

AGNES SMEDLEY

史沫特莱文集

BATTLE HYMN

OF CHINA



1

I15/1

6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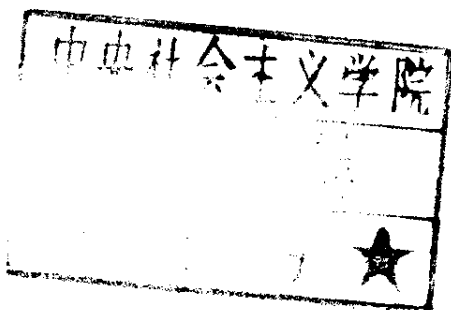
史沫特莱文集

中国的战歌

袁文 賈树榛 袁岳云译



200082310



7

新华出版社

出版前言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自一九二九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踏上中国国土开始，直到一九五〇年与世长辞，她一直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中国人民跳动着同一脉搏。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一直忘掉了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

就是在一九五〇年她缠绵在伦敦病榻的时候，还在深情脉脉地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终因忿忿成疾，贫病交加，溘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她要求把骨灰埋在中国。她在给友人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自有生以来仅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个努力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

1028/26

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史沫特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和支持被压迫的人民求解放的一生。艾格尼丝于一八九〇年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在她幼年的时候，家贫如洗，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在给人家洗衣服，做杂工；父亲则在科罗拉多州洛克菲勒家族经营的矿上当矿工。这贫困潦倒的一家人，依靠史沫特莱一个当妓女的姨妈的帮助，才免于陷入绝境。

贫困和苦难早就在史沫特莱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抗的火种。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在茫茫黑夜中追求真理，她向往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她憧憬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在她十六岁的那年，母亲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悲惨地死去，这使艾格尼丝十分伤心。为了摆脱那吞噬了她母亲的青春和生命的厄运，史沫特莱毅然离家出走，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在艰难的岁月里，她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等。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居然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一所师范学院，并以优异的写作才能当上了学生刊物的编辑。后来经常为进步报刊撰稿，写了不少抒发正义、揭露黑暗社会、同情劳动人民的富有战斗性的作品。

一九一六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开始投身于火热的政治生活。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

斗争。由于她积极参加这些进步的政治活动，一九一八年三月，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捕。根据“反间谍法案”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抗英国统治的叛乱。直到一九二三年，联邦法庭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才正式撤销。出狱后，根据她亲身的经历，撰写了她的第一部文艺作品《铁窗难友》。这时她获悉，她的一个弟弟已被送往欧洲战场去当炮灰，行前，他曾要求见一见被无理关押的姐姐竟不能如愿；她那当小工的弟弟也在一次工伤事故中死去。史沫特莱义愤填膺，严酷的现实使她的思想更加激进了。因此她出狱不久，就积极投身于支持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她编辑新闻通讯《印度新闻》，担任“自由印度联谊会”的执行书记，并为该组织筹款、撰稿。后来由于接连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她才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

在德国期间，史沫特莱除了继续支持印度的民族革命外，还积极参加了争取男女平等权力的活动。她与美国女权运动的领袖玛格丽特·山额夫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于一九二七年请山额夫人来德国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一九二八年，她在柏林开设了一个节育诊所。此外，史沫特莱还在柏林大学教授有关英美的课程；同时，她又劝说校方同意，作为一名学生攻读印度历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用德文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写给学术性刊物，并且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印度历史和妇女问题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还是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舞台上十分活跃的人物。她同德国著名的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成为好朋友。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一九二九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她一到上海，就被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所感动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在他的著作中，对史沫特莱作过一段逼真的描述：

“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之下，一伙码头工人，肩上套着绳子，吃力地拉着装满货物的木板车。突然，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印度巡捕出现了。为了给一辆里面坐着一位傲慢的外国官员的闪闪发光的黑色小轿车开路，他竟然殴打工人们汗水淋漓的光脊背。那时，她感到警棍好象打在自己身上一样。看到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如此对待另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她不禁感到耻辱。她自言自语地说：‘凡是有胆识的人，在这块大地上一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她当时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坚定地表示了要献身变革这一制度的伟大革命。”

当史沫特莱初到中国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共产党人和其它进步人士，横遭反动当局的逮捕和杀害。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史沫特莱，对旧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黑暗腐败的种种状况深为忧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为了把中国革命真相向全世界传播，她决心长期深入生活，和中外进步作家、新闻记者一起，“搬走这座封锁中国的大山”，打开世界人民的眼界，使他们对战斗的中国寄予同情和希望。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尽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但她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她不仅用自己锋利的笔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文章，揭露黑暗，歌颂光明，首次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江西苏区情况传播到国外去，而且还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

卫人权同盟”，利用她的交际才能和记者身份，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中外朋友，向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黑暗暴政。为了支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进步作家的斗争，她曾暗暗地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信联络点和聚会场所。一九三一年二月，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胡也频、冯铿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在悲愤之下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一文，要求译成外文送到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毅然担负起这一工作，终于把这篇战斗的檄文发表在当时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杂志上。

抗日战争前夕，一九三四年底，史沫特莱第二次来到中国，她虽然重病刚愈，却毅然前去中国西北采访。一九三六年，她在西安期间，亲眼目睹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她把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真实情况用英语向全世界作了广播。一九三七年初，她到了延安，访问了许多革命战士和干部，并同朱德总司令作了频繁接触，要求为他写传，介绍他的生平。史沫特莱认为，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者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朱德同志把身世告诉她，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阶级所最关心的事情。为此，她进行了大量采访，并在战斗中实地观察达一年之久，为日后写朱德传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抗日战争开始后，史沫特莱不顾个人的安危，随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她以道劲感人的通讯促使中外记者和进步人士去延安亲眼见识那里的火热革命斗争。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她不仅用她那锋利的笔锋抒发着她对

浴血奋战中牺牲的战士们的深厚同情，而且还到处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国外募捐，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医药界朋友的巨大援助，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她还动员和组织了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在内的一批加拿大和印度医生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身着戎装，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当敌寇对新四军驻地狂轰滥炸时，叶挺军长劝她离开目标较大的军医院，她坚决要与战士在一起；当斗争形势日益残酷时，朱德总司令也劝她转移到敌后较安全的地方，她执意不去，她说：“为什么和我谈死亡的危险，你们不是也经常面临着死亡吗？让我也跟你们一样生活吧，我不想死，我也尽力做到不死。但是，如果我一定要死，就让我死在这里吧。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许多城市象污水坑一样，我生活在那里就感到痛苦以至病倒。但是你们的部队却恢复了我的健康。这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只有在这里，我的心情才平静，我的精神才振奋。”她还说：“你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人民，因为我是属于大地的，我们的斗争也就是整个大地的斗争。”史沫特莱就是以这样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胸襟来看待和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

究竟什么力量使史沫特莱嫉恶如仇、追求光明和奋不顾身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呢？她在《大地的女儿》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她为什么不忘自己的阶级出身。她从不忘记她辛酸的童年

以及她难以忍受的逆境。这也是她为什么远离她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来到陌生的中国，并把她的整个后半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真正原因。当她预感到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那些贫困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时，就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来。

史沫特莱认为，她在旧中国的一切行动中心，“在于要预告中国革命的发生”；她认为她自己全部历史的任务，在于挖掘和发现“中国社会生活的潜流”，并且观察这一潜流究竟要流向何处？经过十年的观察和深入调查，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他们队伍中忠诚的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者到绝大部分的指战员，他们都是全人类中出现的新人，是在旧中国具有全新思想、在当今历史中具有全新风格、高尚情操和坚实理想的新人。史沫特莱十分振奋地写道：“在他们身上，一个全新的成份进入了中国社会。”而且她还坚信，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而且这是亚洲的希望，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希望。

正是基于这一远见卓识，她以惊人的毅力排除万难，致力于介绍中国。她在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的同时，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通讯、报告、杂文和短篇小说，数量约达二百万字。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这位伟大的美国人，在专心写出更多更好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传记文学作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史沫特莱对于她的作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感到莫大的骄傲与欣慰，虽然她受着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但她仍把所得到的一切稿费和讲演费拿来救济中国战区和灾区的孤儿。就是晚

年在贫病交加、处境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在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狂暴里，史沫特莱蒙受了不白之冤，美国陆军当局宣布她是“苏联间谍”。这一罪名使她受到了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她几乎没有栖身之地。到处都是关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或是“卖国贼”的传闻。所有这一切，使她不可能找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剥夺了她集会、讲演甚至出书的权利。就在这一年的八月，曾经和她签订过《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出版合同的美国一家出版社，突然向史沫特莱提出，说她在书稿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是教条的，强迫她进行修改，并加进反共的内容，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表现了宁死也不弯腰的革命精神。

但是，就在她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她从广播里听到了她曾经致力于奋斗的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她激动万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给她来中国的护照，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多么遗憾啊，就在她在伦敦停留期间，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对于史沫特莱的逝世，中国人民是十分悲痛的，为了实现她生前的愿望，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镌刻着朱德元帅亲笔书写的金色题词：“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鲁迅说过：“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史沫特莱文集》。这套文集含有四卷，主要搜集了史沫特莱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她在中国的见闻，真实地记载了她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以及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中南和华东抗日战场的情景，报道了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实情况。此书自一九四三年在美国出版后，连续再版，受到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

第二卷收有《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和《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两部著作。

《中国红军在前进》又名《中国红色风暴》，写的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人民为谋求统一团结、和平奋斗救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同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投靠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进步力量的国民党反动派奋起作战，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五年建军史诗。这部书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以后在西方连续再版。

《大地的女儿》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生动翔实地描述了她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苦难经历和父母的悲惨命运。最后她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参加了工人运动，变成了勇敢的革命者。又经过刻苦自学，成为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这部书是她来中国的前一年即一九二七年写成的，一九二九年初版，以后连续再版。

第三卷《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六十岁以前所走过

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壮丽多姿的画卷。这本传记著作具有它独特的风格。作者把自己置身于书中，并以她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逼真地记述了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了英雄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缔造新中国的过程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事迹。这本书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日文译本初版问世以来，世界各地又先后出版了德、俄、法、西班牙、孟加拉、丹麦、意大利等八个语种的译本，在各国进步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成了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名著。

第四卷收有《中国在反击》(China Fights Back)和《中国人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

《中国在反击》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记下了史沫特莱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八年抗战初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她不畏艰险，深入前线和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书中主要反映了当时华北地区抗日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该书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的命运》主要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动荡社会生活、阶级矛盾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调查，对各阶层人的接触了解，以一个记者的锐利眼光揭穿了旧中国的社会弊端，并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支持。该书在一九三三年先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后又再版过。

《史沫特莱文集》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两书在国内出版过外，其他均为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这次出版

时，对《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某些译文又作了润色和校订。

《史沫特莱文集》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这些记述了中国人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历尽艰辛和英勇斗争的书，既是极好的纪念品，又是激励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决战斗的重大动力。重温她的经历，使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更加奋发前进；对于中国年轻的一代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切有志之士可以更好地学习她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献身精神，学习她热爱人民、深入实际的优良作风，学习她毕生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互助的高尚理想。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光和热。

史沫特莱和斯特朗、斯诺一样，他们的许多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黑暗的中国点燃起信息的火炬，而这火炬又曾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真正是国际新闻界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正如邓颖超同志一九八四年九月致三S研究会的信中所说的：“三S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三S从三十年代起就热爱中国，先后来到中国，他们不避风险，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断地把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以及在旧中国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更加兴奋，不知疲劳地为新中国服务，直到他们的生命终止，还留下遗嘱，把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多么感人，又激励我们热爱中国，发扬国际主义的永恒动力啊！三S为中国各族人民所作的贡献是难能

可贵的，也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向我们三S的老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他们学习！”

我们愿三S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愿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演奏出更加雄伟更加庄丽的《中国的战歌》！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献 给

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
穷苦的光荣的先锋中国的战士们



作者像

目 录

第一篇 早年的回顾

- 一、家世…………… (1)
- 二、亚洲的动机…………… (7)
- 三、欧洲的探索…………… (10)
- 四、遥远的地平线…………… (23)

第二篇 今昔中国 (1928——1931)

- 五、进入中世纪…………… (28)
- 六、学者和无产阶级…………… (45)
- 七、生死场…………… (53)
- 八、上海的恐怖…………… (64)
- 九、鲁迅…………… (72)
- 十、华南插曲…………… (82)
- 十一、上海风波…………… (88)

第三篇 帝国主义和革命 (1931—— 1936)

- 十二、九一八事变…………… (96)
- 十三、民权…………… (105)
- 十四、第一千四百六十九号牌照汽车…………… (109)
- 十五、苏联小憩…………… (120)

第四篇 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 (1936——1937)

- 十六、西安事变…………… (124)
- 十七、人物思想…………… (142)
- 十八、风云人物…………… (153)
- 十九、冲过封锁线…………… (164)
- 二十、奔赴山西前线…………… (169)

第五篇 武汉最后的日子 (1938)

- 二十一、武汉的逆流…………… (188)
- 二十二、红十字会先驱…………… (196)
- 二十三、武汉失守…………… (211)
- 二十四、继续抗战…………… (216)

第六篇 在游击区 (1938——1939)

- 二十五、新天地…………… (224)
- 二十六、新四军…………… (235)
- 二十七、需要“教材”的医生…… (241)
- 二十八、妇女起来了…………… (244)
- 二十九、一个农场的故事…………… (251)
- 三十、转变中的五十军…………… (255)
- 三十一、鬼子的铁蹄…………… (264)

三十二、过江…………… (270)

第七篇 走过华中 (1939年深秋)

三十三、张云逸司令员和四支队… (285)

三十四、游击队伤员…………… (295)

三十五、桂军基地…………… (301)

三十六、战时的安徽…………… (308)

三十七、阴谋诡计…………… (314)

三十八、赤地千里…………… (321)

三十九、传教牧师…………… (331)

四十、修道女友…………… (335)

四十一、皖南事变…………… (344)

第八篇 冬季攻势 (1939——1940)

四十二、鬼子的刀剑…………… (352)

四十三、中国工合…………… (358)

四十四、“告诉你们美国同胞”… (361)

四十五、湖北冬天里的士兵… (376)

四十六、唱歌的将军…………… (382)

四十七、有良心的将军…………… (391)

四十八、兵变…………… (399)

第九篇 再次和游击队在一起 (1940)

四十九、再次和游击队在一起… (403)

五十、我的中国儿子…………… (407)

五十一、挺进纵队和盐矿工入… (419)

五十二、卖国贼与爱国者…………… (424)

五十三、再见吧，游击队战士！… (430)

第十篇 重庆以后 (1940——1941)

五十四、重庆…………… (436)

五十五、医疗队继续战斗…………… (445)

五十六、香港 …………… (450)

第一篇 早年的回顾

一、家世

我家里私下对我父母亲的婚姻早就流行着种种说法。如果背后的议论属实，它说明了两个家族的结合。我母亲的家族是一个勤劳刻苦、很有教养、信仰虔诚的高贵世家；而我父亲的家族里面则是绿林好汉、江湖强盗、流浪者、说书卖唱的、各色人等都有。

我的母亲尚未成年，就跟我的父亲私奔了。我的外公约翰在我姑妈玛丽家里找到了他们两个。玛丽姑妈是个有很多孩子的寡妇，是一个非常能干、个性刚强的女人。她一双眼睛满意地落在我们的外公约翰身上。外公是一个意志薄弱、循规蹈矩的人，外表酷似画像里的耶稣基督。那时外婆还活着。从她那幅褪了色的画像来判断，她是长得很美丽的。外婆辗转床

褥、卧病多年后去世了。她一死我的外公就跟玛丽姑妈结婚了。在密苏里州北部平静的乡村中，和独门独户住得分散的人家里，经常传播着有关我外公一家的各种闲话：什么不吉利的寡妇啦，多愁多病的媳妇啦，毒死妻子的老翁啦……等等。农妇女们四处奔走，各自相告，多少离奇古怪的事，尽出在我的外公家里。

后来，外公得了肺病，备受折磨，面黄肌瘦，终于不幸去世。玛丽姑妈以无限的温存照顾有病的外公，体贴入微，从不说一句粗话，应付他要东要西，没完没了的苛求，她以身示范，严格要求子女。她给我留下了一个身高结实、低声细语，慈祥勤劳的妇女形像。

玛丽姑妈要是生在中世纪，她的才干有可能被当作巫婆活活烧死。她九十多岁以后才放下她那根玉米秆烟袋管。她坐在福特牌汽车里到处兜风，奔走农场事务，直到她临死那天。肖肖白发，闪闪发光，嘴衔烟管，鼻孔冒烟。她的身体太大，死后给她特制了一口大棺材。我还听得人们说我们的玛丽姑妈家庭出身高贵，她来世也决不会坐在天堂的后座的。

我母亲的同胞姐妹兄弟都死得很早。相反的是，我父亲的同胞兄弟姐妹除了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叔叔，都活到高寿。两家的遗传素质汇合在我的身上，使得我的身心成为一个心悸不已的神经战场。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拖着我们全家从密苏里州北部搬到科罗拉多州南部。这个州的一切除了空气，全归洛克菲勒大王的科罗拉多燃料钢铁公司所有。对于矿山工人说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不外贫困、疾病和愚昧无知。我的父亲到科罗拉多州这个地区的运气，遭遇到同样悲惨的命运。我们一家饥餐

露宿在野地工棚里，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思想上的贫困比生活艰苦的窘境更为恶劣。因此童年时代所谓文化生活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冲击力量的东西有什么呢？冥思苦索，只记得我的父亲哼哼唧唧，说说唱唱过的一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民歌小调，小跑马山歌以及赞美吉西·詹姆士一类传奇故事而已。我的母亲唱过什么，我可记不起来了，她总是日夜操劳，心情忧伤太过了。

十五岁以前，我除了知道世界之大，只有洛克菲勒领地所有科罗拉多州南部和新墨西哥州州北一带，天外有天，还有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我的父亲当矿工、干粗活，原来的抱负落空，经常喝酒解愁。我的母亲做零活，当洗衣工和宿舍看门婆。我们史沫特莱这一家五个孩子，想尽办法节衣缩食，上当地贫民小学念书。可是我小学没有毕业，中学也没有上过。看今天的一般高中毕业生程度，我虽未念过高中、上过大学，但并不遗憾终生！然而我常常想着为我具备一些科学、数学、文学、语言的基础知识，好在走入社会、接触生活当中思想上的武装可能更完善些。我少年时期的贫困和无知，同千千万万其它少年一样，是“私人利益”祭坛上的牺牲品，长时期以来我是这样想。

我们兄弟姐妹上的学校同一般学校一样，并不枯燥乏味。然而我的思想没有受过严格纪律训练，语法分析和数学练习需要勤奋，这对我无缘。我学习语言的努力后来以可悲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在学习德语方面，我努力吸收了一些优美华丽动人心弦的辞藻语句。我从学校、家庭和社会生活里接受我感兴趣的东西，人云亦云，对我是无缘的。我的母亲和德喜镇矿区一个

红头发女教师倒认为我是可堪造就之材，总是督促我多受点教育。教育似乎在于读很多很多的书，但读哪些书我并不知道。我暗中摸索了几年，什么东西一到手里就读，总要把它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啃完。有些词句念过，往往囫圇吞枣百思不解，神秘地相信知识的钥匙在于攻克语言这一关。我阅读的东西涉及无聊的传奇小说，学校规章制度和《行为心理学》一本使人头痛的书，其中碰到一本大部头书名为《乐府》，它是用薄薄的白纸印的，挂在厕所的钉子上顺手翻着很方便。是一个名叫莎士比亚的人写的。它象一部天书，我看不懂。若干年后我总是阅读那些从伟大人物那里得到自己最初高尚情操的人物传记。二十岁以后我才知道莎士比亚其人，四十岁以后我方读完他的诗。在矿区工棚里，莎士比亚对我丝毫没有起过什么影响。我把《乐府》挂到厕所原来的地方。

学校生活里有很多我讨厌的清规戒律，有钱人家的小姐对我百般凌辱，教师经常把我扣在学校里给我上资产阶级一套循规蹈矩的德育课，教育我成为一个小姐。那是白搭。我经常用曼陀罗竿子和石头同男孩子们打架。九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叫我去帮人洗锅盆碟碗，照看哭喊不休的婴儿，随后到一个卷烟铺子撕烟叶，因为我浪费太多被人解雇了。老板说我读书太多不是一个好工人，“这是你一周的工钱，下周不要来上工了”。他给了我两元五角钱。以后几年我都是干各种粗手笨脚的零活。

人们有时把宗教当作是一种文化势力，我没受过宗教教条的严格陶冶，这点我很自豪。容忍凯撒掠夺一切的屈服精神，我可是没有那种宽恕德性。我总把长生不老、下世升天的信仰

看作是懦弱的表现。我从小就听说，世上的万物总是有终的，要得到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到手，否则就一无所得。

十六岁那年，我的母亲由于积劳成疾，营养太差，无钱就医，病魔缠绕离开了人世。我的父亲双膝跪下号啕痛哭了一场。然后打开她破旧的铁箱，从一堆破烂布片里翻出了四十五块钱，带着儿子上小酒店喝酒悼亡解愁去了。我的大姐在分娩时去世，留下了一个男孩。从此我成了我们这一家的大孩子，担负起这个小外甥、妹妹和两个弟弟的生活重担。

我要是多象我的母亲少象我的父亲的话，就会不可避免的挑起这副家庭重担。我母亲的遭遇苦难使我怨恨，我拒绝紧跟我母亲的足迹走下去。宇宙之大，无奇不有。我除了放牛娃、矿山工人、驭联兽者们讲的故事以外，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一无所知。我知道哥伦布飘洋过海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也听说过我的祖辈们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侠盗吉西·詹姆士爬火车，打银行，劫富济贫。男人们可以走遍天下，为所欲为闯出新的世界，而女人们只能坐在家里围着锅台转、夫唱妇随、生儿育女、命运注定，夫复何言？但我却反对这个，不能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对妹妹和小外甥的照顾作了初步的安排以后，把弟弟留给父亲，然后我开始过着一种漂泊无依、到处流浪的生活，走上人生的征途，去奔逐那前途未卜的岁月。

我的早年生活以母亲去世而宣告结束。说来无关宏旨。父母生养了我，我生即我在。人生一世，为何奋斗不息？我也不清楚该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时期开始，迫切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还是衣食生活

找出路的问题。我的姨母帮助我去学速记。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总找不到一个固定的职业。我周围的女孩子们发音不准，标点都错，我也马而虎之效尤，乱说乱点。她们倒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地记下工头矿长的意图，一转身就把速记打出来了。而我呢，牢骚满腹，愁绪满怀，当不成一个好速记打字员，只好成天打零工。好几年中间，速记员、服务员、推销员、卷烟工等等，我都干过，有时喝西北风，坐以挨饿。“继续受教育去吧！”我母亲的声音在耳畔敦促着我跑图书馆去看书，但我不知道读什么书好。有时候我到学堂里去找活路干，当清洁工又当旁听生。我拼命筹谋在亚利桑那州滕壁谷的师范学校当了一年这样特殊的工读生。

这一年的师范工读生的生活，产生了对我一生有影响的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对于自然科学特别是对生物学有了入门的知识，因而对它发生了兴趣。第二件是我对一个美国籍瑞典妇女的亲密无间的友好感情。她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到西部来为的是同她在亚利桑那沙漠工作的工程师弟弟更靠近些。不久我同她的弟弟结了婚。过不久我们离了婚。但我并不责怪他。婚约解除后我俩倒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持续我的一生。他过了很久才第二次结婚，生了几个可爱的孩子，他的妻子和我也结成了密友。性是男女之间主要的纽带，我永远憎恨这一信条，我以为友谊更合于人性。我从来不能以性生活关系来限制自己，两性关系在我看来只是对妇女各方面的桎梏。婚姻对于妇女，说好，充其量只不过是经济的投资，说坏，穷其极无非是人类社会奴隶制度的残余。古往今来彻底解决婚姻问题的社会，我还没有听说过。十多年后我在苏联对人们说，在国际妇

女节大会上，红场列宁墓前只有一个妇女代表讲话，其余通通是男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妇女这个问题也不过如此。

二 亚洲的动机

二十岁刚出头，我离开了西南的科洛拉到了纽约。在这里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我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将近四年。这中间我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印度流亡者拉那·赖巴特·赖伊老教授指导我自修印度史，他打算送我到印度去当教师。同老教授往来的印度青年朋友们说，印度唯有通过革命、推翻英国的统治，如美国革命获得独立自由一样，才能对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也深信，只有推翻英国的统治，才能振兴印度。这个信仰是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产生的，实际上我这里也成为印度青年朋友们的联系中心。正是因为我保留有跟他们通信往来的联络密码、国外地址等等工作上的联系，一九一八年我以破坏美国中立法非法活动的罪名，被关在纽约汤姆士监狱。尽管我从来不认识一个德国人，也相信自己仅仅为一个被奴役的亚洲民族印度人民的革命运动做了一点联系工作，然而我却受到为德国谍报机关服务的莫须有罪名的风波而坐牢。

几年后我才知道印度流亡者在欧洲确实有一个有组织的流亡政府，并且从德国政府那里领取过一笔财政援助贷款，把武器军火运往印度。德国人支持他们，但他们并不为德国人所利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不久，对我的起诉全部撤消，我被宣告无罪释放。六个月的狱中生活，使我得到一个读书写作的

机会。朋友们给我送进文具纸张和书籍。我生平头一回不用为生活吃穿发愁，而可以专心致志埋头读书。我最初的一些短篇小说《牢友》就是在狱中的习作。

出狱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小小弟弟当兵到法国去作战，他特地路过纽约，一再探监想见我一面，但承办我的专案人员检察长拒绝接见，对他说我是美好把他打发走了。我的大弟弟帮人干活打零工，出了事故不幸死了，厂主给我父亲付了一笔五十块钱的埋葬费。象牲畜般受鞭打，他该有欢乐的童年，却为了活命挣扎在死亡线上，年纪轻轻，早离人世。我的小小弟弟十七岁不到，为了生活出卖劳动力，为了爱他妈的祖国参军到欧洲战场去当炮灰，生命既无保障，更谈不上受教育。由于个人的风波冤案，祸及兄弟，骨肉分离，使我心伤。这些，都是我出狱前祸不单行的事。

个人的生活问题使我走投无路，彷徨不可终日，加上兄弟的命运，个人坐牢，简直使我的神经错乱到发疯的程度。刚出狱时，我的脾气特坏，境遇悲惨。二十多岁的年纪，正是中产阶级青年男女结束学业，开始事业的时候，人皆有家，有保护人，有指导者，我并不嫉恨具备这样优越条件的青年男女，只是以为他们所有的唯愿世人也均能享有。

我是一个女子，妇女都是要结婚的。如果可能，同“金钱”结婚。如果对“金钱”、对结婚都不感兴趣，那就命运注定她一辈子就算完了。我唯一的想法只有照旧同过去一样生活，我行我素，白天做奴隶、找工作，晚上想办法上夜校听课。以后又怎么办呢？在走廊过道的阴暗角落里的床头上消磨岁月吗？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残酷，无法逃避。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也带来了某种和平景象。德意志共和国已经诞生，但它的命运完全由战胜国家摆布，被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手里。俄国革命已经发生，但俄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正同十四个侵略国家作战，其中也有我们美国在内。俄国人民正在上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无情的大课，唯有他们自己的武装战胜外国侵略军的武装，他们才有选择自己的文明的希望。

美国共产党在纽约成立了，我没有参加党的组织，但我认识很多美共领袖人物，也拜读过他们一些人写的文章和著作。多年以来我对共产党人的观点寄予同情，后来在中国，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给予积极支持。但是，我不能够把我的身心一切毫无保留的交给共产党领袖人物去任意支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正确，比别人高明，但是我决不能成为那些以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一把、而且天下只此一把打开真理大门钥匙的人们手中唯命是从的工具。

因为这种立场，我经常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说我是共产党，赤色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说我是个人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民主人士。等等，说法很多。有一个美国女共产党员早就给我取了个“史沫特莱分子”的绰号，这称号，我倒是深深满意的。

一九一九年年底，有一天我在纽约港区船舶公司的航运办公室申请工作，得到一艘开往欧洲的旧轮“美国—波兰”号运输轮上充当服务员的位置。我和另一名女服务员受雇当临时工，负责船舱甲板和三等舱旅客房间的清洁卫生工作。我去欧洲，除了同住在欧洲并在柏林出版发行的一家小报的印度流亡

者们有过一点微乎其微的联系外，既无具体的地点又无明确的目标，更无个人的组织关系。私下有一个愿望：但愿我能够找到那些印度流亡者中间任何一个。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然后去苏联观光。如果可能，在开往印度的什么船上找个临时工作最后到印度去。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至少在生长我的这个大地上我可以经风雨、长见识，青春不再来，我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的生活下去。

三、欧洲的探索

货船到达但泽^①，我便舍轮登岸，到柏林去寻找印度流亡者们保持的小小办公室。在那里我头一个见到的就是印度革命领袖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我在纽约时经常听到印度流亡者们谈起他，组织印度流亡政府、建立遍及全球的印度革命活动网的也是他。事实上我之所以被捕坐牢，也正是因为与他和他的战友们的联系往来的关系。

机缘迫使我观察维云德拉纳什·乔托巴底亚亚的为人和他过去的生活经历。经过短时间的了解，我同意和他结合，这不是合法的婚姻。但我却用他的姓氏，人们知道我是他的妻子。我们相处将近八年。关系错综复杂，到后来使得我的精神心理病态日益加剧。

我是不是爱他？这我并不确切知道。我们分手若干年后记得在给一个美国友人的信中，我回忆分离多年的维云时这样写

^① 但泽就是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译注

道：“维云照旧是我感情生活的中心，这使我惊讶莫名，也使我肝火上升。他如果处在危难中需要我去帮助，我是可以赤脚走遍天涯海角去助他一臂之力的。但要我和他再相处一日，可万万办不到”。往事已成陈迹，心病愈合不再求医。时间一再证明，他无疑是爱我的。是我还是别人终不明了个中究竟，因为他对女人过去是少有兴趣的。

维云十三年以前同一个信天主教的爱尔兰姑娘结过婚。那姑娘想尽一切办法要他这个异教徒皈依天主均遭到他的拒绝，最后从主教那里买了一张结婚特赦证书，婚礼过后她对他说婚姻附有一个条件，就是所生子女均信天主教。俩人争吵不休，终于比翼分飞，那姑娘出家做了修女，隐居在英格兰一个隐蔽的修道院里。维云好多年来提出他们的婚姻无效的起诉均遭驳回，年复一年，累诉累败，因而我们的结合得不到法律上的承认，以致若干年后，我的美国公民国籍先后两次受到英国秘密警察的挑衅，他们在起诉书中别有用心的诬告我是英属印度臣民。后一次我对美国驻中国的某总领事官员说明我的经历时，他大为吃惊。我说：“我的丈夫同一个天主教修女结过婚，因此他不可能同我结婚，你可以说我是他的小老婆，任随尊便。但我可不是一个英国臣民”。

总领事官先生摊开双手，深为失望。

维云德拉纳什这个人 是印度革命运动地下活动者的缩影。也许他是印度流亡国外致力于革命运动的卓越的领导者之一。在年龄上他几乎长我二十岁，但有一副敏锐清醒的头脑，性格刚毅果断，对敌人象战士般冷酷无情。他面黑癯瘦，一头黑发两鬓斑白，举止庄重，威严可畏，乍一眼会以为他是南欧人。

要不就是突厥人或者波斯人。在我的眼里他象迅雷、闪电、暴雨。他对于那些迫使他的祖国屈服在殖民主义脚下的三岛帝国分子的仇深似海，难以探测。

他的感情生活的基础奠定于海德拉巴德邦的封建回教徒家里，还得加上他在英国、在欧洲、在近东受过二十五年以上的理智训练。他生于一个诗人、歌手、教育家、科学家人材辈出、赫赫有名的婆罗门望族乔托巴世家。他的一个妹妹莎罗金妮·奈都是女诗人和国大党领导人。他的小弟弟同后来成为一个伟大妇女领袖的喀玛拉·德维结婚。家族血统属于印度雅利安种，文化教养混合印度教、伊斯兰教、英国自由主义三位一体的菁华。维云的父亲先赴英国后到德国学科学，是目无印度阶级种族法规的第一批婆罗门先行者之一。结果遭到婆罗门上层社会的放逐，被迫迁居信奉伊斯兰教的海德拉巴德邦，他成为海德拉巴德邦现代大学教育的先驱。

维云在他的父亲和伊斯兰学者以及英国家庭教师的培育下造诣很深。通晓英、德、波斯等语言。他的母亲是一个女诗人，妇女解放的拥护者，伊斯兰教的蔑视者。他从小常听到他母亲一提伊斯兰教徒就嗤之以鼻。潜移默化的母教使他的内心深处产生从不屈服和决不和睦的情操。这只是他内心冲突的各种矛盾之一，并且造成了他的理智和感情生活。

维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和耶那大学致力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他说一口英国统治阶级绅士们讲的英语，也学过法语、德语、瑞典语，并且多少知道一点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他在瑞典住过几年不但掌握了瑞典语并且续攻冰岛语。一九二一年我刚到德国不久，他和我作为印度代表团的成员到苏联，他很

快俄国化了，一有机会就去找冰岛人、立陶宛人，要不然就去吉卜赛人的帐篷里跟他们会话，对照古梵语对语言学进行比较、研究。

维云同尼赫鲁等其他印度上层阶级人物一样，吸收了英国式的自由传统。他把英国一套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运用于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中，实践结果激起了英国绅士们的普遍愤怒。他们中间有些是正统的婆罗门阶级出身，有些是各阶级出身的人物，都是早期印度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中恐怖主义分子，也是印度前期的教育家、科学家、艺术家、工会活动家、后来的共产党人。他们用手枪、炸弹、匕首暗杀英国在印度、埃及的统治者。有的被枪毙，有的被绞死，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世界上有印侨居留的地方，就有他们一类印度革命党人在进行活动。

印度留英学生每年夏天到欧洲大陆度暑假，他们旅欧消假的目的之一总要到维云家里作客。他同留学生们的谈话措词激烈，有些对话甚至不敢外传，因为他猛烈抨击印度教的阶级偏见和伊斯兰教的封建迷信。他当着伊斯兰教学生们的面吃猪肉，当着印度教学生的面吃牛肉。他对信印度教的人说印度教是“牛粪教”，对信伊斯兰教的人说伊斯兰教是“猪屎教”，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使得两教信徒惴惴不安。他讽刺某些全盘英化，学诗要学英国诗，印度古诗不念了，唯有英国的月儿最圆亮，甚至以为天堂在英伦，死后升天幽灵也要赴西方极乐世界的留学生。他还百般讽刺那些想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誓想青云直上的官僚分子。他谆谆教导他的学生，告诫他们不要碌碌无为，象那些书记录事望着时间闹钟、过按部就班、受人尊敬的

生活。一个人必须战斗，对人要活下去的问题他总用伏尔泰说的“我看没有必要”来回答。

他的言行如一。除了一身换洗衣服外别无其它应酬往来的礼服。他那套衣服我总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熨了又熨。至于吃的他根本不讲究。手头有钱随手就给急需用钱的人，因此我们经常负债。钱只是他为祖国的独立而工作的手段。后来我在中国见过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知识分子对子女教育所采取的态度，同印度的家族相同。

维云德拉纳什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赢得印度真正独立的指南。最后他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印度共产党党员。我总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一行动对满腹印度三藏经论的他，会有什么新的打算。我也很难想象他在思想上、行动上听从党的指挥紧跟党的路线。他以整个世界为区域，汲取各个世纪的精华，形成他舍身为国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

我和维云的同居，一开头就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碰头。我是一个美国劳动妇女，乱七八糟的商业文明的产儿。他是一个印度婆罗门的望族子弟，玄之又玄加上英国古典传统教育的产儿。他恨英国的一切，但更鄙视用金钱衡量一切事物的美国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现代的，但他的感情却深深扎根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之中。

他的生活象暴风雨。熟悉了解、影响接触他周围的一切。是他不是我，选择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家是印度联合大家庭的小小翻版。印度友人有了病就来我们家里，由我护理，有一回我同时照看过两个印度病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四个种性阶级的人士，象上车站或住旅馆般川流不息地路过我家，歇

脚作客。学生们一下轮船就背着行李铺盖、饮炊餐具直奔我们的家。有些学生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引人注目。一个学生给自己买了一顶有一球葡萄的女式无边草帽作缠头巾，自以为风流潇洒，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劝说他不要再戴草帽惹人笑话了。

我们穷的走投无路，有时揭不开锅，因为维云身无长物。我把随身带来的东西典尽卖完，以度时日。一九二三年年初，德国政府在英国政府的抗议下命令维云离开德国。于是我们经常改名换姓搬迁住处，而我们的债务和困难却成几何级数增加，问题成堆，债台高筑，日子真不好过。有时境遇稍有好转，但新的问题又压得人喘不过气。伊斯兰教徒和他们的半出“深窗”^①的妻子有时到我们家作客，有时我们到他们家里包括公开走出“深窗”的人家如印度伊斯兰教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夫妇家去回拜。真纳为人刻薄寡恩、世故圆猾，他是一个大地主，同孟买的一个大资本家百万富翁的女儿结婚。真纳夫人当然不会是一个雌伏深窗、克尽妇道的贤惠太太。她是一个美人，也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交际花。她总是袒胸露臂，上身什么都不穿，随随便便把云纱头巾披在奶罩上。

维云对真纳夫妇寄予过希望，想动员他们为印度留欧学生设立一笔学位奖学基金。某次他们前往德国某温泉去疗养，邀请维云去作客，维云兴致勃勃地应约赴会，他们对于学位基金的事毫无兴趣，只是为了消磨时光邀维云去聊天而已。维云可是一个健谈家，而真纳太太则有一个难题需要维云跑腿，解决她在

^① 深窗，即指印度种族阶级社会上层妇女起居室内，避见外人的教规制度。——译注

那边买不到而在柏林商店采购的胭脂口红化妆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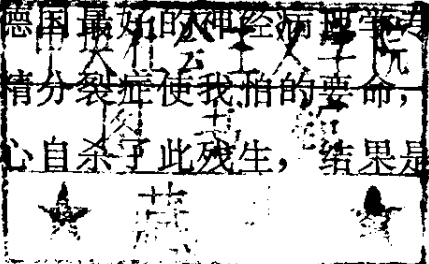
这类跑腿的事务激起了我内心深刻的厌烦，加上家务琐事也使我非常恼火。每逢印度教伊斯兰教过年节时，我们家里总有十来个教友席地坐成一圈，欢度佳节。按照印度人好客的规矩，款待佳宾让客人饿肚皮回去是失礼的，因此长流水的饭菜准备没完没了，尽管我们家徒四壁，但咖喱鸡的香味弥漫全室。

维云性情开朗，交游广阔，身体强壮，而我在贫困和复杂的处境下日益萎靡憔悴。人人了解维云，喜欢维云，但知我者寥寥无几，在人们的眼里，我是一个变得越来越古怪的怪物，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维云的小妹妹苏哈辛妮从牛津第一次来看她的哥哥，目睹他们兄妹见面的情景，使我感到同维云结合，他的人格高尚，品学兼优过人。他出国以后小妹苏哈辛妮才出生，她的母亲就给她唱催眠曲，讲她大哥流亡国外的事。英属印度政府限令他的父亲离海德拉巴德邦在加尔各答家里终身监禁。苏哈辛妮的童年在多灾多难的悲惨家世中度过。英国警察特务不时闯进她家，翻箱倒柜。折腾抄家，撕破床上的枕头，剖开苏哈辛妮的玩具，搜查她的父亲身上是否藏有流亡海外的儿子的信件或通信密码什么的。她年高的老父在软禁中悲愤去世。

苏哈辛妮是一个音乐家兼歌唱家，出身望族，天生丽质，花容玉貌、明眸皓齿，一笑生媚，在她生平第一次站在她大哥面前的时候，兄妹两人泪眼相对，默不作声，苏哈辛妮情绪激动，全身颤抖，维云脸色紧张，内心斗争激烈，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光阴过去，家里来了个亲人真作梦也没想到。苏哈辛

妮的来到一定使他百感交集，悲情大发，想起了去世的父亲，祖国的乡土，个人长年的流放生活。苏哈辛妮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工会组织者，回到印度以歌唱家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她深信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念是在维云的启迪下产生形成的。她那婆罗门贵族出身的花岗岩漂亮脑袋后来能够俯首同贱民阶级出身的贱民们平起平坐，那是难能可贵的事。维云一家学识渊博，出身高贵。破除婆罗门特权的枷锁，父子相承，兄妹相及，献出所学的一切为祖国印度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为流亡者的革命事业全心全意服务。也许，我对于他们兄妹这一类爱国志士的推崇和仰慕，使得我插身其间少有自知之明。在我的眼里，维云热爱祖国，争独立自由的热情感染了同他往来相知的朋友，使他们深受鼓舞，在我们最不愉快的时刻和名义的婚姻生活中使我决心跟他一起的正是他的品德和智慧。

我青年时期的种种遭遇，加上飘零德国同维云一起苦海无边的生活，使得我心悸神伤到了精神错乱的边缘。有两次我不辞而别，只身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去寻找安息，恢复健康，在那里想好我到印度去的未完的旅程，伦敦的朋友为我奔走想办法弄去印度的护照均告失败。原因是我在美国坐过牢，同印度流亡者联系，在印度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同维云的关系等等。于是我病了，整天昏昏沉沉，不言不语，希图忘却一切，于是我辗转床褥，三年不起，德国最好的神经病学家都束手无策，医治不好我的病。精神分裂症使我怕得要命，长夜恶梦使我头脑发胀，有一回我决心自杀于此残生，结果是徒然损伤身体，自杀未遂。

一切办法我都试过，全都失败了，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

一个神经病理学女专家，她同弗洛伊德合作共事过，是柏林法庭的精神病法医，也和柏林大学有联系。用精神分析法持续治疗我的顽症两年多，真是苦海无边，痛苦之极！在这一段难熬的岁月里，我在梦魂中眼前经常出现一个幻象：我的掌中托着一个中国小磁玉净瓶，口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说个不停：“甘露净瓶，美不胜收，净瓶甘露，胜美难收”。突然掌中的净瓶自爆了，磁片落地，幻象破灭。这个幻象日夜烦扰着我心神不宁，得不到安息。它象征着我的生活，病情有了转机，幻象偶或出现。它萦回脑际使我总忘不了。

我的健康恢复过来了，开始教大学生的英语课，重新研究印度史，当了柏林大学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师，有时也上几节印度史的课，柏林男女演员计划演出一出英国戏剧，我担任演员们的家庭教师，因而同戏剧界人士有了接触，交了不少朋友，有一个醉心于心理学研究的女演员梯娜·杜律克丝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很古怪的德国女演员，同干那一行的演员一样家里藏书丰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她是我的文学、建筑、音乐、戏剧各方面的老师，我们同到奥地利避暑，在那里的萨尔斯堡参加莫扎特节听名曲，以后还同游奥地利和德国南部一带地方，参观了许多历史名城和大教堂古寺院。

作为对抗与日俱增、成长壮大的共产主义的一种反动逆流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正在德国兴起，我们很多人看它不过是风行一时转眼即逝的时髦风尚而已。由于忙于生活和恢复体力，我对希特勒的一套主张深感厌烦，没有下功夫研究它。维云德拉纳什有一回到巴伐利亚来劝我和解跟他回去，在返回柏林的途中驻足慕尼黑，出席了瓦格勒的名歌剧“指环”音乐会，晚上，

我们跟一些人走进一个大厅，赶巧碰到希特勒正在发表演说，冤家路窄，真活受罪！除了希特勒歇斯底里地唾沫横飞，拳头乱舞，大喊大叫的凶相外，讲了些什么我没有留下一点印象。

我的身体好了些，决心挑起另一副重担，即上大学听课并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没有大学毕业的文凭，但是根据德意志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凡能提出研究著作者，无论男女，假如被认可通过则授予学位。我提交了两篇关于印度史的论文，均发表在德国历史权威杂志上，其中一篇登在卡尔·郝学斐尔教授主编的《地政学报》上。郝学斐尔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将军，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后，即受巴伐利亚参谋总部委任以军事观察员身份驻日本工作。地政研究所由他主持负责。因为发表了我的论文的关系，我特地前往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他的家里登门拜访他，请他保证让我进入大学。现在清楚了他是推荐希特勒当纳粹党首领的支持者之一，他的研究所当时已成为纳粹党徒们潜伏的参谋总部。给希特勒提供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血统与土地》一套思想的正是郝学斐尔及其研究所。虽说郝学斐尔教授的夫人是一个犹太混血儿，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由许多笔杆子提供材料凑成的一个大杂烩，其中也有郝学斐尔^①的份儿。

郝学斐尔一帮是宣传妇女劣等的，他为什么刊登我的文章，愿意当我上大学攻读学位的担保人。原因何在！我却不得而

^① 卡尔·郝学斐尔（1869—1946）德国地理学者。1887年任陆军军官到印度、东亚、西伯利亚等地活动。1908年受巴伐利亚参谋部委任在日本进行收报工作。1919年起任闵行大学地理系教授。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后他以战犯而自杀。——译注

知。也许是由于我同亚洲的印度有某些联系的关系。我在印度史论文的前言中谈到统治印度的国家是欧洲的白种主子。显然，郝学斐尔希望同亚洲人取得联系。他邀请维云德拉纳什和我到家里作客不无原因。他的态度生硬呆板，一点也不热情，沉默寡言，待客并不友善，是一个性情孤僻、疑心很重的人。

我虽然取得了上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资格，但很快看出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我欠缺科学和数学的基础，赶不上班上其他三四十岁年纪大的研究生。他们大多数都在大专院校和中学任教，回到大学进修，攻取他们最后的学位的回炉生。我一边读书，一边谋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掌握语言工具。经过短暂的奋斗，我放弃了梦想已久的博士计划。

我指导的柏林大学研究院英语研究班级的闹声，同远处临近的报发机极其相似。各班上的各色人等，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纳粹党人都有，他们动口动手辩护各自的观点，而纳粹分子感情用事辩护自己的一套胡说。几乎每个班里都有一帮好决斗、满脸伤疤的纳粹分子公开攻击德意志共和国、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人和犹太人，一帮纳粹学生有一回在班上攻击我。说什么“让德国人听一个剪短发、吸烟卷的外国女人上英语课，足以证明德意志共和国已经崩溃没落了的事实”。

这时，柏林有一批共和党、社会党、共产党的医生组织了德国第一个国家节制生育临床试验班，我参加了这个试验班。玛格丽特·山格尔夫夫人给我们第一个研究小组提供经费，德国政府不久接管这个试验班并在各大城市成立分会推广节育工作，直到纳粹上台强迫妇女回到厨房里去工作才停止。有一

回我同一位女医生和她的丈夫就妇女生育问题发生了一场辩论。男的在公共保健站工作，他主张既然男子可以征集入伍当兵，则女子亦可征集入伍为妓。他歧视妇女的程度同英语班学生中间一些纳粹分子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班上的纳粹学生给柏林大学研究院英语班班主任气势汹汹地发出警告，指责班上开展计划生育的讨论是反常云云。

德国人民正在吞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苦果，对战胜征服者们的仇恨之火日益滋长。我们寄居的那条街上天天听到吃不饱饿死人的事，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见到送葬的行列进出那条街上的小教堂。记得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有一天，一个从法国占领区鲁尔的补鞋匠倒在我家附近的街门口快死了，怀里抱着一个用破烂包卷着只有骨头的婴儿，一群妇女围在旁边七嘴八舌正在议论怎样抢救孩子，我赶忙对婴儿进行护理，直到人们找来城市福利局的人把孩子领走方了。

我经常站在杂货铺子的角落里，冷眼旁观那些奄奄一息的工人们为了买两个黑面包，几斤土豆，一斤人造黄油，把一周工资以千万马克计算的德国纸币花得精光。肉和水果是他们不敢问津的。糖买不到，有点糖精也不给工人供应。为了找外币，妇道人家找外侨包伙或寄宿，那些卑鄙下流的外国人干尽了龌龊的勾当。这期间，我见过许多美国银行家、实业家，其中包括大通汽车公司的一个代表在内，他们无不把德国的贫困和艰难绝境当作外国资本投资的金矿，用高利贷牟取财富，他们以极为苛刻的条件要求政治上担保对革命进行镇压，这点局外人无从获悉。后来纳粹分子全凭政治上秘密保证绞杀革命。经济上依靠外国资本家的财政援助则是人尽皆知的事。

纳粹运动之所以兴起成长，在于希特勒的国社党分子利用德国人民的普遍悲观失望情绪和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处理欠当难以接受的条款，剽窃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的社会革命的理论，高喊复兴德国革命的口号所致。他们拥有来源神秘的金银宝库，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进行挑战，力图以阴谋诡计夺取政权。由于党羽力量相当薄弱，便乞灵于政治谋杀手段，他们复活了欧洲中世纪暗杀团的一套手法，他们晚上活动，对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民主教授和犹太人等绑架暗杀。

一般德国人谈起国家大事言词激烈，义形于色。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是一个有纪律受过严格训练的有希望的民族。不过他们的铁血教育也未免太过份了。一个俄国共产党员说，德国工人只能在德国国社党通过了准许工人革命的法律后才敢起来革命。柏林工人在路斯特公园集会举行示威，警察的马队冲散游行队伍时，人们沿街四散奔跑，但不敢践踏草地一步。

至于德国妇女卑微屈贱的德性使我想起了我和维云租赁房间的那个女房东。她的情况可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问题。她操劳家务，照料丈夫子女的生活，男人打骂她习以为常，有一回把她打得遍体鳞伤，卧床不起，快要断气了。我和维云跑到警察局去报案，警方人员说，警察不断家务事，如果本案中妻方被殴打致死。警方始可按谋杀罪条款逮捕其夫法办。

正是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黑暗和战后德国元气大伤，人民在痛苦中煎熬。使得国门半开，纳粹党徒乘虚掩入，在人命危贱、朝不保夕，社会动荡，万方多难的时期，饥饿失望、政治蔽端席卷德国各地。千百万德国人希望休养生息，谁许诺给他们吃的穿的安定和平，他们就跟谁。当然，纳粹提出了种

种诺言给人民以衣食住行教养生息暂时安定和太平的诺言，德国人民饮鸩止渴，接受了纳粹的应急一时的药方，同时献出了人为万物之灵与禽兽有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唯一可贵的东西。几年以后我重访德国，听到人们骄傲地说：“希特勒想到了我”。

四、 遥远的地平线

告别了美国，前往印度，暂驻足欧洲大陆，又远走中国。尽管我把欧洲当作旅途的休息站，但一眨眼八年过去了。有时候我想，年华似水流，八年一觉欧洲梦，多半时间空度过，那正是我青春的黄金时代。人生难得有自知之明，旅欧八年，我知道了我自己是个什么样子；身体是人生战斗的资本，我卧病近四年，但终于恢复了健康。我扩大了眼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同德国人民多少有过接触，体验了一点德国人民的艰苦生活，更多的是我同印度流亡者有过结合，更体会了一些有关印度和印度人民的斗争情况。

我和维云达拉纳什的结合于一九二八年年初终止。对我来说，私人生活，从此一刀两断；政治思想，从此各奔前程。维云在我的眼里，他是整个雅利安种族悲剧的化身。如果他生在英、美，以他的才干置身于当代伟大人物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我跟他一旦分离，即不在一起生活了。自是后到一九三三年重见过他一面，时间已五年过去。行云流水，艰苦岁月已成过去的往事。震撼世界的事件，历史的暴风雨正在五洲震荡，希特勒正在威胁欧洲，维云早离德国到苏联同列宁格勒科学分

院产生了联系。我离华赴苏到高加索疗养院休养，路过莫斯科他特地去看我。他老了，身体垮了，头发白了，他思念家乡，想回印度的内心呼唤折磨的不成人样了！但除非他火葬升天，骨灰飞扬，魂游故国。此外，英国警察决不可能终止对他的迫害，是要缉拿他归案法办的。自莫斯科重逢一见后，他的下落我再也无从得知。

为了完全摆脱他对我的影响，获得身心的自由，我在一九二七年前往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住了九个月，在那里我写成了我的第一部书《大地的女儿》。这是一本极力设想重新安排我的生活道路的尝试集。一九二八年年年初我重返柏林大学教英语，暑假里到法国度假时打定了先去中国、后去印度的主意。这之前我费了两年功夫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分裂统一战线对共产党发动清剿，阶级斗争碰到了悬崖绝壁而突然逆转。许多中等阶级出身的中国革命者逃到欧洲和苏联，我跟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还得到一位中国朋友的帮助，编辑了一本书。维云德拉纳什曾力图把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不让落在中国革命之后。我被卷入印度革命的漩涡已久，加上寄身德国的动乱生活，这时又加上中国革命的新的因素，就在这时，我参加了中德两党年青的共产党员们在柏林种种各持己见、有时挥拳动武的辩论集会。

共产党人成立了反帝同盟，维云德拉纳什是反帝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印度代表团出席了布鲁塞尔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贾华哈尔拉·尼赫鲁为印度代表团团员，他会后到柏林，我在柏林见到了他。他是一个文雅温和不引人注目的人，同一

般印度革命领袖人物风度不同。他那样的温和谦逊、沉默寡言，人们很难以想象他是一个政治家，然而他在印度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中国大革命给他的印象很深。印度没有革命的武装，这是和中国不同的。中国、印度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武装革命是甘地的追随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经常争论的一个课题，维云德拉纳什是一个坚持武装革命斗争的印度共产党人。

一九二八年，我从法国度假回德国途中在梅因省法兰克福市小住，遇到了《法兰克福报》几位编辑，我们签订了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的合同。我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希特勒快上台以前，纳粹党执政后，第三帝国接管了这家自由主义的老报纸。

我离开德国，踏上征途，独当一面，肩负起新闻事业的重担，这方面可以说初出茅庐没有经验。有时我想，这个新任务可别吓倒了我。新闻天地可以解脱我的苦境，但东方世界地处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又使我感到孤独，苟余心其正直兮虽辟远其何伤！我带着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的矛盾心情，向车站送行的朋友们挥泪告别，列车隆隆开出柏林，取道苏联奔向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

我到过苏联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一年作为印度代表团团员在莫斯科住过半年。第二次即这一次是在一九二八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的特派记者路过苏联经哈尔滨到中国，在莫斯科停留不到两个月。第三次是一九三三年因病到苏联高加索疗养路过莫斯科。同一九二一年我所见到的莫斯科相比不大一样了。两次旅游机会我都访问了莫斯科的学校、医院、

工厂、剧院、电影院以及流浪孤儿之家。一九二八年这回我还参观了莫斯科郊区几个集体农庄。

一九二一年的莫斯科，人人穿的是破旧衣服，但满怀希望和热情。人们坐在破烂的椅子上说：“不管怎样，我们总算自由了！”那时，电话叫不通，房门无法锁，火车尽误点，反常怪事真多。困难时期一切紧张，记得有一次送几个朋友坐莫斯科火车去德国，烧蒸气的车头，开出去了几个小时，竟没有发现列车车厢还停在莫斯科站上！

我三次访问苏联，可说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关心流浪孤儿们的命运，苏联政府于一九二一年发布了一项救济无家可归的儿童的公告，成立了收集考试，选拔孤儿的委员会，因为我的幼年时期遭遇悲惨，对那些到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命运我是寄予莫大关心的。

我走访过一些改作儿童教室宿舍用的礼拜教堂和清真寺庙。有些屋子里面安装了机器、玩具，以便使孩子们自觉养成遵守纪律、热爱科学、勤劳创造的习惯，禁止对孩子采取任何形式的强迫干涉，孩子发生了事故由孤儿管理委员会自行处理。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我第三次访问苏联时，因为重病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仅探问了一下那些流浪孤儿的命运情况。他们均已长大成人，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弃儿了。有的在工厂里成了熟练工人或技术员，有的在部队、在机关成了干部，有的上大学成了大学生。记得在高加索疗养院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年青的农业经济学家，就是一个莫斯科大学毕业的早年流浪儿。在休息室遇到两个过去是孤儿的军官。就苏联这个词儿

的真正涵义说来，流浪孤儿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苏联即我的祖国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我进入苏联境内的时候，八年前的往事历历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坐的这次列车经过波兰，沿途各站上都见到穿着衣服鲜艳、打扮时髦漂亮的波兰妇女们同穿着考究、镶有金边制服的波兰军官依依送别。时间在十月底，风雪交加的一天，列车到达波苏边防站。我走进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海关检查站，白木头搭成的站房，高耸入云，消失在苍茫暗淡的暮色里。进口处站着个魁梧纠纠的红军战士，一件灰大衣长及足跟，鸭舌帽沿一颗红星。帽沿盖住了他的面孔。枪托着闪光的刺刀高出肩头，他象木头房子一样在那里站岗。周围幽静，夜色沉沉。我知道俄国人正在长夜中热火朝天地以超自然的力量为建设一个自己选择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没有外援，孤军奋斗，在边境上永远站着个红军战士，他面对西方世界默默无闻的守卫自己的国土。我也想，捍卫创建我们美国的先辈们也曾经是守望站岗放哨过的。

第二篇 今昔中国

(1928—1931)

五、进入中世纪

中苏边境满洲里那边，苏联的搬运工人帮助我们运行李，他们默不作声，安安静静地把行李搬到检查站的出口处。那儿一个工人代表坐在桌旁对每件行李要了很少的一点钱，既不要东西又不收小费，不作揖鞠躬，不阿谀奉承，社会主义制度既保护外国侨民的旅行安全，也维护搬运工人的人格尊严。

付过行李搬运费后，我扭转身面向中世纪的中国，若干年中间，我总忘不了横眉冷眼、紧皱眉头的苏联铁路人员盯着中国苦力托运我们行李的铁青面孔。

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国苦力蜂拥而上，抢搬我的行李，他们伸手张口，漫天要价，增减脚钱。我的四件手提皮箱有六个大汉你争我抢，我的手提打字

机，有两个小伙子在争。粗鲁野蛮，高大结实，如同美国彪形大汉，他们的举止跟他们的身材太不相称。我被吵得蒙头转向还没有清醒过来时，两个小伙子提上打字机，其他一伙拿起行李直朝待开的列车跑去。在车箱里，大伙把我包围住了，他们伸出手直嚷“脚钱！”我真伤脑筋。为了打发他们走，只好显得大方一一照付，旁边一位女客不断提醒我，叫我不能多给：

“你多给他更多要，缠个没完。”我没有理睬她的话，而苦力们更进而胡搅蛮缠，甚至有的挥动拳头嘟嘟囊囊进行威吓。

这时车箱里走过一个中国男列车员，他一见此情此景，随即大喝一声。同时飞起脚腿，连打带踢把苦力们一个个赶下列车的站台下边去了。他们手握脚钱逃之夭夭。

我站着冻麻了，我的脸色铁青，肯定同那边紧皱眉头的苏联检查人员的脸色一样难看。也许，他们的感觉同此时我的感觉一样，这儿是人性丧尽、拳头称王的世界。在这角落里，遭受人祸天灾、颠连不幸的受苦受难者象牲畜般煎熬成长，他们朝夕相处而彼此漠不关心，一遇获利机会就眼红争夺，象牲畜般拼死拼活，然而，失败者可没有丝毫反抗和任何抗议。这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和以最原始形式进行的“适者生存”的世界。

这幕争夺景象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象征画图。不管它的外表如何乔装打扮或掩饰遮盖。在许许多多他种场合下，我一再反复看到这种基本相同的生死斗争景象：强者横行霸道，弱者受尽欺凌。一见到这情景，我内心里总是念念有辞：“只为上帝恩德，我才到这边来。”

我从踏上中国的大地那天起，就逐渐认识到横在我的面前

有两条路：在理性丧尽，人间地狱、滔滔洪水泛滥面前，我可以筑起一道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甚至敌视一切的围墙在我的四周以防护自己。对那些无事生非、侮辱我者，给予回击，这是一条路；或者是站在生命的湍流中，任凭风吹浪打，挺住突然袭击，病魔缠身甚至生命危险而我行我素，这又是一条路。经过很长时间，我终于选择了后一条路，积多少次经验，深知欲保全自己，必须尽力改变前进路上的险阻，探索前进。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中，我又一再改变，全力投入人生战斗的急流中。

有人说我是空想家，也有人说我是大傻瓜，还有人说我是兼而有之。在我的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有一种模糊的信念：爱人者人爱之，能谅解就有谅解。经过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看外国人无不以为洋人都豪，外人必阔。经过很长时间我也没有认识到，在中国一般穷苦老百姓眼里我的吃穿多么讲究，我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发洋财的东西罢了。记得有一回我跨过北平的二里沟时，一头栽倒在沟里不省人事，四周一群中国人还有警察在围观一个女洋鬼子摔坏了的热闹。没有一人挺身而出，即时伸出同情援助之手，幸亏这时走过一个学生，他叫了一部人力车送我进医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象当时那样孤独、寂寞、凄凉过。

从那时起我嚶鸣求友，开始寻找喜爱社交活动的男女，耐心的期待人们能够信任我。同中国人民生活脱节，不相往来我可不愿。了解中国，了解人民的唯一途径，我以为只有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在他们中间证实自己是否正确，此外别无他途可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下旬我到中国东北时，东三省处于张学良少帅的绝对统治下。张学良之所以称为“少帅”，并不是因为他有经验，也不是由于他有本事。而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张作霖大帅。张大帅是统治东北多年的土匪头子。两年前日本人发现他另有异图，把他干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对这个放荡不羁的年青少帅从身心各方面去争夺拉拢的斗争，一方面是日本人及其在东北的卵翼势力，另一方面是力图统一全国巩固东北统治的执政党国民党。

国民党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首创的党。孙先生在世时以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改善为理论基础的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一九二四年孙先生聘请许多苏联顾问到广州改组国民党，帮助建立一个打倒列强，消除军阀的政府和军队。在苏联顾问指导下，军官受到训练，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类似苏联共产党的政党，容纳了共产党。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了，农工大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和中上层阶级享有同等权利。

革命形势大好，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千千万万的农工大众把改组后国民党的大纲当成是农工解放的宪章。国民党右派和保守派人士但见群众人多，他们人少，怕农工起来革他们的命，因而内心感到恐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伟大的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一年后一位青年军官对广州革命政府发动第一次未遂政变，此人名叫蒋介石。他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之一。深谋远虑的孙先生派遣他到莫斯科去留学，有一个时期苏联顾问们把蒋氏当作民族主义革命阵营里的军事领袖人物看待。孙中山先生一死，筑成民族主义革命阵营团结凝固

的磐石基础开始破裂。旧的阶级路线重新抬头，革命领袖死后留下的未竟事业由谁来承担，在国民党人士中间展开了激烈的阡墙争夺战。其中主要有三派：极左派以汪精卫为首，极右派以胡汉民^①为头，反动派则以蒋介石的马首是瞻。三派当中唯蒋介石有军队，凭藉枪杆子这个反革命杀人利器他当然最有权势。汪、胡、蒋三人都到过日本，有的留过学，有的侨居过。三个国民党头目，都有个人野心，都想掌握党国大权，都有一帮称王人马，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看来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好象是有根深蒂固的仇恨似的，他之所以那样仇视苏俄顾问。究竟是因为他多少具有民族爱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是因为他带有同当时接近共产党的汪精卫争夺领导权的敌对野心？或者还是由于他多少富有阶级出身的遗传因素表现出来的一贯鄙视工农群众的恐惧心理？究竟为什么，很难说究竟。看来蒋介石把他个人的仇恨一古脑发泄到当时拥有大权的苏俄顾问鲍罗廷身上则是人尽皆知的事。

尽管蒋介石发动的一九二六年的未遂政变没有得到成功，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一时得到愈合，并且他被任命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一九二六——二七年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一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的中国银行界和工厂主在外国银行家的资助下向蒋介石提供第一笔二千五百万元贷款，以解除工会、农会的武装，解散工会。农会的组织，清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与迁到武汉的汪记国民党政府分裂，成立南京的蒋记国民

^① 胡汉民（1879—1936）国民党右派首领。大革命期间曾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主凶之一。

——译注

党政府等等。有人说蒋介石作出他的最后决择前、通宵达旦的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考虑了一整夜。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革命一定会成功，但结局是人民掌权。一条是反革命的路，结局是资产阶级掌权，他本人作独裁者。考虑的结果他选择了后一条路。于是开始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晚上血洗中国的白色恐怖。

上海和其它城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惨遭屠杀，不经审判便被处决了。各省军阀、地主动手解散工会、农会，洗劫农村，杀害农民，在中国的大地上—时黑云翻滚，血流成河。列强说蒋介石这一手干得好，赶忙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汪精卫动摇了，同其它中产阶级领袖人物—样从汉口开小差逃奔欧洲。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拒绝国民党假借她的名义，也出国了。

历史上依样画葫芦的事尽管多有，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并不倒转。当手无寸铁、毫无训练，没有外援，大字不识的中国农工大众起来战斗，决心推倒历史上最后一个最反动、最腐朽、最凶残、最低能、最可耻的蒋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王朝时，德国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不久也倒在纳粹法西斯专政的血泊之中。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逆转了，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仍继续向前。

国民党军队里面有些连队的军官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分子，一九二七年八月—日，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领导下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苦转战江西广东而失败了。同年十二月—日广州的工人士兵在共产党人张太雷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在外国军舰的炮击和军阀部队

的围剿下也失败了。几千市民惨遭屠杀。南昌、广州起义失败后，奋起再战的群众在共产党员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很快成立。这支新的革命军队历经千辛万苦，不惜任何代价，把人民组织起来锻炼成为钢铁的工农子弟兵中国工农红军。它持续战斗成长壮大将近十年。一九三四年冬开始史诗式的长征，途程二万五千里到达西北，在那里再次推动进步力量结成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大联合的国共再次合作即统一战线，这回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得到列强承认的国民党南京政府“清党”后，修改了已故仍有影响的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民权、民生没有了，仅余民族主义的空壳。中国的有产阶级高兴这个，在华的有特权的洋人并不以为然。一般老百姓希望民族独立。不仅如此。同德国人一样，迫切要求社会主义救亡图存。封建主义地主阶级把农民终生束缚于农奴制之下，不砸破封建枷锁，农民就不可能前进一步。他们需要孙先生主张的国民的民主权利。孙先生逝世后遗体被国民党政府迁葬南京。他生前的死敌现在同国民党合流统治中国。

以上就是我初到中国，个人所见的中国社会的政治背景。

同张学良少帅谈判，把东三省置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或联合起来的正是这个国民党。少帅清楚国民党。同意东北易帜，挂国民党党旗，把一切外交事务交给国民党政府处理。他获得很多“赏赐”并认可为东北最高统治者作为回报。他单独可以任命管辖区内的国民党官员。

他是一个骄傲自负、富有民族意识的青年军人。同山东军阀张宗昌不大一样，张宗昌接见美国领事时，不是同姨太太睡

在床上，就是左拥右抱着小老婆。而张学良不这样，他在路上见了美女丽妇，用车载回公馆，事后开一张支票送女回家。有的人家且以为荣。

一九二九年元旦那一天，我到了哈尔滨，正赶上东北易帜，目睹国民党国旗在东北升起。那一天的空气非常紧张，因为东北易帜对日本人说来是政治问题，政治上失败了的日本人甚为恼火，采取敌对态度。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动兵，人们细声细语议论探听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的消息。据说日本人正在沈阳同少帅办交涉，恐吓威胁，提出抗议。但少帅答复，从现在起一切涉外事务权在南京。

中国人会抵抗吗？有的人说会的，许多人说打不起来，大多数文武官员在沈阳投靠国民党，卖官鬻爵，发财致富。有的贪图外快受日本人雇用。日本人却把他们当成是废物。哈尔滨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日本代理人。就在我到哈尔滨前几天警察当局对要求实现全国统一的示威游行学生开枪，许多学生被打死打伤。贪污腐败，卖国通敌的血腥气味弥漫东北。有两个外国领事馆官员告诉我，日本人用金钱美女和官爵收买东北的文武官员，他们掌握中国大小官员名单，谁可以收买、谁不可以收买他们都是一清二楚的。

我在中国听到乞丐喊叫，最初是在哈尔滨听到的“打发、打发吧！天老爷保佑你升官发财！”有时也喊“天老爷保佑你发财！天老爷保佑你当军长！”

在哈尔滨老区富家巷，有成群结队由河北、山东关内来的农家妇女，携儿带女沿街叫化讨要。我走过街上时她们把自己的婴儿裹在脏旧的棉袄大襟里，跪在冰地上喊叫：“上帝保佑

你到中国发财！”

我走过时，她们跟着。苦苦哀求打发、打发吧！又一群孩子跪到我的前面，扑通跪倒在冰地上，哀哀向我乞讨。我绕过时，她们也跟着。为了清道，我给了又给，只是发现不知从哪里又出现了一群新讨要的娘儿们。直到为我充当响导的翻译把他们撵开时，我才能甩掉他们。

我在东北住了将近三个月，通过学生的帮助寄住在中国人家里，从外国领事人员、中国铁路官员、中外官方人士、大中学生和出版刊物以及各种渠道了解日本人对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等等方面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渗透的程度，他们的触角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伸到各方面，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他们都认为是对日本莫大的威胁。他们通过东北文武官员、白俄保皇党人以及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各国外侨进行渗透活动。

《日本在满洲的铁拳》是我最初写的一些情况报道论文，《法兰克福日报》怀疑报道的正确性，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不宣而战、侵占东北后才发表出来。日本侵占东北之所以得逞，部分原因可以用封建专制主义对三千万东北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来进行解释。当然，另一方面东北的文武官员中，有不少爱国人士和被当作危险分子的青年学生，但他们人数很少，被迫转入地下。的确，东北还有中国糟糕阴暗的一面。生活在高楼大厦与外隔绝，铁门外有白俄站岗的世族大家，那些“大户”人家凭借产业资本榨取森林煤矿工人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把周围人民的贫困痛苦认为是很自然的事，过去如此，将来也是这样。他们醉生梦死，麻木不仁，

可以看出中国的这一面是多么古老顽固。

有一天，一个送洗衣物的苦力从我身边走过。他肩挑两头的箩筐里满盛新洗过的衣服。来自西伯利亚刺骨的冷空气给他的眉毛、头巾上涂成了晶晶的冰珠霜。天气太冷而视茫茫，他一失脚滑跌在地，箩筐倒了，衣服撒了，砸了一个过路人。那过路人啐了一口，恶狠狠地朝他骂了一通，然后扬长而去。除了一个警察别的过路人没有一个停下来。苦力一见警察过来，马上双膝跪下，双手护头等候着。

那警察并不动手揍他，而是代之以脚踢。每一脚都把这苦力踢得爬下。他一再地抬起身子双手作揖求饶。成群的过路人从旁走过，有的是视而不见，有的是仅道路以目，白了一眼。

有一次，我走在街上，听到背后一群人的脚步声和一辆大车的吱吱隆隆声，回头一看，两队士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呵气吐雾、快步上来了，车上面坐着两个犯人，背剪双手，蓬头垢面，吓得要死。背后各插着一块木牌，上写人犯名字，杀头示众罪名。后面跑着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子们。富家屯外边有一块空地是露天刑场，在围观的群众面前把犯人砍头，首级盛在筐子里或挂在竿子上示众，警告人们效尤。过路的人们耸耸肩说：“枉死鬼不走运，事不成活该死。”囚车过去后，我的学生翻译带着深通世故的口气说：“在吉林那边，被土匪杀了亲人的有时把土匪剖腹挖心，吃仇人的心。”

俗话说得好，傻瓜总是任性胡来，我也一样横冲直闯进出公私机关团体，公开地、秘密地同各种人接触。直接了当提出一些问题，使对方目瞪口呆，噤若寒蝉，吓得不敢回答。间或有人想如实回答问题，但猛然一愣话又缩回去了。很久我才认

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保守秘密的国家，很少人直接提问或回答问题。谁也不相信谁，逢人只说三分话。有时很难相信半分属实。

我对商会会长的一次访问谈话，趣味横生，真是滑稽。我已经听说此人和他的许多同事都经营鸦片生意，我刚从一个鸦片村子访问回来，那儿的兵营里抽大烟的抽烟室和小鸦片灯多的是。所以我一进商会就问会长，村子里一天抽多少鸦片烟。

他身穿青缎狐皮长袍，坐在椅子角上，双手垂膝，象蛇盼着雀儿一样盯着我。他喘了一口气，彬彬有礼地说话了：“见到一位关心中国事务的外国女士真是三生有幸。今天天气，哈哈，冷风刺骨，天气严寒，女士可受冻了！”我答以不冻，倒喜欢严寒天气，我对鸦片贸易有兴趣，读过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您贵体健康吗？喜欢中国不？”他又问。“我的身体很好。”我说。他又问我见过城外的老宝塔没有？我说已经见过，但宝塔虽老，不如对鸦片生意兴趣高。他笑咪咪地畅叙有缘识荆，门庭增辉，但愿后会有期，下次再见，唯恐耽误女士要事，如是云云，端茶起身、送客了！从室内到房门口，从过道到大门外，点头哈腰、礼貌客气真是到家了！

类似这样的访问，经过几次之后我开始学到了中国人世故的策略。个人的应酬往来，酒席宴会，闲话谈天不着边际，从中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费尽多少唇舌。但是直接了当提出问题往往会遭到白眼冷遇，随之而来的是天气好坏、身体健康、礼貌到家的问答。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们偶尔也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好坏耿耿于怀。

我的学生翻译也是我的向导。他有一天把这个旧世界的另

一面揭开给我看。我告诉他日本人办的《东北日报》上面有一篇报道我看了，文章指责二十多名日本共产党分子组织中国日本铁路工人矿山工人闹事，并称二十名日本共犯已捕获送解大连。事件的下文以后不见任何有关报道。我的学生告诉我，这类抓人事件不是为奇，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东北监狱里面多有人满之患，关押了好几百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的中国和朝鲜爱国志士。有的被病魔缠死，有的被严刑拷死，有的不是杀头、就是枪决。我向吉林省省长申请参观监狱的许可证，我的学生拒绝和我一同去。他说：如果我干这样的危险事，不但我会被人怀疑是共产党，而且我的生命也会有危险。

有一天，他带我去看游行中受伤的学生。我在一家马厩般的小房间里看见一个学生，他的伤快好了。这个杂院住满了人家。穿过学生住房走进堂屋里面有一间小房，住着一个名叫三菱、会说英语的日本印刷工人，他的书架上堆满图书一类的小册子，看样子我怀疑他是一个乔装打扮成共产党的日本特务。在哈尔滨时我走访过许多人家，他们的学生书桌上只有教科书一类课本，不见其它书刊。有一个学生，一次让我看一套书，画套外面书名四书五经，里面则是高尔基的两部小说。那个学生对他那套书爱如珍宝，深藏密放从不摆放在案头。我随即坐在三菱的书架旁边就手翻阅几本书，书中部分地方谈到日本农民运动，封皮上面确实印有镰斧标帜。我问三菱二十名日本工会组织者逮捕送回日本的下落如何？他的神色刷地突变，皮笑肉不笑地支吾其词。他不回答问题，反而问我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如何？我说除了看报一无所知。他又问我在莫斯科曾见日本共产党人否？我说未曾见过（虽然我见过一个日本戏剧

作家他是一个共产党，我可不能跟他说），就这样泡蘑菇、兜圈子问答一阵，最后起身互相鞠躬，彬彬有礼的告别。一星期后，我的翻译学生告诉我，三菱“他跑了”。他确实当过工会负责人，日本特务调查他在哪家报馆工作，他闻讯马上溜出后门，旋告失踪。

“他跑了”这句黑话在我周围的人们谈话中间经常听到。大中学生、铁路员工、领事馆雇员、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授都有亲戚朋友，他们内外声息相通，遇到情况紧急就在跑了之例。记得我在哈尔滨时，私下见过一位南京来的国民党代表，他是一个记者，就是他也行踪诡秘，说不定他哪一天也跑了。他说他反对共产党，是爱国主义分子，在东北只有少帅的官方国民党才能立足。“情况很困难”，他一再对我说。

我自己也很快被拉进这个内外声息相通“跑了”的人们队伍里。一天晚上北宁路督办请我吃饭，他跟我谈了一件怪事。他说他有一位美国朋友在美国领事馆当文书主任。美国朋友看了一份英国情报特工人员给美国领事的机密文件，上面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同印度暴力革命分子结过婚的英属印度臣民。并且还说我的护照是假的。要求美国领事召见我、吊销我的护照。文书主任希望我走为上策，跑了了之。

我说英国情报人员的报告纯属捏造，我要到领事馆去跟他们谈清楚。

“千万去不得”！督办大吃一惊，赶忙劝阻我道：“你一去总领事就会生疑心，问你的消息是哪里得到的，这一来我那位朋友就会丢饭碗，撤掉差事不要紧，说不定人家还会怀疑他是共产党！可了不得。还是你跑了为好。”

我说我有我的公民权利。督办再三坚持说公民权利在东北谁也没有听说过。

虽说英国特工对我的指责并不真实，虽说我是一个记者，我还是决定等待到关内美国大使馆或找美国领事人员去谈我的美国公民权利。就在这天晚上，督办和我的翻译兼向导帮我提着行李到火车站，办好托运手续，买了两张火车票。次日清晨，我把房租放在桌上带上房门，通晓英日两国语言的翻译已候在门外，我们不辞而别，一跑了事。印度古谚说得好：“同魔鬼共餐，得用长勺。”

几天后，我们坐着马车穿过日俄等国租界进入有城墙围着的沈阳城。马车夫靠座喊叫号外消息。张学良少帅枪毙了杨宇霆将军。全市气氛紧张，人心彷徨。人们传说少帅请客，几个高级军官赴宴，席间他把劲敌杨宇霆请到书房里枪毙了。随后他差人把杨的尸体，一张数目可观的支票和一封信送到杨宇霆家里，说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很伤心、抚尸掉过泪。

沈阳的城门通常是半夜关闭、清早开放的，枪杀新闻传开后，晚上八点城门就关了，城墙上和大街小巷的哨兵来回巡逻。市内秩序在几天后恢复正常，但人们背地里还在议论此事。

我们在少帅公馆四周环绕高墙的后面一家中国人家里找到了安身之处。生活在沈阳如置身中世纪，夜间，更夫敲着铜锣告诉人们几更几点。街头狭窄、高墙耸立，除了两条主要大街，全城积雪冰封一片银色世界。

我们从屋内总是听到墙外到关外逃荒来的农民老乡们，要饭的妇女们高声喊叫“修福积德打发穷人吧！老天爷保佑你升

官发财！”的讨要声。漫漫长夜吞没了这伤人的哀号。

我晚上到中国人家里，白天到工厂、学校、沈阳新兵工厂以及其他机关单位进行采访。在哈尔滨时，我曾给东京一位日本女友去信请她给我介绍几个日本在满洲的朋友。她的介绍信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在那些日本朋友家里作客，使我了解到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压根儿瞧不起中国人和女人。他们三句话不离中国人脏、穷和狡猾，三妻四妾生活腐化，等等。

通过这类日本朋友的关系，我到日本人办的工厂、学校和抚顺煤矿去参观访问，他们反对我带中国翻译去，但我坚持非带翻译不可，单独采访可不行。我告诉翻译不要露出任何懂日语的表现，如果我进厂里去了，他尽量同中国工人停留在一起。

住在日本人开办的煤矿工厂里的中国工人宿舍，工棚的四面都围着高墙，没有特别通行证不准工人外出，象抚顺煤矿这一类大厂矿的工人仍然保持合同工制度。这种封建农奴制形成的合同制度在东北和内地所有的日本工厂和许多中外合资办的工厂煤矿里一律实行。包工头为工厂资本家以每日工资两角、工作十至十四小时、一定年限为期雇用工人，以每日五分一角的恶劣伙食费、供给工人吃住，如果是棉纺厂的话，包工头雇用几百个农村姑娘，一定年限内给女工家庭三、五十元，每月给女工本人几个铜板。工人身染肺病、心脏病即解除合同辞退出厂。合同规定，因死亡买白木棺材和安埋费用，由包工头负担，这是卖约合同规定的唯一义务。

工人不得擅自离开住处，如果逃跑，警察搜捕送返厂主，后来我在上海了解到英国警察在公共租界把搜捕到的逃跑女工交回工厂的许多案件。我走过抚顺煤矿和工人住宅区时，看到

矿工们的残弱消瘦，使我惊恐不已。时在严冬，他们的单薄棉衣破烂不堪，身上的肉露在外面。好辩的日本人向我解释道：

“矿工们把钱尽花在吃喝嫖赌上去了，多一半有梅毒，我们公司有医疗诊所，但很少人去。”日本人的确有医务所，抚顺煤矿甚至有一个工人澡堂。但除了矿井事故免费医疗外，其他看病一律收费。我对一个日本工程师谈到工人们每天下井不是八小时而是十四小时作业，工头给工人每天五分钱时，使他狼狈不堪。

日本人对我漠不关心地说：“合同工制度只是中国的老习惯。”

新与旧的矛盾激烈冲击着我在沈阳寄居的那一家人，房东一家有夫妇、两个儿子和两个小孙子六口人，两个媳妇在几个月前得黑热病死了。我们在这一家过了中国的旧历年，与其说是欢度春节，毋宁说是忧伤度岁。房东父子三人因为躲债躲到朋友家里住到年初一才回家。我总是听到两个儿子和父亲高声怒吵。生育过许多儿女都丢了，仅养活了两个儿子的房东太太老态龙钟，经常以泪洗面，唉声叹气。

中国最古老的礼教传统和孝道思想在近代思想的冲击下分崩解体，这一家是礼教和基督教的新旧矛盾冲突。两个儿子在上高级中学，讲英语、读洋书。老大是一个基督徒兼国民党，老二是一个共产党兼基督徒，他们经常吵架，互不服气。老二说张学良是一个封建军阀，动辄杀人，忤我者死。老大为“少帅”辩护，说“少帅”爱国，敢于摸日本鬼子的屁股，在东三省易帜升起国民党旗帜，修铁路、兴实业，扩建沈阳兵工厂，创办陆军学校，训练青年军官，少帅是军阀谁敢取而代之呢？

老大问老二，老二回答不出，只是讲摆了许多矛盾现状，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爱国青年学生和朝鲜族抗日志士到处受到迫害。农民在地主土豪、贪官污吏和高利贷主的敲诈盘剥压迫下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不值钱的纸钞害苦了老百姓，等等。

我在有中国官员在座的许多宴会场合，提出成立工会是爱国抗日的办法，无论是中日两国的官员也罢，或是各国在东北的外侨也罢，一提到工会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无不异口同声地说，工人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会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变成共匪。

我离开沈阳到大连和中国内地去的时候，我的学生翻译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大连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每个中国人都受到监视。大连那边有一两个他过去相好的同学，但都早“跑了”，不知下落。我一到大连就有两个日本人前来接我，两个人各行九十度鞠躬大礼，点头哈腰，必恭必敬的请我上一辆轿车。他们说是沈阳的朋友有信要他们来接待的，于是我们驱车到南满铁路一家最豪华的日本宾馆去开房间。我进去交看了护照，登记了姓名。我在大连整个期间拜访了几名日本教授。每次外出，这两个日本接待朋友总是突然出现，礼貌周到地陪伴着我。他们是那样的客气，以致我每次总想照他们一样回敬一礼但总不成功。我不能象他们那样深悠悠地吸气，也不能使自己痛痛快快地品尝风味，我也不能鞠躬到地，因为我的笔记本和论文资料不让我行礼。我宁肯随身带在身上、不愿留在宾馆让接待我的朋友过目，我的礼貌确实不周之至！

不顾他们礼貌周全的抗议，我还是不坐免费日本轮船却搭英国海轮从大连到天津。我跟爱尔兰船长讲起我在大连的经历

时，船长笑着说起头一回他到大连的一件小事：一个日本检疫官员强行登船后，点头哈腰，鞠躬到地，彬彬有礼地声称：“我可是检查瘟疫的瘟神来了。”

“他们真是瘟神！”爱尔兰船长笑道。

六、学者和无产阶级

中国的学者们喜欢谈论中国人对死的态度。中国的哲学叫人成仁取义、视死如归。天津一个德国人甚至对我说，中国人对于杀头并不在乎：“他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我自己就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快死了，旁边一群围观的人，有的直唤声叹气，眼里露出悲伤的神色，可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的手。我提出快叫一辆救护车时，我的朋友反对。他说：“你要出面喊救护车，那车费得由你出，治不好，他的住院费、丧葬费一切费用你得全包。治好了，你得供养他，你不供养，他还是会死在别处的。”

我在天津访问了许多接近死亡边缘的前哨地方。我乘出租汽车到南开大学去看了一批教授，汽车驰过整齐干净的租界街道，沿着坎坷不平、坑坑洼洼的雨后烂泥土路颠簸前进。泥浆飞溅，景物暗淡，洼地远处隐约可以见到许多茅屋土房，村落人家。人们在那一带地方正向死亡作最后的顽抗。垃圾土堆上可以见到提着篓筐，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们在翻捡破烂。一路上还可以见到墓地丘垄，棺木白骨、暴露在外，野狗在争啃尸骨的惨象。汽车开过，喇叭声响，惊动了那些衔着骨头、夹着尾巴向田野飞逃的癞皮狗。

南开大学的学者们见到这种景象，颇为伤感，他们希望社会改革，总有一天情况会改变。他们出版了一份土地工业研究月刊，负责河北定县模范县区的建设工作，推广财务会计，市场管理，平民文化识字教育和新医疗法等现代乡村自治制度，他们的试验得到北平的医务工作者和教授们的协作赞助。他们希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群众收入，赎回典卖给官僚地主的土地。这种模范自治县政的措施，不过是他们所学同实际结合的愿望，是一种社会改良的实验。

北平的一批学者是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受过英美大学的最新式教育的许多男士或少数女士，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没落官僚的书香门第。他们温良谦恭，博学多识。我到他们执鞭任教的各大专院校和苦心经营的科学研究单位去参观过，体验过他们一致热爱悠游自得的古色古香的故都生活。北平是中国思想复兴的中心，她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北平是中国过去历史的最好见证，也反映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共鸣思想。他们当中有些人虽然深受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少数人还是基督教徒，但他们无不反对人生而有罪的基督教的说教。他们讲科学和教育是达到真善美的最好手段，他们有点类似古希腊的知识贵族，所处的社会也正如去奴隶制社会不远的古代希腊社会：“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在中国如同在古希腊是决不同男子交际往来做朋友的。只有个别女性敢当演员，抛头露面同男朋友在大街上行走。在中国如同在古希腊，凡是念书人都不从事体力劳动，过着古圣先贤的理想王国的生活，认为体力劳动是不体面的事。

我在北平同学们来往中间，曾就绅士讨妾和娼妓卖淫等

社会时尚有关妇女的制度争论过。他们有的认为中国的娼妓制度至少比西方的卖淫制度要优越。我说西方法律上承认卖淫是犯罪行为，但中国男子专制对妇女有七出之条，哪有优越性？

他们说官宦人家和富贵绅士娶妾成风，是古老的大家庭制度，这种制度给人们增加“体面”。买来的妾可以卖掉、也可以赏人，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诗人，甚至说一个男子的唯一谈恋爱的机会就是讨小老婆。我指责他这种恋爱观点荒唐可笑，用钱追爱与自由择爱是两回事。这个诗人冲破家庭的阻力，拒绝同父母之命娶到家里的媳妇成婚。相反，他娶了一个京剧演员，但家里反对，不许这个媳妇进门，不承认她是儿媳妇。他有一次跟我讲，如果一个女人年过二十，相貌不美丽，身段不轻盈，体重超过一百磅，他不可能爱上她。我同他有时坐在茶楼酒馆和戏院子里的时候，经常叫他挑选走过身边的妇女谁最美丽，他所挑中的尽是一些木头木脑，洋娃娃般的妇女。他很惋惜我是一个女人，不能跟他一道去倾国倾城艳噪一时的某名妓那里打茶圈清谈，也不能去某个朋友的太太家里去参加晚会，消遣谈心。他没有看中的女友，也没有相好的名妓，他的视线总是落在别人的太太身上。

有一个时期，我同这些学者先生们往来相处很好。有几个和我始终是难得之交。对他们说来，我不是男的，不是太太，不是小老婆，也不是妓女。我是一个外国妇女，既不年青，又不漂亮。自己挣钱谋生，和男子平等交往。我的职业是记者，既非贤妻良母，也非谈情对象。

那些先生学者多半是人文主义者，有的受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有的受罗素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和我同意罗

素对社会的缜密剖析方法和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以及只要人们不怕死就无永生的信念。但他们不同意罗素对中国的看法，罗素的^①书激起了中国青年的愤慨。至于某些学者们的实用主义在于有意识的否定任何运动，他们认为，凡是未经实验证明有用的运动，均不可信。他们赞成美国的民主制度，怀疑俄国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还只是一种实验，实践并没有证明它的优越性。许多青年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长江以南的农工大众正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流血战斗。但是，实用主义的学究先生反对马克思主义，有的坚持说中国没有阶级，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构。有一个实用主义者跟我谈他的古怪想法：给一个省让中国共产党人去作实验，如果实验证明可以实行，别的省份就可以参考照行。学者们认为唯有科学和进步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手段，试看西方科学的成就，要救国只有靠科学和教育。

有一位勤奋思考、专心研究人类学的专家，对发掘中国古代文物非常有兴趣。他的精力全用在“中国的忧伤”黄河的殷墟遗址的发掘工作上，出土了古代母系制度社会遗留的宫室，陶器、艺术珍品、甲骨文字、钱币通货等许多文物。我承认他发掘出来的文物很有价值，也很珍贵，但现实又怎么样？他们发掘工作的那个地区是军阀混战，河水泛滥、饥馑连年的重灾区，好几百万农民被赶出他们的家园，土地卖给军阀、官僚、地主以求换升斗粮食，甚至连最原始简陋的农具也拿到市场上出售。儿子去当兵吃粮，妇女去帮人为婢，饥饿所迫，森林砍光，树皮食尽，童山濯濯，土地荒芜。雨季一来，水土流失，河水暴涨；冬天来了，寒风刮起尘土，到处飞扬。有些城镇的

沙丘高过城墙，很快沦为废墟。“干吗现在去急于发掘那些地下宫殿呢？等过五十年后把废墟打扫干净再发掘地下宫殿也不迟吧？”我想，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意味着参加政治活动。学者们说政治活动还要担当风险，学者从政只有倒霉。学而优则仕，结果会让人吃掉。唯有坐待天下太平才有出头之日。我看人们谁又能等到那个时候呢？

我在北平访问了一个火柴厂，除了工头和不多几个操纵机器的工人以外，全都是童工。他们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孩子，有些还是乳臭未干的娃娃，一排一排地站在托盘前面装火柴盒子，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两只瘦伶伶的小手象火柴杆杆。工头拿着鞭子在过道上来回走动，监督劳动。

童工待遇：每天吃两顿小米粥加一点盐，有时一碗青菜，偶尔见到一些油水。晚上睡在长炕上，挤在一起取暖。我见到一个盖一床薄被躺在炕上病了三天的童工，谁也不关心他的死活，根本没有请过医生吃过药。

死亡，在中国象暴君司命到处周游，在贫苦农民的茅屋草房里，找到了安身地方，横行肆虐。它以肺癆、心脏病的形式降临厂矿工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它惊破了用外国枪炮反革命武装镇压农民造反、威胁专制王朝生存的富人的黄粱美梦，打破了不管是由国民党领导的党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所做的任何进步持敌视态度的租界里的洋人的生活秩序。

死亡和穷学生手牵着手走在一起。但是，穷学生们不怕牺牲、冒着死亡的危险，一心想着要革命、改造社会。于是，我对那些学者们说：“你们那套哲学是虚伪的，学生们并不听你们那一套说教，不然，他们要造反追求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是为了什

么？”学者们愤慨地争论道：“在这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年代，学生利用大中学校的宿舍公寓作为宣传活动中心，是不遵守纪律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指责是否正确我说不上，但确有些学生是一夜之间转变成为革命志士的。难道这不是由于学非所用、没有出路的原因么！他们从事脑力劳动，四体不勤，耻于劳动干活，以致神经衰弱，多愁多病，与世隔绝。尽管如此，一般学生还是废寝忘食，用功读书，不怕密探警方的追捕，敢于向死亡进行挑战。

几个学者先生有一天晚上请客，邀我到驰名中外的烤鸭店去吃烤鸭。这顿饭使我开始明白很多外国人之所以喜欢北平、和中国人交朋友、学北京官话的道理。当我们走进有名的老餐馆时，跑堂们一个接一个地“八位驾到”的吆喝声，高唱入云。简直屋瓦都震动起来了！卖唱的姑娘随着变音走调咯吱咯吱的伴奏二胡在唱京戏，那凄凄惨惨的唱腔同猜拳行令输了干杯的曹杂声交织在一起。同时，不时传来借光、谢赏、回见、驾到的高声细语，一片欢腾，餐馆掌柜满面春风，笑呵呵的鞠躬作揖，可乐极了。

几个侍者抬来了火盆，熊熊炭火使得室内顿时温暖如春。又摆好杯筷调羹，拿来酒杯和各种名酒，其中，有色清味醇的白干酒。我的东道主们一一浅尝品味过后，吩咐安席。拼盘小吃、冷饮白干和烈性热酒随即上桌。不住点头哈腰，一团和气，满面春风的掌柜进来了。他后面跟着一队侍者，手里提着我们进馆时见到挂在屋檐下宰过的北京鸭。东道主们很象十分在行的里手，个个拨弄一番，拣了一只最肥的叫人拿下去烧烤。

这时我们动手吃起来，边谈边饮酒。杯中酒不空，呷了一

口又斟满。手中箸不停，拣一口一口的菜往嘴里送，一位肥胖有福气的客人举杯说：“亮底！”他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一个朋友的英语并不精通，却喜欢在一些外国人面前显露一手，端起酒杯认真地请客人干杯说：“大家量屁股。”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大笑。安静下来后，一位东道主大声说道：

“我重复我的看法要说一句，中国就是没有阶级。阶级是什么东西？马克思学派的虚构！我的包车夫拉我在街上走，我们同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嘛！”

“要是你拉他在街上走，你们会成为老朋友吗？”我不客气地问他。“他要是造你的反不拉你，又将如何？他埋头拉车比你下贱，所以你们才是老朋友！”

“我自己谋生，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座中有一位东道主洋洋得意地说。

另一位东道主夹了一块油煎鸡肝放在我面前的小碟子里，同我交朋友的诗人要来了纸笔墨砚文房四宝，给我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反对用什么春花、夏莲、秋菊、冬梅一类女人的名字。最后诗人以中国古老家族的“史家的史”为我的姓，加上两个音节的字“美玲”作为我的号。我反对“美玲”这个名字，于是他把三个字简化拼成拉丁字“史沫特莱”。这没有什么意思，这样一来四个音节把我叫得象个蒙古人的名字了。诗人一连请我干杯，多喝酒，并且即席赋了一首咏大海波涛之类的诗。我也不得不唱了一曲“拉里多街上的人”之歌，答谢主人的盛意。只有这首歌，我真体会它是以古典文艺作品见称于世的。

接着，烤鸭上来了。大家坐好，首先互相赞赏一番，然后，装作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可以珍尝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说：

“火候不到，欠佳欠佳！”一下子筷子齐动，精黄脆嫩的烤鸭肉片夹在油煎细软的薄饼里，加上调料味酱、山东大葱，卷好以后送进嘴里轻咬一口。眼一眨，彼此示意向东道主致谢。难得吃到北平的风味，霎时间杯箸出动，议论风生，大家又闲话到中国的女人，学者和无产阶级。一道一道的菜不断地送上桌，一杯一杯的酒不断地灌进肠。

当我们起身离开餐馆的时候，一个侍者鞠躬高唱我们给小费的数目，另一个侍者在我们下楼走过院子时连声大喊谢赏，第三个侍者在我们走出餐馆时应声大喊赏光。我们象一队国王的人马在夹道欢送的队伍中间，神气十足地鱼贯而出。这一手给我们最大的“面子”，也让别的食客多多赏赐。两块大洋的小费同一角钱的小费受到侍者们的谢赏回敬，又多么的不同。

我们坐黄包车回家，穿过冷飕飕白茫茫的街道。一位学者在我的后面用尖嗓子哼唱着“有一个囚犯不肯出狱，只因为那囚牢是爱的监狱”的戏文。果尔，我发了一个誓：我决不开北平了，我可要穷毕生之力作大官、学者、知识贵族才行。争取作一个学者吧。我的这个誓言和我前面象瘦马摇摇晃晃、默默无声跑着的车夫的什么老朋友的说法交织在一起，被他那扑哧扑哧的喘息声和一阵阵咳嗽声打断。他那宽阔的肩膀使我猛地想起了我父亲的背影，我是什么东西？一条狗！我们大家的命运象狗一样的遭遇！

“你们听着吧！”我用很不礼貌的腔调，对我的东道主们厉声说道：“去吧！把你们的包车夫拉回家去吧！我们全体都下

车去，把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以身作则用实践来证明中国没有阶级！”

七、生死场

火车离开北平南下，我坐在卧铺席上，脸庞贴紧车窗凝望着华北大平原。在茫茫黑暗的空中，火车呜呜笛声凄厉。铁路两旁稀疏的树木，光秃秃的过去了，一站一座城市，闪动过去了，我感到孤独，内心响起了一首日本古谣《流浪者之歌》：

寒冷的夜晚，
孤单的心。
象候鸟一般，
我们旅行，
踏破冰雪，
顶着寒风，
长长的道路，我们一直前进。

南京是国民党中国的首都，有几所教会学校，建筑宏伟，风景秀丽，还有一些正在施工建设的华丽别墅，以及永远安放中华民国缔造者遗体的中山陵墓。

指派给我当向导的国民党青年翻译官，表现出一副唯他独革，百事都通的装模作样神气。他身穿一套交际礼服，西装革履，站在明陵的平顶上引吭高唱《西班牙骑士之歌》。我和他从我住的旅馆出来时，一辆汽车开过来，把一条狗压死在车轮

下，我吓得喘息不已，停了一会儿，这个青年大声说道：“我真想不到，我还以为你是一位交际花呢！”青年翻译官名叫莫耶柱。我们停下来雇黄包车，莫翻译官这个家伙挑了两个衣不遮体、面黄饥瘦象灯草人般的年老体弱的车夫。还友好的给我讲了一通挑选黄包车夫的高论：“老是挑年纪大些的，穿的坏些的，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不会很长，要价总是比年青力壮的少。”

我们参观了中山陵，步行下山时，道逢大块头黄仁霖上校。他带我看了中央军事学院和他的励志社，还领我看了正在施工中的一所小别墅。这座小别墅是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盖的。“孙夫人将在这里守陵住下去。”他说。

“你以为孙夫人会住在这里吗？”我问。

“当然！当然！她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我想她‘流亡’了。”

“她流亡在莫斯科？”黄的态度和语调变得生硬，悻悻地问：“鲍罗廷又在那里？”

“好家伙，这就是他们的手法！”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于是我回答他说，“据我听说孙夫人是在德国”。黄仁霖是蒋介石夫妇最宠信的侍卫官。“大宦官”是外国记者送给他的外号。对于孙夫人，我从来不把她当作神来崇拜，但她确是一位完美无瑕、很有个性的妇女。她宁可流亡在外而不让她的令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滥用。我发现中日两国封建思想意识特别浓厚，对妇女或政治运动，总是乞灵于人身攻击以达到贬抑的目的。

我初到南京的时候，正赶上国民党召开代表大会，它不准

中外记者参加，会后才让记者向国外报道新闻。国民党里有些进步分子，但他们没有实权。从有关宣传报道中我看到国民党党员人数为三万九千人。我问一个国民党官员人数是南京的还是全国的，他盯了我一眼，避不作答。

在我这回初访南京的时候，个人还以为国民党是一个代表民族主义者利益的党，国民党人士开口闭口谈到工会，言外之意要我相信真有工会这类组织存在。我提出了采访工会的要求，莫翻译官先带我去参观一个工厂，工厂的英国经理拒绝我进厂，只由一个非常体面、神气十足、会拍马屁的中国买办接待我，那个买办守口如瓶，什么不谈，只讲工厂的一般情况。表演了一幕滑稽戏之后，我们到附近一座楼里找到一个伏案睡觉的人，房中仅他一人，桌上有一把洋铁壶和两个茶杯，此外室内空无所有。好一个工会办公室！我们把那人叫醒，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一眼可看出他那副学生派头。从他吞吞吐吐的谈话中可以判断他是奉命接待我的。他回答不上任何提问，甚至工会会员有多少也瞠目结舌说不知道。我问从每月工人工资中扣除多少作为会费和使用情况，他毫无所知，理都不理。后来我了解到工会的会费不过是国民党强迫工人缴纳的一种苛捐杂税，而工会的作用则在于征收会费和镇压工人任何活动。工会主席和工厂经理、买办、工头一起监视工人，把有意见、心怀不满的工人迫害为共产党分子。

我的向导看来很急于要同我友好的样子，什么原因我不知其中究竟。有一回我跟他提过我写的有关论日本控制满洲的几篇论文，他借了去说回家学习云云。过后不久，某大学教授当着我的面向莫翻译官祝贺他一系列论东北的大作出版问世了，

教授夫人给我念了书中的一篇文章，我责问莫翻译官为什么把我的论文当作他的文章私自出版？他泰然自若，恬不知耻的向我解释道，一则他在政府里没有后台、朋友和裙带关系，所以一直级别低，收入薄，甭提养家，连结婚都无指望。一旦成名当了东北问题的权威，就有高升晋级的机会。二则谁会走国际路线谁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的上司科长和党国要人对于同外国人有联系的个人都将另眼看待，提拔重用。他进一步要同我订一个君子协定，只要我肯帮他的忙，他一定为我尽力奔走。他劝我屈驾担任劳动部的顾问。我说我不能担任顾问，我是一个外国记者，必须保持身份自由，不受公务缠绕。他向我提出保证说，一、我的姓名决不公开，二、每月薪津绝对保密。“许多外国人都在顾问名单里，外交部就有几个外国顾问，他们净拿国民党政府的高薪。”他说。

我敬谢不敏，拒绝担任劳动部的顾问。末了，他十分沮丧地说我是一个理想家。

他向我厚颜辩解、有意劝说的时候，他那挑选黄包车夫苛刻付钱的经验说教，他那对汽车压死狗无动于衷嘲笑别人的态度，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他在夫子庙大街上一曲难忘的插话！夫子庙街，秦淮河畔、妓女游客、往来如云，他和我从大庙空地上走到一个大天幕下面，那儿有上百个工人苦力蹲在地上屏声静气、鸦雀无声的听一个老说书人在说评书。我停下来，莫翻译可不愿意，他神色紧张地告诉我，不要同那些不三不四的下流人在一起，只是由于我的坚持他才勉强同意留下，我极力请他帮我翻译。

老说书人年约五十来岁，穿一身青布长衫，头戴一顶瓜皮

小帽，他讲古代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故事。说到思考推理耐人寻味的地方时，他引吭高歌、声泪俱下，手里两块竹板，拍达拍达有节奏地敲打着，抑扬顿挫，神情感人，我被说书人演唱动听的语言艺术、做作技巧吸引住了，只见他时而放下云板，拿起两个小鼓槌在三盘鼓上轻轻敲打，快速比划，高声讲说故事的高潮。时而放下鼓槌，振动竹板，滔滔不绝地讲评书。

莫翻译官的一连串反对占了上风，我们离开了说书场所，他一路上又给我上课了：在中国立身行事的适当方式，有些人可以来往，联络友谊，增进感情；有些人不可接近，避而远之，少惹麻烦。我问他讲书人过去是什么人？他说是没有出息的废物，前清时代科举落第的秀才，为了活命靠讲古说书挣一碗饭吃的江湖艺人。我问他个人的爱好？他说爱看电影，他列举了一些美国胡闹的片子。从莫翻译官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增长了不少见识。

然后我们在古庙的茶厅拣了一个座位，俯瞰莫愁湖的风光。他向我吐露了他过去的隐私。他以前一度倾心信过共产主义，自从一九二七年这类思想信仰构成犯罪后，他就改变了“路线”。“留下来的共产党尽是一些亡命之徒的下等人。共产党在江西组织农民武装农民，那些农民无知无识，正在杀害体面绅士。有些工人和青年学生我行我素还是信仰共产党，但国民党政府正在围剿共匪，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他说。

“斩尽杀绝？”我问，“就在首都地方？”

“当然喽！”他漫不经心地说道，“如果你想亲眼一看，我可以带你去。”

我只有惊奇的紧紧盯住他那讨好的眼光和友善而虚伪的脸色，此外又能说些什么呢？

几个月后，我在上海又会见了莫翻译官。这回他红光满面，神气十足了。他已担任上海华界工厂的主要稽查，同厂主经理合作亲密无间。有了对象，快结婚了。

“我不但尽力而为，同时也心满意足了。”他胸有成竹的告诉我道，“女方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会说英语，有很好的海外关系。她的家庭很富，是一个基督教会家庭。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尽我所能高攀到了一门最好的亲事。”

我的心里想起了中国的一首古诗，苏东坡作的：

“人皆养子愿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①

国民党官员曾经对我提到重要的土地改革，为了研究土改情况，我和中央大学的两个教授前往离南京需走几小时的实验站去。教授们劝一个地主让他们在他的地里进行美国良种、化肥、现代化深耕的实验。附带还办了一所有二十名学生的实验小学，都是地主和其亲友家的子弟。一群乡村穷孩子好奇地紧紧跟在我们后面。他们都不上学读书。他们家里太穷买不起规定的学生服装。这就是土地改革！

在回南京的途中，我们在一个乡村的茶馆里休息了一次。有些农民，衣衫褴褛，聚在那里。我请一位教授担任我的翻

① 这首诗出自苏东坡全集十绝句一百六十首《洗儿》。——译注

译，我偶然了解到其中六七个人，家有一两亩地，其余的人不是佃户就是长工。佃户交的地租是收成的一半，遇到东家的老婆生子、红白喜事和逢年过节还必须额外送礼。所有农民均欠地主的债，有土地、耕牛、农具作担保的农民，每月付百分之三的利息。如果提不出保证付月息就借不到债。

村子由七零八落的土房子组成，门前是脏水沟。村民都有皮肤病，有的儿童头上长癞生疮。妇女在池塘的上边洗菜挑水，在下边倒马桶，粪便又用作上地肥料。夏天，孩子们在池塘里游泳。田地里到处有先人的坟墓。

几个星期后，有一个土地研究专家来到南京，申请在南京、上海之间某一县区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得到官方许可。这个专家邀我同行。该区一年前发生过一次农民暴动，四十多个农民被当地最有权势的大土豪地主杀死了。

我们一直等到秋收季节，在无锡坐大运河上的小火轮，嘎吱嘎吱北行。机缘凑巧，那个最有权势的朱大土豪地主老爷和我们同船。他的个子特高，一脸凶相，狰狞可怕。穿一件银灰色绸衫，屁股后面跟着一个穿黄卡几制服的卫兵。

朱某人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作客，我们答应了。我的朋友土地研究专家是一个谨小慎微、意志薄弱的人，他说如果我们拒绝作客，那我们就休想到该区调查。

朱某人随便闲谈，告诉我们他刚从上海买了几支美国步枪和一挺轻机关枪，交给在无锡的大儿子带上来。他的小儿子十八岁，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现在家里，刚同无锡一家很有声望的大绸缎庄老板的女儿结婚。他本人又是该区的区长、国民党区委书记长、保安团团团长。因此，他是当地党政军司法的首

脑，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揽的土皇帝。

我们到朱某人的老家朱家村时，发现河岸上有一群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聚在那里。一大队武装警卫人马穿过人丛，形成一道保护围子，当我们下船上岸走上用鹅卵石铺成的乡村小路时，他们前呼后拥武装保护我们。群众跟在后面，默默无声。当离开村子还未进入大院的时候，学者朋友和我落在后面同一个士兵交谈。他们说他们是北方部队，调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既不会说本地话，在本地老百姓中间又没有亲友。两天前朱家抓了两个农民。

我们接近朱家大院了，这是一座三面有碉堡式围墙，庄外有壕沟，四面通电网，门户枪眼密布的庄园。

走进大院，我们来到青石砖地、红漆栋梁的瓦屋大厅里。仆人们进来点亮了许多大红蜡烛，霎那间我们看到庆贺小儿子结婚镶有金边的喜帐和花好月圆、白头偕老、鱼水好合、子孙满堂一类吉祥匾联装饰得满堂通红。

朱家的亲房和在大屋里住的武装士兵集合起来了。族长执礼甚恭。同我们客套、喝茶、吃糕点。应酬对答，没有一点意思，使我感到如身处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庄园里的无聊闲话。喝茶未罢，又开夜宴。我的朋友教导我入乡随俗，请见一下新娘子。新郎官已在席上和我们同坐，比新郎年纪大、美而艳的新娘应请姗姗出来了。我们全体起立，鞠躬敬礼，她端正大方就坐。我问她受过些什么教育？她很谦逊谨慎也有点自鸣得意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说中国人要比外国人低一等，中国的教育也实在落后。她的话使我惊讶莫名，除了紧盯着她那迷人的面容，我还能问什么呢？

我的学者朋友又教导我向新郎新娘敬酒干杯。我们全体又起立，端起手中酒杯，我祝新人地久天长、百年和合，并且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就在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了大厅什么黑暗角落里和士兵背后有铁镣响动的声音。这声音我的朋友也听到了，不过他神色自若，毫不动容。谁也没有掉头看望一下。

晚饭后，我们伴随新婚夫妇到后院他们的新房里，乌漆发光，白铜耀眼的桃花心木家具摆设满房。一对新人坐在床边，我们祝贺他们给他们送礼，他俩殷勤地给我们敬茶切梨。我的朋友告诉新人说，我对新娘子出众的天姿惊奇不已。我请专家今后除非有必要、不要信口雌黄胡说。

我们心不在焉地回到大厅里终于轻松下来。这时，除了几个兵和朱某人的兄弟，一个身穿长衫的魁梧大汉在角落里，厅内空无一人。朱某兄弟的腰上系一根皮带，插一把毛瑟驳壳枪。我的朋友助手和这个绅士谈话，最后引他到外面聊天，让学者和我留下同士兵们谈话。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一般说起话来跟受过教育、有权势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开门见山，有话直说，没有什么保留。士兵告诉我们，吃晚饭时我们听到的脚镣声音是因为又押进来了两个农民老乡，他们并不犹豫，马上领我们到关人的暗房里。两个上了镣铐的农民躺在稻草上，铁镣的一端的环子钉在墙壁上。一个农民已到中年，面黑人瘦，相貌惊人；一个农民，二十多岁，面部浮肿，一副傻相。他们不吭声，不回答我们的提问，只是死死盯住我们不放。我们转身离开黑房子。士兵们垂头丧气地站岗守卫。夜深了，外面皓月当空高照，平原乡村茫茫恬静。黑暗的乡村长夜漫漫，多少反映出我内心对黑暗的恐

惧。

那天夜里，我被安排在一间满室家俱发光的客房里。另外有两张床，一张床上睡着朱家的两个姑娘，另一张床上睡着朱家的亲戚。我脱下外衣，和衣倒在床上，睁眼竖耳，留神听着大厅的一切声响。一夜没有睡好。有时坐起，有时躺下，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甚至想入非非，梦中摸到大厅去放那两个囚徒，哎哟！不行！有士兵在那里把守。我再设法爬到房顶上，揭开瓦椽，囚徒可以拉住我的手，我伏在房上拉他们上房，他们小心翼翼的在屋脊上爬着。沿碉楼壕沟出院，爬进茫茫的原野。哎呀！一个翻身我从床上坐起，完全清醒过来了，然后又躺下。感到心悸可怕。恐惧总在我的脑际萦回，中国到处是可怕的，人类世界是多么可怕。

当熹微晨光透过牢房般的格子小窗的时候，我起床走到大厅里。我的朋友和朱家兄弟都在那里。士兵们押着一些农民出黑房到隔壁院子里。黎明中我依稀看出两位朋友的脸色苍白，专家朋友固然通宵未睡，他的助手也是整夜不眠的。

朱某人的兄弟命令士兵用铁练捆住那个青年农民的腰身，双手反剪，一班兵士和一个家奴齐换上了便衣，二把盒子枪藏身，把踉踉跄跄的农民押走了。

“他会出卖别人的。”我对学者说。

“他们谁也找不到。”学者若无其事的说。“每个人都知道抓了人的事。”

“他们会把那个青年怎么办？”我失望地说。“那个大点的老乡在哪里？你能帮个忙吗？”

“外人插手是危险的。”他回答道。“为了不妨碍我们的

考察工作，我们不要有任何表示，视而不见，平安无事。我们今天到村子里去。”

白天我们由一个朱家兄弟领着走一村又一村，武装士兵前呼后拥。所有村庄，什么朱家湾、朱家冲，都以朱家取名。土地和农民都属朱家所有。农民住的茅屋土房，既矮又湿，七零八落，分散群居。木板床上、摆着破烂棉絮被头。屋子角落里，堆着几件旧式农具。灶屋里面有几口锅斧炊具，蓬头乱发的妇女、姑娘们见我们走近忙藏身在黑屋子里。在她们说来，我们是政府大官朱财东的贵客。

一个老农拿了一捆割下的稻子就地放在朱某兄弟的面前。他弯腰到地，哀求行善减租，因为水稻被虫害，收入减产一半。

朱家兄弟粗声豪气地告诉我们，那些农民极不老实，以致割稻打谷时他非派兵到田地里站岗放哨看守不行，一转身他们就偷谷。旁边一群农民交臂叉手，笔直站着听。我的朋友想同他们交谈，一见那些农民怒目相向，沉默不语，紧紧盯住他那充满仇恨的眼光时，他知难而退会意地向我投了一眼。

我们于无人处单独在一起时，我脱口说道：“要是来一支军队把朱家人关起来，救救老百姓才好！”

“什么军队？”我的朋友学者问我。

一星期后，我在上海遇到了这位学者。我告诉他“昨天晚上我同德国实业界的几位朋友共进晚餐，和他们谈起朱家和农民的事，他们狠狠地批评我的态度不对。由他们说长道短去吧！你该知道，象我那种态度可是他们出丧的丧钟！只要有革命军队救老百姓，土豪地主帝国主义分子的丧钟就敲响了！”

“就是，就是！”我那朋友冷冷地回答道。

这个专家是我有幸相逢、体验中国农村点滴生活的同路人。他同其它继承中国悠久文化传统并接受西方世界文化精华的知识分子贵族学者先生一样，都是革命的民主派人士。但是，他们同学者先生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脑子里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八、上海的恐怖

“我真奇怪，中国吃教会饭的人，就是说为了吃饭而信基督教的人究竟有多少！”我说这话时，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的年青馆员的脸上现出一副委屈难受的神色。

“究竟有多少，无法知道。”他回答道。“我们青年会的干事先生们专会钻营，干而优则仕，很快就要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去作官了。我们的干事昨天踮起脚尖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命令我们上大礼拜堂作礼拜去。因为蒋介石参加了美以美教会。瞧他那副吓人的样子！”

“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可把我吓坏了”我大声说道，“美以美教徒也罢，非美以美教徒也罢，都是一样，使我见而生畏。一个吃基督教饭的中国商人是最难对付的，他道貌岸然，满脸带笑、逢人握手，满脑子打人鬼主意的生意经，真是可恶到家。”

进来了两个借书的青年。馆员把我请他翻译的书合上。封面上书名是“约翰福音”，打开书的头几页是福音章节，翻下去却是“中国大革命”。两个青年走后，图书馆员打开福音继

续为我翻译目录章节。这是一本“禁书”，可能是共产党出版发行的。书面上的基督教会出版社是不存在的。青年馆员藏有许多这类图书，书名不是“福音”就是“论语”什么的。

这个图书馆员是情报的源泉。他从公务人员、官场朋友和新闻记者的茶余酒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中，搜集到许多难得的宝贵材料。他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群众生活、人民忧患的青年人。国民党政府发表了值得研究的东西，他就研究一下。共产党人出版了什么为人民谋福利的东西，他也读它。总之，他见书就读，开卷有益。

一天，青年馆员转身问我：“您愿意到杨树浦工厂区去瞧瞧工人的经济公寓吗？明天我可以带您去。许多经济公寓归天主教堂所有。”

我赶忙表示同意。次日下午将近黄昏时候，我上他家里去看他，他住在有损上海市容的半西式住宅里。一排排的住宅同里弄大马路的高楼紧紧相连，如果在一楼，通常是一间正方形卧室带一间小而阴暗的厨房和一个漆黑密不通风的厕所。如果是一个受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教会文书的住家，案头墙上就有磨损破旧的美式流行歌曲集，普天颂赞、电影画报和照片一类的书报画片。

我到图书馆员的家门口时，听到二楼窗口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嘘声，使我吃了一惊。抬头看见了青年馆员的面孔，几分钟后大门开了，他小心地请我进去。

他二话不说，示意我上楼。打开后窗，我见到对面一排半西式住宅小房子，一群中外包打听密探正在敲打一家住户的大门。里弄上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张面孔，随即消失不见了。一

个瘦高个身着长衫便衣踢开了对屋的房门，两个密探跟在后面朝里直冲，其余的人接着进了房。一个女人发出了恐怖凄厉的叫喊声。随着特务们穿房入室的行动，我们看到了对面卧房里那个喊叫的女人。她发疯地来回走动，之后，举起了双手，面壁而立，头顶住墙。特务们撕开被褥枕头，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小小房间，家徒四壁，没有什么搜查的，不几分钟搜查了事。接着街门又开了，几个密探和戴上了手铐的一对青年出来了。女的头发凌乱、面孔苍白，男的口角冒血，身高瘦削，他们摆动的棉袍底下露出弱不禁风的身躯，然后消失在里弄里。

图书馆员的妻妹这时在楼下空房间里气急败坏地说道：“对门屋里还留下了几个包打听，他们在等候抓那对夫妻的朋友！我有一个女朋友常上他们家去，我不敢跟她去通风报信让她不要来了。哎哟哟，我也会被抓走的。”

“我去！”我自告奋勇，“他们不能抓去看一个朋友的美国人的。”

她叹了一口气放下心来，我记下她朋友的名姓住址。

“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提醒我道：“如果特务闯进了门，你就说你是来找英语教师的。请等一下，让我瞧瞧里弄里可干净不。”她跑上楼去，过一会细声细语下来告诉我，可以走了。

走上大街，我在商店橱窗前面迂回观察，断定后面没有尾巴钉梢，赶忙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到市中心区。下车步行一站后，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下车。穿过另一排半西式住宅小巷的时候，生怕特务们闯进了姑娘家里。

我心里七上八下，扑腾扑腾直跳，急忙敲门，无人答应。头顶上面一扇窗子轻轻开了，我向上一看，窗口露出一个十分美貌、两只大眼睛、一头短头发的姑娘面孔。

“快下来！”我悄悄地说。一阵跑步声过后，门开了，我侧身进屋，告诉她刚才发生的抓人搜查的事。她那水汪汪的眼睛顿时翻白，两只大黑眼珠直盯着她书架上的书。一般收藏温和色彩的社会文艺小说一类书籍的人就有被捉进牢里去的危险，许多青年在黑房里埋葬了他们宝贵的青春。

“你的东西全交给我吧！”我催促她，“你放心好了，你的朋友让我来给你报信的。”

她很迅速地走到书架边清理图书，里面有一本高尔基的《母亲》、接着跑上楼，拿下来几本包装好的期刊杂志。

我从上海的林荫大道向回走。遇见国民党特务和地痞流氓正在搜捕那些持不同政见，思想进步的青年男女。那个姑娘在半个小时内会转移住处，她所有的朋友也会得到通知的。在白色恐怖之下，尽管家庭、朋友、同志关系的纽带如何坚韧，但酷刑之下都会破裂。那些把革命当作浪漫事业冒险行事的人们，那些为金钱利益钻进共产党内出卖同志的投机分子，不用动刑就招供自首。有些共产党重要人物卖身投靠国民党后、甚至加入特务机构即后来臭名昭著的蓝衣社。他们潜伏在茶楼酒馆、客栈码头、舟船火车上，甚至混进监狱囚徒中间，指点出卖他们过去的战友。还有的人在报上登“悔过”启事，以求活命。那些失足者无论谁回到旧日的老地方，猜疑的乌云笼罩他们的头上，是多年消除不了的。记得有一回，我向一个共产党员谈过这事。

“看来你们不信活人信死人！”我问。

“如果我们让叛徒逍遥自在，中国就会亡国”。他回答道。

“你们的怀疑也会产生叛徒，你们共产党如果关门，人家势必就进蓝衣社的门。”

“一个人真脱党假脱党、我们有方法掌握得很清楚。”他望着远方盯了我一眼，又补充说道：“国民党对投靠他们的共产党人根本不相信，因为这些人朝秦暮楚，左右投靠，今天叛共，明天也许卖国。我们的思想信仰他们是知道的。思想一旦在头脑里扎根就不能拔除干净。”

“岂不成了强迫义务？”

“是的。国民党政府里面有许多人以前是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总是暗中帮我们的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未来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他们需要得到一种生命保险。但是特务、暗探、地痞流氓可不一样，他们穷凶极恶、为虎作伥，杀了许多自首变节分子，一旦把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情报榨取干净，然后就处决他们，不留余患。”

一位中国青年名叫冯达做我的私人秘书并兼翻译。他读报剪报把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剪下，译成英文，帮助我建立档案。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卡片就有几盒，不过多一半是官方的报道。头半年总结官方统计数字，我发现国民党官方发表歼灭红军的数字达五十万，但是官方报道始终说“共匪残部”在追歼中。红军总司令朱德、共产党总书记毛泽东多次报道已被击毙，一个月后又悬赏通缉他们。

我对各大城市处决共产党犯或共产党嫌疑犯的报道作了类似的比较研究。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国民党官办报纸上还详细报道集体枪决被害者的细节和图片。重庆的一家报纸的报道给我印象最深，据报道，四川省省长下令，凡活捉或打死一名共产党人赏洋五十元。此令一下，丘八袭击大中学校，学生在街上被枪杀。凶手们邀功请赏。我把这类报道的总结向陈友仁提出过，他担任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严厉批评过国民党政府。他当时向我提出保证，说他如果再当部长，有了权他会制止这类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的。一九三一年他在广东又东山再起，我因广州十二名工会领导人被捕案件一事找他，并提出不要执行枪决的申请。他这回的答复是：一、人们干这种非法活动，他们是清楚会有什么下场的；二、他对本案无能为力。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为上海逮捕两名外籍工会官员一案，去找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请他出力阻止将他们引渡移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也受到同样的对待。美国总干事拒绝帮忙，反而教训了我一顿。他说我从来不登三宝殿，没有为中国人性命交关的事找过他，并且说他关心的是中国人。在他看来，赤贫苦力的权利和任何外国人的权利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我接受了他吹毛求疵的教训。几个月后，我为三个工会负责人被捕、事关中国人性命交关的事又去找他。这回他说：“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事前是知道要法办的。这个案子，我无能为力。”

我和其它外国记者一样，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消息来源，同各种类型的中外朋友保持友好关系。我喜欢学者、专家们寻根

究底探讨事物本质的思想，也喜欢有些报纸编辑、记者对问题的现实看法。但我特别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前者后来以民族救国会领袖人物知名于世，后者如同法、美、俄等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无与伦比的勇气。

至于其余的人，则很难足道。在许多外国人和我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我和我的同行很少交往。不过，同行中间有一个人给我很深的印象，对我帮忙也很大。他就是《密勒氏评论周刊》的美国主编约翰·B·鲍威尔，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和他的看法经常相左，因为他不喜欢共产党，偏袒国民党，但是，他是一个美国民主人士，总是为我的独立写作权利而辩护。我们对于英国、日本的远东政策共同感到忧虑和憎恶。日本侵略中国迫使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凡是我投寄给他的东西他概予发表。后来一些岁月中，日本人无耻地暗杀中国新闻界进步人士时，鲍威尔先生组织他的同行尽力以礼安葬那些被害者，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为日本人占领以前，他为保卫中国而战斗，鞠躬尽瘁。他被名列日本人的黑名单，从不畏惧。珍珠港事变后不久，他和另一名美国记者维克多·克因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同我相识的人里面还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他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富有神秘主义色彩。我之所以同他保持联系，仅仅是由于他的消息来源非常有价值。他从内地各大城市回来，就把他拍摄的照片和得到的情报提供给我。

有一天下午，他从汉口返航，来到我的住处，颓然坐下，脸

色苍白，嘴唇歪扭，全身抖颤，再三说：“人生没有什么意思。”我给他一杯法国白兰地酒，等待他的神智恢复正常。他把一包胶卷和照片扔到我的膝上。有几张照片现出汉口江汉大楼前面空场上十多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所谓“共匪”挨次被砍头的情景。有几张照片现出砍头示众、横卧街头的工人尸体。有一张照片是手拿左伦、杀气腾腾的国民党军官的现场拍照，他背后是高高的外国工厂围墙，他前面是一些工人尸体，显然是他动手毙人的。

“除了那张拿手枪杀人的军官照片，别的都是我照的。”库尔特说“军官那张是英国工厂老板给我的。江汉关杀人那张是我在江汉关大楼窗子上照的。十二个人一律五花大绑，上身赤膊，脖子上套着绳子，有的嘴里直淌鲜血。警察和士兵穷凶极恶，以杀人当儿戏，他们把人犯踢倒跪下，踏上一只脚，拉紧套在犯人脖子上的绳索。一个肥头大耳的刽子手挥动大刀砍下一个个人头，热血直喷，甚至溅到挤在周围看热闹的群众脸上，真是惨不忍睹。

他没有动，只是继续讲下去，“有一个人犯被踢倒在地就呜呼哀哉了，刽子手然后剃下他的头。有几个人犯确是引吭高歌，他们唱‘国际苏维埃就一定要实现’那首《国际歌》。杀完了人，警察打扫刑场，用扫帚蘸着死者流出的鲜血向周围的观众头上回旋飞舞，人们惊恐万状，四散飞逃。”

他干咳了一阵，起身到洗澡间去，转来时他的面色苍白如灰。

“库尔特，你瞧瞧这个现代城市吧，”我有点激动，对他说道“要是你，要是我，把我们的见闻向老百姓讲一下又将如

何？把这些照片给传教士，给青年会干事，给金融家、新闻记者看一看，又会怎么样？瞧瞧这个大城市，十里洋场，电灯电话，高楼大厦，一应俱全。”

“我不打算为了一包中国人的照片去受私刑的罪，我要离开这血淋淋的国土到澳大利亚去！”

“你难道把中国人都当作畜牲一类的动物看待？”

后来他跟我说他还带回更多更多的空中拍摄的照片，国民党政府禁止空中拍照，但他还是照了。

“我干这个挣够了钱，到澳大利亚去过人的生活，然后再找事干。”他解释道。

我大惑不解地盯了他一眼，然后问道：“你的老板需要中国领土的照片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不管它！”

“你成了一个受人雇用的反华间谍！”

“反华？你对中国会有什么感情吗？瞧瞧我给你带来的那些照片，就够受的了！”

“说到底，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但你却是在为人民的敌人出力呀！”

“你真是一个空想家！”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注视着远方的天空，久久没有说话。

九、鲁 迅

一九三〇年仲秋一个炎热的下午，一对当教员的夫妇前来

看我。向我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我为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新刊物《大道》捐献和撰写有关印度的论文稿件；二要我租一家外国小餐馆，作为庆贺鲁迅五十寿辰开茶话会和晚餐宴会的场所。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在我的心中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①

第一个要求，我欣然答应尽力而为。第二个要求，颇费踌躇，因为这里面充满着危险，成百的男女宾客尽是思想界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但两个朋友向我提出保证，所有前来祝寿的宾客均系口头邀请并相约不生事故，而且从街头到餐馆的交叉路口都布置有“岗哨”。

祝寿的这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西餐室的花园门口。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长街上过来的客人。我前面的十字路口处有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国人，一目了然，他正在候车，在他附近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另一个长衫客人。

鲁迅在他的夫人和小儿子的陪伴下来得很早。他是我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和他见面。他的个子矮、身体弱，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象一把刷子似的。脸型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在我的脑海记忆中留下了一副表情丰富、机灵生动、为我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因他不会英语，能说德语，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他的举止，他的谈话，他的每一个手势，无不显示出难以言表的和谐和他那人格完善的动人处。在他的面前，我不禁自渐形秽、粗鲁鄙野、如同土偶。

^① 伏尔泰（1694—1778），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思想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就在同时，宾客川流而至。鲁迅步入园内。我一再盯住他的背影，他那纤瘦的手作出的手势把我吸引住了。

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的两个朋友告诉我，宾客中间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演员、学者、新闻记者，甚至还有两个政府要人。这一对权贵之所以也来祝寿，并非他们同情鲁迅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尊敬鲁迅的人品、言行一致、大智大勇、学识出众。

这是一次人材荟集、场面激动的盛会，一次思想界革命先驱者济济一堂的集会。一个衣着寒酸的团体引人注目，他们作为现代美学戏剧界代表的一批新人物，试图在演一些社会戏剧。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剧艺社这个团体看来比较得意，他们演出了易卜生写的一些戏剧和洪深教授编的一两个剧本。洪深教授也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之一。第三个团体是左翼青年作家、艺人和翻译家组成的剧艺社，他们演出罗曼罗兰、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作家的剧本。后来晚些时候，他们演出《卡门》时受到警察的袭击，人被逮捕、戏被禁演了。因为观众里面的特务密探很不喜欢《卡门》剧本的最后一幕，在最后一场里卡门把她的戒指朝她遗弃的爱人唐·乔希扔出并念念有词地说：“要记住国共两党的决裂”，这时，唐·乔希刺死了她而得罪了警察暗探！

这时我见到花园门口许多人渐渐走近。一个身高体瘦、走路如飞的青年不停地打量四周的动静，边走边看，一眼就知他是一个学生。他刚走过，我的朋友就悄悄地对我说，他就是共产党机关报搞党的宣传报道的《上海报》的编辑。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西装皱褶、头发蓬乱、坐牢几个月刚刚出狱的人。他因

“红军协会”中国代表的嫌疑被捕，他的家庭给警方贿赂了一大批款项才把他买了回来。

花园里挤满了宾客，再无人来了。我和我的朋友仍在放哨。夜色来临时，客人半数已经离去。另外有人站岗，我们和其他宾客进入餐室。

晚餐过后，讲话开始，我的朋友充当我的翻译。荷兰西餐室的主人不懂中国话，因而不用我们担心。中国侍者服务员们则站在一旁谛听人们的讲话。我们一边听那个蓬头乱发的人报告狱中的生活状况，一边密切注视那些侍者服务员的每个动作。接着那个《上海报》编辑作了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报告。这，我虽然听说过，但他的报告具体生动，为我首次听到。

一个身材矮胖，剪着短头发的青年妇女开头讲到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必要，她的讲话最后要求鲁迅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人和“导师”。这两个新的联盟团体后来成为中国文联。

鲁迅一直对每个人特别是对新的讲演者从头到尾、用心倾听，食指扣着茶碗的边沿。他继大家讲演之后，站起来平平静静地讲了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混乱的故事。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历史的见证。

他出生于一个清朝破落士大夫的家庭。成长于西学东渐思想渗入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由于贫困不能前往欧美各国留学，他以官费留学生资格到日本学医，对国民革命运动持同情态度。他在学医的同时，还读了日文，最初翻译了托尔斯泰著作。托尔斯泰向他灌输了社会革命思想和当代文艺的功能。

他回国后行过医，同欧美许多医生一样，他很快发现多种病根在于贫困和随贫困而至的无知。唯有富人有钱就医。于是他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同封建思想进行搏斗，在俄国经典作家影响下，用俄国古典小说的风格创作短篇小说，弃医执笔，五四运动时期，他在北京各院校讲中国小说史略。

以后他钻研德国、俄国的文学，翻译了很多俄国文学名著和文章。他说目的在于把当代社会文艺最优秀的作品向中国青年推荐。他还搜集西方古典和现代的美术作品，为青年艺术家出版了很多卷版画木刻集。

他说，现在要他来领导一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些青年朋友也劝说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出自农村，立足于农民和学者的生活之中。他并不相信对工农的痛苦生活毫无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活力来自实践，并不出于理论。

尽管如此，他将继续努力把西方的最优秀的文艺作品整理介绍给中国青年，并乐意充当青年的指导，或者说如青年们要求他充当他们的所谓“导师”。谈到保护青年，在这样一个把最温和的文艺当作政治犯罪的国土里谁能保护谁呢？从所谓“导师”的身份来说，他劝有教养的青年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搜集题材，学习研究西方的文艺形式。

集会快结束时，一个青年面对着我悲伤地摇头说：“真叫人失望，我是说鲁迅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态度真叫人失望。他的话真叫青年人泄气！”

我生平对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对立态度。他这样说，使我的对立情绪油然而生。中国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

分，从来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作品多半是无病呻吟、没有经验的虚构。讲到“青年”这个词儿对他们来说，就是学生，唯有学生才是青年。对于工人和农民，他们保持一种悲天悯人、寄予同情，但自我超然、鄙视群众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创作出的许多号称“无产阶级文艺”的作品多半是一些东施效颦、粗制滥造的俄国式作品。我对这个青年批评家回答道：“我是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的”。

我的生活同鲁迅和他的密友、中国知名的小说家之一的茅盾的生活紧结在一起。我们三人共同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人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版画集；我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对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政治迫害发出抨击的呼声。茅盾和我经常在某条街头的角落里碰头，仔细观察鲁迅住处那条街道的动静，然后走进他的家和他一起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一家饭馆叫来饭菜一谈几个小时。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

鲁迅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处于中国青年知识界的先驱或“导师”的地位。青年中间有很多集团，每个集团争取他站在自己的集团或路线一边。他对青年一视同仁，拒绝参加他们这个那个阵线组成的联盟，对各方面的意见广泛采纳，讨论青年提出的问题，修改青年作家的创作，鼓励青年努力上进。他的名字在青年创办的刊物上登在前面。

他常对我讲到他要写一部以他的生活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的计划，但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动乱使他没有功夫动笔。他对“无辜者遭到的屠杀”与人权的粗暴破坏是如此强烈憎恨，以致旋即

把他的笔当作唯一的武器，一把名符其实的锋利匕首来使用，对之进行政治上的讽刺。

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他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要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他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面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他向公众经常介绍这家那家文艺杂志，只是眼见那些刊物遭受镇压封禁而已。他的那些结构严谨、文风简洁的推荐文章写得流畅生动，有如迎风飘扬的旗帜傲视一切。在他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乃是人类成就的精神实质所在。他的独具一格的文风是那样与众不同，以致他用任何化名都会被人识破，检查官员把他的文章删砍斧削得不成体统。和他联系往来的作家、编辑、艺术家相继失踪、不明下落了。唯有他的年岁和盛名使他幸免被捕。多年中间，他的那些没有删改的手稿只有日本左翼知识界人物敢于给以发表。在日本知识界人士的眼里，他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作家。

鲁迅的追随者朋辈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如同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因而他病了。有时病重起不了床。他感到心脏衰弱，同意让上海最好的西医治他的病。医生检查过后把我拉到一边说，“他的肺病很重了，只有清凉干燥的气侯，病情才能停止恶化，延长寿命。”医生还加了一句话，说道：“他当然不会听医生劝告的，这些古板固执、愚昧无知的

中国人是并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很难说鲁迅古板固执：也难说鲁迅愚昧无知，可是鲁迅并没有听西医的劝告。“当别人正在战斗不息或是宁死不屈的时候，你们让我卧床一年做什么？”他指责我们说。我们以种种理由进行说服，但他提醒我们说，他穷，无钱就医。于是我们设法筹集一笔医药费，他仍然拒绝。高尔基邀请他作为他的客人到苏联暂住一年，他谢绝了邀请。他说，国民党会向全国大肆宣传叫嚷他接受“莫斯科卢布的。”

“随他们怎么去说吧！”我和他争辩。

“他们胡说不了！”他大声说道，“人人知道他们靠造谣过日子，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去！中国需要我。”

我们百般劝说，总是徒然。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开小差！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

一九三〇年年底，我去菲律宾休养数周。动身前夕，鲁迅和三个青年作家前来看我，消磨了一个晚上。其中一个 是柔石，他过去当过教师，是鲁迅最有才华和最心爱的学生兼朋友。当我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回到上海时，我的中文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了二十四个青年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被捕遇难的不幸消息。他们于二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提出牢房，强迫自掘坟墓，遭到杀害，有几个惨被活埋。柔石是被活埋的一个。

我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他书房里，我发现他面目黧黑，没有梳洗，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

“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一篇签有他的化

名的手稿交给我说道：“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

他把文章的大意说明后，我提出警告说，文章如果发表，你会遭到杀害的。

“有什么要紧？”他很愤慨地说：“总得有人出来讲话！”

离开他以前，我们俩人拟好了一个就屠杀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声明。我把手稿带给茅盾，由他作了润色并协助我把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有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鲁迅的《写于深夜里》这篇手稿甚至在国外也未发表过，我一直把它保留在我的身边。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文章开头写道：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在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他这里说的“野地的纸灰”，指的是为死者灵魂焚化纸钱的中国丧葬习俗。接下去他写珂勒惠支夫人的连环木刻画中有一副木刻《牺牲》刻画出一个面容憔悴、无限哀伤的普通母亲把垂死的孩子作为供献交给死神。木刻中牺牲的那个孩子就象征着二十四位烈士。文章继续写道：

“在中国的过去，一个死囚临刑。照例走完一个过场，准他喊冤枉，让他说无罪，由他骂昏官，听他摆业绩，任他表白

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上杀场临刑前，观众会喝采，他勇敢的死讯会传播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以为这些作法是既野蛮又残酷的，而今我看过去的统治者们让死囚这样作是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满有自信和勇气的证据，让死囚开口的作法多少是含有一点仁慈、一点恩惠的。”

然后他把笔锋转向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铢堂写的一篇《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文章，那文章说什么“对死囚的喝采还是同情，理想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对于社会实在要不得。因为这种作法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鲁迅以辛辣的讽刺对他作了回答，他论述了凶手的残酷：

“今天我每当听到一个朋友或一个学生的死并且知道了谁也不知道的死法，我感到比听到他怎么死去更加悲哀。我能想象得到在暗室中被屠夫们杀害的寂寞比当众处死更令人心胆发寒。当我第一次阅读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狱篇的时候，就惊异于书中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我看但丁的设想还是过于仁厚的了。他的设想并没有达到今日极平常的残酷的深度。”

文章末尾他附了一封信可能是自《坐牢略记》的摘录。寄信人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和两个上海大学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研究会的学生。他们因共产主义思想罪名被捕。指控他们的罪证有一条是查出他们有一幅卢那卡斯基的木刻版画。给木刻打上共产党罪名的烙印真是荒唐透顶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不敢逮捕鲁迅，把他的学生抓起来了。

这个青年的《坐牢略记》，以“敬爱的大师”开头，叙述他从客西马尾果园被捕蒙难那一天到贿赂一个看守转信给鲁迅

的那天夜里为止的全部经历。特别提到一个农民被告被拷打他是红军司令员的苦楚，十个指头的指甲被拔掉，鲜血淋淋直淌，面色死白，僵直无声，象一个鬼魂伏在地上。“我敬爱的大师啊！每当我一想起他的时候，我的心冰凉发寒，毛发直立！”狱中书简呼喊道。

我和茅盾翻译到这里时，茅盾搁笔、语调低沉，细声说道：“这的确是深夜里写的。”

“是的，深夜里。”我说。

十、华南插曲

一九三〇年炎热的夏季。我在广东实际考察广东缫丝业的情况。我一到广州就听说一个将军被他的对头另一个将军以五十块大洋收买他的马弁杀死了，这类事件滑稽可笑，给我的印象很深，广东省政府处于半独立状态，大权落在一些专横跋扈、视华南为禁脔的将军们手里。他们坐在避弹的汽车里，警卫人员保卫森严，招摇过市。这就是他们以及随他们上台的一帮的威风。

我一一走访了这些将军，对他们说的一套并不相信，他们很好的接待了我，因为，外国记者在汗流浹背，暑热难当的夏天是很少或根本不到华南进行采访的。于是，我有一艘专供我用的公家小汽轮，一个官方向导引我参观工程、柏油马路、水利工程和中山纪念堂。说实话，我的参观访问采访报道工作，完全依靠大学教授、报馆编辑或记者、教师和作家、德国驻广州领事。当然，还凭自己的耳目见闻和分析研究。

我之所以在年中最热的季节到华南广州，真正原因在于研究缫丝业的美国市场迅速落在日本缫丝大王手里，几百万“丝农”的现状。我可不愿意作为那些手摇芭蕉扇、大腹便便活象罗汉的广州丝绸工会巨头的客人，前往丝厂地区进行考察。最后，我在一九一五年创办的暨南大学里找到了一个研究缫丝工业的教授团体，其中有一个青年专家要去顺德产丝地区进行六个星期的考察。我跟他到广州丝业公会，在那里他和一个多疑的公会理事争论不休，最后得到坐同业公会的轮船前往几百万农民辛勤劳动的缫丝工业产区的许可。百万富翁在广东南海顺德，三水一带兴办了许多缫丝工厂，缫丝工人尽是青年妇女。

第二天，青年专家和我上了一条轮船，船上乘客不过二三十个，是缫丝工业同业公会的商人。船身包着铁壳，船上架着机枪，以保护商人不受“土匪”的袭击。就我所知的“土匪”，无非是一些为了活命每年在一定季节拦路行劫的农民罢了。我计算过，如果那些所谓土匪光临我们的船，搬走船上储藏的食物，回家可供全村子里的人吃几个月饱饭。每次开饭，那些丝商团团就坐，大吃大喝，丰盛的筵席，鸡骨头满地乱扔，他们互相谈论银根紧缩，市场萧条、丝厂倒闭和亏损的情况。缫丝工业确是在衰落中挣扎求存。我的同伴年青的专家对那些商人非常敬畏，但一提到蚕农或缫丝厂女工时，他的无名火气便升高三丈，语调中间总流露出敌对和轻蔑之意，他的火气特别集中在几千丝厂女工的身上。原因在哪里，我难以理解。他悻悻地说，那些丝厂的小娘们是华南臭而不可闻也的中国里斯波斯^①

^① 里斯波斯女郎，指古代希腊里斯波斯岛（Lesbos）今名买提仑尼岛的妇女。相传岛上的年青妇女多情，以同性恋爱著称。——译注

小骚货。她们不肯成家结婚，如果父母强迫她们结婚，她们就拿出部分工资叫男人讨小老婆。结了婚的女工最多也只生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后回到工厂去做工，拒绝和男人同居生活。政府颁布了禁止妇女逃婚的法令，那些娘们视法令为具文并不遵守。我的同伴年青专家还愤愤不平地说：“她们很有钱，洋气十足，麻烦的根子就在这里。她们一个月的工资十一块大洋够多的了，她们目空一切骄傲得了不得，谁都不在他们眼里。当然，她们挣的工钱要养活一家人，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等一家人口也是够多的。然而，她们手头大方，浪费她们的钱。我每回上电影院总见那些娘儿们三五成群手牵着手，唧唧啾啾、叨叨个没完没了。”

“到一九二七年，她们不顾禁令在缫丝厂里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工会。现在那些臭娘们不顾法律规定秘密结拜‘姊妹会’。她们胆大包天甚至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经常听到因为她们的父母逼迫她们结婚的缘故，三三两两在一起自杀的消息。”他又指责道。

我和年青专家有几个星期，有时步行，有时坐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集镇到另一个集镇。白天，烈日当空挥汗如雨，晒得我们头昏，脚板滚烫。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如医生的手套紧贴在身上；晚上，我们不是在乡村小客店里歇脚，便是在寺庙的空房里支起蚊帐过夜。一路上遇到肩挑满箩筐蚕茧的赤膊农民。集市上发出生丝熏鼻臭味，仓库里的蚕茧、屋檐下的生丝堆集成山。村户人家，形容枯槁，劳累过度的农民守在养蚕盘前日夜操劳。我询问那些蚕农的生活和养蚕情况时，青年专家担任翻译。开始他有点好奇，后来他很感兴趣了。蚕农人

家，茅屋土房，木板当床，上铺旧席，围以发黄变黑的当蚊帐的幔布。一般说来，小灶房里有一两口锅，室内有一张旧方桌四条长凳，这就是千万蚕农的家。蚕农财富以桑树计算，少数蚕农有几株桑树，为了急用或买粮食，几乎所有人家都把自己的蚕丝收入提前当出。收成落空就倾家荡产，日日养蚕，岁岁欠帐。我们走访各家千篇一律都是这样。仅在大市镇生丝气味弥漫的丝厂附近，我们才看到境遇较佳，而有人的人家。这类人户的姑娘都是缫丝厂女工，这时我开始认识到，同其他地方一样的农村的情况，工业化对姑娘们参加工作的意义。这一带的妇女下地上工，赡养家庭她们是主要劳动支柱，所以生女孩同生男孩一样喜庆门楣。姑娘们的价值意义和她们的独立尊严的地位反映出来了。青年专家指责她们是里斯波斯小骚货的意义我开始明白了。她们的尊严只能和已婚妇女的卑微处境相比，她们的独立似乎是妇女对封建制度官僚主义的对抗。

青年专家对那些缫丝厂女工的反感在我们参观访问丝厂时突出地表现出来了。穿着光滑平整的青布衣裤的青年女工们、长长的一排排地坐在沸腾翻滚、热气直冒的缫丝大锅前面，搅搅生丝十个指头烫得通红发亮。她们一班人中间有时传出一句话，全车间接着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青年专家的脸色这时开朗起来，给我翻译解释道：“娘们说我是一条资本家的走狗，说你是帝国主义洋鬼子！她们嘲笑你的奇装异服，短发头，高鼻子，蓝眼睛。”

一个黄昏时候，我和青年专家在一个旧庙的空无人居的厅堂里架起行军床露宿，我们坐在庙门前的台阶上乘凉。小沟那

边矗立着缫丝厂的高墙，工厂大门不久大开，身穿青布衣裳的女工们纷纷而出，每人手里提着一个搪瓷食盒，脚上穿着木板凉鞋，踢踢达达地快步疾走。乌黑发亮的头发向后梳成一条辫子拖齐背臀。发辫靠颈背处扎着鲜艳的红头绳，当她们的行列跨过小沟的青石拱桥、匆匆走过庙前的大路时，我感到这样风流潇洒、美貌动人的妇女，在我生平是确是少见的。

我请我的青年专家给我翻译，百般求他总是不答应，他说他不懂此地土话。他不但不翻话，竟拍屁股而起，怒气冲冲地朝镇子直奔而去了。当他的人影消失时，我便起身走下台阶。这时一群姑娘们围拢上来双眼盯着我。我请她们吃白冰糖。这些姑娘明眉皓齿，仪态大方，接过冰糖往嘴里送，咯吱咯吱地嚼着，一边不住打量我的衣服、头发和眼睛。我同样一一打量着她们，猛然一声大笑，我们一齐乐开了。两个女工伸出臂膀挽住我的胳膊，其他的姑娘簇拥着我，高高兴兴地走进一个女工的家里。姑娘的父母和两个大眼睛的兄弟十分殷勤的接待我们。小小一间房子里，早已挤满了许多姑娘和邻居。方桌上燃点着一根巨烛，旁边几条长凳。姑娘们请我坐在上座，同时给我端上好茶。

一场奇怪的对话接着开始。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广说官话。北京官话我很有把握能听懂，但是这些姑娘说的是粤语方言，同中国其他地方的普通话全不一样，我难以听懂他们说的什么意思。我在东北、在北平、在上海陆陆续续地学过华语，但是由于行踪不定，每次总是从头学起，这里学过的，易地则一无所用。上海有上海的方言，在北平说上海话引起人们发噱，到华南就绝对说不通。只有传教士和外事工作人员有可能

在北平华语学院专学华语一年，而记者们东奔西走无从学习华语。因此语言不通和丝厂女工们的对话只有用手势动作来进行。她们指着孩子问我有子女没有？没有。难道还没有结婚吗？姑娘们很感兴趣看来有些奇怪。我掏出水笔和本本，作出思索的样子，以探问的眼色望着她们，然后作出写字的姿态。一下子大家激动开来。

一个男子站在门边用普通话问我一些问题，他的话我能听懂。我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新闻记者，不错，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以前是一个工人。”他翻译了我的话。姑娘们似难相信我做过苦工。她们坐在板凳上，挤在一起，背后站了許多人。通过动作、手势比划，我了解到她们的月工资不等，有的八元、九元，有个别人挣十一元。一天做工十小时而不是八小时，如青年专家告诉我的。有时一天做工长达十四小时。

一天十小时是如何争到的？这问题，比划失灵，只好用画画来提问求答。我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幅图画，上面画一个大胖子站在缫丝厂大楼顶上，呲牙裂嘴张口大笑。又画了一张姑娘们叉着双手站在工厂四周、大胖子站在中央抱头在哭的图画。女工们边看边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一个女工冲口说出了两个字，大家接着装出罢工的样子，叉手而立表示上工的神气，又俯首按桌表示决不动摇的决心。姑娘们乐开了，彼此手牵着手拉我到她们的中间，我们大家站成一圈，笑得前仰后合。她们就是这样争得一天十小时工作的。

这时，一个姑娘突然以清脆悦耳的女高音领头唱起了一支歌，歌声突然中止，满房子的人合了一声。接着她一声声、一声声地问，人们一声声、一声声地和，一问一答欢乐地歌唱。

她们的歌声使我激动兴奋，也使我神伤、失望和怅惘，她们唱的什么歌，词调我理解不了啊。

奇妙的歌声终止，姑娘们盯着我拍着手，她们要求我唱一只歌呀！《马赛曲》涌上了我的心头，于是我对她们唱出了这只法兰西大革命的进行曲。姑娘们高声和唱，喊着再来一个，我们大家又一起唱了《国际歌》。所谓缫丝厂女工中间有共产党小组活动的说法，观察她们的神色歌声，尚未完全证实。

室内发出一阵轻微的骚动，那个站在门边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笛子悠悠扬扬地在吹，那个歌声清脆动人心弦的姑娘随着嘹亮的笛声唱了起来。笛声阵阵升高，这时一个男高音接唱下去，男高音的歌声停下来时，女高音又回唱下去，这显然是一曲民间流行的山歌。

我同这些萍水相逢、语言不通的丝厂女工就这样欢乐相处、度过了一个难得亲近的晚上。一个姑娘打着红灯笼照路，别的姑娘跟在后面送我回庙安息。夜深沉，景寂静，除了巡夜的更夫敲梆鸣锣报告时刻、告诉人们一切平安无事外，四周安静极了。我躺在行军床上难以入睡，发感慨之幽情，想人类的共性，普天之下，人性善良；四海之内，姊妹多有。

十一、上海风波

一九三一年春末的一个下午，我翻开美国报纸上海《大美晚报》看到了伍德海先生攻击我的一篇文章，他是英国侨协的主席，也是英国在远东的最为反动的作家之一。

伍先生的大作之所以有趣，并不在于他的矛头指向着我，

而是因为它的风格确是上海瘪三穷极无聊跳墙碰壁的 最好榜样。人们可以提出人权主张来对付这类无聊的思想，而在一个残忍无情的反动派对每个男女横行霸道的城市和国家里，他的奇文可算是极合低级趣味的新闻界人士的杰作，因为它对我进行政治陷害，又对我施展人身攻击的伎俩。

要不是官方一手加在我身上的询问、非难使我处境困难的话，对伍先生的大作我是不会加以理睬的。几个月前我被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逮捕，罪证是上海英国警务局给该局一份秘密公文。莫须有的指控我是一个持美国假护照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警方用我不懂的俄国话同我谈话，然后抄走了我的护照。德国总领事出面干预我的案子时，国民党广州市警察局给他看了上海英国警务局的秘件。美国驻广州总领事也看到了公函，但我问他时他却支吾其词不回答问题。在等待华盛顿官方关于我的公民资格的答复中间，我们的总领事要我把我熟悉的中国友人的姓名一一告诉他，我说我以记者的身份这样作是不道德的，他以领事身份这样要求也是不道德的。于是我们的总领事先生恼火了。

我被软禁了几个星期，武装人员随意进出我的住处。我要上街，他们跟着，一群不三不四、窃窃私语的人跟在后面瞧热闹。等到华盛顿官方证实的公民资格复文来到时，我已病了。承蒙我的朋友爱尔兰船长的营救把我带回上海。在重新投入战斗生活之前，我不得不前往菲律宾作三个月的疗养。

伍德海攻击我的幕后背景正是这场意外袭来的风波冤案广州事件。他在后来的文章里提到一个中国人全家十二口被共产党杀害，埋在院内的案件。据说是对这一家的苦主斩尽杀绝的

报复，家主原来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物，后来他叛变投敌，加入蓝衣社，出卖了几十个同志。

这事与我毫无关系，暗杀在中国蔚然成风。谁给刺客一笔钱谁就可以制敌手于死命。杜月笙，上海青帮头子，靠暗杀起家，拥有大资产，且不提他的鸦片生意和中国厂商给他的“保家供俸”了。他是上海的鸦片大王，提起法租界的沙皇，指的就是杜某其人。他和另外两个青帮头子结成一帮，号称“三巨头”，横行上海。青帮经常绑架那些反抗他们的中国商人，用绑票人质勒索赎命巨款。同青帮勾结在一起的公共租界的中国特务头子也拥有巨大资产。有一次青帮在对许多法国官员赴宴的酒席上暗下毒药，几人中毒身死，报上说是天花恶性发作之故。

伍德海对我的人身攻击也不能使我有动于衷。人们知道，多年来，英国警务局长和资产阶级的高等妓女同居，这些高等妓女只奉陪那些能付“一炮五十元”的白种好汉。警务局长的婊子夫人有一回和尊敬的局长先生及其僚属在一起还拍照留影过。

这类婊子夫人中间有一个夫人的小姐还在英国一个高级社交学校里受过教育。

我还记得玛格丽特·山格尔夫人上次来上海旅游的事：她一头深色秀丽金发，坐在一家茶亭里喝茶的时候，吸引住了旁边一位浓装艳抹、姿态高贵的女人的注意，那女人主动向她靠近问她愿不愿意挣一笔大钱，一件皮大氅，还有什么漂亮衣服、首饰等等。玛格丽特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那高贵的女人向她交了底，原来是英国舰队开到上海，海军司令看中了玛格丽

待这样金发美人型的人儿。

而我则不知作了多少孽。真不容诛，既不是青帮的打手，也不是局长的情妇，更非舰队司令随意摆布的金发美人。个人问题，除了朋辈知己，不足为外人道，恕不作答，但是，对于包括我们可爱的伍德海先生在内的英国绅士们非同一般的政治陷害则有回敬的必要。政治上辨明是非，更为必要。他们对我的人身攻击是如此卑劣，以致有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向大美晚报社的编辑提出了抗议，然而该报声称论战已经结束，拒绝对来函作任何答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伍德海文章袭来过后几天，我的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一个神秘的警告。据说一个同法国、英国警察当局和白俄有联系的波罗的海德国人名叫卡尔·史特豪斯其人要来拜访我。他自称是国际红军援助会的委托代表，该会是共产主义劳动保卫组织的机构，总部设在柏林，还说他带有国际红军援助会主席威里·孟曾伯格先生的两封亲笔信。我既非红军援助会的会员，更甭提是该会的官员，有关信件的事使我怀疑。卡尔·史特豪斯是一个知名的国际间谍，许多人久仰他的大名。他来看我还说有信，用这种方法借以骗人，可以轻信，未免天真。

过了几天，史特豪斯其人大驾真的光临。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个子，红发碧眼，獐头钩鼻，象蛇一样的刺眼吓人。他拿出国际红军援助会委托他征收水灾帐款的介绍信，真是滑稽可笑。我马上告诉他我同国际红军援助会毫无关系，同孟曾伯格其人从无来往。史特豪斯的原话是：

“我要你把你知识界的朋友介绍给我。听人家说你知道很多，他们能够帮助我们的运动。”

史特豪斯的身后放着我现在随身携带作防身用的一头以铁嵌铅包的手杖。我起身去拿它。他回头也看到了但一声不吭，转身就逃。我在后面大喊紧追，他象黄卷风似的无影无踪了。

这天晚上，我注意到我们房子前面大街上的路灯熄了，一片漆黑，灯柱背后站着一个显然是外国人。我还看见紧靠马路边一间亭子里新开了一家“美术店”，几个白俄正在杂陈乱放的文具纸张、颜料、笔刷的堆堆后面无事忙碌。然后我看到两个中国人来回在我的房子外面走动。经验告诉我，一眼看出他们正是青帮打手。尽管一般认为“天下的中国人和小娃娃一个样”，而中国人的模样和别国人的模样不同。中国刺客，上海的流氓阿飞和暗探是一目了然，与人不同的典型。

第二天早晨，我雇的老妈子从厨房跑出来气呼呼地喊道：“小姐！小姐！厨房里来了一个家伙，一个土警察，要抓你去坐班房！”

我昂然大步走进三家共用的厨房，发现中国用人们垂手直立在听训话，一个穿西装的中国汉子见我进去就不说话了。我命令他出去，他拉长了脸转身走了。我的用人奉命马上回家。有两个男朋友住在我的住处陪伴我有两个星期之久。每次外出决不独行，由一个朋友或两个朋友陪伴，打手们跟在我们后面监视盯梢。

白俄呆在那里监视我的行动已很明显，于是我到美国法院向特区首席检察官乔治·司雷特报告了情况。关于我同卡尔·史特豪斯打交道的事使他捧腹大笑。他告诉我上海警察局曾经三次想把我逮捕，所有尝试均白废心机。他向我提出建议，既然我住在法租界就当给法国总领事写封信把青帮打手、暗探特

务、白俄大鼻子无事生非的情况告诉他。

我给法国总领事写了一封带刺的信。第二天上午，一个可爱的白种人士前来拜会我，脸颊留着蜡黄色的小胡子，手里拿着一根精致的手杖。他用男高音声调象唱赞美诗似的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国警察局政治部的代表特来求见女士的。这位世外来客安然就坐后就又唱起歌来。

“女士！我奉命前来告知你，女士所指有关暗探特务流氓打手之事我局一无所知！鄙人奉命前来向女士推荐一名法国高级特工紧跟女士外出，我们希望女士放心和安全！”

“我犯不着用贵局的特工来保护我！”我一语戳穿他的鬼话，“贵局的暗探刺客不是对我撒下了罗网吗？请高抬贵手，把我屋子前面的街灯修好，并且召回贵局的走狗。法租界已经臭了，先生们要不听忠告照旧胡闹下去，我只好诉诸国际舆论。如果不修灯不收兵的话，我只有请贵局领教一件国际丑闻，让法租界的臭名声更臭如何？”

“女士呀女士！那些家伙并不是我局的人员，法租界也并不臭呀！”

“阁下，那些家伙可真是贵局的人员，法租界也确是臭气熏天，特务、流氓、打手、刺客、鸦片、白俄、婊子等等臭不可闻！”

这位想入非非的来客挪动了屁股，斯斯文文地站起来向我行了一个鞠躬礼，说道：“再见，女士！再见！”

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拿起他的漂亮精致的手杖，慢慢地走了。

出乎我的意外的是，那天晚上街灯亮了。“美术店”关了

门，特务们不见了。使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的生命多多少少还有点保障，但是，中国人仍一无所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租界的风波过去不久，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报上又刊登出一篇有关我的文章。这篇奇文，真令人异常惊奇。文章说我出生于美国的密执安州，在密州东南的安亚伯市受教育。精通各国语言，日语、华语、俄语说得很好。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员。专攻房中术，在军人身上下功夫，从中探取英国人的情报是她的拿手戏。因为她年轻美貌，既是歌唱家又是舞蹈家。曾在新加坡探取英国人的情报，在爪哇探取荷兰人的情报，在菲律宾偷窃美国人的情报。现在上海，正盗窃每个人的情报！荒唐捏造，不值一驳。

欲入人罪，何患无词！隔了几天，汪精卫的英文宣传机关报《中国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妙文，声称，史沫特莱从小就是一个骗子。他们摘录我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里面的话作为“证据”说是供词：她五岁的时候，就因为她编谎对她的妈说，轻风儿背负着高楼大厦，红头鸟儿在樱桃树枝上跟她讲故事，而被她妈打了一顿！

这一类童话故事的墨迹未干，又出现了一个德国小特务柏哈德《苏区的日记》风波。柏哈德这个德国小特务显然急需要钱，不择手段，闭门造车，杜撰出一部参加江西苏区代表大会的旅行日记，天津一家外国报纸连续刊登了它。日记里面有一段话“透露”，史沫特莱同一批中国学生前往江西苏区出席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带了一箱威士忌香槟美酒，在江西赤都和学生同生活，夜夜狂欢，朝朝作乐、对酒歌舞。一直到苏维埃大会开幕时，乐极发狂的史女士头戴小红帽，全身精光光出现

在主席台上，高唱《国际歌》云云。

象这类发疯似的谎言报道，对于生活在秩序正常的社会里的人们，听来真难以置信，但在中国这类谎言却是习以为常的闲语，中国外国的“合法当局”无不承认谎言便是真理。有些中国报纸靠积累达官贵人的私人生活档案起家，维持自己的饭碗，以发表文章向受害者进行敲诈为能事。照例达到所求，公案不了了之。至于起诉，中国的法律是一纸具文，念起来好听，但有理无钱莫进衙门，贿赂公行，法律一文不值。对一无所有的中国人说，毫无公道可言。

上海有许多中国人寻求外国法律的保护，即使这样得到保护的人也寥寥无几。自从蓝衣社在公共租界成立新闻检查局以来，新闻自由过去保障过，现在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第三篇 帝国主义和革命

(1931—1936)

十二、九一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梦想灭亡中国，统治亚洲，作为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开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夜里。日本帝国军队在走向失败和灭亡的九一八晚上炸毁沈阳一段铁路，制造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天亮以前攻占了沈阳，同时，日军源源开进东北其他许多地方。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天津被绑架诱骗到东北，登上了傀儡宝座，得到了一个日本女人作妃子。戴上了新“满洲帝国”皇帝的皇冠。他的小朝廷里安置了许多倚老卖老、没有气节的老牌汉奸和卖国贼，日本“顾问官”告诉他们何时张口、何时闭嘴。少数青年中间有一个默从的青年军官马占山被任命为军政大臣。

张学良少帅在北平一家戏院里得到事变的通知，

他知道了并没有离开戏院，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正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里打弹子，同洋人联欢增进友谊。这个有趣的傻瓜之所以当上外交部长，正如其他官员一样，他唯唯诺诺地会说“也是”的本事。一百万国民党中央军队正在华南剿“匪”，妄想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政府认为日本出兵东北侵占中国的东三省，甚至把保家卫国的东北军队撤进关内是无关大局微不足道的事。国际联盟会迫使日本就范。“国人激动空谈抗战实无必要，中国抗战还没有准备”，蒋委员长这样说。而对红军则加紧围剿，“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蒋委员长这样干。但是，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情况又怎么样呢？一面是国民党代表向大会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声泪俱下。一面是日本代表衔着雪茄，轻蔑地盯着对手，挤眉弄眼。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成立统一战线、抵抗外来侵略的呼吁，不久又发表了对日宣战的声明。红军和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打击，但它设法让全国人民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这时日本人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警告，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剿灭不了红军，日本人将亲自出兵剿共。国民党的官僚政客说：“日寇是癣疥之疾，共匪是心腹之患”。有些在华的外国人士同意这种亡国论调；甚至说什么日本人来了，会保护个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共产党要夺取一切、没收私有财产。并且，日本人的过剩人口需要空间，把东北让给日本，既可以满足日本人“生存空间”的要求，又可以进一步确保中国的安全不致于受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将会是一个反

苏堡垒云云。

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东北事变。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对华政策各自矛盾意见总不一致，李顿调查团呆在东北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调查研究英美在华投资和“赤色威胁”的问题上。我始终不明白这样一个调查团的出面，好象是在暗示中国发出的日本侵略的消息纯属中国的捏造。田中奏折^①是日本征服世界的行动计划，已经被中国人揭露于世。但是许多外国人不顾日本占领东北接着侵占内蒙的事实，一口咬定是中国人捏造的报道；而田中奏折是把进攻满蒙作为占领东亚，把美国赶出太平洋，最后征服全世界的首先步骤的。看来田中计划真是异想天开，难以相信。对长期统治世界各族的白种人来说，他们的权力正在受到挑战，这是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然而日本人是有色人种，有名的矮子，历史上的倭奴。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日籍美人小泉八云即海英或《天皇》一类浪漫小说中的人物。

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是那样愚不可及的。他们一叶知秋，看出了日本侵占东北国难当头的威胁和危险。一个抵制日货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地。愤怒的浪潮转向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国民党政府在镇压各地民众抗日团体的同时，把东北沦陷的责任转移到不抵抗的张学良少帅身上。少帅之所以不抵抗是他事前接到过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事后他声明寄希望于国际联

^① 田中奏折是一九二七(日本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的密奏，详细说明了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祸及中国，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长达十五年之久(1900至1945)的侵略战争的“既定方针南进”政策。——译注

盟。于是对他的讽刺挖苦、非难攻击的文章和漫画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说他剃发弃袍，看破了红尘，痛恨鬼子，灰心之余，带了一个冰箱上庐山坚持不抵抗到底云云。

但是，张学良少帅的大部分东北军队拒绝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英勇作战，坚持抵抗日寇的侵略。他们屡败屡战，决不屈服，转移南下，穿过长城，进入关内。马占山将军利用担任伪满洲国军政大臣时期的机会对北满军队进行动员，然后挺身而出，率领部队走上战场，打响了东北军队抗日的第一枪，著名的嫩河战役点燃了全国抗日的烽火。他因为得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持，很快就被赶到苏联境内。但他为祖国、打日本、灭此朝食、英勇抵抗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博得全国人民的推崇景仰，上海市的学生走上街头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筹款。东北军人的事迹在一般报纸上是很少提到的，但东北军人的名字开始受到同胞们的敬仰。东北义勇军和朝鲜爱国者也奋起走上战场，投入消灭日寇、保卫山河的战斗，人数与日俱增、队伍随时在壮大中。

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一类南方政客面对日本的侵略在作什么？他们利用东北危机，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部门扩充势力，争夺地位。他们的权柄和所有的中国政客官僚一样，是凭他们掌握多少枪杆子的人数来判断的。他们控制了十九路军的一部分，把在江西前线同红军作战的这个军队撤回增加上海防务。

十九路军是一支民族意识很强、勇敢善战知名的南方军队。它同红军作战，不但学了一套游击战术，而且还学习了红军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彻底革命的思想信念。在淞沪地区施展故技制造“事件”的日本人被十九路军缉拿镇压，

于是战火重开，这回是在上海打仗，又是不宣而战的战争。十九路军的军官们告诉我：蒋介石给他们军队的前线总指挥蔡廷楷通电话，下了对日军不抵抗的命令，但是蔡廷楷拒绝服从。蒋介石调遣几个受过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精锐师到上海换防。据说这几个师奉有解除十九路军武装的命令。但是这几个师不但不执行蒋的密令，反而投入抗战的行列，同十九路军并肩抗日。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支持其嫡系部队卷入保卫上海的战役，对于无比英勇、孤军抗战、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则并不给予任何信任。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淞沪之役的抗战期间表现分明，使人确信不疑。市民家里、大中学校成了伤兵医院，医生、护士自愿担任救护工作。学生、工人不是上前线参加打仗，就是抬担架救伤兵。吴淞口炮台守卫战斗中有七百名工人同士兵一起浴血奋战，抗击海陆空三面来犯的日寇有几个星期之久。

一般外国人无不认为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打不了硬仗。淞沪战争给了我了解中国士兵第一手材料的大好机会。我同个广东翻译到医院里去慰劳伤兵，坐下来和他们谈话，一谈就几个小时，从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态度。他们多是些饱经风霜的战士，很多人还有孩子气。要不是说一口广东话，我还以为他们是美国的农民哩！他们随便谈话、有啥说啥，并不装腔作势、转弯抹角，不失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本色。他们痛恨日本鬼子，反对帝国主义，不愿打内战。尽管说为工农红军辩护就犯了国民党的法，但他们却大谈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农村老百姓中间进行的土地改革。他们批评自己的长官政客，控诉他们克扣士兵

的粮饷。十九路军有四个月没有发饷了。就在淞沪作战期间，医院伤兵委员会曾经提出补发欠饷的要求，许多伤兵因此被捕坐牢。他们说老百姓和士兵都一贫如洗，军阀和政客无不发财。

中国贫穷落后是没有人否认的，但中国外国的资本家做军火生意捞取巨大利润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承办军火的国民党官员拿不到很高的手续费就同外国厂商签订合同。外国资本家揭发了这一手，美国国会终于也讨论这类交易情况，但中国报纸上完全不登那些应该负责的中国官员的姓名。

我从许多中国朋友那里得知这类问题的侧面情况。有一天，一个中国女友去参加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夫人举办的茶话会，她顺路来看我。这位女友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负责的，有一千个床位的伤兵医院筹集捐款和征求志愿护理伤兵的看护人员。我在她的名单上签了名。捐了一小笔钱。她参加了茶话会后转来把她的见闻告诉了我。出席茶话会的来宾都是军政界高级长官的小姐太太。女士中间有一位太太穿一身绣花镶边十分华丽的新衣，戴一枚宝石戒指，嘴里嘟嘟囔囔直说仅花了七百大洋，真够丢脸。她们都打麻将牌，每桌的输赢，成百上千，毫不在乎。我那位女士朋友请女士们捐款，她们见名单我列第一名，捐款二十元。一个个照样拿出二十元作为捐献，不多不少。我那位女友再请她们自动报名到医院去护理伤兵，她们提醒她说，她们和小姐都是女士和千金，和那些出口粗野的丘八谈话可受不了。

没有一个女士志愿报名。但几天后却有几个女士照了她们在医院里给伤兵分桔子、香烟、包裹的玉照。伤兵们对她们大

发雷霆破口大骂道：“滚你娘的臭桔子臭香烟！把我们的欠饷还清，我们自己会买。”

经过三个月的英勇抵抗，浴血苦战之后，上海市闸北地区沦为一片焦土。中日双方官员在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幕后的秘密条款具体有哪些，无从获悉，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管怎样，国民党政府同意把淞沪地区中立化，对民众抗日运动进行镇压并把十九路军调离淞沪地区，甚至解散了曾经把枪口对日的上海警备部队，改由更加顽固得到日寇赏识的北平特别警察部队驻防上海。

淞沪作战期间，外国人说服中国、日本双方停战一日，准许那些在日本屠刀下幸存的市民从闸北疏散。持有日方军用特别通行证的外国人许可进入战区，帮助市民离开闸北。我弄不到军事通行证，但美国《大美晚报》的主编同意带我去，如果我敢于冒被抓的危险的话。我决定抓紧机会冒险去找我的朋友作家鲁迅。《大美晚报》主编是一位见义勇为的朋友，他开动有记者证的汽车，一手伸出窗外挥动军用通行证，一手把住轮盘朝日军营房疾驰过去。一路上不见老百姓，路边尽是日本兵，没有等他们举手检查通行证，我们加速开过了他们，我坐在车子里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到了我的朋友的家门口，房子一部分已经倒塌。我用英语、德语喊话，推门、叫门无人答应。许多中国市民被禁闭在家，宁愿饿死也不应声开门。

我们的使命失败，又赶忙开过戒备森严的日军占领区回到公共租界里，停战以后我才得到鲁迅一家为日本友人营救脱险、隐藏起来的消息。

我有些朋友在淞沪战事期间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一个留学美国回来的学者在日军闯进他家时，鬼子用刺刀乱捅并带走了躲在衣柜里的兄弟。我托两个日本记者朋友到所有日军拘留上海市民的集中营去找他。“真是惨不忍睹，吓死我也。哪里也找不到。”他们说：“请相信我们，我们将尽力去找。”他们一去没有再来消息。

十九路军在淞沪停战协议签字以后，请求调赴华北去同侵入热河的日军作战，但是他们反而被调到闽南去继续打红军。他们部队内部的军官大发雷霆，举行暴动，半独立了几个星期，同红军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飞机轰炸下，事变失败，有一部分人投奔红军参加了革命。几年以后，我在西北红军总部遇到一些十九路军的军官出身的参谋，他们参加过历史性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人民在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求和、丧权失地的国耻下感到羞耻。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抗日，受到镇压和逮捕。十九路军一个军官在南京行刺汪精卫等一伙政客。汪精卫前往德国治伤，并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投靠了法西斯轴心势力充当一名走卒。

接着，意大利照抄日本侵华故技占领了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抵抗重新燃起了中国人民心中爱国主义的烈火。小小的阿比西尼亚能够奋起抵抗强大的侵略者，中国也一定能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的志士们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呼声响遍全国。

阿比西尼亚抗战期间，我又一次游历华北，看到了蕴藏在人民心中的愤怒和失望的情绪。青年学生们在谈论中间无不慷

慨激昂，义愤填膺，怒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卖国、亲日投降活动。每个周末数以百计的男女学生到北京西山去郊游“野餐”，用手杖作刀枪，以卵石当手榴弹，举行爬山演习和游击战训练。

阿比西尼亚能够打，中国为什么打不得？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问国民党官员。他们说：“哎呀，阿比西尼亚人可是生番，生番不是好惹的。你把生番踩在脚下他会同你死拼到底。我们中国人可是文明人，有悠久的文明而且爱好和平。”

我在平津铁路的火车上亲眼见到了严重歪曲中国人民革命、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帝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苦果的一个侧面。国民党政府禁止任何人把银元装运出口，但是日本浪人在华北用不值钱的钞票兑换银元装运回国。我坐的那趟列车停在站上，等一伙一帮的日本浪人扛着沉重的银元箱子上车后才开出站。他们象一窝蜂似的窜进每个卧铺间，十五个一帮，二十人一伙。他们喧宾夺主把我和旅客推出座位。我站在过道中间的时候，见到一个中国查票员走过来把每间房门关好，点头哈腰、鞠躬如也地问候那帮银元走私贩子“太君的好”。他不敢动手查他们的票，因为日本人和沾主子光的高丽棒子坐中国火车以太岁自居是不买票的。

当我把这段见闻同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外国朋友谈起时，他说：“这个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对民族敌人不抵抗，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它的人民个人赤手空拳同外敌作对头？那个查票员要是查票补票、就会挨揍，被日本人干掉。”

正如我闻中国人的人力物力，战争物资和国家财富，不是用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而是在兄弟阋墙自相残

杀的内战中消耗殆尽。

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写信告诉我，说国际染料工业法丰公司已经买下了《法兰克福日报》的大部分股份。我是这家报纸的通讯记者，国民党政府曾前后三次向德国政府提出要解除我的记者职务的要求，报纸的新主子将会遵命行事这点我是清楚的。这家报纸是欧洲大陆上一份资格最老、最为出色的自由喉舌，经历了德国无数次反动运动的考验，纳粹的逆流不仅威吓它的出版自由，而且危及编辑、发行人员的生命安全。因为他们是一些很有学问、酷爱自由的民主主义人士，从而犯了纳粹党徒们的禁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犹太人成为纳粹匪帮要消灭打击的对象。报纸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士和我经过反复磋商、对我表示歉意之后，付了我六个月的工资，终止了我的记者活动。他们指派另一个德国人接替我的记者职务。此人后来当上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

十三、民 权

我和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时候谈到基本的自由问题，我们要争人民的民主自由，迫切需要把人权理论引进中国。但是我们不能有过多的期望能够得到多大的自由权利，只要能够争到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只要能够争取到政治犯的公开审讯，只要能够争取到监狱条件的改善和制止对人犯的逼供暗杀，我们的收获就很可贵了。

学识渊博，名实相符的学者详细论述了基本自由的必要性。一九三〇年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博士在上海一流教授办的文

学刊物《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尊重人权需要“法治”的文章，毫不夸大，论证很有说服力。

另一个反复无常，讽刺成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上海的林语堂博士。他在讲演报告写作中，主张用法治反对无法无天的专制。他贪生怕死，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他成为官僚制度的辛辣的批评作家。他的英文版《西风》小评论专栏内一些短文风行一时，鲁迅指责林语堂的一套理论对青年的影响很坏，因为它引导青年愤世嫉俗、脱离政治，不敢面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斗争。青年们东施效颦，欠缺林语堂的讽刺手法，写一些无病呻吟、贫乏无聊的文章，对血腥镇压的政治迫害揶揄嘲笑。

杨铨先生也是有真才实学、名实相符的中国学者一流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组织人才兼行政干才。他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院长是中国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人文主义学者蔡元培博士。一九三一年，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蔡元培博士担任副主席，杨铨先生担任副主席兼总干事执行委员。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担任主席，林语堂、鲁迅等人担任执行委员。同盟里面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的青年记者哈罗德·伊沙克，一个是我。林语堂、伊沙克和我三人一起负责英文出版的通讯报道工作。

民权保障同盟参加了三次争取人权的斗争。第一次斗争是为了一个中国记者在上海青江县附近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非法逮捕、私刑拷打致死的冤案。这个记者揭露了与顾祝同牵连有关的贩卖鸦片、贪赃枉法案件。顾祝同的故意杀害记者罪，激起了上海报界的义愤，提出了对他的公诉。民权保障同盟也强

烈主张公开调查死因并将顾祝同撤职。

顾某人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说死者是一个“共匪”，五年前的大革命期间，阴谋组织清江县人力车夫工会有案可查云云。同时他大摆“息事宁人”的筵席邀请民权同盟的会长和总干事赴宴，南京方面的蓝衣社分子对拒绝私下了事不赴宴会的蔡元培、杨铨等人发出了立即停止活动的恐吓信。国民党清江记者被杀案工作调查组，作了秘密调查并且验了尸，但调查的结果守口如瓶，没有公开。身为国民党要员的杨铨告诉我，找到了死者的一条打断了的腿，证据确凿，铁案如山。但顾某人依然无恙，主席还是主席。民权保障同盟首战失败，清江记者案不了了之。

民权保障同盟受理的第二件案子是为五个被指控为“共匪”的工会领导人的辩护案件，要法院公开审讯这类案件是异想天开的事。民权同盟要求本案庭审公开，有两名律师志愿出庭担任辩护人，一名律师收到恐吓信后自动告退。另一名律师收到蓝衣社分子要砸他的招牌、杀他的头的恐吓信后逃之夭夭。我们对五人案无能为力，又彻底失败了。五个工人运动领导人只有一个活下来。这一个共产党人之所以活下来，原因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国民党党员。她出面奔走，儿子才免遭遇难。

第三个案件涉及到我的朋友女作家丁玲的案子。一九三三年春天，丁玲和另一个作家潘梓年被蓝衣社分子绑到南京。人权同盟总干事杨铨为本案奔走不遗余力，并发表声明呼吁社会公众的声援。

几天以后，四个蓝衣社匪徒把杨铨暗杀在中央研究院的台

阶前。我们的民权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的打击下一事无成以失败告终。不过，知名的争民主自由的人士杨铨的被害，有名的作家丁玲的被捕，已经成为国际争论事件。美国作家、妇女界、知识界人士的纷纷抗议才救了丁玲的一命。而杨铨先生则不幸被残害了。

杨铨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深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革命影响，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是一个服膺民主、热爱祖国的学者。我能有一点中国过去社会的历史知识，应该归功于他的指教。正是他和抒情诗人徐志摩经常陪伴我去听京戏。我们三人总是一起去看朋友、上茶馆、赶庙会。一坐就是半天，天南地北无话不谈。他的谈锋犀利，轻松感人，使我心境开阔难以忘怀。这两位中国朋友放浪形骸，纵谈他们自己和朋辈中间的隐私，风流韵事、悲欢离合，使我吃惊也给予同情。杨铨先生把我的《大地的女儿》译成中文并在他的文章和讲演报告中向公众大力推荐。不过我有时注意到他的兴趣所在是更多的谈到书中描写的有伤风化、行为荒唐的地方，而少谈这本书的社会教育意义。

抒情诗人徐志摩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爱国学者杨铨先生为争民主自由，英勇成仁，他是惨遭国民党法西斯毒手的第一个民主爱国烈士。死者已矣，而我幸存。有时候我真有踏着别人开拓的足迹而生活战斗、迈步前进之感。

如果说我也付出了我的代价的话，看来和中国朋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法兰克福日报社终止了我的记者合同后，我被迫节衣缩食，撑持生活。打算写一部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报道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反迫害、争自由民主的斗争情况。美国

领事馆大概知道了我的经济收入困难的情况，一天，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官员邀我午餐，要我向他们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活动、纲领、政策的机密情报。我一口拒绝了。他毫无顾忌的指示道，只要每天打个小报告提供点东西就行了。而且说明可以让美国国务院知道真相。他建议我充当特务，礼貌照顾未免过于周到！什么目的使我奇怪。有一个美国驻华领事提出过一个客观不带成见的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结果招徕了“赤色分子”的称号并接到召回华盛顿听候审讯的命令。我也拜读过其他领事官员的报告，他们总是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什么的。

我们离开酒馆时，在街上遇到了领事官员的上司。我的东道主人当着我的面向他的上司报告，她说她一无所知！接着两位先生哈哈大笑起来，真是抱歉之至！

我下了决心，应该把我所搜集到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任何材料实事求是的摆在美国人民大众的面前，不说那些材料很不完全只是一鳞半爪一孔之见的东西罢了。反面报道，什么不说的人多的是。而我只报道中国的老百姓，只报道红军战士和知识分子反压迫为解放而奋斗的事迹并向他们学习。这就是我的志愿。

十四、第一千四百六十九号牌照汽车

那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李工程师有一天跟我说，他要去北平会一个正在同日本鬼子作战的东北义勇军的代表。他打算去东北参加义勇军。他请我帮忙为他到北平后找一个安全的住

地。我给一个外国友人写了一封信请他到某家外国饭店同李见面。

十天过去了,我那位外国友人给我回信说,他一再去约定的地点,但工程师并未见面。我立即断定李已被捕。马上通知了他的妻子和所有他的朋友们立即搬移新居,只有我的住处唯有他一个知道。

我正在准备行装离开中国前往苏联,转地治疗我的心脏病。动身前夕,房间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我听到了李工程师情绪激动的声音。他说他刚刚出“医院”,要马上见我。

坐待来客的时候,我想来者不善,他当了特务回来了。他提到“医院”的话就是说他已被捕。很少有人能够逃出虎口,即使出来了也罕能得到人们的信任。我和李工程师无深交,但我本能的感到此人可以完全相信。这种本能使我判断中国人是友是敌。正是这种本能使我辞退了我的秘书冯达。

李工程师来了,他的头发散乱,衣服不整,脸上有伤疤,情绪很激动。他坐在书桌对面,用流利的英语讲他的遭遇。

“我知道您在想我当了特务回来了,请您耐心听听我的经历吧。列车快到北平的时候,两个人上来抓住我,逼我跟他们走。他们说我被捕了,当时和以后都没有给我看过逮捕证。有一个人我认识,他过去当过共青团的负责人,后来叛变当了蓝衣社特务,现在为虎作伥,带人搜捕昔日的同志。

“那两个家伙把我带到北平一家人家,问我去哪里。命令我交出同志们的姓名地址。我一口咬定几个月前我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现在是去东北参加义勇军的。当然,当共产党也罢,投义勇军也罢,命运同样糟糕。

“他们从我身上搞不到东西，就把我带回上海，要我把上海这边熟人的姓名地址交给他们。我们一到上海，就有一个密探开一辆汽车来接，汽车牌号我注意到是一千四百六十九号。这个密探司机也是变节的共产党人，现在是蓝衣社特务。”

“他们把车子开到法租界同南道交界的一家肮脏的小客栈‘大东旅社’，那是一个土匪窝，抓进去的男男女女受到严刑逼供直到他们说是共产党才止。然后把人犯移送给警察局。”

“他们为什么把你和人们带到那里不交给警察局？”我问。

“什么原因我没有听说。我想也许是他们抓到一个共产党就得到一笔钱，所以非强逼人们说是共产党不可。我看到许多特务匪徒进进出出，他们打牌赌博，吵架斗殴。从人们的谈话中间我了解到他们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打手，杜月笙是蒋介石在一年以前任命镇压上海共产党人的帮匪头子。从那时起他们放肆和我们暗中作对。”

“密探们松了我的绑，强迫我看他们拷打人犯。一对夫妇象是穷学生模样，受到密探们的围攻，他们否认他们是共产党。密探们推我上去让他们瞧。我不认识这对夫妇，他们也不认识我。于是密探们让他们“坐飞机”。逼迫他们招供。”

“野鸭浮水坐飞机”，是一种酷刑。他们把那对夫妇的双手背后绑牢，用一根绳子吊起来悬在梁上。女人马上晕过去了。一个匪徒拿一根木棒直捅悬在空中的男人的肚皮，那人象鼓一样来回震荡，哀号惨叫满口喷血，终于失去了知觉。匪徒们把那对夫妇放了下来，拖到外边。接着又带进来一个要跟他们打架的人。他们把那个人推倒在地按住胸口，用一根橡皮管子插进

那人的鼻孔里，然后从皮管灌入屎尿煤油气味的屎尿臭水。那人的肚皮鼓起来了，于是特务们坐在肚子上一下子屁滚尿流，脏水上吐下泻。接着他们又灌。那人又吐，翻来覆去，几个回合，直到那人无声无息直挺在地上，特务们才把他们拖出门外。

“特务们逼着我看那些受刑的人，那人见我在场和匪徒们同在一起，当然会把我也看成是狐群狗党一流东西！”

“等一下！”我插话问他：“你为什么没有象他们一样的受刑？”

“蓝衣社分子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新的对策，”他黯然神伤，无限感慨地说道：“他们屠杀工人农民，因为他们除了革命无路可走，而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可能动摇。或反身投靠当局求得一官半职，或加入蓝衣社充当一名特务。如果拒不投降就会惨遭毒手。他们把我们的同志带到人犯面前当众露相，让人看清面目，即使我们的人能够逃出虎口，再也休想得到其他同志的信任了。他们有时候带知识分子走过牢房，有意让政治犯人看到，再不依靠他们了。”

“特务们逼令我写信给我的朋友，要他们到公共租界的大东旅社来看我，不然就象对待其他人犯那样对待我，他们极尽恐吓之能事。我希望逃出他们的魔掌，假装同意了。写了两封假名假姓假地址的信。他们把我带到大东旅社一间房子里锁了起来，他们住在隔壁房子里等着。”

“第一天夜里他们紧紧监视我不放，使我无法逃跑。第二天夜里我听到他们打鼾声，于是我爬到窗口想顺三楼的排水道而下。我的腿刚伸出窗外就听到一个声音，向下一瞧，一个人

正从排水道爬上来！那人抓住窗台，轻轻地推开窗门，我看出来他是个小偷。这时二楼房间里一个女人叫喊起来，小偷还没有进房间就赶快顺管道溜之乎也。顿时吵声大起，这天晚上我又逃走不了。

“我的信无法投递，当然无人登门上钩，但是我对监守的特务们说，恐怕是我认识的朋友搬了家的缘故，要不就是谁也不愿意来同我约会。他们大发雷霆把我带回那个特务窝子去，说要清醒清醒我的头脑。进门口时，见到两个密探带进一个模样儿英俊、衣履很讲究的青年人。特务们逼着我跟这人对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脓包，胆小如鼠，卑鄙龌龊的怕死鬼。在特务们威胁下上刑，他就磕头作揖，直叫招供，出卖他的朋友和同志。以换一条狗命。”那个卑鄙的家伙坐下来全身像筛糠一样直打哆嗦，结结巴巴地说：“丁玲住在金山路，今天晚上同两个作家有一个约会，在她家里会面，他们帮她编辑一份文艺刊物。丁玲是左派作家，不是共产党，不是什么共产党，”他一味坚持说。

“且慢！”我喊了一声，说道：“把那家伙的模样说一下”。

他把那家伙的模样描述一番，原来他就是我解雇了的翻译秘书冯达。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潮澎湃，很久一阵才让工程师把话继续说下去。

“大约黄昏，天也黑了，两个特务和一个司机把我推进了又是那个一千四百六十九号车牌的汽车里、朝那个懦夫叛徒供出的地址开去。四层楼上一个房间有一个女人应声开门，她一定就是丁玲。她一句话也不说，当司机抓住她用绳子绑她时，她

的脸色一下刷白，随即被押下楼梯走了。

“就在同时，我被推进房间里面。随即见到两个人，一个又高又瘦，神情紧张，一个人矮小个儿，脸色发青。前者背窗而立。一个匪徒向他扑过去时，两人动手扭打起来，高个子太脆弱，他一脚踢倒特务，接着纵身跳上窗台，飞下了四楼。‘哎呀！’特务吓慌了惊呼一声，冲出房门，去收尸体。怕把外国租界发生绑架的事故张扬出去。

“房间里面，矮个子和特务也扭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我拿起一个凳子朝特务的头上狠狠地砸下去。他应声倒地，我转身就跑，飞奔下楼，步出大门，没入人丛里面。在四川路上一家铺子里给我妻子打电话，可没人接，因此我叫您，叫您的电话。”

过一阵后他补充道：“这就是我的经历。您当然不会相信我，谁也不会相信的。太古怪离奇了？但我发誓我说的句句属实。”

我们对坐，静默不语。然后他对我说道：“请把我刚才给您讲的向我妻子转告，我打算在一家熟人的便宜的客栈里住几天，我的妻子要来看我的话可以派同志监视住我。”

“你的妻子也好，你的同志们也好，我一无所知，无法转告！”我对他说：“我搜集故事题材，你讲的故事非常动人。”

他低下头过度紧张后的疲劳使他闷不吭气，静静地坐在那里，我知道他讲的一切是真话，像一个母亲知道他的孩子说谎不说谎一样。“留下你住的客栈的名称和地址吧！”我对他说。

他写下旅社的地址名称，坐下想了一阵，然后对我说道：

“请您转告家里，一星期后的这个时间，我站在凉水井路的大庙前，左手拿一份西文报纸。同志们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出来一个同志跟在我的后面，走到一条僻静的里弄去。接近我身边时，就问见过唐朝四骏图没有？我说只见‘三匹马’，就可接上头。”

“如果人家不信任你怎么办？”

他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那就请同志们随意处置吧！”

“我现在身无分文，”他最后说道。我给了他几块钱，他随即离开了我的住处。

几个星期后，我在苏联高加索疗养院的房间里翻阅最近的上海西文报纸，上面有我的朋友杨铨被刺，丁玲和另一个男作家潘梓年失踪的详细报道。关于蓝衣社特务到丁玲房间抓人，高个子作家跳楼坠身的消息则一字未提及。

由于杨铨的社会地位和名气声望，他的被刺经过不得不有详细的报道，这是必要的。法租界巡捕当场抓到了两个行凶之后逃跑负伤的刺客。一个凶手死前供认了一切。警方声称他们不能透露幕后负责的主谋罪犯，“因杨案牵连中国政府最高当局”云云。

紧接着暗杀失踪新闻之后，“共产党又一暴行”的醒目标题跃入我的眼帘，消息报道说一个以“身入龙潭虎穴，跟踪追捕共党”而著名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是脱党的共产党分子，所乘汽车开过公共租界宝钗院前时，他和司机当场饮弹毙命，报道说汽车是一辆大型轿车，牌照号码是一千四百六十九号。

两年以后，我周游世界又回到上海我的住处，有一天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李工程师的怪影靠在门前，他一副病容，毫无血色，两目无光，紧紧地盯着我，当我把他扶进我的会客室，帮他解衣上床的时候，他浑身发抖东倒西歪，垂头丧气，左摇右摆。像一个踏遍人生终极旅程，行将止于此矣的人直挺挺地躺下了。我请来了一个医生，工程师在打摆子。心脏病、扁桃腺发炎并发症。满口牙齿坏了，肠道系统还有钩虫病。

李工程师卧床不起，望着顶上的天花板有几个星期之久，他的健康情况有了好转，便开始讲他的遭遇。我首先问他两年前那天晚上离开我的住处以后的经历如何？

“一星期后”，他接着两年以前的话题说道：我站在凉水井路的大庙门前。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跟在我的背后，他接近我问道：“你见到唐朝的四骏图没有？”

“三匹马”我回答道。于是我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接上了关系。他安排我去江西苏区，我党中央已经迁到那里了。我取道海路到了汕头。在汕头碰见一个人，他把我带到韩江一条木船上。艄公并不问我什么，只是把我送到很远一个乡村并交给了一个向导，由向导带路北走进入闽南山区。”

李工程师从福建汀州西奔赤都瑞金、受到党中央的审查之后在瑞金附近的红军工厂担任负责工作，因为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很少的缘故，工作需要他干什么他都自己动手干，从制造枪炮弹药战争物资到为红军医院筹建制药厂、肥皂厂、事事他都在行。他的讲话包括江西中央苏区各个方面的活动情况、医疗卫生、教育法制、行政问题、矿藏资源、农副产品、书刊报纸等等都谈到了。

他的谈话，部分涉及到国民党对工农红军的几次大的军事围剿，也讲到广昌战役的一场恶战。广昌之战，红军损失人众四千，接到集合队伍参加长征的命令时，留下了两万伤员在后。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万人开始长征，行军情况仅由高级领导人掌握，他是其中的一个。同兵工厂的熟练工人把机器埋在地下，按照指示集合待命。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突围的长征命令终于下达了。这是国民党军队按德国军事顾问法西斯军官施各特制订的围剿红军计划，红军按中国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制定的反围剿路线阵地作战计划失败的结果。李德的军事思想观点和有游击战经验的专家毛泽东的思想对立，但是在当时反围剿战役中李德的观点占据优势地位。

李工程师给我讲述了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罕见的长征，跨过高山，越过大河，走过雪山、草地，历尽雨雪风霜，出生入死，经过无数次战斗。与世共存，永不磨灭的英雄事迹将永远留传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

他也讲到了万恶的军阀的狠毒狡猾：

“我工农红军翻山越岭，走过桂北山区的时候，村子里的乡镇保长鸣锣喊叫‘共匪来了！’老百姓逃避一空。我们走过无人的村庄，从来没有骚扰过一户人家。我军后面留下了许多伤病号，我得了疟疾。我们有时候见到以为红军已经过完的乡保长和民团团丁，他们回到村子里抄家烧屋，对老百姓造谣说是红军干的，于是老百姓反对我们了。”

“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兵伏击我军掉队的伤病号。国民党特务穿上我军阵亡战士的服装冒充红军，混入我军队伍，刺探军情。我就枪毙了这样一个特务。”

他讲到老百姓的贫困穷苦时说：“贵州老百姓是多么苦呵！记得有一回我走进一家农民茅屋，见到一个老大娘藏在屋子角落里。她跑到外面捉住她家唯一的一只鸡，颤颤抖抖地送给我。我付钱给她时她掉下了眼泪。成百上千的穷人参加了我军。”

他讲到反复无常可恨的内奸：“我军进入云南曲靖的时候，一个小学教员率领他的农民游击队欢迎我工农红军，他是上山打游击的司令，因为我害疟疾病到了，部队命令我留下担任他那支游击队的政治教员。我军过后，国民党军队来了，那个小学教员又象他欢迎红军一样去欢迎国民党军队，为了活命我只有跑掉。”

他讲到难以置信的结局：“我向北走，路逢土匪，他们剥光了我的衣服，连眼镜也抢走了，我摸到了一座庵堂，庙里的尼姑给了我一件袈裟和七十块大洋带我来到上海。一路上快折腾死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飘零到哪里了。”

他有一回说道：“自从两年前那个晚上我离开您以后，我就开始为您报道记日记，但是长征开始前我把日记连同机器全埋在地下了。”

李工程师的病恢复到了能够去旅行时，我资助他去苏联继续治疗和学习。自那以后到如今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负过伤的红军司令员在我的住处住了一段时间。承蒙他的帮助，使我能够写作出另一部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他的名字叫周建屏，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该军的政治委员和组织领导者是著名的方志敏将军。

我久仰方志敏的大名。但无缘识荆没有见过。听到所有红军司令员们的不幸逝世的消息时使我心中难过，而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南昌慷慨成仁、英勇就义的不幸消息给我的印象是最为深刻、永世不忘的。也许，一家外国报纸的记者里克里·徐士科令人可憎的报道方志敏示众的手法使我有动于衷、百感交集吧？徐士科其人以往没有听说过，以后也没有听人提过。可能是某个传教士为了发表文章恶意中伤而取的化名。方志敏不幸被俘的消息传出时，中外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欣喜若狂，掀起了庆祝的浪潮。徐士科的报道腔调，泄露出他自鸣得意、语无伦次的天机，而他的报道内容则记录了他为虎作伥、冒充好汉代言人的可耻供状。据徐士科先生报道：方志敏行经群众集会的广场时，他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谋求祖国的独立和解放；在绑赴刑场临刑前，还向刑警队人员宣传参加革命挽救可爱的中国的道理。

周建屏用一种平淡无味、实事求是的态度跟我讲方志敏的英勇事迹。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组织领导者的光辉形象。他的牺牲给可爱的中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方志敏之所以对普通老百姓有那样大的神奇号召力，原因在于他光明正大，见义勇为，他事事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不息。他创办了国民小学、农民夜校、扫盲识字班、改良品种农业展览会、采矿局、红军医院和技术学校。

周建屏是一个沉默寡言、谦虚谨慎的矮小广西人。贫农家庭出身，五岁丧父，靠母亲为人洗衣度日。行年十岁，入伍当兵，勇敢善战、升任旅长。率一旅人参加红军，建功甚伟。

周军长离开了我的住处，前往西北，重返工农红军部队里

工作。数年后，因天花不幸去世，时年四十六岁。

十五、苏联小憩

一九三三年，我的身体健康又垮了。只得离开中国前往苏联疗养。在苏联住了十一个月。一部分时间在高加索基什洛伏德斯克疗养院，其余的时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完成了拙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因为有病和从事写作，我的活动受到限制。至于苏联生活，只能管窥一斑，见闻不多。

基什洛伏德斯克过去是俄国贵族们的避暑胜地，而今已改造成为人们逍遥度假的疗养城市。这里已有五十座楼房供旅客居住，另有十一幢大楼在修建中。

过了几个星期，我认识了一个苏联红军的军官。跟他去参观了当地苏军休养所占用的两座大楼的一座大楼。几百名军官站在花园里，天还没有黑，他们刚看罢一场电影。他们在度过假日期间还继续进行军事训练，每天上课读书，看电影。军官介绍我见了他们的首长，一个莫斯科红军军事学院来的教授，他说一口道地英语，听说我是一个美国人，就连声直说俄国革命时期，美国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拉维斯将军救了他的命。一九二〇年他在海参崴一家报纸当编辑，他和另外十一个同志被日本人逮捕要枪毙的时候，正是格拉维斯将军派出美国部队强迫日军释放了他们。

这位教授对我说，格拉维斯将军的著作《美国西伯利亚冒险记》一书已经译成俄文由红军出版社出版了。序言里回顾了日美两国太平洋国际关系、两国利益和政策上的冲突史实。格

拉维斯将军直言不讳地憎恨日本人及其走狗白匪军挑起的冲突。

在社会主义的医疗制度下，疗养院里的医生、护士对来住院的病号一律进行体格检查，普通药品和镶牙是不收费的。公园和周围的丛林山坡弯弯曲曲的，并且中途有站可上山。当医生说病人可以走上顶点的时候，他的疗程就完了。

.....

在苏联期间，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洛什伏德斯克只不过是为人民疗养休息的好几百个疗养院里的一个，几年前这里什么也没有，现在到处是建起的大城市和工厂。医疗方面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化的成果，教育方面从小学到大学是免费的。红军的生活尤其引人注目：军队有自己的大剧院、出版社。从将军到战士都受最好的教育和可能的军事训练。这方面，世界上越过它的军队是否有，我不敢说。

寄身苏联，冷眼旁观，我经常把眼下见到的事物进展情况拿来同中国的现状进行对比。国民党中国的交通实业有了一点发展，但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重担下，总是动摇不定。国民小学如雨后春笋开办起来，但穷人的子女在生活逼迫担负不起的困苦下总是不能上学。国民党军队腐败不堪，声名狼藉，总是欺压老百姓，人民的被国内外千百条锁链紧紧捆住翻不了身。而苏联的人民在沉重的劳动负担下喘不过气来，但他们自己当家，不作别人的牛马。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工厂不归私人所有，他们是一个骄傲的觉醒了民族。

然而，让我离开中国消磨岁月，简直难以生活下去，什么原因我说不出来。生活在苏联同生活在中国两相对比，在苏联

虚度光阴可能会自由自在、安逸舒服一些。俄国出版我的几本书，稿酬收入不但足够维持我个人的生活，而且还有一大笔节余存入银行足够我一辈子享用不尽。但这又算得什么！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住我回中国去的内心愿望。中国社会的巨变和个人写作的兴趣在深深吸引着我。并且中国有我许多战友在那儿生活，在那儿斗争，在时刻召唤着我重返中国，去生活学习、去工作斗争！

要回中国首先必须使自己以记者身份同美国出版界建立联系，因此我决定回美国一行。一九三四年春天我离开苏联，途经中欧，从法国坐船乘三等舱回国。

一到纽约我就踌躇街头，看那家报馆能否谋得一个位置。多方奔走均告失败。一家报馆愿倒愿意，但主编先生向我提出远东是否有战事的问题，我的看法如何，而我说会打起来时，他的答复是“他们的报纸不能发表这一类倾向性的报道文章，这家报纸是主编和平的喉舌，”于是我的希望落空。

美国像一个奇怪的星球，我少年时期的朋友们现在已到中年，她们现在的生活和思想似乎同十五年前一样。我到西海岸去看望了我的妹妹和弟弟，弟弟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的士兵，离开他时他还是一个孩子，现在三十过了，已经成家，夫妻生活美满。妹妹在一个小学当校长。无论怎么说，妹妹和弟弟两家人的生活中都没有我可以容身的地方。

从弟弟妹妹那里我得到我的父亲的情况。他的身体健壮，精神矍铄，七十多岁了，还养马，追女人。其余时间贪饮几杯酒，常在醉乡。我有时候从我的版税中给他寄一点钱以尽父女责任情谊。他用那些钱添置酒坛酒缸，靠墙摆得整整齐齐，乐

而浅尝，逢人夸耀，有时几个星期，有时长达好几个月之久。

回中国两年以后得到父亲去世的讣告时，我悲伤难过，但默读他老人家死的详细经过时，我的心潮又平静了。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玩桥牌，打赌赢了十六瓶啤酒，大热天里一下喝光，站起来就见了上帝。

第四篇 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 (1936—1937)

十六、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遇到一个刚从西北来的作家。他是工农红军的代表。参加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朱、毛红军举行了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行程二万五千里路，时经冬夏春秋，走过平原村庄，跨过千山万水。

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说到长征，充满了艰险苦难和百折不回的画卷。人们难以相信，尽管他镇定自若，说的是真人真事，当他讲到在那雪海茫茫，风雪交加的川康藏边的大山丛中漫步前进时，他这样说：

“人们精疲力尽，渐渐支持不住了，自自然然地蹲下来，那样软弱再起不来。几千人冻死了。我们几个月只吃青稞，许多人消化不了它，拉出来的青稞，

别人捡起来，洗干净，又吃它。过一次肠道再排泄它一次。”

当我们这些幸存者终于出现在甘肃草原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贫苦的当地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伸开手臂，团团把他们抱住，又哭又笑又欢乐，又打又闹又歌舞。有的穿着羊毛捻的毛线衣，有的披着羊皮剪的老羊皮，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瘦的像个鬼，几千人有病，夜里的咳嗽声此起彼落互相呼应发出回音。甘肃是那样的苦，我们总是吃狗、猫和老鼠肉。甘肃是那样的穷，妇女藏在寒窑里，一家人往往仅有一条裤子，男人穿了女人就没穿头。民国以来二、三十年的兵荒马乱，干旱饥荒，天灾人祸，加上苛捐杂税，老百姓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连衣服都没有。最遭殃的是军阀的队伍还带来梅毒病菌，许多妇女不生育，有些地方看不见十五岁以下的儿童。

这个作家跟我说，红军部队的医药物资非常奇缺。自此之后，我同两个外国医生开始为红军筹集资金购买药品，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成了红军采购药品的“走私商人”。

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打手们横行霸道、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养病。少帅自从当上东北王以来在性格上发生了许多变化。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打破了他过去对法西斯主义五体投地佩服的迷信。他受到司令部里一批青年军官的影响，成为一个作风民主的军人。他戒掉了抽大烟的习惯，并且极力克制改掉青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封建军阀的习气和影响。全国各地民族救亡抗日爱国运动在其他省市地方受到取缔，但在他的地盘内得到保护。他无视国民党政府的训令指责，许可全国各界联合救

亡爱国运动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他反抗国民党政府对到达陕北的红军继续围剿的命令，当日寇占领东北入侵绥远、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根本没有打内战，残杀自己同胞的想法。

有一个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西安十五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寺安排了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大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摇篮，许多伟大的朝代在这里兴起，交替成长，西安是大西北的中心，我希望在西安恢复我的健康，写作另一本书。

我住在华清寺。这是公元八四七年至八五九年统治中国的唐玄宗皇帝的宠妃杨贵妃在这里游玩的地方。我望着杨贵妃当年逍遥赏玩过的亭台楼阁，走廊石桥，使我记起了有一回我听过一位中国老音乐家用五弦琴演奏长恨歌谱的情景，他的音乐犹如小管弦乐队合奏的歌声满屋激荡，绕梁不绝。长恨歌是一首古诗，叙述唐玄宗多么怀念杨贵妃，她上穷碧落、下穷黄泉，苦恋相思，想见一面。而住在海外仙山上的太真仙子给皇帝报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相爱私语。

这里探微穷究，尽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就在这种气氛下我研究中国历史并把时断时续的汉语练习重新捡起。我的健康状况日渐好转，经常穿过平原村庄前往始皇陵漫游。公元前二五五年秦始皇建立了秦朝帝国。他雄图大略灭六国，亡诸侯，废封建，设郡县，想砸烂当时的封建制度。他好大喜功，劳民伤财，“鞭撻天下，威震四海”。就是他，征调全国的老百姓，家家户户一男一丁去修筑防止北方野蛮民族入侵的万里长城，

就是他，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开始在中国的大地上“治驰道，车同轨，一法度，书同文，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都咸阳。”西安古名长安，就是秦朝的首都咸阳。秦始皇把咸阳建设成为当时大秦帝国称雄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秦始皇焚书坑儒，厚今薄古，想消灭和销毁当时“逆古害今，危言乱实”传播封建思想的孔家学派的儒生经书。人们指点临潼西南五里那儿有一个山谷就是秦始皇当年大乱天下焚书坑儒的坑儒谷。

秦始皇穷奢极侈，纵欲放浪，老而怕死，梦想长生，以为东海有蓬来，方丈，瀛州三座神山上有不死药，遣徐福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传说数万家男女开拓了日本，毫无疑问这是荒唐的传说，他们过海漂洋没有回来倒是真的。始皇陵在临潼外郊的骊山下高大如一座小山，据历史工作者考证始皇陵下埋藏了一座宫殿和中国古代许多珍贵文物和无价之宝。“以铜为椁，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上以明珠为日月，列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具山川五岳九州地里之势”。山上的花岗岩石曾被一个军阀盗卖给一个英国人，但陵墓原封未动仍埋在地下。

回到临潼华清池庙里，我动手写我的一本新书。只有在西安的朋友带来新的消息和安慰我的寂寞的时候，我的写作才停顿下来。朋友里面有一位红军方面的同志，他总带来一些使人不安的消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正在同侵入内蒙的日寇作战。日寇已经占领了山东省的青岛。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抵抗日寇的入侵，反而集中其强大兵力在胡宗南的指挥下围剿陕北的红

军，通达这个战争舞台中心的公路上沿途成立了兵站，战事极其激烈，胡军损失惨重，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举行联席会议，商讨国民党政府围歼红军的命令。张学良少帅的东北军，装备最新式，他的部下官兵一致要求抗日，不愿打内战。联席会议拒绝服从围剿红军的命令，相反的是结成了西北抗日军事同盟。它包括红军、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其他军队的代表，以及本年五月持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的代表，已经抵达西安磋商参加抗日军事同盟的谈判。

几百名平津学生，上了张学良少帅的军事学院。西安蓝衣社头子叶道光的党羽们把这一切进展情况向主子打了报告。蒋委员长非难少帅军事学院里窝藏共产党分子。少帅的答复是，他判断学生的唯一标准没有别的、仅看他们的抗日热情，并且补充说了一句：“奉告委座千万不要听日本特务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十月，有三个刚到西安的学生就被蓝衣社特务分子绑架到国民党省党部。少帅派部队冲进省党部放了那三个学生。这类事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暴前奏。

有些消息扰乱了我隐居生活的平静。十月二十日，一个同住华清池庙内，看来不问政治的女友来到我的房间里没精打彩地说：

“我们中国人损失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又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来了，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逝世了。”

我在不久前才得到我父亲去世的消息，我悲伤，深感遗憾。鲁迅的死，对我说来不仅是个人的悲伤，且也是民族的不幸。他活着奋发有为，并非漫无目的的活着，也不想争权求名，发家致富，财权位根本不在他的眼里。在中国知识界中，他对知

识青年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共同的善良美德，忧国忧民，刻苦奋斗、积劳成疾是他短命的原因。而他以轻蔑的态度对待死亡本身。

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方面发表了鲁迅逝世的电讯，这是对他唯一解除禁令的报道。上海举行了安葬鲁迅的殡仪。学校的师生走出课堂，商店的店员走出店铺，工人们走出工厂，贫寒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参加了他的葬礼。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也在送殡的行列里，送他到最后的安息地。

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共产党人士无不尊敬他的渊博学识和斗争精神。后来共产党圣地延安成立了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我作过外文图书管理员并把我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赠给该馆。稍后共产党人士又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由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演员和音乐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指导学习，这是创作生动活泼战斗作品的艺术学院。

西安的朋友们在鲁迅逝世第二天来到临潼的时候，华清池庙的长老也走进房来同西安来人坐在一起议论鲁迅。这个长老是一个四大皆空、接待方外的办事员。听他谈话可以看出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方丈也熟悉鲁迅的生平和鲁迅作品。“检查制度能起什么作用呢？”我想。

我的写作不时为其他发生的事件所打断，十一月底我听说少帅不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他们之间又有一次冲突。蒋指责少帅不执行剿共命令。少帅回答说：“我和我的官兵多年来对委座效忠服从命令，相信你领导我们抗日的诺言，时机还不太晚。现在我请委座给我们一个驱除日寇还我山河的权力和机会。必须报告委座，我已无力控制我部军官士兵提出的这个要

求了。”

几天后，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华清池成为蒋委员长和他的侍卫官卫队的居住处，并作为十二月七日开始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的地址，对住在临潼到西安的公路两边的村民，命令他们一律搬家。

我和我的中国女友乘车到西安去。公路上背着行李卷、推着独轮车的人群挤塞道途，征调来的民伕村民儿童正在修路填补坑坑洼洼。公路旁边的村子里住满了特工人员。显然这是一次非同平常的剿共军事会议。老百姓也成了怀疑对象。我在西安市唯一的一家现代化旅社西京招待所租了一间小房子，打算以后仍回华清池去。但几天之内耳闻目睹西京招待所住满了蒋委员长的高级参谋人员、几百名蓝衣社分子在市内许多地方建立了活动据点。据说他们有武装和电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曾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现在是蒋委员长的秘书，他在西安有卫队并指挥全市警察部队。国民党陕西省特别党部也警卫森严。

临潼军事会议开始，西安气氛异常紧张。我每天听到有关蒋委员长一一召见东北军高级军官进行个别谈话的报告，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他们为他卖命，改变效忠少帅的立场，这就是说要他们死心踏地跟他继续打内战。东北军官的答复是，他们的家乡被日寇侵占，他们自己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有跟着少帅打回老家去。然后转身回来向少帅作了报告。

一天早晨，我的红军朋友来向我借手枪和子弹。“据可靠的消息说蓝衣社特务在西安警察当局的支持下阴谋闹事，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他说。

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西安市大中小学的几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散发传单呼吁民族统一，停止内战，声援绥远傅作义抗日，向蒋委员长提出请愿，邵力子奉蒋氏手谕下令警察对游行队伍开枪镇压，学生中间有两个东北高级军官的子女受伤，全市气氛顿时紧张异常。

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蓝衣社特务来找我的麻烦。他既不肯说出他的姓名，也不愿出示任何证件，硬要看我的护照和居留签证，并且一再盘问我为什么要照相，要拍学生游行的镜头。我把签证拿出给他看了，对他说法律并无禁止照学生的像的条文。他气冲冲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跑到公安局找给我签证的科长，打了科长一耳光，撕下了他的领章，并撤了科长的差事。这个蓝衣社特务听科长说我的签证是西安市政府指示办理的，接着他跑到市政府办公大楼去大吵大闹，结果被市政府官员训斥了一顿赶了出来。他又回西京招待所，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宣称，招待所经理要是不把我撵走，他就要亲自动手了，并且要“找她算总帐。”

当天晚上我向东北军军部的一个副官和红军代表作了报告，讲了蓝衣社特务找我麻烦的经过。他们非常愤慨并指示我道：“就在这里住下去，同蓝衣社特务对着干！他们如果对你下手，就会成为一起国际纠纷事件！这样一来就会暴露出他们对日寇不放一枪而对美国友人进行迫害的面目。”

就是这样，我等待着一个国际纠纷事件的出现！

次日，招待所经理收到限二十四小时把我赶出招待所的最后通牒，我拒绝离开，经理哭丧着脸说：“不走的话就会遭殃

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夜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详细情况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这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同所属高级军官彻夜开会。黎明前孙鸣九营长率一营人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打死了蒋的侄子侍卫队长蒋孝先和三十多个警卫兵。蒋委员长身穿睡衣，逃到了山上，藏到了岩洞里面。孙鸣九搜山抓到了他，蒋对孙说他是总司令。孙营长回答：“你是总司令，也是活俘虏。”

蒋委员长的脚摔伤了，孙营长把他背下山，并送到西安张、杨那里听候发落。

这天夜里我不能入睡，没有脱衣服，通宵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站在窗前望着黎明前的破晓，晨光熹微，我听到一阵机关枪的达达声和步枪的劈拍声大作。“好家伙，真干开了！”我想：“蓝衣社特务分子按既定方针行事了！”听到招待所里一阵飞跑的脚步声时，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接着是喊声叫声大作。步枪射击声就在附近的地方，门窗破裂声，玻璃哗啦声，大祸临头，临死前的哀号惨叫声，女人的尖叫声，汽车引擎突然发动声，混成一片。

门外面有人在用枪托捅门。坐以待毙，我心不甘，我刚退到墙角里，就飞进三颗子弹，破门穿窗而出，玻璃粉碎，门扇通开了一个洞，我听到几声“日本鬼子”的喊叫声，使我恐怖异常。“我的上帝呀！他们借口我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了！”

一个士兵的头从门洞里出现，鼓着眼睛，东张西望，我拼命用中国话喊：“我不是日本鬼子，我是美国人！”

背后有人把他踉踉跄跄地推进室内。一群年青士兵跟在他

后面，手里端着步枪蜂拥入室，有的冲进洗澡间，有的捅破更衣室的门。接着又一窝蜂似的走出房间去敲打隔壁经理住的那间房门。但有两个兵留在房子里不走。

留在室内的两个兵开始在房里转来转去，突然间一个兵用枪托顶住我的肚子，逼我后退，靠墙而立，另一个兵把梳妆台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见啥拿啥，把我的眼镜盒、手电筒、电池等直往口袋里装，手舞足蹈地收拾我的羊毛衫和毛线衣。

逼我靠墙而立的那个兵随手掀开我床上的枕头，我的钱包和所有的钱都在那里，他们两个欣喜若狂地扑过去抓住钱包就地分钱。一个兵拿我的水笔，一个兵拿我的铅笔划了一阵，之后把战利品塞进口袋，各人又从床上拿了一条毛毯，飞跑下楼而去。

我相信他们只是趁火打劫一心在于抢东西，于是我摇摇晃晃地走进洗澡间拧开水笼头洗脸，然后坐下来，听到招待所里和附近一带不绝于耳的奇怪的吆喝声。兵大爷逢人冲杀横行霸道的事我在书本上念过，但在这里一场西安事变中我才亲身体会了丘八胡来的滋味。这时，恐惧心理被好奇心战胜的我，颤惊惊地向大厅偷偷地看了一眼，然后又到隔壁房门外看了一眼，房间里两口大皮箱开着，衣服扔了满地。我喊了一声：“经理先生，他们是抢东西的！”

然后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答应了一声，王经理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他满头大汗，一身灰尘，脸色苍白，还有点发抖，动手收拾衣服。“他们把皮大衣抢走了！”他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把东西抢光了！”他向客厅瞥了一眼，最后安慰我道：“现在用不着害怕了，我会收拾残局的！”

他跑下楼在大厅里一晃不见人影，很快又上来，背后跟着一个手提自动步枪的青年军官，看来也情绪激动有点吓昏了头脑似的。一个兵冲过去了，那军官喊了一声命令，用手枪指着那个兵，那个兵立即止步，转身立正站在那里。军官对士兵开始训斥，气势汹汹，狠狠臭骂了一通，接着又扬言他再敢让什么人进我的房间就唯他是问，不死也要脱一层皮！经理先生找来一张纸，一枝毛笔，请军官写通知，军官大笔一挥，写了：

“不准进入此室，违者枪决！”

他签了字，经理先生得意洋洋作了好事似的把纸条贴在我的房门上。军官和经理一走，那个老兵等着不见他们人影的时候便伸长脖子、探头探脑地朝房间乱堆的衣物方向走去，顺手翻了一阵，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瞧了我的手表一眼，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扯下手表，转身朝楼下一道轻烟似的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龙飞凤舞的军官手令，不见一个兵停下来瞧它一眼。即使止步，不识字的兵也看不懂它。识字的兵也不会服从命令！

西安市内和招待所里的枪声逐渐稀落，军官们终于把士兵们赶到院子里去了。我和经理站在招待所的门口，注视着院子里两个军官在一队横眉怒眼的士兵前面来回跑着，把兵士口袋里的战利品、衣物等东西掏出来放在地上。两个军官破口大骂，如江河溃堤一泻千里，经理的脸色一阵发白，非常难看。我从那些伤人恶语中搜集到不少兵大爷的祖宗三代老祖母的浪漫题材资料。

楼上的电话铃声一直在响没有人接。现在我们才听到了招

待所服务员们的喊叫声，经理先生冲上了楼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道：

“上边一个人快断气了，流血不止，你能帮忙急救一下他吗？”

我记起了床下的旅行袋幸好没有动过。赶忙上楼找出我的急救箱，跑下大厅。一眼见到一个矮子躺在那里，满枕头血，一嘴仁丹黑胡子，活像一个日本人，我和经理先生急忙对这矮子实行抢救。与其说他是中弹负了伤，不如说他受惊掉了魂，一颗子弹洞穿双颊，竟没有触及牙齿，也许他正在打哈欠时一弹飞过。经理煮了一杯浓咖啡，我把矮子嘴上的血迹收拾干净，帮他穿好衣服，喂了他一调羹咖啡，他从头到尾向我和经理赌咒发誓说他不是日本鬼子。

救护车把矮子送走后，经理把他的大小皮箱搬到我的房子里，他对我解释道：“兵游子们还会来的！你是外国友人，你的房间比我的房间要安全，我不收你的房费了。”

一辆卡车开进了院子，一批东北军的青年军官接管了西京招待所，大厅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一个青年军官会说英语，他接待旅客们的申诉，他填了一张失物丢失清单，他告诉我，肇事部队的负责长官杨虎城会赔偿我的损失。（我没有收到一文钱的损失赔偿费。事过三年后，杨氏军部的一个参谋告诉我，当时一个秘书奉命拿了一笔款子送给我，但那位秘书饱了私囊，也许他以为外国人都富有中国人都很穷吧！）东北军青年军官给了我一份宣言，这是西安事变有名的通电八项主张：改组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各党派在内的共同负责救国的国防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上海七名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

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证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权利。废除一切镇压爱国抗日运动的非常法令。与同情中国独立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我读完这八项声明，身受打砸抢遭遇的不幸一扫而空，无论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中国将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可以断言。

这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一个军界的朋友跟我打电话。好几个小时电话刚才接通，他告诉我这不是一次蓝衣社分子在闹事，是一次政变。西安现在在张杨的手里，市警察局、市党部、蓝衣社活动据点均已经占领，电台、文件、连同黑名单均已查获。两个被捕的学生也从蓝衣社总部里找到了。围剿红军的一百架飞机没收了，蒋委员长现在在西安已成少帅的俘虏。胡宗南剿匪兵站所有物资均已接管过来。少帅发布了一项声明，明天可能召开群众大会。他听到西京招待所遭劫的消息非常吃惊，向我提出警告：

“不要到外面去，已经宣布戒严，街上死伤的人很多。”

“慢着！我要去救护伤者，想办法帮我弄一张军用通行证吧！”我在电话里大声向他喊道。

我的朋友和招待所的东北军军官通话商谈过后，我得到一张通行证。于是我背起急救箱到浸礼会医院弄了些外科用的纱布绷带，在西安市转了一整天。救护伤者，送入医院。

第二天下午。西安市召开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我有幸在场。十二月十六日，张学良少帅在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讲了话。他回顾了日寇侵占东北，政府不抵抗，他和蒋委员长中间发生过许多“违反民意”的政策上的矛盾，他宣称：

“我希望和全体武装同志并肩一致，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全国同胞一致起来共赴国难，团结奋斗。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我们的满腔热血，一定要洒在保卫祖国打败日寇的战线上！”

西安市贴满了抗日的标语，受过特殊训练的东北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和全国抗日爱国联合会，以及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们在街头巷尾举行小型集会，并派出宣传小队到郊区附近向农民进行宣传，组织和武装西安市的市民和工农群众。

政治犯得到释放。里面有三百名工农红军战士，五十名红军女战士和三十三名红军小鬼。战士们发烧，伤口化脓，感染的有百多个，我只懂一点急救方法。尽力跑医院为重病号找床位，给轻病号弄到药品。他们躺在冷冰冰的砖石地板的草垫子上，有一床薄棉被的战士为数不多。过了一个星期才来了一位医生接替我的护理工作。杨虎城将军最后送来了两千块钱作为替病员们买毯子和食物的用费。

见到红军，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他们是四川来的红军，都是贫苦农民，年龄在十五岁至五十岁之间。看到他们，使我联想起历史上描写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人物形象，他们一双眼睛赤肿发炎，许多人没有鞋穿。一双农民脚板，一道道化脓流血的裂口。我第一次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用怀疑的眼光紧盯着我。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穿着讲究的“女洋鬼子”。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我怀着历史在创造中，人物在活动里的奇特感觉观察时局的发展。一架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下午飞回来了，在西安城头低空慢慢地盘旋过后徐徐降落在西安机场。飞机请来了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红军代表抵达西安的第二天，我见到了他们一行。九年内战过去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九年内战的浩劫中牺牲了生命，国家的财富资源消耗殆尽，军事装备物资浪费无存，多少工农红军指战员家破人亡、骨肉失散。但是，从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我的谈话中，使我感到他们此行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

西安事变第二天，出现了全国各界抗日救亡联合委员会的报纸。接连半个月时间内又出版了另外两份报纸和一种学生刊物。学生和演员组成第一批流动剧团为部队和老百姓演出活报剧。南京国民党广播电台疯狂报道蒋委员长已被枪毙，红军占领了西安，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等等谣言。西安一家日报的编辑发表中文电讯广播稿进行驳斥，我担任英语广播。发表了我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我的访问报道很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头痛生气。几个月后，我从美国记者那里听说美国驻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们甚至宣称他们已经作出驱逐我出境的决定，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发言人接见纽约时报记者的访问时，宣称“我的讲话与政府既定政策方针抵触，为统一战线思想方案辩护。”这个发言人对于基督教美国青年会总干事发表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的南京报道的广播则不表态。平心而论，我讲了实话。

对中国的未来起危害作用的消息纷纷传来了。第一个消息是有关汪精卫的报道。前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汪精卫自从遇刺受伤后即侨居德国养病。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立即赶赴柏林

和希特勒开黑会，然后乘专机回国，醉翁之意显然是要上台执政。

日本侵华司令长官也在华北召开黑会，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警告，声称必须粉碎西北军队结成联合战线。军政部长何应钦多年来同汪精卫沆瀣一气，互相勾结。他以设法营救蒋委员长为借口，组织讨伐军，命令部队进入陕西省境内向潼关集结，挑起了内战的威胁。我写了一篇警惕内战的讲演稿，广播前提请东北军和红军的代表审阅过，我在讲演中把何应钦及其一伙比作是明末清初反复无常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的贰臣反动派吴三桂。

张学良少帅天天和蒋委员长进行谈话，劝说敦促他停止内战，抵抗民族公敌，我听得人家说少帅读了蒋委员长的日记，相信蒋委员长确有抗日到底的最后决心和意图。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她的兄弟宋子文博士以及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很快飞到西安，商谈释蒋及其参谋人员的问题。

蒋委员长于圣诞节这天秘密获释，老百姓一无所知，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先一天西安当局放出风来，说英勇保卫绥远的傅作义将军于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同盟。黑压压的一群人在机场上打着旗子去欢迎他。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少帅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不见傅作义飞来，只见张学良飞去，人们大惑不解如入五里雾中。等到真相大白时才知道，他们到机场名为迎傅、实是送蒋，给蒋一个众人爱戴他的印象。

一小时后，西京招待所里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和抗日救国会领袖奔走相告闹翻了天，群情愤慨大骂这是一个政治骗局。人们停下来对我讲：“我们被出卖了！红军还劝说少帅放了老蒋！”一个青年军官蔑视一切大声说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那还有他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

国民党中央政府以不放蒋就讨伐挑起内战进行威吓，几星期内继续在潼关集结兵力，前线发生了战事，飞机轰炸了西安沿线的车站。抗日同盟坚决主张迎头痛击。少帅行前指定负责东北军的高级军官同何应钦进行秘密谈判，其他军官则在东北军内进行派系活动。青年军官怒火满腔非常气愤，坚决要求释放少帅，实现民主抗日的八项主张。红军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条件，在西安事变时而急转中，为了打破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挑起内战的阴谋，红军两个师开到西安附近形成了一道防线以防万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新西兰人詹姆贝特兰到了西安，帮助我发表对外广播，搜集新闻报道，出席城乡群众大会发表演讲。他的讲话录音第一次播放出来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说，西安电台现在的播音员是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

有些外国人把中国人看作是任人宰割，唾面自干，打不还手，决不抵抗的冷血动物，他们要是见到了东北军，肯定会改变他们这种糊涂的看法。对国民党政府在日寇面前妥协求和的不抵抗政策，积压在心头的愤怒，象爆裂的炸弹在西安事变中炸开了。东北军官兵深深感到自己被赶出了他们的家乡，被当

作兄弟阋墙亲痛仇快的炮灰。我亲眼见到了两次空前的游行示威，一次军事示威，一次军民游行，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头戴皮帽、身穿皮领大衣的东北骑兵队伍。他们高大结实威武雄壮。紧接着是东北军的步兵。我第一次听到东北军队步伐整齐、高唱《打回老家去》的雄壮歌声。青年军官们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法西斯卖国政府！”“释放少帅！”

一直受压的学生、妇女、工商各界等民众团体以及公教人员，现在加入了游行队伍的行列。游行队伍中，有人高举着一幅法西斯走狗汪精卫同希特勒握手的漫画，被禁止的《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人们起来战斗的歌声响彻云霄，西安古城在震撼世界！

西安渐渐的平静下来了，少帅在南京被软禁以劫持统帅的罪名受审讯。本刑立即受到特赦，但蒋委员长却以“严加管束”的名义把少帅关在奉化的蒋家。岁月流逝，张学良成为蒋介石的笼中囚。他的命运激起了东北爱国人士的怒火，他的部队分散解体，参与西安事变的僚属幸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西安事变以地方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在迟迟分挽、阵阵阵痛中诞生。我们很快得知国民党军队要打过来了，西安即将失守。抗日救亡委员会的爱国领袖们闻讯纷纷离开西安，分赴全国各地，他们知道国民党是从来不给人民以公民权利的。

我知道要是我留在西安就会被捕，受到中国爱国人士一样的命运，一月十二日早晨我离开了西安。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四周和十字街口正在赶筑沙包防御工事。城头上隐约传出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口号怒吼声。墙壁上张贴的八项声明的标语在严冬的寒风中沙沙作响。

我在飞机场附近寒冷冰冻的路边等了四个钟头，终于过来了一部卡车，一个红军战士跳下了车，命令一个坐在司机旁边的战士让座。我上了车，车上坐了一车学生，各人脚上放着一个背包卷。我们一言不发，心向陕北。汽车朝古城咸阳，经过周秦汉唐历代陵墓，向三原红军驻地开去。

十七、人物思想

我们在一个黑暗的小客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气候奇寒，司机在引擎下生了一堆火发动机器。我们坐车穿过三原古城，打算到墙垣一半倒塌的杜里镇、红一方面军总部左权将军那里去吃饭。

我们终于到了杜里镇，城门太窄，卡车开不进去，只好下车。一群穿黑布制服的青年战士围上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人群里面有我的朋友丁玲。她被关在南京监狱，逃到西北终于参加了红军。

在城边麦地里进行游击战术演习的许多红军战士，这时飞跑过来了，争相观看才到的西安来客。见到长征红军在我是头一次，环顾身边这些青年人真使我欣喜若狂。一副副面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机灵活泼脸色红润，如伟大的作家鲁迅断言过的。和我所见到的白区那些神情萎靡脸色呆板的士兵的脸孔完全不一样。

丁玲说明了我是一个国际友人。一个战士转身就开门见山

要我讲讲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消息！他们说一口江西腔，期期艾艾尖声尖气，我半句也听不懂。丁玲连忙替我解围，跟他们说我会和群众大会上作报告，那时我会解答提出来的一切问题的。她想带我走开，我可不愿意错过这个毕生难逢的良机，就地站在那里向战士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参加红军一般都有五、六年了。年纪要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的话，那在红军里面他就算得上八年以上的“老红军”了。身上不负伤的几乎没有，有的负过七、八次伤。“负伤两次就够要人家的命了，”一个战士无所谓地说了一句。冒过多少枪林弹雨打过多少回仗？他们谁也说不上，只是笑眯眯地说，仗多少回数可真记不清了。结了婚的有几人？他们说里面有两三个，家都在江西。国民党白狗子占了家乡后遭遇如何？谁也没有得过音讯。他们称国民党军队为“白狗子”。“白狗子杀剪短头发的姑娘们”，一个战士说。他有两个妹妹在村苏维埃工作，都剪了发，她们和他的爹爹而今是否还活在世上，他不知道。

他们等着我提问题。好奇地想听一听一个外国人对什么感兴趣。我说我早就听说，也很想听听红军进行曲。他们乐开了。一个战士爬上车举起手，“一、二、三”喊声一落，人们跟着唱起了洋溢着革命豪情的雄壮歌曲。

中国古代悠久文明的历史涌上了我的心头，听完红军战士们的雄壮军歌后，我在我的翻译和丁玲的陪伴下，走在昔日无限繁荣，现在一片荒凉的杜里镇上，发思古之幽情。门庭冷落，院落幽深，寂无人居，唯有那石雕浮刻的狮虎牌房，照旧

壁立在门口。窗棂檐际，蛛网密布，战士们住在堂房厢屋的青砖地上，一排排草席上加麦草，三九寒天，冻土硬地，这儿就是他们的宿营住地。

红军连队十点开早饭，我们同一个班的战士们围在一盆白菜旁边。各人手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子饭，吃得津津有味。左权军团长和几个参谋找到了我们，他很吃惊。因为设宴洗尘款待来宾是中国友人好客的传统习惯，礼貌周到，擅长交际的军团长也得照旧。我们立即跟着他走到一个青石砌成的台基上，那儿已经摆好一长桌席面，一道道热菜很快上来了。我批评这一类封建残余的请客陋俗，他们笑了。也许，他们把我的批评当作客人应酬的客气话。后来几个月里我一再说明了这一点。左权是一个温文尔雅，沉默寡言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委员十分健谈，英语说得很好。西安事变前，红一军团驻防在长城一带，内战一触即发时调到这个地区。地主们散布“土匪”来了的谣言，逃走一光。老百姓根本不听他们的东家地主说的那一套，哪里也不去。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则经常在老百姓中间传播新的思想，尽管爱国团体受到镇压，新闻出版受到封禁检查。农民听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因此他们殷切地期待着红军。

红军并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相反，派出了政工人员到各个村子里去动员群众成立工农商学各界和妇女儿童的抗日救国会。老百姓知道国民党政府禁止成立民众救亡团体，小心谨慎地问红军能在本地区待多久，因而组织工作进展缓慢。

近晚，丁玲和我在两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一个是士兵大会，一个是乡镇民众大会，民众大会地址在镇公所小学。妇

女们带着哭叫吵人的孩子、抱着吃奶的婴儿来开会，男人们拥挤在门窗一边直嚷着：“我们听不见！”

主持民众大会的主席过去作过县长，看来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爱国的人，但是官场习气阿谀奉承的客套辞令太多了。他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地介绍我如何学识渊博、著书立说、富有存款、走遍世界，令人起敬云云。还说我跋涉冰天雪地、跨越千山万水、不辞劳苦、勇于献身，来到这里对中国的老百姓宣讲小日本鬼子确是万恶可恨的道理。

老百姓喜欢口若悬河的雄辩术，但始终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对客人总是赞扬备至，一转身忘得一干而净。大会以后，人们聚在一起进行讨论，男人们叽叽嘎嘎说个不休，妇女们躲在角落里不出声。我们终于摆脱了那些男人，同一群妇女姑娘走到司令部我们住的地方。她们在炕边、衣柜上、椅子上坐下来，对我提出各种问题。她们特别关心问我为什么没有结婚。这就给了丁玲一个机会宣讲妇女解放的道理，向她们指出，妇女必须成立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抗日中同男子一样有同鬼子作战的权利和责任。

她们用心听着，很感兴趣，直到天色黑下来才走，我们手牵手，送她们到司令部的大门口，眼望着她们兴冲冲地回家去了。

几天后，丁玲和我到镇外一个村子里的红二方面军贺龙司令员的司令部去。同行者有两个教员、三个学生、两个商人，一个原来的锡匠和几个农民。他们是新成立的抗日救亡联合会的群众团体代表，带着赠送红军各连队的锦旗。

“学生们早知道红军的政策和纲领。”一个很健谈的教员

谈开了：“他们也跟老百姓讲过了。说实话，国民党政府说东，老百姓总是说西，想法相反。我的学生有许多不听父母的话跑延安上抗大去了。我个人对共产党的看法倒没有什么成见。”

跟在我背后走的一个小商人打断了教员的话头：“做生意买卖的人大多数是抗日的，他们很快会回来的。”他抬头对教员笑了一下，说道：“先生你还记得那天夜里商会开会的情景吧？全体商家准备关门大吉，逃跑了事，一下子进来两个戴红星军帽的长官，他们讲了话，会议开到鸡叫了。次日大早店铺开了门，只有几个傻瓜蛋跑了。我们商人讨厌打内战，我们给蒋委员长发出了一道电报，电报上说“苟吾人能够和平团结，即可驱除日寇，还我河山。”

那个教师对渴求进步的学生提出了看法：“革命唯有通过群众才能进行到底，有些学生自命不凡，自以为是革命的代言人，其实，不过是革命的传声筒而已。”

“老年人越来越保守！”一个学生嗤了一声。

我们就这样一路谈着，到了贺龙司令部住的村子。一个身材魁梧、戴一顶大皮帽使身材显得更高大的黑胡子军人从司令部走来向行近的人们招手致意。丁玲喊道：“贺龙同志，我们来了！”

“活龙活现的太平军造反战士的神气！”我心里在想。看贺龙的外貌不象一般中国人，有几分象版画故事里的古代中亚一带的蒙古黑大胡子。他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龙行虎步象狮子一样。他越来越近了。他那身装束使我感到离奇古怪。青布制服上身满是补丁，象是儿童穿的百家衣。下身套裤

布鞋加上一副草绿色绑腿从膝到踝缠成树叶形式引人特别注目。此外还有更显眼的东西，那就是他那根发亮的皮腰带和弯把指挥刀！

久仰贺龙的大名，见到贺龙果真名不虚传，他是湖南湘西桑植县人，农民出身。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间，他的部队改编为北伐军，他被委任为团长。他喜欢马和军队，至于官阶职务倒无所谓。他那一团人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名义还是一个团。国共分裂后，他在武汉西北很大一片地区打游击多年，时起时伏，成为赫赫有名的红二方面军司令员。他的政治委员肖克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事家，最近三年来才同他在一起工作。

贺龙早想入党，多年来提出申请书，直到第十次申请才被接受入党。现在他能看书，但不会写东西。讲到打仗他可是里手，他的部队反映了他那顽强泼辣、勇敢善战的作风。他现在虽然是一个共产党员了，但仍保留着过去农民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会员的资格！并享有“双龙头大哥”的最高称号。名如其人，这称号对他合适莫过。

有一个贺龙的传说，讲他在武汉西北洪湖地区缴获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条轮船，他坐在这条他说的“海军”轮船上指挥红军打游击。人们听说贺龙来了就喜形于色，因为大家知道他来了，就会听到许多鼓舞士气、冲锋陷阵神出鬼没的故事。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时参加了红军，他后来给我讲了贺龙作战的许多故事，马海德一再称赞贺龙的为人正直，“他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接着就大讲贺龙背有病负伤的小鬼到医院里看病的事。

贺龙闹革命，一家亲人都牺牲了。最堪敬佩的是指挥过红军一个团的他的姐姐贺英，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时年纪四十九岁。他唯一剩下的弟弟死在上海牢房里。他的夫人是一个小学教师，被捕后受尽百般折磨。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还对贫苦的女难友教文化。

肖克政治委员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很瘦，行动快，反应也快，说到作到，如雷如电。如果他骑一匹马，手握一支长矛，就活象波斯古画中的人物。我看肖克没有一分钟平静过，总是在思索。

三原民众代表团的代表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贺龙的风趣的讲话。他兴冲冲的打着手势，逗得人们哄堂大笑，而最后总是以不忘他是一个好共产党员和满怀政治信心的军事家来结束话题：

“请好好想一想吧！早在日本鬼子开头侵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如果同我们联合抗日的話，现在就有两百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了。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我们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

贺龙的部队最近才走过康边“草地”，同江西来的主力红军会合，这时很少一部分人穿上了拆补过的青制服。大多数的战士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我在他们中间走过的时候，咳嗽、哮喘、喉头哽咽声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传来。很多战士有肺病，烂眼病，究竟是沙眼还是由于挨饿所致，我不敢断定。

“只要我们有了冬衣，得到休整，有了吃的，我们的情况自然会好转起来的。”有一天贺龙发愁地讲出了他的内心话。我怀疑这点，因为红军里面害肺病死的人可真不少。

这支红军队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衣服

破旧和身体多病，看来和江西来的红军很不一样。丁玲和我出席了他们的会议，讲话的时候，他们好象很难听懂的样子，一个连指导员总是插话问他们是不是听懂了。然后，他又慢慢的把观点重复讲一遍。他们如饥似渴，专心听讲。我们请他们唱歌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古怪而低沉，充满着忧伤的情调。这时我想：“他们象是挣脱奴隶锁链不久才站起来的人一样。”

我离开红二方面军团以前，贺龙请我提出我的观感和意见。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症结所在。战士们需要吃饱穿暖，休息治病。我们讨论了防治西北流行的霍乱、伤寒和消灭虱子的问题。除虱消防站根本不知道，既没有澡堂设备，又没有换洗衣服，而参军的新兵不断涌入部队。

朱德是工农红军总司令。清教徒式的彭德怀是前线部队司令员。这位作风朴素、刚直不阿的领袖人物出身于贫穷家庭。但受过十分良好的教育。北伐期间，他是国民党革命军里的一个团长。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带一团人奔上井冈山同朱毛红军会师，艰苦转战、卓著功勋。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许多传说不脛而走，如同中国各地民间故事真假参半，难以分辨出事实的真相和虚构的情节。有一个传说说彭德怀参加红军之初，他的妻子公开指责过他，他妻子的指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许多红军将领的家属受到株连惨遭杀害了。

他过着士兵一样的艰苦生活，和战士吃一样的饭。拒绝请客宴会，反对特殊享受。我从许多人的谈话中知道他的部队怕他，因为他决不容许马马虎虎的坏习惯。然而，部队尊敬他、

爱戴他，深知他律己严，行事慎重，是一个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正直人。

彭德怀的司令部设在白武丁山下云阳的一个大村子里，丁玲和我骑马前往山头覆盖白雪的山村。一个小孩站在他的身边，摇头晃脑地说个不休，他很注意似的听着孩子的呀呀话语。

他的身材中等，块头结实象一个农民，看上去三十多岁。相貌老，但不难看，笑迎来客时满面春风。双眼平视，目光深沉，语气粗哑豪放。

我们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正有病，他在长征中得了胃溃疡，加上前不久还被马踢伤了。谁也不敢当他的面提他的病。大家都很着急、发愁，关心他的健康，因此推我出来劝他保重身体，即或不当也不会见怪。我也有胃溃疡的病，带有药物、奶粉和压缩饼干。我把药物分给他治病，因为我是客，必须听我的忠告，这很难得。

因为他有病的缘故，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在司令部里，我们发现他坐在一个炭盆火炉前面，不是工作，就是学习。他的口袋里总是有一本小册子或一本包了皮的书。我在红军各连队或在延安总司令部就很少见过无聊的闲书。他们出生入死，为了一个新世界而工作、而斗争，他们阅读过的政治军事书刊材料成为红军政治部学习参考的读物。政治部的任务之一是向连队传达阅读教材。

我在彭德怀的房子里同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多次围炉谈话。一次访问中，彭德怀说：

“国民党对我们散布各种谎言。他们控制舆论工具，践踏民主权利，不让我们把事实真相告诉全国民众，他们说我们乱

搞自由恋爱，说我们抓童男童女发泄兽欲，还说我们杀人放火，打家劫舍，活埋农民！他们说我们反对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信教。

“你看，他们说的一套鬼话如果是真的的话，这么多年我们还能够存在么？我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的力量是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我们从群众身上汲取力量。人民是老实正直的，我们如果欺压群众，群众早就把我们消灭了。

“我们新来这个地区，有的在这里不过两个星期，我还是请你随便去访问一下老百姓，听听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你会发现我们的战士住在老百姓家里如同老乡的儿子一样情同骨肉。我们的战士都来自群众也很清楚自己是人民的保护者和子弟兵带路人。我们在这里的很短时间里，就有一千二百多个青年农民、工人和学生来参军。我们的枪支不够，制服太少，参军的人数太多了，他们知道我们部队的生活艰苦，也知道我们如果有钱也只能一月给他们发一块半钱的零用钱。”

他的粗嗓子变得低沉了，两道目光平视望着我说道：“你昨天在农民大会上讲了话，也到过老乡家里作过客，有哪一个男人、女人或姑娘们提了什么意见，请你告诉我。”

“我只听到大家说好，一片赞扬声。”我说。

他盯着炭盆里的木炭火很久一阵不说什么，然后又继续说道：“我们的农民太穷了，穷得令人难以相信。但是，他们聪明，没有文化可不是他们的过错。当然，也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可以教育，认识到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当然不肯交纳额外的苛捐杂税和过重的田赋征实。他们更不愿意当亡国奴做日本鬼子的奴隶。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必须得到

满足，这样才不致成天为衣食发愁，然后他们才可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蒋介石说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对日和平有一线希望，他仍致力于和平解决。我们对日本人不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对国民党政府却是采取这种态度的，因为国民党军队多是爱国的中国人嘛。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同仇敌忾富有爱国主义思想，那么为了保家卫国打败鬼子，一无所有的穷人会出力，有钱的富人会出钱的。”

他的话使人清醒。我们之间的谈话大抵类此。彭德怀讲话很少幽默，至于轻松愉快的谈话，我一次也没有听他说过。天南地北的闲聊他可以听下去，自己总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下级说他是“同革命结合”的人。信然。

一个晚上，我在他的司令部里闲谈，有他还有他的战友们。一个人在调整南京广播电台，照例只听见滋滋干扰的噪音。丁玲和政治委员任弼时谈论着他们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从两人的谈话中间我听到他们说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个名词的意思。他们还开玩笑地说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游击战！”丁玲引了一段柯朗台夫人的“三代人”里面的一段话，任弼时引了列宁反对性生活关系不过是杯水主义的名言。

彭德怀静静地听着，一只脚踩在炭盆上，另一只脚跷起二郎腿，尽力想把袜后跟的一个大破洞朝鞋里塞来塞去。

任弼时瞧了我一眼，然后说了一句：“彭德怀同志固执不结婚，无怪乎他得了胃溃疡！”

“结过婚的得胃溃疡的多的是，你是一个牛医！”彭哼了

一声。

正在这时，角落里的调音员高兴地叫了起来。“听！南京电台！正广播我们的消息！”这一喊，打断了彭的话头，要不然他还得说几句的。

南京电台的新闻播音员都是嗓门很尖的妇女。空气中传出女高音的广播声音：“共匪现仍盘踞三原县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全县十室九空，陷于恐怖之中。”

我气呼呼地喊道真讨厌！任弼时笑了起来，学着我的喊声，又补了一句：“他们忘了加一句，我们还俘虏了一个外国女人呢！”

“造这样的谣言又有什么用处？”我问。

“唯一的答复是我们最后胜利！”彭德怀说道。

有人关了收音机，室内沉寂异常。我左顾右盼好奇地看着室内的人们出神地坐在那里。

彭德怀看着炭盆，丁玲双手伏桌闭目养神。室内两支蜡烛的暗淡光亮照在房顶的屋椽上也照在地面的桌腿上。异乎寻常的沉静。

十八、风云人物

中国共产党中央刚进延安就以延安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和训练中心。我一到延安，那个取了回族名字美国人马海德医生带我去见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战士们爱戴他。”马医生说，“他爱战士如自己的儿女。战士爱他如父母。”

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钉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我见到了朱德，许多年来我在我的书中写到的朱德，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象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马医生也伸出两臂，抱住朱德，啧啧有声的左右亲吻。然后退立一边看他的动作。

我们都笑了。“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对朱德说：“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一个多次报道过被打死了的人。”

我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这时，马医生尽力伸出手在朱将军的头上作按摩状，嘴里不住地发出哼哼声。我们的受打搅的对象则镇定自若的注视着我们。

人身检查过后，我转到朱德的办公桌边，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记事本、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

“那是我到‘抗大’上军事课的讲义。”朱德解释道。

我转过身来看到墙上从椽到墙基钉着一张军用地图。图上标着许许多多小红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真是土匪，到处有匪。城市里的土匪我所知道的则另是一套。他们穿西装革履，有油漆发亮的写字台，进出限制严密的俱乐部，看侦探小说。”

“这是阶级的差别嘛！”朱德笑道。

“你还是我见到的最有生气的尸体！”我补充了一句。
“我给你带来了几份宣告你的死亡消息的上海剪报。”

我从口袋里掏出剪报，当他看到一张硬说是他的照片时，他会心地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们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计划和他

的工作上去了。

共产党员的主要义务是以统一战线为原则对红军进行再教育。他说成百成百的指挥人员正召到延安来进行培训。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他们学懂弄通阶级合作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事。

还有大批学生涌进延安来学习。他们的人数那么多，他们的问题同部队的问题又那样不同，因此新的陕北公学正在筹建中。各种学生甚至蓝衣社特务和其它党派的特务也混进来了。刚刚逮捕了一个十人团，他们成立了一个“自由恋爱社”。托洛茨基派认为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派了几个人来阴谋破坏统战工作。他们受到了审查，他们既无计划也无目的，思想很混乱，观点也糊涂。

朱德继续说：“一个主要问题是教材缺乏。没有国外的军事著作、政治著作和报纸杂志。我自己需要德国、俄国、美国的军事著作，因为我知道和日本人作战是完全和内战不同的。这就是我后来几个月里在延安一项主要工作，创立鲁迅图书馆的缘故。”

“你会骑马不？”那天晚上朱德问我。我说我能骑马，接着我们谈到马的颜色和性格，最后以他送我一匹小马结束了关于马的谈话。这匹小马是贺龙红军在长征中从云南省一个大地主家里没收到的十二匹骏马之一。一星期后，朱德将军还给马配了一副蒙古式的青红布套马鞍坐垫。我给它取名叫做“云南”。“云南”野性难驯，使得我同几个饲养员多次发生争吵。

朱德问我想写什么。最初我没有定下来，但自那天晚上和后来几星期的多次谈话后，我给他写传记的想法逐渐形成。于

是我就动手写起来，但是这个工作总是被我的其它工作，或被
他上前线的视察所打断。

我的翻译秘书先前在上海当过演员，我同她一起开始探
索朱德的童年回忆。他度过了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几十个春
秋。青年时期他致力于推翻清朝的国民革命，是革命的国民党
早期党员之一。后来，国民革命蜕变成为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
局面，他在四川云南过着旧式军人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逐渐深入到边远的西南省区。
朱德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参加知识分子的读书会。中国在
觉醒中，朱德在探求中，虽然他已年过四十，但他毅然决然与
旧生活决裂，首途前往沿海一带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他们拒他于千里之外，于是他奋然去欧洲留学。

他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周恩来是这个小组
的负责人之一。经过批准他参加了这个小组。他这个过去叱
咤风云一时的军人现在俯首甘当排字工，为第一张中文报纸在
德国的出版做排字工作。同时他还跟军事专家学习军事。

一九二四年第二个学年完了，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国共
分裂时他担任南昌警察局局长兼军官教导学校校长。他和叶挺、
贺龙率领的部队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震撼中外历史的南昌起
义，对屠杀成千上万农村老百姓的反革命事变进行了回击。

他指挥一支起义队伍南下打回广州去，想以广州作为卷土
重来再次革命的根据地。起义队伍在汕头附近受到挫折，但朱德
收拾余众进入湘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另一支革命队伍
会师，成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第一所军政训练干校和第一座
兵工厂。十年内战中这支红军称为朱毛红军，毛泽东担任政治

委员，朱德一直担任总司令。

朱德对我讲他的生平的时候，他还扼要地概述了工农红军的艰苦转战和历次战役。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异己，清除革命力量，对朱毛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朱德收藏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作战地图，他长年累月地搜集资料，甚至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也不间断。我们经常讨论有关搜集、整理、保存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朱德在延安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着手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一天日军突袭芦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动身到前线去。我则带着又一本未写成的书留在延安。是留下来写朱德的传记？还是去前线报道战争的消息？二者对我都重要而哪一件事更值得我立即去作？我问毛泽东。

“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的多。”毛泽东说。

于是，我收拾我的记录本本，准备上前线去。

红军许可我上前线，但有一天我在马上摔下来伤了脊背，只得躺倒养病，整个夏天，我坐在房子里看冲垮田园茅舍，十年难遇的延安山洪暴雨。

我初到延安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永生难忘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

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独一无二的烛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显得阴森静美，如同岁月凋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阴暗的景象使我不知所措，以致当时说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清。

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一样，对他也有许多传说。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通缉他，重价购买他的人头。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彭德怀、贺龙也没有出过国，红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到过国外，但他们个个都有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有的写文章，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章节长篇大论，非常自负。有的作报告引证马恩列斯的话，侈谈三四个钟头，自以为很了不起。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稍后几年我发现这类著作流传在一些穷乡僻壤。包括极端反共的政治家、有时也要剽窃他的军事著作，据为自己的东西发表问世。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穷思苦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由于语音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

不过他跳舞象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恻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我的全部时间并不消磨在教工作劳累的共产党人学习跳舞得以休息。实际上我的事务很多，我总是个拙劣的修补工，样样都想干，一门也不精。我在延安继续搜集朱德将军的传记材料，写论文报道，参加保健活动，还种园子，埃德加·斯诺夫妇寄给我一些进口种子，我开了一个菜园和花圃。创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把进口报纸分发给党政领导机关、教育单位和红军各连队，向沿海各大城市的外国朋友们写信，敦请他们到延安来访问红军，以及消灭老鼠等等。

我的灭鼠运动并没有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老百姓视老鼠为天生万物灭不掉的东西。然而，鼠疫在西北是一种地方流行病，周期性的流行病从蒙古草原蔓延过来，由老鼠跳蚤作为媒介，人们同意我的看法，但忙于军事政治问题没有时间消除鼠害。日本鬼子毕竟要比鼠疫危险性大。几年后，我读了汉斯·金色尔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之后，我才被他提出来的保护普通虱子的主张吸引住了。

我之所以灭鼠成迷，也许是因为我初到延安，有一个时期住在一个尽是老鼠洞的民房的缘故。晚上，鼠辈在炕上梁上横行打架，闹得我不能安睡，我把一支蜡烛点到天明，但老鼠习

惯了亮光更加横行无忌。我睁大两眼瞧着那些灰毛耗子在桌子上，椅子上和地上摇摆着。我把西安市上所有的捕鼠机托人抢购一空，并且给埃德加·斯诺夫妇写信请他们尽力从北平寄一些来免费送人，但捕鼠机很快在集市上就售光了。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驻上海领事经常给我寄来一包一包的反法西斯宣传品，这是由马德里寄给他，由我分送给延安和前线的红军各连队，可以说是在延安的另一活动。中国的西北地区也许是对西班牙内战唯一有反响的地方。一九三七年五月，西北各地集会、游行、示威，声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我在延安有幸相逢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当代风云人物是周恩来。他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同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的首席代表。他的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天津南开大学念过书，到日本法国留过学。在苏联逗留过很短时期，他同党内的同志、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谈话的时候，总是端正直立，盯着对方的眼睛发表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假如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引进现代医疗实习成为必要的话，正是周恩来签署引进命令并使之贯彻到底。后来若干年中间，他代表他的党和红军常驻国民党中央政府，赢得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富兰克·多恩上校、英国驻华大使阿基巴德·克拉克·凯尔爵士等许多外国朋友的钦佩和敬仰。

据说蒋委员长夫妇对周恩来非常敬佩，从一些国民党官员散布的谣言看，国民党当权派希望他脱党改宗为国效劳，这种

阴谋从未获逞，因为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他的公私生活表里一致，既维新也开明，他过着现代化文明的公私生活。他同受过优等教育、最有头脑、最能干的中国革命妇女运动领袖之一的邓颖超结成终身伴侣，他俩的革命爱情天长地久，永世不渝。

四月初旬，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他跟我谈到他一行谈判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判的基本问题是国内和平问题，内战最后停止了，但很多问题仍悬而未决。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于二月十日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两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条件。电文保证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装备给养同其他军队相同，可以保留红军自己的政治制度。要求实行民主，保障民权，释放除敌特汉奸外全国一切政治犯，取缔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禁令。中国共产党宣布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用民主制度代替苏维埃。

国民党对这个电文提出的某些条件拒不采纳，周恩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照旧没有解决。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官僚党阀，他们意识到老百姓当家作主，享有民权之日，就是他们独裁结束，特权乌有之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极力反对实行民主和反对统一战线的首脑人物，何在四月初旬还下令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剿灭江西红军“残匪”的命令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一年仍然生效。

我问周恩来“蒋委员长对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的命令难道不负责任吗？”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尽力争取能同蒋氏达成统一战线，他们深知蒋氏被有权势的帮派集团所包围，这些集

团为了各自的利益把蒋氏当神皇帝来利用。我认为如果蒋氏对他的军政部长的行动不赞同的话，他是会罢他的官的。

我和周恩来这次谈话后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官方高级军政首脑代表团来到陕北，视察红军和延安边区政府行政管理事务。据我观察所及，这个代表团当中的代表，没有一个学识见解修养和才干能够和共产党人相比。代表团里面有一个堕落的汪精卫信徒，他一路自带厨师和医生，老而不死一身梅毒，延安的主治医师有一天晚上被召集到他那里去会诊他的花柳性病。

代表团成员里面有几位德高望重作风正派的代表，其中有一位多年奔走国事，致力于愈合阶级的创伤，长期主张和平建立国共合作，成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元老。他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的追随者、共产党元老林伯渠的陪同下，前往传说中的中华各族人民的祖先墓地黄陵去扫墓。这种象征性的做法常常使得外国人感到发噱，但在中国人的心里则印象深刻。这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象征。

国民党政府军政代表团访问延安以后，毛泽东向共产党党员作了长达一天的报告。据我的日记所记这个报告论统一战线的进展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结论中他说：

“和平与民主是保证武装抗日的两个条件。在新阶段中我们有许多任务，但最根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

“民主好比现在我们要从汉口搞到粮食一样，是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的。还要考虑途中有被拦劫的可能。如果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过低，如果我们松懈斗志，不努力去争取，那么

要全民抗战战胜日本收复失地，都是不可能的。”

十九、冲过封锁线

包括德国人李德在内的我们一群在延安的外国人，一天晚上，欢聚一堂，议论国民党政府多年来，用控制一切舆论机器，进行新闻检查、收买外国通讯社、情报机构的记者等等专政手段，让西方世界的人民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被污蔑为“共匪、赤匪、强盗、暴徒”等等一类恶名，原因就在于此。

“国民党中国的新闻报道奴才性十足，恐怕是世界最罕见的”我大声说道：“在西方说来，至少还有些新闻记者为了新闻出版的自由，不怕坐牢，不怕丢饭碗。”

“贪赃枉法，奴颜婢膝，在中国官场上相习成风，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一位中国朋友说道：“不过，我们的新闻出版界也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的烈士，大家不会忘记鲁迅和他的战友们吧？”

“不会的，还有张慎微，”我说：“他是一位埋头苦干，积极战斗，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的公正编辑。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正同检查人员扯皮，日子真不好过。”

我从箱子里翻出有关张慎微在一九三二年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时的一份卷宗，里面有他写的论新闻黑幕和遭受压制的四篇文章的原始资料。

在晚上的讨论会上，我对我的朋友们说，张慎微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论国民党过去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政党，但自从它成

为执政党以后，混进了北洋军阀政府里的许多官僚政客，给新闻出版机构也带来了北洋军阀政府一套贪赃枉法制度。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国民党宣传部和外交部情报司同英国官方通讯社路透社之间有两个秘密协定。协定规定国民党宣传部每月津贴路透社一万英镑，外交部情报司每月津贴三千英镑；路透社承担对国民党作“有利的宣传报道义务。”张慎微说，日本侵略东北国难当头的时候，签定这种协定纯属对中国的敲诈。我把协定的复制图片给朋友们传看了，它证明张的指责完全属实。然后我补充发言道：“国民党政府把宝石勋章授予伦敦路透社社长是不足为奇的，太不象话的丑闻还有的是！纽约有一家大报的驻上海记者被另一个新闻记者揭发，他按月领取国民党的津贴因而被解雇。而这个揭发者接替了他的职务，不过他自己却同日本人来往密切，非常友好。这类为日本人服务的外国记者多如牛毛，不过大多数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日本在一切准备尚未就绪以前，对英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必须敬而远之。这类为日本人效劳的外国败类，有的公开活动横行无忌，有的暗中活动背后捣鬼。一个香港来的英国主编负责《上海泰晤士报》，这家日报部分归日本人所有。一个爱尔兰人在华北为日本人编一份报纸。《远东评论》是上海一家大型月刊，从凡尔赛和约以来一直接受日本人的津贴。它的发行人是美国人乔治·布朗桑·雷伊，他在签定巴黎和约谈判期间担任中国和谈代表团的顾问，由于中国人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便大发雷霆，气冲冲地走进街对面的横滨正金银行帮日本人作事去了。雷伊把他的差事交给了澳大利亚人端纳德。但当端纳德得知《远东评论》即将成为日本人的喉舌时，他就自动退出，这个月刊过了一个时期才

继续出版。雷伊是以日本宣传代理人兼伪满洲国顾问的身份公开露面，到处招摇撞骗。当他离开上海到华盛顿去为伪满洲国进行宣传工作的時候，另一个美国人乔治·索柯尔斯凯当上了《远东评论》的主编。索柯尔斯凯回美国去的时候，又一个美国人查理·拉伐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美国人表演得很不错嘛！”有人插了一句。

“糟得很！”我说：“不过我们也还有另一种美国人。拿《密勒氏评论周刊》的编辑约翰·B·鲍威尔来说吧，鲍威尔有一回偶尔问过拉伐尔为什么他要帮日本人干那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拉伐尔的回答是：‘我老了，跟谁家玩牌下棋都行，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也会试试看的。’”

鲍威尔从一九二八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驻中国的记者，和拉伐尔的无意谈话后，被该报以中国新闻没有什么重要性为理由解雇了。人家把他赶出该报之后，仅仅保留了一个远东记者甚平芝，此人是檀香山籍日本人。办事处在日本，由他单枪匹马为论坛报采访中日战争的新闻。

我对红军有关人士说起过这一类记者：“有一些英美驻华记者只要能够得到直接采访你们的新闻报道的机会，我深深相信他们是决不会采用国民党污蔑攻击你们的官方报道的，如果他们现在就来采访你们的话，他们是会如实报道你们的情况的。”

红军人士考虑了这个问题，说道：“好得很。只要有来者，我们一律欢迎。”

这就是我想打破封锁红军消息的缘起。我向上海方面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了授权邀请信，当然在信中同时提出了穿过西安国民党军警特宪的封锁线时谨防被捕的警

告。他们必须两三个一行住在西京招待所里于约定时间内，等待一个外国妇女拿出我为他们安排赴陕北的交通工具的明信片。

凡是得到邀请信的编辑和记者无不跃跃欲试，上海新闻界人士非常激动。英国最重要的一家报纸《华北日日新闻》的主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外国报界同业公会的会长。我请他率领第一批记者团先来访问延安。我这样作，并没有考虑“抢先”报道新闻的惯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抢镜头、争先报道、争出风头是可耻的，我行我素，一贯鄙视什么“抢先”报道的惯例。上海方面接受邀请的同仁无不希望捷足先登，争取能够第一批来访延安。

国民党政府得到这个安排记者访问延安的消息以后，老羞成怒，并且对新闻记者们悍然发出警告，宣称如果访问延安共产党人，政府将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英国《每日新闻报》经理部因此下令该报编辑停止此行。但《联合新闻报》办公室主任仍指示该报驻华北代表伊尔·黎夫离开天津前往西安。稍后鲍威尔和纽约《呼声论坛报》记者维克托·盖因也决定排除艰险身入虎穴。

鲍威尔和盖因两名记者于指定日期到上海机场，已坐进机舱，特警出现命令他们下去。鲍威尔考虑违抗命令不智，争吵后颓然回家了。盖因则要特警提出他违反中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对方既然拿不出什么，他便怒气冲冲地坐在那里拒不下机。到西安后日夜有人盯他的梢。有一个外籍妇女给了他一张卡片，然后他神秘失踪，不久出现在延安。

这之前，埃德加·斯诺的年轻、美丽的太太尼姆·威尔斯到

了西安。有三个特务在她的身后盯梢，跟踪不放，她注意到特务跟踪的习惯。一天夜里她给招待所经理留下一张有事外出很快就回的便条，越窗而走。她在延安逗留了三个月为写一本书续《西行漫记》收集资料。

接踵而至的是《联合新闻报》记者代表黎夫，他从天津到西安，和西安官场教会人士鬼混过后，旋即神秘失踪！

这几位外国朋友便是德国顾问李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和我等四人第一批到禁区延安的外籍记者。几星期后，自乘专车周游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一批美国学者也来了。延安教育机关、研究团体、全体党员都接到听国际问题报告的通知。拉铁摩尔博士站在夫子庙前台阶上，沐浴着阳光，对求知心切的延安干部作了一系列讲演。这使我感到西方有识之士终于同亚洲革命的进步先锋靠拢了。

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口里我一再听到。

外国记者们在延安访问了各界人士，参观了教育团体，晚上到“抗日剧院”看节目演出。他们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有时通宵达旦，我的住处总是响彻他们的笑声。有时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演出节目的晚会上，观众总是一致鼓掌，全场热烈欢迎

外国友人表演一个节目，我们美国人不是以唱歌见长的民族，当观众热烈欢迎维克托·盖因唱一支歌的时候，真使他窘态毕露，恨不得一头钻进地洞里去。但是观众可不买帐，鼓掌跺脚呱呱呱呱一直不停。我问盖因会不会扮演维吉尼亚利尔舞曲的哪个角色，他说可以演一个，于是我和他登台表演了一个美国风土舞，乐得观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欢乐异常。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略日深，我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又有一批记者冲破封锁线到延安访问，无不经过西安军警特宪的百般阻挠。甚至在红军改编成为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以后，新闻记者要访问延安照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冲破人为的封锁线，对外国友人说来仍然是冒险的生活也是顽强的挑战。

访问过中国红军回去的记者个个都有一种共同的观感。即：他们曾经同当代中国的新人，同他们一样思想进步的新人在一起过。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跟他找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几个月后，这个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

二十、奔赴山西前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凌晨，延安广播电台广播了芦沟桥事变的消息。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西南十五英里的芦沟桥挑起的划破东方社会新旧世界历史的又一次事变。日军在北平附近的“军事演习”，正如日军如果在纽约、在旧金山附近进行

军事演习，会使美国人愤怒一样。中国人民对日寇这一名为演习，实为挑战的侵略罪行是决不能容忍的。七月七日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县城搜查。宛平县长断然拒绝了日军这一无理要求。日军用这一套“事件”渗入华北，建立傀儡政权并迫使冀东成为非军事化特区。

从七号午后到八号清晨，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宛平在芦沟桥发起进攻，宋哲元将军的二十九路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二十九路军人众一万，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旧部之一。他们奋起迎战人数多过两倍的日军侵略者。七月下旬，日军调动八个战时师团和两百架飞机大举入关。二十九路军，包括好几百爱国青年学生在内，浴血抗战，伤亡惨重。

即使国民党政府照旧考虑“芦沟桥事件”是“地方事件”，是防共反共亲华友华的“军事演习”，但是日本灭亡中国、侵略亚洲、征服世界的野心再清楚不过的了。蒋介石委员长在避暑胜地庐山同他的高级官员们争论和战两难的问题。青年学生在延安在西北拿出抗大出版的简明地图走上街头，向群众讲解战事形势，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宣讲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道理。

全中国发出了要求全力支援二十九路军的呼声。蒋委员长于七月十七日，打破长时间的沉默，发表了他的告全国民众四点声明，说最后关头已经来临，中国决心抗战到底。

中国抗战开始了。芦沟桥事变的烽火警报传到延安，延安的锣鼓响彻云天，军号吹响了中国人民奋起反击的战歌，我站在延安古城的城门口，望着身穿灰布、青布制服的红军男女战士们，一队一队步伐整齐面孔严肃的游行行列走过。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我这支秃笔难以描绘的。勇敢、沉着、坚定，威武雄

壮，不动声色。要自由，争解放，为祖国献身的精神溢于言表。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闻报而起，挺身而出，横眉怒对入侵的侵略者，声援前方抗战的义勇军，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是属于他们的，我能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目睹这英雄的行列，百感交集，实在难得。目睹这英雄的行列，我的个人生活看来碌碌无为实在可耻。

八月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开赴华北战场，深入敌人长驱直入轻易夺取的战略城市和关口的后方。抗大的学员们几星期内学完他们的课程，匆忙结业，背起背包在倾盆大雨中离开了延安。由于我的背部受伤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在一批批学员走时，使我心如刀绞非常难受。九月中旬，我还是同一个小组的人离开延安到西安去，一路上有时坐上毛泽东送给我的藤轿子，有时骑上朱德送给我的“云南”小驹，路过西安为的是去西安教会医院用X光透视检查我的伤处。道路陡险，颠簸难行，途程十天抵达三原。将“云南”小驹托人送给在前方的朱总司令。

我的背伤经过X光透视的结果，触及经络尚未骨折，筋痛难受，但无危险。医生在我到山西前线之前给我绑扎伤处并嘱我在门板上静卧养病。我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间小房子里眼望庭院，整整躺了三个星期。办事处院子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反映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每次火车载来一批批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他们面无血色，苍白消瘦，坐牢苦状表现无遗。很多人有肺病，肠胃病，精神分裂症，他们希望能坐上一趟大车到延安去恢复健康，能上抗大或进陕北公学去学习。

十月中旬，我和两个中国记者，一个是湖南人周立波，一

个是东北人舒群，坐火车去潼关，然后换乘火车去山西省省会太原。中国在奋起抗战中，一切话题集中谈抗日救亡。当我们走过街头前往黄河渡口的时候，看到远处有一个长长的队伍打着军旗，唱着救亡歌子向我们走来。突然间，战争已经临到我们头上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渡船在黄河北岸的风陵渡口靠岸，我们想在这个小镇上找一个客栈过夜，但满街都是兵民车马和小商小贩。我们向镇上走去。见到烂泥路边的地上躺着一排排的伤兵，好几百伤兵有的昏迷在地，裹扎的绷带血迹斑斑，有的发黑，惨不忍睹。我们走走停停，跟他们攀谈，有的是一个月前受伤的，挣扎南下，有时坐大车，有的骑骡子。成百上千的死在途中。轻伤拖成重病号，好不容易来到渡口，等待过河再坐火车向东或西行去治伤。他们没有医生护士，也没有陪同人员一路护送。

走过这些为祖国光荣负伤、受苦受难、奄奄一息战士中间的时候，我对两位中国记者说：“我们第一个战时报道应该报道伤兵的情况。我将尽我的力量争取国际的援助和志愿援华医疗队前来中国”。

我们一行找到了一个小店的一间小房。大家紧紧挤在一条炕上，我的警卫员同志为我在炕前咫尺之地支起了行军床。无人护理的伤兵景象使我不能安睡，黑暗中我听到东北人舒群辗转反侧的唉声叹气。

“为什么你睡不着？”我问。他回答说：“那些伤兵都是我的东北老乡。见到他们，使我思念东北的家乡，想起了年高衰老的爹娘。爹娘呵！是死是活我不知道。我怕再也见不到我的二老双亲了。”

在这暗暗的长夜里，千百万中国青年有多少在思念他们可爱的家乡和他们的亲人。内心深处怀着无限的悲伤！我躺在行军床上，睁大两眼望着黑夜直到天明。

次日，我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车箱里找到了座位。晚上，列车才迟迟向北爬行，有一次停在一个小站上很久很久。听到外面嘈杂的人声，我起来下车走到站台上。但见一轮圆月当空，旁边一辆敞车满载几百伤兵，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没有一隙余地，拥挤不堪。

第二天黎明前，我们到达太原，随即步行到八路军办事处。正吃早饭，赶上敌机光临，这是敌人头一次轰炸太原。我们躲进办事处地下防空洞，市内到处有类似的防空洞，各机关的防空洞有几十英尺深。

我们一连几天走访了包括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在内的省政府高级军官、军医署长，还有在绥远抗战有功、部队损失惨重的傅作义将军。

在旧中国过去的岁月里，背后议论或是书面报道文武官员的真实情况是不礼貌的。在为中国的独立、民族的生存而战的今天更是这样。然而真相大白，很不文明。我们不建立一个新世界则已，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必须看到同旧世界相连的一切阴暗的东西。我深深相信，国民党中国政府，当然我们美国政府也一样适用，假如它是一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府，假如它铁面无情地把那些吹牛拍马、昏聩糊涂的死官僚主义分子消除干净，那它的失败决不致于这样惨重，它的牺牲决不会这样之大。

山西省主席兼山西省保安司令阎锡山并不比他手下的文武官僚们特别顽固，他不过是上了年纪，有点糊涂，对日军的野

蛮暴行毫无所知。他手下的将官们许多是大地主，他们最关心的是山西省的实业工厂。他们的兵都老了，思想守旧，装备差，不能打仗。日本人对他们的情况一清二楚，打进山西省内以后，采取保护大地主身家财产的办法，收买他们充当维持会的会长。甚至对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的太原孔公馆周围驻守重兵，严加保护。日本人对中国的国情是狠下功夫研究过的。

山西军队的医务部门是简陋的。我向军医处长提出组织志愿担架队和急救工作者的可能性时，他疑心重重，以为这种搞群众运动的想法是危险的，他三句话不离钱，考虑问题一切从金钱的观点出发。他说他在考虑给伤兵抬担架付款的规章制度，因为除非付钱，否则无人上战场去抬伤兵。

太原市内五个后方医院，军医处长派了一辆汽车送我去参观访问了两个医院。山西省共计十六个后方医院，设备简陋，病人睡在地上铺的稻草上。太原的严重病院例外，病人不睡草窝。这是太原的模范医院，因为院长是北京协和学院毕业的合格外科医师。他每天的工作不少于十八个小时。他有一班人马：十九名不合格的助理医师和十八个合格的男女护士。我访问这个医院时，他亲手治疗一千三百个严重伤病员。医院九月份接受病人五千人次，其中所有最严重的病员送上火车转移到南方去了。这个医院仅有一些最主要的外科医疗器械，没有X光仪器设备，没有止疼剂和破伤风药。给病人输血没有听说过。

山西省唯有教会医院有一架X光仪器设备。但它只透视过三十个病人，而这些病人尽是能够付得起透视费的大官老爷。

我到这个教会医院去贴腰背痛膏药，并让一个警卫员去检查肺病。外国女医生说：“前线下来的伤兵并不特多，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军阀队伍不打仗，见鬼子就同兔子一样飞跑，鸟兽散了。”在争取传教士加入统一战线的时刻，我压抑住胸中怒火，把所见到医院情况告诉了她，从侧面作了一个婉转的答复。

我在离开太原到八路军总司令部之前，花了整整一夜时间准备一份关于西北战场伤兵情况的报告。附件中我呼吁外国对华进行医药援助，并且成立确保医药援助的外国委员会国际机构。我把这份报告寄给了《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他发表了这个报告。

日军这时正向太原北面二百英里的重要关口忻口关推进，东面向平汉铁路正太线交点石家庄推进。企图两路进攻太原。忻口北线所有国民党军队包括几师中央军在内统归卫立煌指挥。八路军“耍龙尾”，在日军后方或左右两翼进行阻击、攻打日军运输辎重部队和开赴前线的增援部队。我的目的地是到敌人的后方八路军总部驻地五台山去。

中国战场这时伸延几千里长，京沪战场上训练有素的国民党中央军和有名的桂系军队联合作战，筑成一条血肉长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陆海空三军的联合进攻，同山西战场上的军队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大山作屏障而在平原上作战。

一道光芒划破了北方的长空，这就是平型关战役。它吹响了我国抗战最后一定取得胜利的进军号角。八路军一一五师部分部队在长城附近五台山的平型关反击日军。各连队得到鬼子要从平型关通过的情报后昼夜兼程两天两夜赶到了关口。休息

数小时后，派出快速部队夺取作为后勤据点的五个市镇，游击支队占据山头地势，步步设防埋伏狙击，留一个团守关，迎击来犯之敌。

到这时为止的日军，一路只遇到软弱无力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队的零星抵抗，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既无坦克也没有出动飞机掩护进军。他们还遇到了西北黄土山陵深谷、道路坎坷起伏的障碍。据守平型关的八路军一团人沿山陵要道设置密集机枪阵地，各个连队占据山头待命出击，山上扔手榴弹，山下打机关枪，放鬼子进入伏击圈一举歼灭。九月二十六日，平型关战斗结束，日军板垣师团一个旅全歼，八路军缴获敌军地图、文件、日记和大量服装，以及军用器械设备等等。我看了一个日俘的日记，有这样一句话：“红军使我头疼，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平型关战斗之所以震撼中外，意义重大，是因为中国人民军队第一次联合起来军民合作打破了趾高气昂、不可一世、号称无敌的日本皇军的神话。是因为不愿作奴隶的中国老百姓被迫投入了保家卫国的战斗，是因为它证明了即使装备低劣的中国人民军队使用了“人民战争”的战术，是可以而且也一定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的。半年后，我在汉口同史迪威上校（后任将军）、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上校一起费了半天时间，对这次战斗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次大捷。

时间和空间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日子没有计数就打发过去了。十月下旬我和周立波、舒群两个中国记者才离开太原，乘坐八路军卡车前往五台山。上车后一路睡觉，人们提醒我，鬼子飞机夜袭，发现汽车前的灯光就当靶子扫射。我真睡死了，

不把扫射当回事。车子终于深入五台山峡谷把我们送到五台县民众动员委员会。身穿制服、热情洋溢的青年们吩咐给我们做一顿好饭，房子里一下子挤满了老百姓。

我们花了大半夜时间谈论敌后有关民众动员、群众运动的问题。我看运动好比沙漠中的清水，因为我花了不少时间同太原民众运动委员会打过交道。他们的种种努力都受到大小官员们的百般阻挠，那些官员认为战争只是两军对垒，沙场决定胜负的问题。如果老百姓应该训练武装起来，的确会打鬼子保家乡，但以后怎么办？他们认为，老百姓决不会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回到战前牛马走的日子过生活的。

太原民众动员委员会转弯抹角地想尽办法试图说服当局大小官员们，动员民众会巩固他们的名誉地位。官员们唯恐变天，也不相信太原会沦陷失守，只让动员太原以外临近战场地区的老百姓召开群众大会，讲抗战的目的。阎锡山迫于形势，成立学生“敢死队”和在山西各地成立军训学校。

五台县是八路军唯一深入活动的地区，这里的工、农、学、商、妇、儿童抗敌会组织起来了。在民运工作者的四乡奔走、多方努力下，青年编进了游击队，老年编进了乡保卫团。各个抗敌会共同选出了县长、县级干部，以代替那些听风就是雨、见敌就逃的县政府官员。

天快亮了，我们才请安睡觉，马上又醒了。我们听到了西面传来隆隆震耳的大炮声。我们看到县城一半已成废墟，然后沿着山间小路开始爬山。这是一个风和日丽、景物新鲜的秋天，路上尽是老百姓和大篷车的人流，唯有那远处传来的炮声和空中飞过的敌机，使人感到是在战争中。

正午，我们到达一个村子里，它坐落在一个开阔的金色山谷之中。指定我们住在一个石头围墙、玻璃金顶、雕梁画栋的一间大房子里。村子为一片桦树林所遮盖。整个山谷桦树成荫，村庄相连，安乐清静，平安无事。朱德的总司令部设在另一个村子里，一个警卫员骑着我的“云南”小驹，带着欢迎信件飞驰而来。

我们住的房子是八路军政治部，住满了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人们穿着缴获的战利品日本军大衣，带着手枪。我们吃着日本人的大菜，开始过豪华的享受生活了。

我在这里碰到一个从冀西涞源县来的政工干部。他告诉我，八路军攻克涞源县城时，日寇扶植的伪县长一批汉奸逃进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堂里藏身。涞源失守后，意大利神父推举那些人作傀儡头目，并帮助日寇征收粮食，成立特务机构。涞源收复后，八路军战士去敲教堂的铁门，神父升起意大利国旗，大叫中意两国政府还保持外交关系，意大利财产仍享有豁免搜查权。八路军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报告了这件事，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包括意大利神父以及许多外交官在内助纣为虐、与中国为敌的类似案件均未得到处理。八路军战士当时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抓走汉奸？我问。总部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怕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避免有人挑起争端，说八路军破坏基督教。

我在五台山停留了一星期，和朱德谈了一整天，他作了八路军深入敌后同日寇作战的全面报告。其余几天，我和中国两名记者前往山后看青年民兵受游击战争的训练。民众动员委员会会址所在地在一个村子里，整个村庄成了一个训练基地。动员妇女参加训练作的还很不够，不过，随后几星期从延安到这

一带来的妇女政工人员大量培训起来了。

我亲眼见到了日后把五台山转变成为民众抗日的强大基地的诞生。这个地区成为军政、教育、医务的中心。华北和西北各地的男女青年到这里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八路军突然接到向正太线活动配合作战阻挡日寇推进的命令。次日清早，总部和一一五师开始沿太行山南下向正太线进军，这是一次难忘的艰苦转战的大进军。

尽管每天快速行军，又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但是红军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我看到了红军之所以产生、成长、壮大的一整套自觉行动的军事制度。部队各连队打前站的政工代表出发先走，我们晚上抵宿营地时，墙上、树上均有粉笔写明各连队住宿的地方。我们到了我们投宿的村子或集镇时，甚至在门上可以见到“记者住此”的粉笔字。按房子大小人员多少分配住房。严格的纪律和对群众的注意事项使得军队同老百姓亲如家人。

战士们每天晚上还集合继续听课。一份中日关系历史的教材刚发到了各连队宣讲。每到休息地就听到“开会！开会！”的锣声和喊叫声。叫喊每个人都要参加群众大会，听报告人讲战争消息和老百姓参加抗战迫在眉睫的必要。政工干部留下来继续作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我在五台山所见的情况相同。

当我们快接近正太铁路的时候，就听到不绝于耳的大炮声。日寇已攻破石家庄西面娘子关沿正太线向太原推进，敌机向我们俯冲扫射时，我们就地散开；如在村子里，就寻找隐蔽地疏散。

以后我们仅在夜里行军。清早，在离铁路十里地以外的村子住宿。许多村庄被炮火炸平，一片凄凉，苍痍满目。但我们在炮火连天声中找得到驻地，白天睡觉。敌人的轰炸机飞过头顶时总使我惊醒，敌机过去后我又沉入睡乡。

以后我们又在半夜行军，设法在天亮前穿过封锁线。先一天我在一个大镇子里把我最后的日记书信札记投邮。我担心寄出的东西命运如何，但中国的邮政局还是工作正常，能够办事的机构。无论春夏秋冬，即使战争岁月，邮务工作者鸡鸣而起，孳孳为人民的邮政事业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劳勇敢地工作。他们有的用两条腿走路，有的推着独轮车，骑着自行车，有的赶着小毛驴拉着大骆驼，或乘车、坐船，用汽车、用飞机投递邮政包裹和信件。可能到得晚些，天灾巨变有些影响。但通邮地区的邮政业务工作总是照常运行。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地区，我的日记、报道与其带在身边不如交邮安全保险得多。越走近正太线，我就终止写日记并且把我随身所有的片纸只字都毁掉。

我们眼望着第一道晨光的来临，还没有跨到铁路那边去。我们的前站迷了路，等找到了道路而黎明象一只猛兽威胁着我们。我从来没有这样痛恨亮光，队伍里面不断传出“赶快！赶快！”的慌忙火急的行军命令。

好不容易到了铁路边上，但错过了过铁路的机会！我们只好沿铁路小跑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了一条通向村庄的小路。人们静静地拚命向前赶路。时而气喘如牛地狂奔一阵，时而小跑，时而慢步行走，气呼呼地直喘。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枪支、弹带、手榴弹和背包。倒在铁轨旁边的尸体横七竖八到处可见。一个

兵在一座桥下睡死了，我们拼命叫喊他也不起来。东面，一列满载货物的火车开来了，车笛呜呜尖叫声未落，我们闪在一边，列车穹隆穹隆飞驰过去了。我看到了火车司机神色严峻的面孔，他望着前面铁路不断发出警号。中国铁路所有职工的英雄主义气概使我起敬。他们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成年累月、无时无刻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铁路是敌人袭击的主要目标，但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从不畏惧。他们始终是默默无闻、埋头战斗的无名英雄。

我们终于找到了路，叹了一口气向南前进。我们部队的大队人马还在沿铁路线快速疾走，至少得半小时才能转向南下的路，而第一批敌机已经临空。我们跑到地头卧倒疏散。敌机没有下蛋飞过去了！

以后十天，八路军沿正太铁路南侧边打边走，敌寇增援部队不断上来，中国军队包括我军在内疲惫不堪，打打停停，艰苦转战，奋起还击。敌人的飞机天天轰炸，有时一小时一次空袭扫射，但始终没有发现我军的军部。一天早晨我去总部找朱老总谈话，只见几百个武装民兵围在那里，许多人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一双赤脚，带着妇女儿童，还有一个六十多岁满头白发、身体结实的老太太。他们是矿山铁路工人，他们拿起当地兵工厂的武器，扒铁轨，挖铁路，打游击，许多人英勇牺牲了，现在他们来参加八路军。

一场恶战就在我们驻地的山后激烈展开，整整打了一夜，我们听到机关枪嗒嗒嗒嗒刺耳的扫射声。朱德面不改色，威严如神。天亮了，“大胜利”的捷报频传，声震山岳。我和两个记者翻过山坡，赶到战场。

山后深谷里一片人喧马叫声，缴获了几百匹满载日军物资的骡马牲口。我们看着山坡后面一大队头戴鬼子钢盔、身穿鬼子大衣、手持冲锋枪的战士直赶上来了。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潮水般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步伐轻快，精神抖擞，欢呼歌唱，挥手致意。这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几周前在五台山，转战过此上前线的。嘈杂声中我听到有人喊我的中国名字。一个军官向我飞跑而来。我伸出双手迎接他。他就是陈赓。几年前他负伤到上海就医同我在一起谈过工作的红军指挥员。我们简短地交谈之后，他跑下山坡，赶上队伍向战场走去了。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然后我和两个同事深入村子里找日本俘虏谈话，了解战争的各种新奇经验。在一个村子里见到政工人员手舞足蹈地把一大箱子日钞当作胜利纪念品分发给人们，任意销毁。我建议他们把日钞送往延安去处理。

一连几天，战斗继续打着。我们到指挥所设在山梁上的一一五师师部去观战，俯瞰谷底，鬼子兵如潮水般地通过山涧，敌人的炮兵密集发炮，敌人的飞机在头上不停的扫射肆虐。

一个晚上，我站在一座山头上，尘土起处一队八路军战士从深谷上来，经过山头又下到鬼子正在穿过的深谷里去。他们是久经风霜锻炼成钢的人民子弟兵，尽管全副武装随身背负的东西沉重，他们的脚步轻快，走过身边听不到一点儿声音。一个十三四岁的红小鬼背着一个美孚油洋铁桶，里面盛着水，跟在一个扛机枪的战士后面一路小跑着。他那天真烂漫、威武动人的脸蛋和边跑边溅水的油桶的哗哗响声，这真是战地风光的诗画图，给我以永生难忘的印象。是走上战场同鬼子拼杀的战士们的严峻面孔，还有那背着油桶跟着战士跑的红小鬼的欢乐

神态，使我深受感动。那孩子背的美孚油桶，是我在中国西北战场上所见到的我的祖国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唯一贡献。但是，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敌人飞机和扔下来的炸弹也正是美国制造的钢铁化合物的产品啊！

日军从晋北晋东两路夹攻夺取了太原。八路军一二九师沿正太线继续深入敌后，展开游击战争。总部和一一五师沿吕梁山脉向晋南移动。每天从容不迫地行军八、九十里，我学到了按劳累计算里程的方法。走六十里路精神还好，后一、二十里真越走越费力。天气转冷，河水结了一层薄冰，有的山头已经积雪。一大早步行很长一段路，脚才转暖，骑在马上，脚又冻僵，还是安步当车行军走路的好。但是也有阳光暖和的日子，大伙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我们利用午间休息的时间，不是找其他连队的战友们谈心，就是同过路的老乡们攀谈了解情况。碰上风雨交加，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能行军的日子就在一个地方暂驻几天，开会学习，训练民兵，发动群众，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翻吕梁山那天遇上暴风雪，天山迷蒙，道路陡滑，泥沙飞溅，身上爬的虱子痒的难受，鞋子上结了凌冰冻疼难熬。一个战士盲肠炎发作蹲在路边。我把“云南”小驹上给他骑。他伏在马鞍上一路呻吟着，大雪齐膝深，骡马趑趄走，乌鸦低空飞，狐兔雪里奔逸。朔风呼啸怒号，我听到如清泉流水的悠扬笛声，它导引着我们一步步爬上琉璃世界的高山之巅，到山顶上，我看见了长长的行列中一个战士，在双手横吹玉笛一步步的走着。

翻到山下，走过洪洞县古城，来到一个平坦开阔的乡村。时已半夜，我们还从这村走到那村，无处投宿。一大早到了一

个地主家，门上有“记者住此”的粉笔字。进到屋里，全家正以热菜热饭和备好的酒席等待我们。他家的两个儿子都在延安学习。这一天一夜我们行军十八个小时，走了多少里路我不知道。

我们在洪洞县乡下停留了十来天，我骑马到处求借医药物品。各战斗连队向北向东北和西北活动。防备敌人来袭的可能通道，新的参军青年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找到总部，麦地里黑压压一群群的民兵在进行军事操练。晚上，村子里坐满了一班一班的战士。敌机狂轰滥炸洪洞县城，以为我八路军总部设在这里。

十二月下旬，有两个外国人不远千里而来。一个来客是新西兰青年记者詹姆·贝特兰，西安事变时我和他一起在电台工作过。他不脱牛津文化人的习气，还带来一部莎氏乐府全集。道貌岸然使我生气。另一个来客是伊文思·F·卡尔逊中校，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情报武官。

我听到卡尔逊来了，决定给他当头一棒，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根据我在中国同我们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高不可攀，难以接近。他们把中国人看成是为衣食忙的洗衣婆，店老板。称中国人叫中国佬。总而言之，我并不喜欢美国外交官员吃的基督教那一套。因为我看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穷人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有些美国官员就把我当作一个头放豪光的名妓。特别是日本侵略东北以后，这些美国佬的太太把我看成是红军之花，自甘堕落丧失白种人天下之骄子的尊严的美国生番。

一天，我坐在土台上观看八路军两个连队进行一场篮球

赛。朱德走到我的身后说：“有一位贵国同胞要见您。”

“我早就想能见到您，史沫特莱女士。”卡尔逊中校说。

“好嘛，您现在见到我了。”说罢，我扭头转身继续看篮球赛。

卡尔逊是一个很瘦很长的个子。但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同他谈话后发现他跟他新英格兰州当地农民老乡一样倔强老实，他的谈吐简要，有一种纯朴气质，起初我想他很狡猾，装模作样有意来这一套。

他是从单纯的军事技术观点来研究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很快的认识游击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教育问题，广泛深入开展人们的生活战斗、牺牲就义的政治教育制度问题。他着手研究这种政治思想制度，很快称之为“道德伦理教条理论”。

美国军事专家来到前线，激起了八路军指挥员们的求知欲。专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同他谈话。会议举行了几天，讨论问题深入到假想的日美战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桌上摊开一张大地图，手指头在新加坡到阿留申群岛之间指指点点有几个小时之久。他们的假定新加坡将是英美军队的作战基地，并且相信美国已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设防以备日本的进攻。他们很难作出其他设想，因为到这时为止，他们是高度评价美国军事当局会高瞻远瞩加强战备的。

八路军将领们毫不隐讳他们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简要的说明实战情况，避免同优势敌人打阵地战，在敌后迂回活动，对敌人的侧翼或后方发起进攻，切断敌人的交通

线，分割敌人，包围歼灭之。他们对敌我双方的优缺点进行分析对比，谈到军民关系问题时说：“我们象大海里的鱼，在群众中自由游泳，我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自己肃清内奸。”

会议几天，我和卡尔逊中校之间开始的友谊，经过战火的洗礼，后来证明这种友谊是我一生中难得的、最忠诚可靠的友谊之一。圣诞节晚上，我在卡尔逊的住处过年，烧咖啡，吃花生，摆龙门阵。他的远祖出生于挪威，他的父亲是康涅狄克州的一个牧师，他的德性秉赋有深厚的家世道德宗教渊源。他的处世哲学深深扎根于美国建国初期的杰弗逊式的民主信仰原则之中。这也许正是他能体验八路军的生活，能呼吸八路军的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空气，并如同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的根本。他感到探索多少年，走遍天涯海角，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中国民主的靠山，他这种看法和其他许多访问八路军的美国记者看法相同。卡尔逊对八路军的观感使我经常想起了《共和国战歌》的两行有名的诗句：

“我看到了主的荣光，从天堂降临；
他踏平了葡萄酒的窖藏，那儿是愤怒与骚乱的祸根。”

一听到这首战歌的诗句，我总是想到：

“他为了人们的圣洁而献出生命，
让我们为了人们的自由也牺牲生命。”

圣诞节之夜，他举起他的搪瓷珐琅咖啡杯并且说道：“艾格妮丝，庆祝圣诞，新年愉快！”干了杯。我也同样端起咖啡杯子放在床边，一起剥落花生。他把咖啡杯子放在床边，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吹起了美国海军军歌。接着又吹出：“多可恨呵我要早起床”之后，他笑道：“唉哟！记得我最初听唱这些歌子的时候，真无聊透了！”

我们合唱了“黑奴呼天之歌”。接着唱“静静的夜儿神圣的晚上”，没有唱完，因为有些词儿记不起来了。最后，我们起立，合唱了一个我心爱的歌《我的祖国您的儿女》。

我们美国人不是以唱歌擅长的民族，从音乐的观点来看我们欢度圣诞佳节这个晚上的乐歌很难说得上欢乐空前，但从朋友共话，在异国过节来说过得不算顶坏。

第五篇 武汉最后的日子

(1938)

二十一、武汉的逆流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十个月期间，武汉实际是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这十个月胜过千年，是多事之秋。正如长江汉水把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分开，通称武汉单提汉口也可以。国际国内有一股巨大的逆流在这个战时首都起伏翻腾，同老百姓士兵们强大的爱国主义思潮相对立的反动逆流泛滥成灾：国民党官员有的卖国通敌妥协求和，有的醉生梦死发国难财，有的引狼入室从事敌特内奸国际间谍的阴谋活动。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沦陷打开了不可一世反动透顶的法西斯化逆流的缺口，人民民主运动从这道防口冲出，一泻千里，表现出群众组织出版集会的活动日益壮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动因素又重新集结

巩固他们的队伍。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府里仍掌握大权，他的亲信徒党窃据武汉各部及其他地方的战略要害部门。汪精卫认为与其让共产主义最后得胜，不如对日讲和反共到底。国民党取缔一切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团体，命令一切学生参加半法西斯主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是依照意大利法西斯蒂和德国纳粹党团的样板模式组成的类似组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向大学生发表讲演，声称大学生是国宝，不可以在抗战中丢失，有学问的人必须明哲保身成为战后建设的栋梁。共产党人出版了《新华日报》，宣传动员全民抗战，蓝衣社黑帮分子晚上捣毁新华日报社的印刷厂。阶级斗争激烈，大人物并不出面，他们雇用地痞流氓大打出手。

我也有个人的种种困难和矛盾，首先是生活衣食问题。我的奔走革命的名声在外，以致就业大门均对我关闭。因为我为人民的利益同白色恐怖势不两立，坚持不懈地斗争和为人权辩护，许多人认为我是拿共产党津贴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相信，凡是外国人都理所当然的有谋生之道，不但生活舒适而且生活豪华。这样一来，我成了梁上君子在经济的真空中悬荡。有一个时期，我成了汉口圣公会主教大人罗甘·乐兹和他的女儿富兰西丝的家中食客。但不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我能解决我的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从我的一位忠实朋友，一个中国的工程师那里借到一个月的生活贷款。

到武汉新都后，我首先看望了美国驻华大使尼尔逊·T·约翰逊，把在八路军的伊文思·卡尔逊的信转交给他。除了一套军装别无衣服，我穿着它去拜访我们的大使和他谈中日战争。我提出了一点看法，指出如果日本人利用美国战争物

质征服了中国，就会进攻美国。

约翰逊大使作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说：“他们到那时候早拖垮了。”

约翰逊大使在中国的美侨中间并不深得人心，人们说他没骨气。因为他是大使，大家外表上尊重他。这可不能归罪于他个人，说到底他只不过是美国国务院远东机构的代表而已，他同我的谈话说，让日本人在中国泥潭里拖垮，以便我们脱身的看法，扼要说明了帝国主义列强英法荷属东印度以及我们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会铸成历史上的大错，在远东的英美民主人士中少数真正有远见的人是早预料到了的。有些人地位很高受到尊敬，而其他的人则被当作空想家或是共产党受到排斥。人们背后对我有种种看法，说我是正不派的女人，理想家，共产党分子等等等等，但我可毫不在乎，我行我素。我总是记得林肯对那些在他面前唠叨挑剔说格兰特将军常在醉乡喝酒糊涂的答话说：“我希望其他将军也烂醉如泥，只要他们能创造同样战绩的话。”

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现在是中将了），我们的驻华武官，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鲁莽、粗暴、直爽、诚实受过战争创伤的战士。他深爱中国士兵，对伤兵充满同情心。我老是跑到他那里求援。有一回他在街上叫住我问道：“你在忙什么呢？”

“装这车药品呗！你在忙什么？”

“我站在这儿观察你呗！”他皱起眉头说：“我要告诉你，国际红十字会仓库里堆满了新到的一批药品，包括新到

的一批磺胺类药物。马上到那里去，为八路军部队要些药品！”

听信史迪威的建议，我去交涉要一些西药，照例是遭到拒绝。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委员会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没有联系，主要是传教士们组成的一个地方性的外国分会。他们接受一切外国救济物资随意进行分配，一般是分发给基督教教会医院。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分不到一点东西，因为，在大多数传教士看来，凡是中国人，特别不是基督教的中国人一概是不老实的。他们说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战争中采取中立，因此来自这些国家的供应物资就不能分给中国军队。我的看法是一个伤兵同一个非战斗人员一样，我们可以说他和一个空袭受害者的遭遇相同。我听到他们说，凡是基督教徒都是老实人，不是基督徒都不老实时，真使我无名怒火升起三丈。

另一个有点象史迪威上校的人是克策里·陈纳德上校（现在是中将了）。他是我所见到的一个出类拔萃但很难理解的人物。他沉默寡言，性情粗暴，一脸麻子，象是一个生活在自己天地里的人。在外国人圈子里很少见到他，当时我还没有听到有关他因为相信空军力量被迫离开美国陆军的事。我有一天在一个僻静的茶室里和他吃午饭，我抓不住他谈话的要点，不理解他的冷言冷语不平之鸣真意是什么。这使我感到生气。他说他能找到中国技术工人，只花一半时间他就能把那些技术工人训练成为飞行员，他认为训练那些学哲学文学怕弄脏自己的大人先生的子弟是白费时间。

史迪威上校对于远东整个局势非常悲观，以致有些官员称他作“尖酸刻薄的老乔”，不过这总比被人说是没有骨气的大

使先生要强。他有一回对我说：“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之一，我要能指挥这样的战士就了不起了。”

富兰克·金和伊文思·卡尔逊以及其他美国军人也看出了中国形势发展下去的危险。多恩中校（后升上校）为美国驻华炮兵武官，曾旅行各地，对中国了解很深。他刚听到让他再留三年的话，又因故接奉回国的指令。我甚至跟他参谋，为了留在中国就是走上街头造反也在所不惜。他是一个非常漂亮、品学兼优的西点军校学生，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因此他老实地回国了。在他行前我们给他隆重送行。我写了一首诗，诗中称他是一位小说家、画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还是一位音乐家。多恩的秘密并没有外传，《芝加哥日报》的阿尔特·史蒂尔热情洋溢、严肃认真地念了我的这首别离诗。

我的其他朋友也开始离开武汉。伊文思·F·卡尔逊已从西北前线回来并接到海军部停止他发言的命令。他曾发表过有关游击战争，偏偏又发表了有关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是战时利器的谈话。也许海军部怀疑他有佛教思想，但卡尔逊可不是美国西部的纽英兰人，也不单是《共和国战歌》的应声虫。他立即辞去海军部的职务，感到唤醒美国人民对付日本的威胁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劝他考虑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坚持原则的人毫无用处。我担心他在以金钱作成功标准的美国会饿肚皮。他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不必跟我讲经济保障生命安全了，最要紧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对？”作为他的朋友，我引以为荣。

对卡尔逊持好感的人并不多，我不时听到有关他的一些冷言冷语，“可怜的长子！”一个记者说他。“他相信八路军跟

他讲的一切！他入了八路教！”人们不顾事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并不是光听八路军一面之辞。他确是到过并且同八路军一起生活战斗过。只迷信个人成功不相信其他的人可以把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和政治思想教育（卡尔逊称之为道德教育）撇在九霄云外，不赞一词。但是卡尔逊并不是一个被闲话吓倒的人。他没有上过西点军校，也没有上过安拉波里斯军校，在远东大多数海军军官生活里面不可少的鸡尾酒会、茶话会、聚餐、玩牌、赛球、赛跑、高尔夫球赛中也没有露过头角。不过他有不少外国朋友，美国亚细亚舰队司令哈利·耶尼尔上将看来是器重他的。我补充一句话，他自己对耶尼尔上将也是衷心钦佩的。

因此，卡尔逊准备离开汉口。同时，英国女记者弗丽达·尤德丽也要走了。香港扶轮社很快引起了抨击用战争物资供应日本反对中国的英国人的争论，扶轮社主席后来公开为他的“不正大光明的”行为作辩护。

英国巡逻长江炮舰大尉在武汉失守以前的混乱日子里，邀请我到他的旗舰甲板上对英国军官和水手们发表讲演，我拿着地图给他们上课，究竟是他们英国人头脑清醒还是我个人神智糊涂我始终不清楚。美国海军让他们的海员在海军基督教教育青年会听我讲演，让他们的军官参加乏味的茶话会坐冷板凳，以同样的礼遇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倒使我放下了心。他们老是坐在长江的小舟上观看日机轰炸武汉过着令人讨厌的生活。美国巡逻长江舰队上将马奎尔德特有一回在他的旗舰和我共进午餐，发现我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苍老和并非不逗人喜爱，居然对我说：“干吗世界上象你这样的女人要葬身在那见鬼的西北，同一个破破烂烂的军队纠缠在一起？你是在同八路军将军

搞恋爱吗？”是他认为凡是好看的女人或能出场的妇女总是被婚姻问题抓住不放，难看的女人总是成为只讲原则专会报复的社会叛逆？还是他的家庭教育社会生活思想意识使得他说出这番有点意外无聊的话？

“跟你说实话吧，我同一个海军上将搞过恋爱。他抛弃了我，我才跑到西北去忘掉一切的。”我压低声音说。

“哎呀！我亲爱的女士，你也爱过荒唐的上将吗！”

这次午餐虽然我想我们有甜面包，但我忘却了其他一切，我照往常一样尽力进行宣传工作，真正希望他能为中国伤兵提供出一大笔捐款。可是他是个美国鬼，并没有解囊相助，我看人看他是不是乐意给中国伤兵捐款。捐款的人我记得，不捐款的人我忘却。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波德·克拉克·凯尔爵士这时刚到武汉上任，我同这位大使先生的往来获得了较大的收获。他请我吃晚餐时，我跟富兰西斯·罗滋小姐借了一身晚礼服，希望遇见什么英国帝国主义魔鬼。他不太象个魔鬼，当然他有绅士风度，瘦个子，棕皮肤，他是一个头脑敏锐、意志顽强、很有才华也有幽默感的苏格兰人。在某些方面他使我想起了“尖老乔”史迪威、陈纳德上校和卡尔逊中校，我喜欢这样的人。

阿奇波德爵士另外还邀请了四位客人和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身穿武官服，外表活象美国漫画里的美国佬的英国绅士先生。这位英国先生对我说：“史美德君^①，我敢断言，我们在西安事变中见过面！”

^① 史美德君是人们对史沫特莱的爱称。

“不错！我们见过面，你可是在那里侦探红军！”我回答他的话时有点生气。

“你可在侦探我吧！”

“本来嘛！”我回答。

其余的客人保持礼貌的沉默，阿奇波德爵士想入非非的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人们一齐哄堂大笑打破了僵局。晚餐简单而别致，杯盘狼藉，酒杯常满，我借的晚礼服使我感到象舞台上扮演的什么角色人物，幸好人们有战事作话题，阿奇波德爵士用不得讲什么，他对游击战争和动员群众、训练群众很感兴趣。当时我有点奇怪，看起来他是否真正是一个斗争性强的民主派人士，还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外交家？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在外交界难得的苏格兰好人。

谈话开始，他讲到新西兰人文主义者路易·艾黎创办的工业合作社计划。且不用说路易·艾黎是工合之父，他是陷入这个泥潭里的人们中间真正最开明、心地最好的人。阿奇波德爵士说蒋委员长会采纳艾黎的计划的，这是解决国民党中国战时经济的强有力的方法，它奠定了经济民主的基础。有些人胡说路易·艾黎象一个沽名钓誉、海底捞月的空想家。英国大使一针见血地反驳道，这可不是一个坏主意，如果列入沽名钓誉海底捞月的话。

阿奇波德大使把艾黎的合作社计划迅速递交给蒋委员长夫妇并提出了英国救济基金支持的保证。计划得到采纳。中国最知名的地质学家、全国资源委员会主席翁文灏对合作社事业也很感兴趣。艾黎放弃了上海某工厂监督的公职到武汉发起经济运动，以后发展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最重大的运动之一。

阿奇波德爵士多才多艺，但没有发挥所长。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学识渊博，涉猎文学，擅长绘画，钻研汉语。我们之间从武汉开始到以后的几年里，在其他地方以奇特的方式增进的友谊，充满着愉快的幽默。当然他给我提供购买医药物品的金钱数目更不消提了。他通过日寇封锁线给我送过一箱外国点心、香烟和其他礼品，使我欢度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新年。他真象一个心肠好的苏格兰人随箱放了一瓶苏格兰陈年老酒，几斤黄油，一包圣诞布丁，还有食品调制作法。洪湖游击队员们看了，思想上会以为这是离题太远的瞎编胡扯吧。

二十二、红十字会先驱

在武汉使我有幸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结了解之缘，并且认识了医疗队创始人和队长林可胜博士。为伤兵服务的工作支配了我后来大部分的生活。其间经过是这样的：

一到汉口我就去找我的一个朋友，博尔塞克博士，知名的南斯拉夫公共健康专家，他是国际联盟派驻国民党政府任职多年的健康顾问。他同许多其他科学工作者一样，具有真知卓见，学有专长，此外对社会福利文学艺术事业也有兴趣。他倾向社会主义，热爱音乐戏剧。热恋一个歌剧院的歌唱家，两人结了婚。在抗战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对我的友谊、帮助使我能坚持斗争生活下去。他住在护界神旅社，我找到了他。两个中国医生时刻盼望找他，一个是后来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金宝善博士，一个是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林可胜博士。他不惜牺牲他的医学研究工作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希望，在北平和南宁两地致

力于红十字会组织工作。博尔塞克告诉我，南京现在已沦入敌手，林可胜博士正计划重新组织全国各战线上红十字会医疗队。希望创立十五人不等的流动医疗小组，分赴各战场和部队野战医院，因为部队医院里合格的医生人数很少。

南京红十字会大医院的下落如何？我问。他出神地望着粉墙纱窗好一会才平静地说：“破坏无遗！”南京撤退不及的几百名重伤兵在中国医生护士的关心下已经离开了南京。中外人士始终相信日本人会尊重国际公法和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但是日本军队攻进南京城时，不但用刀剑杀死了二十万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而且攻打医院屠杀伤兵、医生、护士。奸污妇女的禽兽行为是令人发指、尽人皆知的事，留在南京的一些外交官员和外国传教士亲眼见到甚至还照了相。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助手、司机、技工等七百多人已经来到汉口，许多人在途中被杀害。仅有十七辆半载药品的救护车和汽车从南京脱险到汉口。

南京大撤退中间一片混乱。为了脱险求生，人们不但要同日本人作战，而且有时要同国民党军队拼命。一个红十字会的司机在撤退中驾驶一辆满载医药物品的卡车被国民党军队拦住，命令司机跟他们走。司机嘟嘟囔囔大吵大闹，争执中间敌机临空开始扔炸弹，军队急忙隐蔽，司机大喊一声，快活地把车子开动向西跑了。

中国红十字会现在必须从头作起，苏联给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理事会捐款十万元，博尔塞克博士想把这批捐款给林博士作为组织装备派遣第一批流动医疗队到战区去的经费。

博尔塞克博士和我正谈话的时候，金、林两博士进来了。

金博士的个子高大，相貌英俊，穿一身黑中山装。林博士矮而瘦小，穿一身红十字会蓝布制服。林博士摆动转椅，点着烟斗静听博尔塞克博士谈预防传染病的任务。这几个医生想培训防疫工作人员。林博士还着手筹办第一所战时紧急医疗训练学校。在这次集会上我听到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同林博士一样知己的另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这时担任前线军医院战地监察员、后任军政部医务署少将的卢致德博士。他正协助创办紧急医疗学校的筹备工作。就我所知，他是一个和气可亲的人物之一。曾在北平跟林博士学过医，又赴美国上陆军军医研究院，后在英国完成医学专业。他同林博士一样对那些伤兵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不生气。他们两人这种高尚品德使得我感到如同兄弟般可爱相亲。

在博尔塞克博士房子里开的这次会议，不但对我个人有着历史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也有历史的意义。这样的会议奠定了社会化医学在中国的基础。它不但包括适应战时要求，而且适应战后情况需要在内的庞大组织机构和教育制度。

自那以后，我开始同医学界各种人物往来，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社会化医学论战不已的争论中。中国医学界权威人士多年以来一直争论社会化医学的老问题。他们受到西洋传教士们的激烈反对，传教士们首先把近代医学介绍到中国来，教会医院成为基督教的传教中心和影响力很大的基地。社会化医学将使教会医院的影响力量消失。事实上中国在抗战前教育和医学多年的进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传教活动，海外许多基督教徒已经开始提出整个传教活动的前途问题。

战争对教会团体意外地证明是一种天赐良机。各国人民捐

献出大宗金钱和药品，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由当地外侨、教会长老、教会收容所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控制了捐款和医药物资。数以千计逃出日寇魔掌的难民寄身收容所里避难，基督教徒向他们进行说教。

林可胜博士、卢致德博士、金宝善博士以及许多中国新的医生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医生是民族解放的战场并非上帝的战场。他们憧憬着卫生保健看病医疗是每个人的权利的未来。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之所以成立了两年多得不到外国的医药物品和捐助基金，其基本原因我以为就在于此。

林博士本人经历过激烈的斗争，辛酸苦辣，艰苦备尝。以后若干年不难想像，我听到中国人对他的攻击，也听到外国人对他的指责。国际红十字会武汉委员会的一个传教士恶意地攻击他酒色财气、醉生梦死、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另一个传教士无中生有，造事生非说他贯于穿英国订做的礼服，伦敦浆洗的内衣。医疗队成为有影响力的团体后，急于想取代他的一个野心勃勃的红十字会医生，捏造罪名控告他和德国斯达公司秘密勾结，和暗藏在红十字会里的共产党分子密谋策划。说我利用医疗队为八路军谋取医药物资。

林博士的朋友们叫他“警察”，他们好像很喜欢他，所以这样称呼他。他讲一口稍带苏格兰腔的流利的英语。我从他那低沉柔和的语调里面听出一种警告刺耳的声音，好像他的性格并不温和。我几乎立即感到他身上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后来我发现同我往来的卢致德博士医生也具有这种气质。

一旦投入医疗界，唯有勉为其难，全力工作，但很快使我

感到伤兵在落后的军队医疗制度下，他们的命运悲惨，使人绝望。承蒙林、卢两位医生耐心地同我争论，百般解释并向我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使我终生感激，难以言谢。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很像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而中国伤兵的命运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描写的一八一二年战争中的俄国伤兵又很相似。不然，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富罗伦丝·南丁格尔出现的英国伤兵一样。并不是中国没有无数自我牺牲的医务工作人员或许多舍己为人的南丁格尔的缘故。

国民党中国伤兵的这个问题多少个夜晚使我苦恼，难以安眠，我要把事实真相报道出去，还是给中国士兵的英雄主义披上一道罗漫蒂克的面纱？有时候我自言自语：“劝君莫写真相，你要如实报道，美国、英国的上等人物的心灵里会大吃一惊，从此对救济事业不掏腰包捐款了。他们会掉头不顾宁可去看一场电影，消磨时间，爱情解决一切啊！”然后我又自问自答：

“想想伤兵吧，历史上向前进的国家和政府哪里有过！除非在舆论的愤怒谴责下才有所行动！如果你对国民党政府阿谀奉承，即使这个顽固政府处于国步方艰、危如累卵之际，也是同流合污冥顽不灵。说实话、报道真相、被驱逐出中国也在所不惜！不过要忠于那些不惜为国捐躯、献出生命而一无所有、毫无所得的英雄子弟兵！”

国民党军队伤兵的悲惨命运是由于贪污腐化剥削成性的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大资本家组成的半封建性的军事制度和统治阶级造成的。他们有些人飞黄腾达，执政掌权以前也是一些进步人士。他们既非下愚也不落后，但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玩弄一切手段，买田买地修建自己的庄园。现在日本人来

了把他们的财富囊括一空。他们有钱，要啥有啥，他们的子女在英美大学里念书，抗战发生后有些家族逃亡美国。

统治阶级对于现代化军队医疗制度是完全清楚的。国民党政府按军队编制人数每月给各军部队发给固定军饷。各部队用这笔军费采购伙食、服装，安排运输。用来采购医疗药品的钱每人仅一角钱而已。由于医药物品仪器设备从无统一标准，由于主要医官滥竽充数不够资格，由于所有西药必须从国外进口，因此医院主管盲目采购见到药品顺手就抓。战争打下去了，时日一久，药品很少或根本采购不到。药价腾贵。唯有普通老百姓、逃难的难民才可以得到外国医药的杯水援助，而士兵被日本用英美供给的军火杀伤却没有资格享受英美捐助的医药物品。这些皆是极不合理也不正常的医务界的咄咄怪事。

国民党陆军军医署里完全合格的医生人数不多，屈指可数，不过十来个。但不合格的军医官人数有两万人，军医护士助手的人数有十八万人。军医护士是那些在部队里身体太差不能打仗的士兵抽下来搞医务工作的。他们的医学知识不过是几周换衣服的训练，他们和许多军医官既不知道传染病的致病原因或预防方法，也没见过石膏、夹板或现代化消毒器械。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人在徐州北面的台儿庄受到第一次重大的打击，武汉市民走上街头庆祝台儿庄大捷。这以前，中国被打翻在地，这一仗，虽说小胜，但鼓舞起全国抗战必胜的信心。我遇到从前线归来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他们畅谈在这一仗以前被当作封建落后的华北军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表现出毫不怕死的大无畏的爱国英雄主义气概。

我在这时候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身份是宣传工作者。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刚刚安排了我的工作。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特约通讯员，每周给他们邮寄两篇文章，我担任这一工作直到我于一九四一年离开中国为止。他们付给我的报酬足够我在医疗队生活不领薪金，甚至还可以作出捐献。在我的第一批文章里，我谈到伤兵的情况，没完没了的陆军医疗工作和红十字会医疗队问题。我还向世界性组织团体写报告呼吁救护车、汽油、医疗器械和医药物品。

医疗队在长沙仅存两百加仑汽油终于无钱买汽油了。美孚油公司有一批存油急于在日机轰炸长沙前抛售，这时苏格兰红十字会给林博士电汇了七百五十英镑。他盯着汇票发呆，他要是感情激动的人早就哭了。但他核算该买多少汽油，我赶到煤油公司办理交易事务，公司职员节外生枝地找麻烦，提到我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英美资本家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人是自掘坟墓的一篇文章。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道：“谁付钱就卖给谁，我们错在哪里？我们不是也卖给你们吗？为什么卖给日本人就不行？”

我跟他辩论，红十字会医疗队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不能等量齐观，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任何国家如果听任买卖决定它的外交政策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引了田中奏折的话，劝他读一读，语气温和地告诉他：“那就是嘛，你要是能读的话。”

一九三八年六月徐州陷落，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穿过华中各地，在武汉三镇四面高山峻岭中占据新的阵地。日寇乘胜紧追，在战场上疯狂屠杀伤兵俘虏，奸淫烧杀，洗劫城镇乡村。国民党炸开河堤，黄河决口，洪水泛滥，阻挡日军的进攻，

淹毙了日寇几万人马。日本人提出中国人野蛮的叫嚣，国民党官方宣传人士指责日寇决堤。我认为炸堤抗敌愚不可及。这使我想起了掘堤抗战骄傲自负的荷兰人有过此举。“与其把荷兰送给老西（班牙人）不如把荷兰送给大海！”同样，“与其把中国送给日寇，毋宁把中国送给黄河！”予及汝偕亡，敌忾同仇，并不明智。

武汉四周的大山成为保卫华中的最后天然屏障，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一道长城屹立在丛山峻岭中间。但这道长城毕竟是血肉之躯，阻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日寇正在猛烈发动进攻，溯江而上炮打南昌门户。如果占领南昌，不但威胁武汉，而且危及长沙。

我们红十字会医疗队几个分队在战争最激烈的前线医院里随军转移积极工作，但始终没有足够支持他们一两个月的经费。林博士请我帮忙劝说有钱的中国的富人出钱资助一两个医疗队至少维持一年的经费。宋子文“圈定了”十一个医疗队由他负责提供经费。海外华侨也给另十一个医疗队提供捐款。其他医疗队的经费我劝请美国红十字会出面承担，但希望落空。我请在汉口的史迪威上校视察长沙卫生学校战时急救班，并帮助我为该校筹募基金。他考查第一期急救班的几百名男女学生，随后他和伊文思·卡尔逊劝请汉口美国总领事捐款六千元，同时我继续为医疗队工作。红十字会医疗队战地分队的队长们按月送上报告，有些报告枯燥乏味但报道真实，有些报告废话连篇但可以编成历史剧本。医疗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整整一星期打扫垃圾，准备草垫，建立护理卫生制度，修建手术室和手术台，给病人规定特别饮食和洗澡制度，使伤兵们感到惊

讶莫名。不到一个星期，能够走动的伤兵个个都找医生看病，无不低声下气表示感谢。对医疗队扔砖头恶语伤人的事再也没有了。医疗队下一步工作是对医院里没有受过医务训练的人员举办训练班，那些人员同伤兵一样表示感谢。办了十天，附近一个市镇受到严重空袭破坏，医疗队一半队员去抢救受难者。医院附近有一个大难民收容所，几乎每个晚上妇女都来请医生护士。医疗队把收容所的医务工作也接过来了。这个医疗队留在前线工作两年，没有回后方休息过一次。

从汉口至长沙一路上千千万万的病人和伤兵挤塞道途，我来回奔走于武（汉）长（沙）之间。到前方的每一条道路上，抬担架的人员，步行的伤兵和病人的行列看不到尽头，有的爬伏在树丛里等死。疟疾消灭了大部分军队，卢致德医生上前线时总是把尽力搜集到的全部奎宁丸装在车子里，部队停下来时给每人一打药片。有的团里士兵在进攻期间打摆子发冷发热，挣扎起来又拼命杀敌。有的电话员接线“摇机”时病倒，致使电话线发生故障。

我天天看到从泥土污染的红十字会救护车上卸下乱七八糟的载货，听司机们讲敌机沿路扫射轰炸红十字会车辆的情况。弄到后来，不得不把顶篷上的红十字标记用泥抹掉，没有一个伤兵愿意乘车。一天，我在长沙见到一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匆匆赶来的中国女医生，她在前线带领一个小分队的医生、护士工作。两星期内她们的三个医院被炸光，全部药品毁坏无遗。她目睹前面一辆红十字会汽车被机枪扫射坏在路上，甚至还看见敌机坐舱里龇牙咧嘴露齿狂笑的飞行员面孔。这位女医生天黑时带着更多的医药供应物资重返前线去了。

又有一天我见到一个中国青年医生把车子开进来了，他来自西印度群岛特林立达岛，只会讲英语。我们叫他“艾伢仔”。他对林博士说：“头儿，你看士兵们对我们干的好事！”

他拿出在前线拍的一张照片诉说。好几百站着躺着的伤兵拦路包围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救护车满载药品。轻伤号爬到车上，有的挤进驾驶室。司机站在人前，举起双手，失望地哀求着，这是一个很平常并不特殊的场面。伤兵卧道拦乘汽车怕掉在后面是常事了。

“那些家伙！可怜，可怜！”林博士边听边说。

“头儿！”艾伢仔请求道：“我真累死了！我在前线作手术整一千次了，我该休息一下了吧？”

“我知道，小伙子。”林博士回答道：“但你年纪轻，身强力壮。战士是不能下火线不打仗的，回前线去吧，我尽可能让你休息一下。”“好，头儿”。艾伢仔重返前线去了。

卢致德医生这时正忙于建立从前线到后方各条道路上的中途接待站。他设计每三十里盖一座竹棚茅舍作为火线下来的病号伤兵食宿换药接待站，每站找几个青年负责。他的计划还包括难民在内，难民们身受营养不良的痛苦，他们会成为未来的抗敌战士。我一听到这个计划马上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去找战地工作者刘良模。刘君听了后同我到红十字会总部。一星期后刘和一些基督教男女青年分赴前线沿途各接待站开始工作。

我给刘良模提供了从美国运来的多少包、箱的洋李脯和葡萄干。这些东西在路上走了九个月，半数腐烂发霉了。基督教青年会屋顶平台上晒满了洋李脯。我自己动手开了几箱把烂果子拣掉。红十字会总部里有三台简易除虱机，我想把那些果脯

放在里面烘干，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一个青年医生跑过来大发雷霆喊道：“我们的三台除虱机都坏了！盘格子沾满了什么东西不通气了！”

“是我为卢医生的接待站烘果脯用了的”我解释了我的想法。

“你在消除虱子！”

“是的先生！”我有气无力地答。

不过当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乘车赶到前线去的时候。他们的红十字会汽车上装满了烘干了的慰劳伤病员吃的果脯箱子。车厢两面贴有鲜明耀眼的彩旗上面写着：“美国赠给民族英雄的礼品。”

长沙成了一个大后方医院，伤兵躺在各种临时搭成的收容站里。千千万万的人得不到治疗只受到最简单的护理，红十字会三个医疗队都上了前线，大小车辆船只把成千上万涌入市内的伤兵撤出到长沙。武汉三镇在失守以前几周内就撤出了四千名伤兵。

红十字会医疗队在仲夏炎热时节得到了一位自告奋勇举足轻重的志愿军国际友人。她就是香港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希尔达·司徒永觉夫人。她坐飞机到汉口，后来我们通信往来，成为生死之交。她红发碧眼，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丈夫在香港的地位给了她声望和权威，并且在英国工人运动中获得惊人的组织能力。她运用她一切才干和影响，作出铁一般的决策，在中国医院里产生一种令人生畏但无敌对性的吸引力。

她飞回香港后，成立了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她是这个外国人组织的秘书，同时又是“保卫中国同盟”的秘书。她建立起

国际援助网，组织起通过敌人封锁线转运医药救济物资的庞杂机构。她把香港中国难民站改成红十字会活动中心，妇女姑娘们在收容站卷绷带、缝被单和手术围裙。她在香港危急以前一直坚持工作。她在日寇进攻香港期间，同医务工作者为保卫香港而战到最后。

当武汉的命运已定时，林博士接受我提出的红十字会医疗队撤出汉口并招募青年培训入队的建议。他委托我负责这项工作。在中国，凡事开头难，问题成堆。这个工作也不例外。这时我提出了一个报告，里面谈到我向美国总领事提交的美国红十字会援华六点纲领。第一点要求委任美国红十字会驻华监督美国援助的负责官员。另一点要求美国红十字会供应救护车辆和汽油，并资助中国红十字会十七个前线流动医疗队。我的报告结尾说：“美国总领事认为六点建议很好，根据他的建议，我将一份副本寄送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总会，一份寄给新的美国援华医务总署。美国记者一致赞同此计划。”

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终于来信答复了我的六点建议，信尾说：“你为了伤兵申请救济，不辞劳苦多方奔走所提出的材料非常生动，也很感人，当然我们也衷心同情。但美国理事会所管理的基金正如你在附函中指出系为平民救济的专用款项……”。

扬子江的波涛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武汉变成了斗争激烈残酷对比的城市。爱国者利用一切资源，千方百计为保卫祖国尽献力量。而卖国贼则花天酒地荒淫无耻坐待筹组汉奸傀儡政府为敌人效劳。德国军事顾问在日本人要求下被希特勒下令

召回了。各国驻华使节用鹰一般的眼睛盯着苏联顾问是否取代德国顾问留下的空缺。人人争相猜疑打听别人的情况。一批替日本人工作的白俄被逮捕，又许可他们离开武汉前往香港。意大利领事同日本人有无线电通讯往来是尽人皆知的。装成超级新闻记者的德国盖世太保头子定期从上海来出席新闻工作会议走访国民党官员。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她的追随者正在收容几千名战区逃难来的战时孤儿。一天我去战时孤儿院，正赶上一些刚下火车、衣服破烂、虱子满身面黄肌瘦的孩子送来这里。十几个妇女忙着替孩子们剃头、洗澡，换上蓝纹布衣服集合吃饭。之后，那些小人儿排成长长的队伍走过街头等候把他们转送到华西去的民船。

各工厂奉命西迁到后方去，正在拆卸启运机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同中国工程师同事们一起利用撤退工人，着手建立中国工业合作社。

空袭警报对我说来不但使我怕得发抖，而且也使我感到精神颤栗。每个白天和有月亮的晚上我们总是听到那海妖般的令人恐怖的呜呜警报声，接着是千万人的脚步朝两个外国租界沙沙地奔跑声。外国银行、旅社、商人住宅关门闭户，不许中国人进屋避难，怕弄脏地板，怕丢东西。外国洋行几处大栈成了防空避难场所，人山人海挤得满满的。另外，成千上万的市民、男女儿童躲在岩墙下或堤岸下跑警报。我住在法租界一家外国小旅社，墙壁很厚，墙内有花园。旅社老板紧关铁门，对怀抱婴儿的中国母亲们的哀求毫无恻隐之心，充耳不闻。即使拉着老爷太太的人力车夫也不准进入旅社的大门，他和他怀抱

婴儿的妻子藏身在可怜的包车下直打哆嗦。

我在汉口街上总被人注意，跟踪盯梢，发现后面尾巴，我就赶快回到租界，或走进那家银行找个藏身处。银行里的人给我开门不让特务进去。每一次空袭过后，汉口街上粉身碎骨不幸死难者的尸体挤塞道途。我有时去武汉铁路医院工作，那儿地上躺着好几百伤口流血奄奄垂死的受难者。我发现自己的心肠变硬了，专拣轻微受伤、志气旺盛、很快能够恢复的士兵和工人进行治疗。

目光森森，队伍长长的士兵行列，一队一队走过命运已定的武汉街巷。他们向西北两面的山里进军，那边的城镇乡村均已化为一片焦土。骨肉流离，哀鸿遍野，死尸载道，白骨塞途。沿江大道天天有靠岸的船只，船上躺着的伤残士兵，血迹斑斑。屎尿臭味熏天，无人护理。一队队步行的伤兵慢慢地痛苦地沿街摸路去找指定的医院。他们走了一两条街，坐在石板道上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向前走。从电影院蜂涌而出的群众，难得有几人看那些东歪西倒的伤兵。每天我注视着那些看戏的观众，没有一个停下来伸手援助的。我经常叫一些人力车把伤兵送到陆军医务局局长的办公处，老少将在答复我的抗议时摊开双手回答道：“我没有权，我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干不了屁事！蒋委员长要是开军事法庭审讯枪毙我倒求之不得！至于现在拳打脚踢的滋味可受尽了！唯一的安慰是，我被我的同胞而不是被日本鬼子拳脚交加痛打个死！”

我尽我的本分作过种种尝试，劝请国际医务工作者志愿到中国同中国医务工作者同工同酬一道工作。抗战开始时，毛泽东和我向美国人民发出请派遣外科医生到八路军来的呼吁书。

我离开西北战场前，朱德和我写信给印度国大党请派合格的医生来华到各抗日军队里工作的邀请信。

美国来了一个医务小组，包括知名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内的三名医务工作人员。有一名医生成天喝酒沉湎于醉乡，我们只好劝他回国。白求恩大夫和教会志愿医务战士里查德·布朗大夫两人去五台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白求恩打算返美以前因败血病不幸逝世。

武汉失守前，印度首批援华医疗队五名外科医生都是印度国大党党员，于夏末抵汉，并加入了红十字会医疗队。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邀请他们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工作。总领事解说，如此这般他们即可长远保持一切所需的供应物资，并可在设备齐全的教会里工作。并进一步劝说，他们如当了日本人的俘虏不会同中国医生一样丧命，因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就此和日本人已达成协议。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对这些论点的回答是：“你说这一套充分证明了我们同中国人的使命相同。”五位印籍医生在汉口陆军医院工作了一段时期，即随红十字会医疗队西撤。在重庆，他们见到并且同蒋委员长夫妇及其他国民党党国要人见面谈话后即动身到八路军那里去了，有两位印度医生仍在华北的游击部队里坚持战地医疗工作。

基本上，贾华哈尔拉·尼赫鲁对印度援华医疗队是负了主要责任的。他组织印度国大党第一批援华医疗队时，数以百计的男女医生护士志愿登记到中国工作。国大党用足够的经费资助，装备供应首批志愿援华队五名医生，并且发起“中国周”号召全印度抵制日货。

由于我对印度援华医疗队这个小组负责，并向国大党经常

报告中国抗战的进展和需要，因此对于印度医生和各国医生中间存在的尖锐分歧我比较清楚。他们受过科学的训练，政治上头脑也清醒。他们来到中国不但为伤兵服务，而且要学游击战术，以便有朝一日不得不拿来在印度运用。他们不但是印度的爱国主义者，而且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者的倾向，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进步人士。他们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无不怀疑，时刻警告中国同事们说，英国人随时会翻脸出卖朋友。

这些印度医生和其他各国医生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对陆军医院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不满意，感到厌烦。他们在印度医学院校受过教育，遇到问题需要什么都能解决，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过惯了佣人杂役为他们奔走的舒服生活，但是他们很快接受了中国原始生活的工作条件，除了两位年纪大的医生工作两年后返回印度外，其他三位年轻医生埋头工作，以全付精力投入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二十三、武汉失守

在武汉那些日子里，死亡和贫困白天、晚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身边，人们不是死于想不到的疾病，就是死于意外飞来的横祸，而贫困无不横加到难以度日的程度，以致生命本身有时象疾病一样朝不保夕。军队的高度爱国主义气概笼罩着这个死亡呻吟的城市上空，与最高当局的叛变妥协的卖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英国大使在长江下游的上海对日本人说过，只有中国社会的残渣余孽才能帮助日本建立起中央傀儡政府。日本人冷冷地回答说，他们正在同国民党中央政府最高当局某些

大员谈判磋商，并且提到了汪精卫的名字。

从这种生死斗争一片混乱的局面中出现了前所未闻的极不平常的友谊，在人们的心中萌芽成长。我们作为中国友人的一些外国记者，以及具有同感的领事馆武官，加上少数中国朋友，互相接近，互相探讨，彼此追求全人类最好生活方式的心灵和意志。我们所有的旧价值观念似乎消失了，我们不注意物质的东西。谁也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们像身在大风暴的海洋里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旅客，终于发现了彼此的人性，毋须了解的“不言而喻”的友爱，使大家紧紧相连在一起。战争的紧张气氛与诗歌的吟诵逸致在我们中间如花盛开，神奇的光照射在我们的团结友谊上。

我们这个小团体的成员经常碰头，随时分手，来往前线，互通情报。每次聚会，欢庆重逢。不分白天晚上，大家忙于工作。经常在跑空袭警报疏散过后，在见到漫无止境的伤兵穿过市面过后，我头痛的再也支持不住时，就上朋友们那儿去寻求慰藉。我们三两个人站在另一个朋友的窗子下拍手击掌，一个睡眼惺松的头探出窗外问：“怎么了？请上来！”我们喊：“快下来聊聊吧！”我们的朋友便披着睡衣下来同我们坐在院子里海阔天空谈起一些异常的动向。

外国的妇女、儿童和中国大官僚的太太、小姐、少爷以及有钱富豪都从武汉撤走了。一个打扮整齐、戴着帽子的美国妇女偶然路过来到这儿，写妇女未来的文章。这位美国妇女在这一段毫无进步的表示，真使人惊奇。有少数严肃认真的外国作家飞来飞去搜集创作资料，维尔朗·巴特莱和埃德加·莫雷尔从英国来。约翰和法兰西斯·根室从东南亚来，埃德加·

斯诺从菲律宾来。一个过去为西班牙工作的英国妇女下飞机的时候，机场上不见欢迎她的群众场面，甚感愤慨；她坚持要预定好紧急飞机座位，以便一旦接到通知即离开汉口。她对我说明理由，在于她是一个要人，死在中国太不值得。这以前和以后，有各种形形色色的新闻界、摄影界的流氓骗子来到武汉，利用中国抗战来抬高他们个人的声望。他们精力充沛、头脑混帐，可以说同那些为了发战争财给日本人提供战争物资的钢铁煤油大王一样，缺少基本的道德和社会进步观念。

在武汉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尽人皆知德国记者不但和德国的盖世太保法西斯分子互相勾结，而且和日本人互通情报。意大利新任驻华大使在武汉、重庆公开露面没有麻烦，并且在日本、在“满洲国”同日本人、伪满政府傀儡人员亲密往来消磨时间，外强中干，颓废堕落。愤世嫉俗的法国人与世隔绝，他们在越南的残暴腐败行政制度已成为远东惊人的话柄。英国颓废派的代表，我知道有一个炮舰巡逻号的军官便是一个。他以画水彩画而非常自豪，三句话不离性生活，总在醉乡，喝酒不省人事。他有一回跟我谈过他在英国昂贵的公学穿着天鹅绒小制服，蓄着金色的长头发，过着花天酒地寻花问柳的荒唐生活。出了校门就走上海军工作岗位，毫不费力地担任指挥职务。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一生没有经历艰险，没有打过一次仗。我问他长在酒乡有过苦恼没有？他一再坚持说他发现人生是愉快的。日本人攻占中国某大城市时，他并不抵抗，以最好的学生派头笑眯眯地把英国租借地奉让于日本人。汉口的外国人诱劝过许多中国人和少数外侨出钱保卫“隔离日侨”的前英租界的大栅门。英租界被日寇接管

后，蒋委员长的主要侍卫官前纳粹分子史汀尼斯上校对我高喊：“大英帝国完蛋了！”

传教士们有他们自己的信仰虔诚的小圈子。外国记者们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寄居在路德会宾馆，虽然这个宾馆说我不大正经拒绝给我租用一间房间，但我总是由于参与他们的医疗救济工作的缘故免不了和他们亲密共事，友好相处。年青的传教士比较开明进步，不满他们的说教，有些人常和他们的长老发生矛盾。这些年青教士对中国同情关心，并不把中国仅仅看作是“要改变信仰的异教徒国家”。我自信在任何地方，任何行道，从来没有见过比某些年老的外国教传士更顽固透顶执迷不悟的人。他们大多数拥护蒋委员长夫妇，理由无他，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通过蒋某可以使全中国老百姓皈依耶稣教。每个乡村一个教堂，中外牧师所有家属人人宣道，思想统一，定于一尊，不见一个无神论者！我听到一个严肃考虑问题的外国记者称呼一个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传教士是中国的拉斯普丁神父^①。

中国外国的基督教徒对赛珍珠的态度是饶有兴趣令人啼笑皆非的。她在中外传教士们的眼里之所以成名，不但在于她以有关中国的小说，而且因为她同教会脱离了关系，抛弃了丈夫二次又嫁了人。传教士们斜眼看待赛珍珠，正如党派团体对待脱党的党员，他们冷嘲热讽赛珍珠堕落了。赛珍珠虽然道德没有败坏，他们就蠢蠢然诽谤怒形于色。

许多中国传教士不喜欢赛珍珠的小说，因为她并不常把她

^① 拉斯普丁（1872—1916）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宠信的一贯道首，俄罗斯帝国死亡时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反动僧侣。——译注

书中的人物用最好的服装打扮起来，一位国民党上校有一次对我的一位友人宣称赛珍珠完蛋了！因为她写了一篇谈八路军的文章，说八路军是“争取中国民主的大炮”。他宣称赛珍珠是七出之妻，覆水难收，在中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孤立了，真是无聊！恶意的人们对赛珍珠极力散布这一类流言蜚语。

正如月亮把黑夜变成白天便于日本飞机轰炸睡梦中的人们，正如汪精卫正准备同日益逼近的敌人进行和平谈判，扬子江的波涛席卷风流人物也泛起卖国贼的沉渣。大江巨浪汹涌滔天，敌人的铁甲车军舰正向武汉乘风破浪前进，为他们的陆军部队先行开路。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九月底发布撤离武汉的命令。十月中旬我和林可胜博士还有红十字会的一个女医生离开了汉口。我们五个人挤住在长沙林博士的小屋里。武汉失守后轮到保卫长沙了。

国民党军队于最后一批卡车离开武昌后便开始炸毁破坏通往长沙城的公路桥梁。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撤出长沙时，他们在旧日租界的所有房屋建筑物里燃放炸药。长沙大火，全市恐慌，愤怒。国民党人还计划把市区各处日本人所有的房屋烧光，但是其他各国的外侨出面搜查信管，切断了引线，决心保护他们的财产，才免全市化为一片焦土。外国人之所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因为中国毕竟不是他们的祖国。

我们每天晚上从长沙红十字会总会回到住处，准时收听香港电台广播的新闻。十月中旬广州沦陷，没有任何抵抗，这对中国人民像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十月二十五日晚上，我们

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到播音员的声音在说：“汉口于今日落入日本手里，日本军舰停泊江中。第一批日本海军军官上岸时，等候在江汉大道的意大利总领事上前握手祝贺日军的胜利。日军进城时，白俄和舞妓在跑马厅大道跳舞赠烟慰劳。日本士兵开始把中国人一群一群地驱到江岸，用刺刀枪托逼人下河，对反抗者当场枪杀……”

广播员继续播讲下去，声音逐渐消失。林博士贴近收音机，背向着我，木然不动。卢致德医生站在窗口，犹如化石望着暗空。蒋吉恩女医生和贺东女医生坐在我的左右两边，紧紧盯住收音机，双眼凸出。一阵沉默我好像听到了大地的隆隆声。

“现在如何得了？”贺东悲伤地问。

“我们要继续抗战，我们的长城军队并没有垮。”林博士挺起腰杆并不转身回答道。

我们周围又是一阵沉默。夜色深沉中我依稀有大难临头之感。还没有开腔，呜呜鸣的警报器响了，使我感到心烦意乱。灯火熄了，一团漆黑，震惊全城开往市郊的火车、汽车的隆隆声不绝于耳。我们都走到晒台上，倚栏而立，向震响声发出的方向望去。日机在上空盘旋，像在搜索什么目标。

“它们发现不了什么。”林博士悄悄地说。

又一会机声越来越近，终于消失。我们回到室内躺下一直谈到天亮，然后起身继续工作。

二十四、继续抗战

新四军的救护车上连我一共坐了八个人，正在路上飞驰，

猛然一个刹车，就地不动。我们赶快跳车朝山里跑去躲飞机。这时东方的灰色天空里出现的黑点子嗡嗡声越来越大，成为雷鸣般的怪物。敌人的飞行员徐徐低飞，像有意捉弄我们似的，嘲笑我们的软弱无能。

我在中国多少战壕里，曾经向日本帝国的天神和美国帝国的财神磕过头！说不完的空袭并没有教我更能勇敢些。每一下凄厉长鸣的警笛声，每一下敲打的铜锣声、撞击的钟声、紧急的号声，无不使我的心房紧缩惴惴其栗。

又是敌机的骚扰，这回它们向长沙方向飞去。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我首途到敌人的后方长江下游一带去。广州、武汉失守后敌人的战线拉得很长。主要交通线一带的兵力单薄，两翼和后方的广大地区仍在中国人手里。

我劝请林博士把医务工作人员和医药物品送到敌后去。但他说我们还不摸底，既不知道敌后的情况，也不知道医疗队是否能发挥作用，药品能否供应得上。因此请我作好安排把《曼彻斯特卫报》同红十字会的工作结合起来，到敌人的后方去进行调查，随时给他们寄送报道。

我们向东走的这条公路位于一个非常活跃的战区里。穿黄咔叽军服的师团士兵向南昌疾走，成群结队的伤兵从长沙南岸战场下来转移到后方去。每个城镇、乡村进口处都有警卫站岗放哨。

头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子里的路边上的一个小客栈里过夜。蚊子、臭虫彻夜扰人不能睡觉，天一亮我就起床走到外面发现路边有三十多个伤兵不是坐就是躺在大路边。他们是才从两面纵深五十到一百里的一块荒无人烟的地方顺长江而来

的。军队正在破坏大小交通道路，以免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通行。那边还在激战，伤兵起码经过两个星期才通过那块无人之地。

那些伤兵又累又瘦，伤口感染化了脓，军服破旧，日晒雨淋褪成了灰白色。有的光着脚，他们的手臂、胳膊和腿脚绑着血迹紫斑肮脏黑黄的绷带有好多天没有更换了。他们没有住进医院也就无处领到十元津贴。身上有钱的人不多，几个兵能买点红薯山芋充饥，有的拄着拐杖蹒跚步行带着瓷杯给体弱的战友端送开水。

我从我们的救护车上拖出消毒衣服和一箱药品。救护车和汽车所载医药物品是我为长江下游敌后主要游击队新四军收集起来的。这些药物是红十字会和人民的捐献，还有我用自己钱买的大捆洗脸毛巾、绷带纱包、防护手套、肥皂和奎宁丸。在我的秘书帮助下我在路边设起包扎站对三十多个伤兵进行护理。

汽车发生故障，在路边一家茅屋前停下，我们等候司机修理。老百姓照例围上来讨奎宁。疟疾给每个人造成灾难痛苦。一个老人走来看我们救护车的大红十字和美国麻塞诸塞州波士顿华人洗衣工会字样，他低声下气地说：“我的女儿病倒了，给我点药行吗？”

我拿起药包走进茅屋。有两间小而阴暗的房间，光线从房门射入，每间房子里各有一块木板支架起来的床，一间里面有一张白木头方桌，两条长凳，灶屋里一口灶，大小锅壶，墙角边有犁锄齿耙简单农具。

女孩儿躺在里面一间床上的旧棉被里，我给女孩吃过药并

把奎宁服法教给她妈后，老年夫妇给我和秘书送上一碟子花生，一碗热水。老大娘头上包着一块印花布缠成的女式帽沿形式，脚上穿苧麻草鞋，江西农民跟四川、云南的农民一样，即使在贫苦人家也还保存着民间固有的手工行业。我回想起八路军战士们编打的漂亮的草鞋，这家的孩子们可能有在八路军里当兵的吧！我想。

从洞开的门望去，山头上有许多守卫城镇的营房和碉堡。那些营房碉堡是国民党政府主要军事顾问德国施各特将军设计的十年内战害怕农民革命战争的遗迹，抵抗外来入侵的日寇碉堡政策完全无用，若被敌人占领则可以用来对付劣势装备的中国军队。

最后，我问年老的夫妇他们有儿子没有？

“四个儿子。两个参军打鬼子”。老人指着长江那边。

“还有两个儿子呢？”我问。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老人犹豫一阵后答道。

我喝着白开水，思想这一农家的儿子都被抽光当兵打仗，穷人的孩子们拯救中国，抗战胜利后富人又会返乡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吗？

南昌兵荒马乱空气紧张，象一支引而正发朝着敌人射出的箭。广东军队几个月来在赣西北的德安与日寇激战。满载军火的汽车昼夜赶赴前方，救护人员络绎途道抬回伤兵，南昌九个收容所一周内涌进九千名伤兵。挑选出来的重伤号转移到市立医院或后方陆军医院里去了。

我们到南昌的晚上，市内张灯结采。士兵整队游行，庆祝

刚到南昌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的寿辰。日本特务的爪牙潜伏各地，我们正赶上狂轰滥炸的时机。我们在南昌住了两天两夜，市内落了许多炸弹，破坏不大。我们每回跑警报躲在院内很不坚固的防空壕里，捡到炸弹的弹片和碎片。

到南昌的晚上，我们从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住处，事先没有打招呼就走进街那边的最大一所伤兵收容所里。本意在于看看司空见惯极其落后的收容场所的，无意发现一种新的精神正姗姗来临，四层楼房的厅房里洁净无尘，墙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标语和剪报。一壁悬挂大幅红布，上写“我们万众一心”几个大字。里面收留了八百名伤兵，有单人床、草垫、枕头、床单、棉被、蚊帐。男护士来回在通道走动担任护理。我们在无人陪伴下听到了胡琴声，于是向那里走去。一间大病房里一个男人拉着二胡，两个穿得寒酸的妇女正在清唱，如茶楼酒馆卖唱糊口常见的江湖艺人。一个妇女翻着白眼唱着老调，走近一看，她是一个盲人，伤兵只顾倾听歌声，全神贯注，凝望出神，我们走进室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又信步踱进一间轻病号房间，有的坐在床头上，有的来回走着，和穿制服的学生们正高谈阔论，欢乐取笑。一个学生主动向我们介绍，他们这个小组是江西省战地服务团的一部分，在医院里工作。快半夜时分，收容所所长发现了我们一行，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并且谈起收容伤兵的工作。谈话中间，前线送的一批伤兵来了，战地工作团的团员们像欢迎英雄凯旋归来，欢迎伤兵，给新来的每人一个慰劳袋，里面有毛巾、肥皂、苹果、香烟，跟伤兵谈话，帮他们写家书。

第二天又遇到一次吓人的空袭，过后，我走过硝烟滚滚的街

巷，前往红十字会医疗队工作的一〇九战地医院。过去这里是一所学校的宿舍，校门上画了一幅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长画，下面写着：踏着烈士的血迹，为死难同胞复仇！我早就知道中国人是专心致力于在这类口号上下功夫的。

医院的组织机构如同收容所，战地工作团的人们在里面工作。年轻的负责人刘医生介绍了两位志愿医务工作者母女两人，女儿十八岁，都是虔诚信教的基督徒。她们帮忙买菜指导作饭。开饭时间她们到每间病房在床前和蔼地询问伤员对饭菜可口满意不？仁慈温暖的气氛洋溢着整个医院。

刘医生告诉我：空袭警报响了。红十字会外科手术队在动大手术。炸弹在头顶下落，他们不为所动。我们穿好白工作服戴上白帽后进入手术室。一个伤兵躺在手术台上，一个美国医生坐在床头边在打麻药，一个瘦弱的外科中国女医生弯腰倚靠病人在切腿，她和她的助手们目不转睛一直低着头把手术作完。等她摘下口罩，我才看出她就是香港来的志愿援华医疗队麻队长。阿锡兰医生是医疗队唯一美国的志愿医生。埋头工作，毫不张扬，来华三月，马上上前线到这里。医生护士们赶紧作下一次手术的准备。担架抬进了一个年轻兵士。我弯腰看他的口角正冒出鲜血，两眼露出将死的神色瞧着我的眼睛。

离开医院，在大门口想跟刘医生谈谈个人在医院所见的感想，欲说又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伸出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他那用无声的工作代替无声的语言的无限关心的手。

我们一行于两天以后又向东疾走。汽车救护车的车轮滚滚越来越接近烽火连天战事频繁的长江战区。公路上只见增援部

队上来了，疲乏不堪的队伍下来了，人流没有止境。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千多年来以瓷器驰名中外的景德镇住宿。战场就在山北那一面，化装成僧道、叫化、难民、商人的日本特务潜伏在四乡。因而景德镇夜间施行戒严。

到景德镇最使我关心的是，住在设备简陋的市医院里的伤兵，而后是劳动和社会状况以及留在镇内的瓷器工人。看来他们对瓷器工业的封建性质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说七八岁的孩子给陶器师傅当学徒，师傅供给住宿膳食，老板付给学徒工资每月一元，师傅从中扣除两角作为“教艺钱”。学徒实际收入八角钱维持一切需要。

一个陶工师傅带十到十五个徒弟，徒弟在家里赎得自由或成为工师以前始终是一个人身受束缚的“徒工”。许多孩子当了十多年的“徒工”，二十多岁了也学到了手艺但仍未获得自由。每天能塑两百多件陶器，他们的成品由工师卖给老板。

徒弟虽说是师傅收入的来源，师傅并没有积累财富。年景好时一个陶工年收入八百元，抗战年月每年仅收入二十元。发财致富的是窑主老板。窑老板说瓷器是当地最有收入的投资。有一个从北方来的朋友来时本钱仅有两千元，两年后他就能净得利润二十万元。

如果学徒有家，积累了一笔钱或借到高利贷主一笔款送给工师作为出师钱，摆一桌酒席宴请师傅，出师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自由了的学徒每月工资最多收入为十二元，但一般不过六元。

我访问过不少瓷窑老板，烧成的瓷器琳琅满目摆在大瓷器店里，至于学徒们的健康状况，他们说几乎所有学徒都身染肺

结核、肠胃病、疟疾等等疾病。还说他们无钱买药。叫出了一个十岁年龄的孩子由于疟疾病脸色苍白，有病在身，师傅给他吃住似乎心肠厚道得很！

我们走过瓷器车间的时候，多少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十年内战初期，中国工农红军解放过景德镇，记得当时上海的报纸曾经大声叫喊共产党把景德镇的瓷器工业砸光了。后来我遇到一位红军司令员，他是景德镇的瓷器工人出身，做过瓷器，他告诉我，红军队伍里有许多瓷业工人，瓷窑没有破坏，完整如故，许可老板照旧办窑，唯加了许多限制。学徒年限缩短了，学习期间学徒和师傅双方从老板那里取得合理工资，老板和瓷工联合经营管理瓷器工业，技术指导进行技术改革。破坏的封建制度而今又复旧了。

红军解放景德镇前后，瓷工和他们的家里的阴暗不大卫生的堂屋中央都有祖宗神牌。神座墙上画有一幅表示红军精神的图画。学徒们朝神牌图画烧香磕头。

景德镇如果落入日寇手里，封建复旧不消说，更悲惨可怕的命运难以想像。这儿有宝贵的文化遗产令人探索，这儿保存了古代中国艺术设计图样形式，风格优雅。这儿有着从自然吸取彩色的丰富绚丽奇异多姿的民间工艺。

我们离开景德镇向东疾走。农历九月，序属三秋，山峦起伏，秋色迷人，潭水寒彻，瀑布飞珠，白云悠悠，清风习习。近晚，我们进入中国有名的红茶之乡的祁门镇。

第六篇 在游击区

(1938—1939)

二十五、新天地

一九三九年^①十一月九日，我进入长江下游南岸一带的游击区边区。我们一行二十多个人，有上海来的学生、印刷工人，还有武汉来的画家和学生。坐着竹筏子，顺小河到长江边，两岸群山笼罩在弥漫的晨雾里，蛟龙起舞若隐若现。远处有青绿翠竹在随风点头，苍松红枫，临洞凭吊，水镜鉴影，迎风叹息。

同混沌初开的天地景物一样，江山如画。太阳步步上升，云雾渐渐消散。秋高气爽，水秀山清，河上现出一片金黄，山水欢笑的秋香秋色。茶园里一行一行的茶树过去了；捕鱼网上露珠儿闪光，背后隐约现出一个个小小的村落。一所小学的房子过去了，学校

^① 从上章作者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从长沙动身经南昌、祁门到太平……”来看应为一九三八年。——译注

门口的粉色墙壁上写着“打倒死教育！活教育万岁”的标语。竹筏上的人们一下子欢腾了起来。

护送我们的新四军游击队小分队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喜洋洋地走着。时而大喊过河，从左岸涉水过到右岸；时而朝坐在竹筏前面持枪的战士打招呼：“加油！加油！”他们一口福建话，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听懂。我问坐在我身后的一个人他们唱什么歌？他说是游击队员之歌。他们都是“哪怕山高水又深”的飞行军。他们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自有那敌人给我们造”。这支歌唱完，他们接着又唱起了《青年进行曲》，把中国比作一只风雨飘摇、舱中漏水的破舟，救国的责任落在中国青年的肩上。咳嗨！咳嗨！的歌声响震山谷。

竹筏上的学生纵情歌唱、欢笑。他们是青年学生，青春似火，热情奔放。有几个极左，比革命的更要革命。他们的欢乐使我感到，一事无成人在老，壮怀要问上帝和群众。我一路上看了部队许多医院，劳苦奔波，心情紧张，阅历增广，这是他们刚入伍参军的青年所没有的。眼前浮现出战士上前线，伤员下火线的战争风情画，成千上万数不尽的伤兵队伍。那些为了妇女和儿童，为了祖国人民争自由、民主和解放而光荣负伤的战士们，躺在简陋原始的医院里，听任那些力不从心的万金油医务人员的治疗，忍受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战争的伤痛和折磨。他们的苦楚积压在我的心头。

前天我在太平访问了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的战地医院。近一千名伤兵躺在那里，其中有一个八岁不到的农民孩子，他帮军队带路走在村子附近的山间被鬼子的炮弹打伤了，他躺在病床上玩着战士们给他剪的纸鸢和扎的风筝。多苦多难的往事回忆

历历在目使我心焦，展望前路，如履冰临渊，我心战栗。

我们顺河而下的时候，敌人第一批飞机沿太平河而上飞过去了。我们的船工把竹竿插入河底，竹筏停在小河中间，我们坐看敌机会不会光顾送礼下蛋，但是它们飞过去了。

河长滩多，水急浪澜，河床越来越浅，我们搭竹筏登岸，傍山路急走，让竹筏顺流而下。这一带山林有茂林修竹，风光美丽，青山绿水，物产富饶。江南下游盛产稻、棉、茶、丝、鱼、虾、菜蔬。山坡上一层层梯田，麦苗、油菜青青喜人。走过一个农家，听到屋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唱孟姜女哭长城的哀调。三天前我住在黄山的旅社里，一个茶房教我唱四季抗日杀敌歌，就是孟姜女小调的旧曲新谱。

暮色苍茫，我们又坐在竹筏上顺河而下，排头一个战士发出一声如鸷鸟在啼的长啸，远方传出一声军号的回音。顿时间，嘻嘻哈哈，嚷嚷吵吵的一片人声过来了，一群头戴军帽、擎着松枝火把的人影出现，“欢迎！欢迎！”的欢呼声从岸上传来。人影喊声中，我见到了新四军医疗队沈其震队长，他一人抢先上了竹筏。我在汉口见过他，并且帮他募捐采购过医药物品。我们上岸从欢迎的人群中间走过，被安顿在新四军后方医院里小住。

原来以为这里会同国民党部队的医院一样，内幕黑暗、死气沉沉，但出乎我的意外，这儿的医院竟在草创之中具备了现代医疗工作的第一流条件。这是一所接受重伤病员的后方医院。附近二十五英里外靠近江边的战地医院亦同，已经建立起了仿照西方医院现代标准的医务制度。这套医疗制度准许医务工作人员和医药物品随时下到前方各战斗连队单位去进行巡回医疗。

医务工作这方面的成就应归功于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是他和沈博士首先劝请十一名合格医生和二十名受训护士参加新四军。他们很难再请到更多的医务人材，便想成立一个卫生学校、办医训班为各连培训几百名卫生员。

这个后方基地医院坐落在小河口的村子里。小河口也是新四军全军的后勤中心，每隔两三个星期就有些战斗连队从这里出发到长江下游去。医院病房、军部库房设在一座大祠堂里。墙外用泥抹涂，墙里粉刷一新。泥土石板地上遍洒石灰水。铁木工匠整修添制病房、门诊部、实验室、手术台各种设备。他们造的药箱能装三十磅药品，一根扁担能挑两箱子药。军车沿后方公路收集空煤油桶，铁匠把它改成各种药盆药箱。篾匠制作竹筒把不能用铁盒装箱的药品装在竹筒里启运。人们称它“楠竹山医院”。

这个医院里仅有一台X光透视仪器，一架显微镜和一口高压锅，并且仅有一个实验室和两个学过医的技术员。但是，据我所知，它和国民党军队的战地医院后方医院相比，还算是唯一拥有这些医疗仪器设备和医务工作人员的医院。在缺乏医疗设备的困难条件下，医生们设计出细菌培养器和制造药丸机的模型交由兵工厂铸造。这个医院还有除虱站和洗澡间。

我在这个后方医院里参观了它的医学图书馆。馆里藏有英、美、德、日等国医学参考图书，并且订有中外医学杂志，医生们了解医学方面新近的发现成果，维生素、磺氨类等新药品的功效。他们如饥似渴地钻研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西班牙共和国军医工作人员的战地临床经验，并且编辑出版前线卫生医务工作人员必备的袖珍医务手册。

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密切联系群众，对老百姓看病免费治疗。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止，两个后方医院百姓门诊共计三万五千人次。江南战区再无其他公立医院有群众看病门诊。新四军医院大部分医药物品是由红十字会医疗队、各人民团体以及个人捐助的。

新四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深入各个连队和人民抗日团体，并且建立起一整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政治工作同样深入到新四军医院。八路军、新四军决不把他们的伤员交给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医务署所属的后方医院。主要原因在于防止部队人力的分散瓦解和希望继续加强伤员的革命训练。

正是这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治制度，使得八路军、新四军受到莫须有的指责，后来几年中间反动派三次掀起了反共高潮，把中国一再拖到内战的边缘。反动派攻击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抗而不战，纯属造谣是不真实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勇敢杀敌，但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套政治制度。

尽管我衷心希望能够看到牢固统一的中国，尽管我心底讨厌个别的共产党员自以为有功骄傲得了不得，然而，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或兄弟，我是不希望看到他完全受国民党军队一套政治制度摆布的。

共产党的活动多，新四军医院里的各种活动真没完没了，非常活跃。指导员每天不是读战争消息，就是念社会新闻，文工队演节目，老百姓包括我这样的局外人在内，也送东西，作报告，唱歌子，军民联欢，往来亲密。

病床上挂着一叠叠识字卡片，每张牌子上有五个方块字，

不识字的人每天要识五个字，识字的人供给书籍报纸。指导员或政治干事常坐在不会写作的病号床边，记录他们的战斗经验、批评建议、生活感想或诗或歌，作为墙报稿件。

我在后方医院发现一个九岁的孩子，他总是蒙头睡觉。他一见到我这个外国人就抽泣发抖。护士们赶忙上前安慰他说：“莫怕莫怕，她不是日本鬼子，是美国朋友。”

两个月前，日本鬼子洗劫了这孩子的村庄，杀死了他的父亲和哥哥，奸污杀害了他的母亲。他跟鬼子拼命被打昏在地，一条腿断了。后来我又见到了这个孤儿，他被医疗队大夫收为养子，半天读书半天工作，干卷纱布、胶布，绑拖把、叠工装的杂活。还有三个战时孤儿干同样的活。这就是人们亲热称为“小鬼”的起源之一。他们无家可归，新四军就是他们的家。他们与部队共生死。成为部队未来的“干部”。他们从儿童时期起，身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以崭新的一代人投入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小鬼”的身上。

走在医院的过道上，那些眉开眼笑、逗人喜爱的面孔总是使我注目。记得有一回我停在过道中间被一张严肃刚强带点孩子气的脸孔吸引住了。他名叫周彬，二十三岁，参军前打过五年游击的老红军战士。在前线打鬼子负过三次伤，他不动声色地说道：“伤快好了，很快就能上前线去了”。

“一个半月前”他说：“我同游击小分队沿南京一带公路去伏击鬼子的车队，队员们埋伏好了，我和另一个队员奉命到前面去侦察。我看到只有一个鬼子押车的卡车开过来了，趁它慢慢爬坡时，我就一跃上去干掉了押车的鬼子，还没有等司机回头就用刺刀比着他的后颈窝命令他继续向前开车。到了伏击圈

里了，回头一看，后面又来了鬼子的三部军车，战斗打响了，我一刀捅死了司机，翻身跳车，队员们消灭了鬼子兵，带走了车上的东西，放了一把火，背起了负伤的我马上转移。”

“鬼子兵打起仗来的表现如何？”我问。得到的是令人发噤的回答：

“他们在公开场合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胆小如鼠。”

“他们藏在工事里，有飞机大炮助阵的话，他们勇猛如虎。”

“犯不着说他们是胆小鬼，他们是好样的，我们也是好样的。”

“我说他们是胆小鬼，特别是在夜战的时候，一到晚上就成龟孙子。我们在煤油桶里放爆竹，他们就朝黑处开枪，整夜不停。”

“你们为什么在煤油桶里放爆竹？”我问。

“消耗鬼子的弹药呗，我们放爆竹，等鬼子注意力分散，我们就发起进攻。而今鬼子坐着汽车夜里巡逻，每辆车上都有探照灯照明。”

“我是在攻打鬼子的营房时受伤的。”躺在另一张病床上的一个战士插话说道：“鬼子营房在一个火车站。我们一部分人攻车站，一部分同志扒铁轨。车站的房屋不多，鬼子兵都住在二楼上一间房子里。我爬上屋顶向下观察。看到十来个鬼子个个搂着一个寸丝不挂的婊子在寻欢作乐。我们想可怜可怜那些姑娘，但有啥办法？唯有楼下放火，房上扔手榴弹请他们一同去见天尊！”

一天晚上，我在医院的俱乐部里向复原的伤员和医院的工

作人员讲话。讲话中间，一个战士朝我冲来，大喊“日本鬼子！”挥拳就打，幸亏一个医生当场制止住了。原来这个战士受伤后得了神经病，不发病时人正常。那天晚上我在讲话时，他听到外国人的声音，神经病发作，走进俱乐部来了。

医院对河的一个村子里有新四军的一个运输站和一个小分队。我在那里停留了一天，参加了分队召开的会议，从会上我了解到人们把我当成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百事通和算命先生一类人物。人们还想知道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态度。美国政党的一般情形，赫斯特报对美国舆论的影响，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对国民党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胡适博士的反映如何，等等等等，国际大事。

村子里许多房子改成了铁匠铺子，二十多个铁匠师傅汗流浹背，忙着打铁器作车轮。他们过去是兵工厂的熟练工人，来到这个小军械厂，埋头苦干，日夜修理报废的枪枝。一天能造一支新枪。厂里的气氛紧张极了，我问工人们为什么干得这样起劲，从谈话中使我了解到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对新四军新战士拒绝发枪的事。

甚至在“七七事变”鬼子打进来了，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军队对留在江南华南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围剿。当敌人的飞机不断在头上扔炸弹，大炮不断在阵地逞威风，国难当前，京沪危急的时候，知名的铁军军长叶挺将军拍案而起，挺身而出，敦请蒋委员长让他收拾旧部、他改编红军游击队伍在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蒋委员长同意，共产党赞成，把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开赴前线抗日。一九三八年六月，坚持在长江北抗日的新四军以茅山山区为中

心，开创了苏南抗日根据地。番号之所以称新四军，因为在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一路扫荡，赫赫有功，号称为“铁军”的先锋部队就是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叶挺将军就是四军杰出的将领之一。

但是，留在南方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江苏七省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一九三七年底向皖南指定集中的地点开始进军的时候，各省的地方军阀、官僚政客、地主资本家蓄意制造摩擦。他们在游击队进军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派遣地主武装民团和地方军扼守路口碉堡，企图对游击队包围缴械。红军游击队奉命决不打第一枪，他们在进军抗日途中不得不密切注视所谓同舟共济的友军的枪口。他们不得不为了避免冲突减少摩擦而经常改变进军的路线，有时夜里行军。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带着伤重病号，日夜兼程赶路。还有许多红军家属老小一起，形成无数支抗日的铁流。官僚地主、土豪恶霸照旧同十年内战时期一样，在老百姓中间散布土匪来了的谣言。百般挑拨，使游击队战士们的内心难受。

有些被分隔在深山老林地区的游击队艰苦进军，路上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指定集中的地点。从福建、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皖西，先后两个月时间，共一万五千人，大部在皖南集中。其他游击队在江北集中。合编为新四军，编制一万三千人，辖四个支队，四支队在江北敌后打游击，一、二、三支队在南京芜湖清江地区，在江南的敌人的心脏地区坚持抗战。

国民党政府视察员按照其他部队的军需给新四军拨款，发给军装枪枝弹药，但不发给新式武器。当红军其他游击队到达指

定集中地点的时候，当敌后许多志愿军纷纷参加新四军的时候，他们得不到丝毫增加军费的拨款。新四军不得不把按编制调拨的全军经费平均发给各个支队。同国民党军队官兵待遇差别悬殊，新四军的待遇是官兵平等的。战士每月的津贴一元五角，干部两元，团级干部四元，部队供给吃穿，但鞋袜、汗衫、衬衣、牙刷、牙粉、毛巾、肥皂必须自己拿津贴费买。有衬衣汗衫的人并不多，对因公出差的人员额外补助，收入相对说来好一些。

地方老百姓参加新四军抗日成了和国民党政府经常摩擦的根源。新四军的队伍迅速扩充，一再申请增拨军费枪枝弹药，国民党政府的答复是：“如果我们发给你们更多的经费，你们并不拿来改善士兵的待遇，只是一味扩军罢了。”阶级斗争以新的形势出现，国民党政府并不希望新四军在老百姓中间壮大力量 and 影响。事实上我从各方面听到不少的指责。尽管国民党政府同意联合共产党军队一致抗日，但国民党某些顽固派头子则希望借刀杀人，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

在皖南山区我访问的这个小小的军械厂之所以建立起来，为的是给新四军的新战士修理和制造枪枝，以补枪械的奇缺。它的存在是老百姓经常提起的秘密之一，蓝衣社分子当然是知道它的底细的。

据我从各个方面听到的意见看来，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是一个坦率正直的人。他毫不隐讳他这个军的力量日益壮大，对一些人的指责他称唯有全民总动员和唤起民众，武装老百姓，中国才能战胜日本，革命才能成功。

叶挺将军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留学苏联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他主张和平奋斗救中国,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实行三大政策,革命才能成功。但是,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白色恐怖消灭共产党。他是国民革命军中奋起反抗白色恐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同年十二月参加广州公社起义失败后,他出国留学,脱离了党。他拒绝为国民党出力,并抨击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他立即回国,为恢复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攘外先安内,抗日先剿匪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致使他满腔爱国热忱付诸东流。很长时期默默无闻。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世人才又听到叶挺将军叱咤风云的声音。

医院采用了一整套新医治疗病历纪录统计按时会诊的医务工作制度,但是却遇到了农民出身的人马马虎虎的习惯,阻力很大,难以执行。他们还抱怨着新来的医生在医院里什么事也干不了,甭说看病了;甚至让七八岁的孩子干护士医助的工作;还用白痴低能儿甚至疯子、神经病人作清洁工、勤杂工,奇谈怪论真使人受不了。

院长讲他的抱负,希望在部队里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标准的医务制度为病人服务。我对他的表白寄予同情,但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他应该想尽办法解决矛盾,并且要努力工作,为病人对医学作出贡献。我向他们提出了西方世界为科学献身、为真理奋斗的科学工作先驱者们的范例,有的科学家被人诬蔑为巫师,绑在火刑柱上活活被杀死。这里工作难,自有工作处,试问中国之大,别处何可容身,你们又能到什么地方去施展你

们的抱负呢？

一个青年医生听了我的话后说道：“你真好辩，同青年会干事一样会讲道！”

我最后对医生们提出我的忠告，他们可以向项英副军长提出召集一个会议听听他们的申诉意见和计划设想的建议。医生们听了我的意见表示同意。仅有一个医生和一个实验员离开了新四军医院，留下来的医务工作人员，按讨论一致的章程办事。医疗工作终于得到胜利解决。项英副军长签发了一项全军支持医院新医标准医务工作制度章程的命令。红十字会医疗队应我的邀请派来两个巡回医疗工作组到新四军协助工作。

中国军队第一个现代标准医务工作规章制度终于在新四军医院里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二十六、新 四 军

尽管时间无足轻重，杯中的茶都凉了，项英副军长同我的谈话没有个完。他同军部的同志一起欢迎我们。

项英是组织训练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使得新四军成为敌后最有战斗力、思想最进步的武装力量。我们四个人到达新四军的当晚，他站在军部一张军事大地图的前面介绍敌我兵力分布情况。地图上红圈标记出新四军活动中心的敌军据点同脸上的麻子一样，密密麻麻，纵横交错，互相牵制，一目了然。

这个军事活动的舞台中心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纵深五十至七十英里的狭长地带。北面与日军长江巡逻线抵界。在这个敌人称为“封锁区”的游击地区里，公路、运河、湖泊纵横，罗网

交错，对敌人有利，对游击队极为不利，围绕南京和清江这个地区是一个山林河汉、土地贫瘠的平原，对于有飞机炮艇机械化装备的侵略者说来是一个理想的地区。从长江北岸靠近军部的芜湖市起才有高山峻岭大树森林。

新四军最初进入这个地区活动时，敌人拥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力量。除了少数零散的游击队，所有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抵抗均被摧毁无遗。每个城镇、乡村都成立有伪政权和伪治安部队。日本人的汽车、坦克在公路上奔驰，日本轮船在江湖运河里航行。沪宁路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

一九三八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新四军先遣队偷偷进入这个“封锁区”。他们两三人一个小组成扇形展开活动，挨门挨户访贫问苦，调查了解敌军据点，装备和活动的情况。老百姓欢迎他们，掩护他们。全体先遣队人员于一个月后返回军部带回各种报告。

战斗小组接踵而入，“封锁区”一下子闹翻了天，成了马蜂窝。新四军的政工人员同时在农村活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团体。短训班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了，培训民兵，讲授组织、教育、侦察、抵制敌人的战略战术。

八个月后我到新四军时，它作战二百三十一次，缴获步枪一千五百三十九支，轻机枪三十二挺，重机枪四挺，冲锋枪四十八挺，子弹五万发，日钞二万二千七百三十八圆，电台、马匹、骡子、旗帜、地图及其他战利品。击毁敌军汽车二百辆，破坏铁路十三英里，公路四英里，桥梁九十五座，高压电线十三英里。俘虏日兵三十八人，伪军六百一十三人，伤敌三千二百五十三人，新四军伤亡四千四百七十四人（其中阵亡二百四

十三人)。

此外，新四军同民兵联合肃清土匪三千人。半年多时间的战争，新四军游击队消灭或争取了敌人“封锁区”的大多数伪军反正。伪军和伪政权龟缩在日军严密防守的城高堑深的大城镇里。敌人的交通受到严重破坏，车辆、船只无武装护送不敢通行。过去，地方上的民兵游击队在“杀鬼子，拼一命”的口号下同敌人作战。现在，他们受新四军训练营的教育在“杀鬼子，求生存”的口号下与敌周旋。有些伪军政人员考虑把敌人情报提供给游击队是生命保险的事。

人们告诉我，新四军一个连最近在南京南面的湖熟镇乘汉奸欢迎日本驻军时包围和占领了这个集镇。抓到的伪军政头目公审枪决了，伪军警宪士兵被送到后方集训。公审汉奸头目大会上出席作证的有被锁在“空房”、欢迎日军的二十个青年妇女和姑娘。商会会长维持会头目在大会上无耻为自己辩护什么：“麻烦在于镇上没有足够的婊子。”

我对新四军军部各单位进行了访问。主要的单位是军部训练营，有一千四百名男学员和一百多名女学员正在受训，从各战斗连队每三个月抽调学习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入营轮训再学习军事、政治和文化课。包括从上海等城市穿过日军封锁线来的大学毕业生和文化人在内的几百名各种文化程度的青年男女都在训练营学习。

军事干部用十分之七的时间学军事科学，十分之三的时间学政治文化课。政工干部学习时间则相反。主要政治课程为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大多数老红军都是贫雇农出身，同地主、资本家称兄道弟感到很困难，更难于共事合作。因为，在战争

中对他们在进行一场阶级斗争。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说军训营是共产党的军政大学，他们反对这一套作法。

军训营里讲授的其他政治课程还包括中国革命史，世界通史，动员民众方法。文化课包括阅读、写作知识和地理。一个北平大学毕业的女青年讲自然科学史。合格的医生、护士根据医务工作的需要学习生理学、解剖学、个人卫生学。我建议并担任把个人卫生学改为全训练营必修的“民族抗战与健康”课程。

我在讲义里讲了一点态度问题：有些受过教育的学生，一到部队里，对那些干革命顾不上洗澡或身体坏的工农干部表示看不起，这个问题并非中国革命队伍里独有的问题。人们说这些学生是“小资产阶级”。我在讲义里讲，折磨人的疥疮没有革命性。我还讲，俄国布尔什维克即使在最艰苦的战斗岁月里，也还是要洗澡的。

反对洗澡并不仅是态度问题，因为吃水用水均须从远处溪流中担来，而且无法烧热。学生一心学习，解决洗澡设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只有医院可以设法解决。后来，我拿出一部分版权税和稿费，加上英国大使凯尔先生送给我的一点钱，在军内修建了第一个消灭虱子的浴室，这是由医务人员仅用土、石、木三种材料设计盖成的一幢大屋。管道由凿通节疤的楠竹接成。这个浴室的修建是我对抗战必胜的微薄贡献。我感到自豪与有荣焉。

敌工部负责日俘事务，审查考核所有日俘。把少数年轻、特别是工人学生出身的日俘留下来，把年老军官俘虏解送第三战区司令部。国民党政府给每名日俘拨款，每名军官日俘拨给

巨款。新四军留下了三名日俘，两个是渔民，一个是学生，让他们教日语，对日军进行广播喊话。

身穿中国士兵制服的日本俘虏从不戴镣铐，可以自由活动。我问他们的态度如何，林世夫同志告诉我，日俘均厌战，不打算逃跑。想逃也逃不了，因为民兵视鬼子如毒蛇猛兽一见非打死不可。教日语的三个日俘联名写了一封致他们原来部队士兵的信，把他们在新四军的生活告诉同班兄弟，并劝他们开小差投奔新四军来。三个日俘成了没有祖国的人，唯有中国革命胜利两国重新建交后他们才有家可归。

敌工部有一间堆满各种战利品的房子，两面太阳旗作窗帘子用挂在窗子上。两包邮袋尽是日兵往来信件和士兵日记。我的秘书和林世夫帮忙我把一本日兵日记译成英文。中村班长这本战地日记记得洋洋可观，是研究侵华日军兽性暴行毕露的罪证。班长开始记他不愿意应征入伍。后来行军记他在渡口逢毛毛雨时颇富戏剧味道地说：“这是老天下的雨水；还是我流的泪水呀？”

强抢掠夺奸淫烧杀几个月后，他在南京南部某地一九三八年九月一天的日记中记道：“天青气朗，下午四点，我部奉命开赴路国镇。我们占领某村，挨家搜查，想弄到最动人的漂亮姑娘，骚扰两小时，西村下土枪毙了一个闺女，因为她痛苦挣扎面貌丑陋，我们大家都看不起他。”

日记里面反复记了许多新四军破坏战略桥梁和日军天天修桥的事。一次他们抓到了五个民兵活活拷打死了。有些日本新入伍的士兵在旁恐惧发抖地看着。中村记道：“新兵莫不如此，很快会自己照样干的。”

九月底他又奉命到路国镇，这回老百姓坚壁清野，撤退一空。班长记道：“如果百姓这样行动，我们怎能维持东亚和平秩序？”十月一日新四军击毙了中村。他的步枪号码是750508号，刺刀号码2296713号，防毒面具号码82056号，皮带号码62号。他的父亲中村弥吉，住东京小森田、大豆村长间九十号。

几天后，我同两个新俘日本兵谈话，一个是兵，一个是少尉。那个兵是在强奸一个妇女时被抓住的。这时在军部医院治他的梅毒。暴牙齿尖，瘦猴相，真象个青面獠牙牛头马面的原始畜牲。我尽力制止中国人对他的好奇和愤怒。

俘虏的少尉过去在东京当过警察，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因为被虫咬送进医院。他说他是在日军驻点外的长江上被俘的。那天早上他下面有三个士兵到附近一村子里去想弄几只鸡。晚上不见回来，少尉官爬上一座小山头环顾四周，突然有人抓住了他的两腿，抱住了他的脖子，把他带走了。“胆小鬼才这样的打法，勇敢的人可不这样！”他轻蔑地说。

我问他对战争的想法如何，他冷冷地答道：“我没有想法，我服从命令。”

我对新四军军部各单位的访问以一天晚上的“军事干部会议”结束。数以百计的游击队战士执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昼夜出没高高的山上，四处活动，定期讨论“优缺点”。指战员中间互相批评，互相帮助，令人鼓舞，组长最后作出总结性的小结。

新四军就是这样尽力推动这个伟大的时代向前向前进的！

二十七、需要“教材”的医生

新四军卫生学校终于开学了。从军部训练营调出来的第一批三十八名受过教育的青年入了学。医生们和护士长杨小姐每天在正规业务时间里也抽出几个小时备课、上课。她们需要“教学器材”，尤其是人体骨架。她们有三个人当代表到军部向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提出要求。准许她们用死在医院的战士尸体作医训班讲课用的标本。他们还说因为有不少战士没有进行手术不幸死了，所以他们自己也希望作解剖尸体的实习。

军首长们深感兴趣也很关心，但说不能这样作。说要到军内和老百姓都具有科学态度时始可进行尸体解剖。大多数战士来自本地农村，他们或者老百姓如果知道医院解剖了尸体就会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一个缺胳膊少腿的人死后升不了西天，来世五官也不齐全。我觉得这是荒唐的迷信。

医生代表说：“我班有一个学生今天说，他否认他的肘腕有两根骨头，另一个学生说他相信他有两挂肠子，大肠排大便，小肠排小便。从理论上进行教学很难讲通。”

“我们可以把战场上的日军尸体给你们一具。”首长答应了医生代表们的要求“你们如何处理军部不管。不过，日本鬼子照例是搬走尸体的。”

一天送来了一具尸体担架。工作认真负责，很有才华，具有艺术家手腕和头脑的外科医生 N·C·龚博士作了五马分尸的解剖手术，一个手术是把头部骨架分割下来。敌后的唯一女医生张大夫当助手，她在军医学校讲解剖学。解剖后龚准备把肢

腿扔掉，张医生直喊：“教材！教材！”制止了她。然后剔出了腿肉把腿骨放在消了毒的煤油桶里。

过了一阵，屋子里的人个个毛发悚然，被院子里一阵咆哮声吓住了。我们冲出房子看到一只狼狗正叼着刚剔净的腿骨乱跑，张医生拼命叫喊来人。我们帮她把狗赶开，夺回了“教材”，她小心谨慎地把她的宝贝放在设计好的大缸里加以煮沸。

卫校指导员胜利地通过日本封锁线从上海弄来了一部新收音机。军部所有收发报机都只能传呼喊话，这部收音机一开，战士和老百姓收听到节目音乐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围着收音机转。有一个农家妇女最后点头说了一句聪明的话道：“这鬼家伙怕就是科学吧？！”

其他的人听了她的话都恭而敬之地看着收音机。他们称心如意看完以后走了。留下我一人在医院图书馆里。我带着一种觉宇宙无穷须深入探索的心情拨动收音机的调谐度盘。南京上海的日本电台在播音了，我向遥远的西方电台拨转，茫茫中听到钟声在响，英语广播，这是伦敦呼声！传入我的耳鼓。我一阵发呆。报出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乐曲的节目，接着开始播放。埋藏心底的西方文明的感情有如泉涌，泪珠儿夺眶而出。正在这时，一只手按到我的肩上，泪眼纵横的我看到是张医生。她愁眉苦脸地喊道：“我的腿完了！我把腿放在设计缸里煮！勤杂工睡大觉，水烧开，腿也完了。”第五交响乐曲在室内绕梁不绝，她的话使我真有“不知骨味”之感。

龚医生出现在门口，他进来听了她的悲剧，赶忙安慰她：“不要伤心了！我有一个设想，但我们必须保密。我要去掘墓挖骨，不弄到一副好骨头作教材决不罢休。你要胆小害怕就莫

跟我去。”

这话显然激怒了张医生的女性尊严，她骄傲地抬起头说：“我以社会主义竞赛的名义跟你打赌掘墓挖骨，我自己动手在乱葬岗去找！谁输谁请客！”两人一言为定，在第五交响乐曲绕梁声中，拿上铁铤、口袋、电筒分头掘墓找骨去了。

黄土下面的棺材在中国是深挖浅埋的，盗墓不用费力气。我们从龚医生挖了八座坟、张医生挖了五座坟的结果，看出了中国婴儿死亡率高的情况：大多数坟墓里埋的是孩子。有些墓地被长江下游雨水冲击，土壤风化，白骨腐烂，无法收拾，这是毫无用处的。龚博士挖了一具新四军战士的骨架，由于肉未烂掉，他在坟上垒了一堆石头作标记，待到来年再发掘，如果寻找标本失败的话。

第二天夜里我在收音机旁收听新闻的时候，张医生进来朝我神秘地点点头，我跟她到院子里，她象展示偷来的珠宝一样解开口袋指着一堆白骨，感情激动地说：“她是我的家乡无锡人害痲病死的，尸身用丝绸紧缠，七孔用丝棉塞紧，无锡老百姓认为可以防病消灾。”

说话时龚医生带着满手泥土进来了，望着张医生的一堆白骨非常嫉羨，知道他的打赌他失败了。”我赢了，你输了！你请客！”张医生拍手道。

一星期后，张医生带我看一切就绪的标本。她把骨头绑扎好了，安置在竹架子上，每根骨头有一块小标签，它已转变成为人们追求知识的小型模具，不再是无用废物了。我们在它周围赞叹不止地观察它的“优点”和“缺点”。

一天晚上，说好了给作解剖用的鬼子尸体也送到医院来了，

放在门诊部的大“诊断室”里，三纵队跟来了一位男护士，两眼炯炯有神、眉飞色舞地向张医生汇报：“我们奉您的命令，为了科学带来一个死鬼子，我们成功了。”

一个通讯员向附近村子里飞跑去召集医校全班学生。他们白衣白帽手拿笔记本赶来了，放死尸的地上垫了一层厚石灰，周围用三角凳、条凳方椅排列成为一间原始的阶梯座位教室。手术室用的乙炔灯吊在房椽上。桌上陈列着一排盛满酒精的大玻璃缸以便处理“教材”的零件。

世界上有哪一个科学家经历过比这更激动心弦的时刻么？以无限热情专心致志从事科学研究苦干的精神么？新四军军医学校师生们干革命学科学的奋斗精神使我深深敬佩。这以前，学生们学的一套普通经院式的医学课，或党政干部的军事课，仅仅是应付门诊医务工作的需要才把他们抽调到军医学校里来学医的。张、龚两位医生的白制服闪亮发光，站在僵硬的尸体前面。张医生用宏亮的声音向中国人民的子弟兵白衣战士说，新四军主讲第一堂医疗示范课。室内只闻笔记声，不见人影动。

快半夜了，我离开解剖课室去搞情报工作，收听国际消息，从遥远的美国、伦敦、柏林、孟买电台的新闻广播时，不时听到隔壁房间里医生们的讲课声音。

二十八、妇女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蔡老太太的时候，她已是下游一带脱颖而出的妇女领袖了。她比一般长江下游妇女高得多，黄皮肤，双手

青筋突出，瘦长个子，身体结实，说话嘶哑，语调坚定，头发花白，高额头朝后梳一个髻子。农家妇女，养过许多儿女，一生饱经辛酸，曾不说自家困苦。身穿白布褂子，黑布裤子象刚浆洗过的，一身干干净净。虽然老，但她是稳健庄重的化身。

很难相信她六十八岁了，并看不出老态龙钟，看来不过花甲之年。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寡妇，有三男一女，两个大儿子在新四军，十五岁的小儿子和两个媳妇在家里种田。

抗战前，村子里的生活枯燥乏味，死气沉沉。但是，自从一年前来了新四军，世道好象开始在变样。旧世界土崩瓦解了。许多女学生参了军，当她们跑到乡村妇女门口敲门时，土豪劣绅家的太太小姐闭门不纳，打发男人出来应付那些“红色娘子兵”。然而，蔡老太太则刮目相待。女兵敲门，她开门一看知道姑娘们不坏，招呼进屋，让座斟茶，叫媳妇和邻家妇女陪伴她们。妇女救国协会就这样在村子里诞生了。会员人数慢慢增加到一百多人。

经常可以见到蔡老太太的瘦长高大身影在上下左右的村子的大路小道上奔跑，督促妇女们参加识字班，学习小组，讨论抗日救亡是怎么一回事，妇女如何出力。妇女们白天的家务劳动活计做毕，就坐在家门口织织补补，我问她们在做甚么，她们回答说是“帮新四军做军鞋”的。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手顶替以前男人干的地里活。青年们参加了新四军，老人、孩子帮忙干农活，挑东西上战场、转回身抬伤员。每逢节日，妇救会的会员到医院里去“慰劳伤员”，她们带着糖蛋糕点礼物，同伤兵谈话，问病情和问寒问暖。蔡

老太太总是在病房里对伤员们亲切地讲，他们都如同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是妇救会的儿子。她讲话结束时，总要谈到妇女的权利，总要劝人们参加妇救会。有些人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讲话，无不肃然起敬地聆听。中国地妇女接受新的事物看来要比西方世界的妇女更讲文明礼貌，宽宏大量，只有少数男人站在新运动的背后指手划脚持反对的态度。

妇女们参加部队妇女举办的各种学习班后更加充满信心，斗志昂扬。一个学习班讲了侦察敌人和工作方法，要求妇女成为新四军的耳目。同失败主义作斗争，处处监视汉奸特务，抵制日货。所有这一切活动，用一句话说就是“守卫人民军队的后方。”从此以后，她们不是过去的锅台转后门坐的深闺屋里人了，而是关心民族兴亡、复兴的出门跑的新妇女了。男人讲话，她们参加；国事意见，她们发表；群众集会，她们出席。村子里出现一个陌生人，她们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非把陌生人的由来以及他家祖宗几代问清楚不可。

有些男人出面反对，成了“新妇女”的对头。例如张经纪就是一个。他说：“妇道人家出头露面就会磨死男人。蔡老太太是坏中之坏，她的鬼名堂最多，不知道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张经纪把全部蜡树小白豆子收买一空，这宗买卖被蔡老太太发觉了，因此他对她恨的要死，怕的要命，特别讨厌她。原来，老百姓用白蜡树子做蜡烛，而张经纪却贩运白蜡子到芜湖出卖。如今鬼子占了芜湖城，谁干吗要去芜湖跑生意。妇女要问到底。她们问张经纪，为何不断地毫无困难地通过鬼子封锁线？山村的白蜡豆子为什么突然找到了这么的大市场？是鬼子制造蜡油吧？张经纪这个人鬼头鬼脑，谁都看不起他。因为，

山村一带新鸦片灯的买卖人人知道有他的份儿。地痞流氓甚至有些人家成了挥金如土的暴发户了。

蔡老太太有一天直奔张经纪的蜡烛铺子，开门见山问他跑芜湖生意的勾当。张经纪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不但不回答问题，反而恶语伤人。这不仅是侮辱人，也意味着嘲笑老太婆和村子里庄户人家。张经纪违反老百姓的意志行事，很快得到自食其果的下场。鬼都不上他的铺子来同他作买卖了，他走过街上，人们避而远之，无人看他一眼。孩子们在他身后扔石头喊“汉奸！”一天他路过农民门口，清楚地听到有人唆狗出来咬他。

张经纪怒气冲冲地到县政府去告状。县长请蔡老太太去谈话。老太太去了，但不仅她一个人，儿子媳妇、左邻右舍、村上的亲友们以及妇救会全体会员都送她到官老爷门口。远近村子里的老百姓也跟在后面，围在衙门口听候动静。老爷本人倒并不坏，他有爱国心，头脑也开明。一看到黑压压的群众，他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斯文开明了。他要蔡老太太说一说跟张经纪说了些什么。她提到张经纪到芜湖作生意，还有鸦片灯开赌场的事。她指出鸦片烟土是川军里面几个贪官污吏从西面偷带过来的，这一带没有过鸦片灯盏，妇救会要求禁烟。

县长承认烟赌有害，但声称法律无明文禁烟禁赌，盼望戒烟新法从速颁布。他劝妇女们能以“体贴爱人”之心同人们打交道。蔡老太太回答说：“我们妇女是有爱人体贴之心同人打交道的。无奈人家不听，人家要我们回到灶房去围锅台转，莫干涉男人的事。”最后，蔡老太太说：“我们妇女起来了，我们决不许可富人违背老百姓的意愿行事！”这话使得县长大吃一

惊，面色如土。尽管如此，他对张经纪也束手无策。同鬼子作生意的证据并不确凿，人们千真万确在芜湖市上见过他，他跟别人一样是偷过鬼子封锁线的，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这个。

三月八号使问题到了紧急关头。“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天举行庆祝集会，村子里准备在老祠堂大厅之中开群众大会，这是妇女的节日，但应邀出席大会讲几句的人尽是男性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祠堂院子会场的前排座位都留给妇女，战士、干部和老乡们被请到后排坐。墙上贴了二十几幅各国知名的国际妇女科学家、作家、革命领袖人物的画像。号召妇女发扬勇敢上战场救护伤员的爱国精神。

“三八”这天上午，蔡老太太领着妇救会全体会员到新四军医院慰劳伤员。进病房前，他们拿了十个鸡蛋一只母鸡来看我。蔡老太太端端正正地坐着，要我转告西方妇女同胞，中国妇女是怎样争取自身解放的。并且对我说：“你同我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奋斗精神表现了妇女的崇高美德。”她的礼物使我深受感动，也是莫大的鼓励。

我跟着妇女们走进医院病房，看到几箩筐鸡蛋、烘饼、一半边猪肉。她们的男子汉骄傲地把礼物挑到过道里，让伤员们看后又乐呵呵地送进了伙房。献礼完毕，妇女们集合唱起了慰劳伤兵之歌“啊！最勇敢的人，你们为了千百万妇女和儿童，负了光荣的伤，忍受着战争的苦难，躺在病院的床上……”

这是一个美好动人的场面，蔡老太太和跟她来的妇女们问我：她们希望知道还能为伤员做一点什么事才好？我说可以做枕头、枕巾，上面绣上“民族英雄”“抗战必胜”一类口号，

她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个人正在为筹集一笔买布料、丝线的捐款而奋斗，她们用不着谢我，我们同命运共呼吸，这是我的战斗也是她们的战斗。

下午的群众大会取得了巨大成功。蔡老太太害怕登台讲话，但她战胜恐惧，一步一步走到台上，讲妇女的权利和应尽的战争义务。讲话最后，她宣布她们的妇救会要把村子里一切坏习惯包括打牌、赌博、抽鸦片和游手好闲等等恶习从根刨掉，通通扫除干净。结束时，她告诉大家刚收到她一个儿子在前线负伤的消息。但作一个保家卫国抗日救亡光荣负伤的儿子的母亲是光荣的。她说，这样一来她个人的职责就越来越大了。

当她走下台的时候停下来看到场上指战员们全体起立，枪支举在空中，高声唱起了《游击队进行曲》，在激动人心的歌声中老太太慢慢地走下了讲台。

隔了几天，一个军医叫我到门诊部去会诊，出人意料的是我发现蔡老太太躺在担架上，使我大吃一惊。我蹲下来看她的伤势，她把事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都是因为鸦片灯和麻将牌，妇救会同人们辩论要关赌场和烟馆，男人们拒绝，她就同其他妇女闯进了赌场。地痞流氓朝她们起哄。蔡老太太拿起拐杖朝桌子上一扫，洋钱、麻将满屋乱飞，别的妇女也跟着她一起动手，赌场大乱。男人们大吵大闹打起来了，在场的妇女几乎个个被打伤，蔡老太太的伤势最重。

一连几天，村子里简直闹翻了天。乡亲们、指战员们无不挺身而出要求平息众怒。打得鼻青脸肿的妇女们都围在蔡老太太的病床前安慰她。不过，大家都无休止地谈论着这回斗得好。烟场、赌场关了门，张经纪和动手打人的烟鬼们都被关起来了。

她们高兴地说：“一大胜利！一大胜利！”

蔡老太太请我写信告诉美国妇女同胞：

“美国同志，请您写信告诉美国全国妇女协会，把我们的斗争告诉美国妇女同胞，说我们的斗争胜利了，告诉她们没有斗争是决不会有胜利的！”

我说我要写信告诉她们时声音有点发抖了。但是，我坐下来便想起了我们美国的妇女同胞，她们吃得饱饱的，穿得漂漂亮亮的，一年三百六十天受着电影、电视“爱”的教育，过着金钱解决一切问题的资本主义生活，她们大多数人能够体察中国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状况么？我很怀疑。

几星期后，蔡老太太恢复了健康，回到了战斗的岗位上。一天，我伏案工作，抬头一看她站在门口，身后几个青年妇女，个个嫣然微笑着。我跟她们走到外面，男女老少和孩子一大群捧着枕头枕巾，上面绣着花鸟图案。“民族英雄”、“抗战英雄”等我建议的词句工工整整地绣在枕巾上面。妇女们到病房里给一个床位一个床位的病号送上了枕头枕巾。伤员们的惊喜和快乐就是她们情意的最大报偿。

枕套虽小情意重，可惜的是太少不能每人都分到，因为又有几个伤员住院来了，还有两个日本俘虏。蔡老太太极力说服两个伤员把枕套让给两个日本俘虏，答应给他们另做一对。送礼完毕，她又讲话，讲妇女的权利。日本俘虏瞠目结舌，面带笑容，困惑不解地望着她老人家。

“好极了，好极了！”我对一个医生说：“老太太可把日本俘虏缠住了，他们成天睡大觉什么也不干，听她讲妇女的权利得了。对他们的招待多周到，他们可不要无功受禄啊！”

二十九、一个农场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匆匆来临，整个长江下游平原在痛苦中煎熬。日寇从长江向南发起扫荡，一路向我军西面的广西第五十军坚守的驻地进攻，一路朝我军东面二十英里的山城南陵骚扰。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空袭轰炸下，南陵困守几周看来顶不住了。五十军一师人穿过我新四军军部所在村庄前往围城，新四军几个纵队沿长江南岸连夜行军，日夜攻打敌人的后方和侧翼，参加解围战斗。

村镇多次易手，伤兵各路抬下。数以千计的老百姓逃到后方基地，或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难民收容站里寻求吃住地方。或是在新四军军营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沿门要饭。村镇收复了，沦入敌手的老百姓嗷嗷待哺，伤病需治。他们挨过刺刀，中过流弹、炸弹，在痛苦中呻吟挣扎。有的肢体不全伤势严重活活地死去。

持久战打下去了，新四军医疗队沈其震队长匆忙到上海一行，向中外团体争取救济资金和医疗药品。我向英国救济基金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特别监督委员会提出报告和申请书。沈其震很快回来了，他满面春风完成了任务，同时把英国大使的两千元赠款交给我。我把这笔款子的一半立即送给新四军民运部，另一半留作农村用款。

到阴历大年初一的时候，敌人的进攻被打退了。隆隆炮声渐渐稀落，农村逃难的老百姓动手收拾所有东西，挑起襁褓中的婴儿，向他们的家园走去。他们感到男子汉大丈夫靠慈善救

济生活可耻、脸上没有光彩，就是那些躺在病院里的老百姓也感到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在人面前矮了半截，说话不响。连病中呻吟的权利都没有似的，许多人等不及伤好，晚上拄着拐杖偷偷地走了。

可是一片瓦砾废墟，哪里是他们的家？家禽家畜通通被杀完了，家具器皿、炉灶锅釜不翼而飞。公众谷仓遭抢一空。逃难的人，罕有余粮。人们不能用五指种田犁地，而且几升粮食必须留作种子。

我同新四军医院的军医们讨论了一千元赠款使用的上策。医院附近有一个祠堂，住有难民十五户。祠堂旁边有大块休耕地，区长是一个地主，他答应出租免税给我们使用。医生们制订出一个互助组共耕计划，开了一个需要农具、种子的清单跑去同祠堂里的农民讨论。他们对难民讲，没有疮的妇女可以帮医院缝洗床单、被子和病人衣服，收拾手术工作制服，挣得工钱。战士们可以教几个人打草鞋，编箩筐、提篮、席垫、背篓，各家看病由医院负责。

难民们听了计划，妇女们照例不吭声，男人们盘算了很久才问贷款付利息多少？医生说是无息贷款，但挣得赢余必须作为其他难民解决耕地用费。人们听着，满腹怀疑。有一个说土地所以免租，因为部队住在这里。部队开走，地主不但要租，而且还逼欠租。医生们说可以取得区长的书面字据。农民认为，部队一走，书面保证是一纸具文不顶屁用。尽管如此，只要有地可耕，部队在一天就种一天，长江流域的鬼子赶跑了，他们就回老家去长年种地。

这一点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

医生们感到对农事一无所知，最后把全盘计划给了交民农。第二天，一群农民到山坡上看了地，一直摇头，地看毕，五个人来到医院。他们削减了我们原来的财政预算，并且声称三批人次日分头出发，一个小组到南面的镇子上去买农具，第二个小组上南陵县去购良种，第三个小组去找耕畜、猪娃、同鸭贩子商量孵一千鸭蛋的交易。他们能以五块钱买到一百只小鸭。

他们精打细算我们给他们的钱，一个铜板都有用场。说他们用不着花钱住客栈。农民出门总是住在别的农民家里，不过吃饭一天一人一角钱够了。

一星期后，十五户逃难农民成立他们自己的合作农场。各家妇女到医院进行体格检查，没有疥疮的开始做缝洗工作，其余的接受治疗。部队派出战士教打草鞋。医生让男人们干地里的农活，并强行安排了一份菜单。农民坚决反对每周吃一次肉，说白浪费钱，但医生有医生的想法。农民们走后，两个医生动手草拟一个有儿童教室、洗澡堂和公共洗衣室的模范乡村设计。

一个满面红光、朝气蓬勃、体壮如牛的青年当选为合作农场的经理，这个职务和他的耕地任务结合在一起，他还来回爬坡同我们办一切交涉。设计标准村的时候，人们慢慢地在山坡上找来找去。最后择定了一块干燥高地。我们眼盯着阳光底下土坯砌成的茅棚土房建起的标准乡村慢慢落成了。

园里的葱、蒜、韭菜、茄子、南瓜、豆角、甘薯慢慢长起来了，我们引进了一些西红柿，他们不知道这种菜也不喜欢。我们说明了菠菜的价值，他们同意种。他们还种了一畦西瓜，以对我们表示敬意。母牛、黄牛的费用大些，我们把耕畜关在棚里，不准卧在屋里。人们赤膊卷着裤脚耕地犁田，身体结实，

肤色黄黑、外表健美，不长疥疮了。关于疥疮我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学术上称之为“严格规定病人的饮食”。

大竹篮挑的小鸭送来了，老人、孩子在池塘边搭了一个大而矮的席棚，地上铺了一层厚草，每天赶到池塘游一阵，塘边有上岸处。棚边有老人睡觉地方，他昼夜观察羽毛未干的小鸭。白天，他用一根长竹杆扎着长条带赶小鸭群。小鸭很快成长，不久即可下溪自寻食物了。

成年人学文化和儿童上学校的问题，由新四军民运组抽调的一个女教员负责。我们又想到与农场有关的织布机问题。我在去泾县的路上遇到一些逃难的织布匠人，他们说能做八块钱一个的织布机。

我们同农场的老乡们商讨织布机匠的事。显然我必须写信想法找钱。

医生和我想在长江下游一带难民里面成立其他中心合作农场，但是需要受过训练的组织人材。估计有二十万户无家可归的难民，英国救济基金协会和美国红十字会特别顾问委员会拨款么？他们给教会人士提供大笔款项，而教会仅解决难民的吃住问题。中国救济工作他们很少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我没有传教士的资格，由于我同新四军的联系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资助。但是，我还是照例提出申请。出乎意外的是，又寄来了一小笔钱。但总数从未超过五千元，有一部分钱必须用作医院的纱布费。

合作农场的农民于农闲时为部队医院干各种活。一有战斗情况，他们挑选最结实的男子汉送弹药到前线，抬伤员回后方，一天才挣三角钱。我们眼见他们成为村子里最身强力壮的老百

姓，肩挑负重比别人都强。我们的医生一想到“严格规定饮食新法”都很满意乐开了。

农场农民根据设计图样用土坯、铁杆、竹木为医院盖了一个除虱站。秋收前我离开这里到新区工作时，农场经费仅余八十元了，但新谷即上场，鸭群已肥壮，可以带来为数可观的收入。医院已经采购鸭子给伤员们吃。

离开农场时，我给上海英国救济基金会寄了一份农场情况报告。一年半以后，我到重庆时，英国驻华大使凯尔先生特派大使专车接我。关于新四军南宁合作农场的事，对我来说，似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他可并没有忘记。他仍然笑谈农场的大事，问我如果再办合作农场，他可以多捐点钱。我说好的。

三十、转变中的五十军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五十军军长郭嵩歧将军请我到他那里去作客。天下着毛毛雨，我和张医生骑马翻山前往西面的五十军军部访问。我骑着一匹缴获来的腿长体瘦、仅一只马蹄钉了蹄掌、有喘息病的东洋马。

天快黑了，我们进入五十军作战地区，每条通道都可以见到岗哨的人影。行近拱桥时，飞步走出一个青年军官，兴冲冲地问了一下跟我来的警卫员，随即跑步立正，向我敬礼，喊道：

“敬礼！我谨代表郭嵩歧将军向您致敬，并恭请您驾临澈军军部去！”

桥边，一排身高漂亮的仪仗队，人们带着渴望的神情望着我，旁边放着几乘四川特产竹兜轿子，轿夫在旁，我下了马坐

上一乘轿子，青年军官和士兵们的激动心情丝毫掩藏不住，我又一次看出中国军队有一个外国客人访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在一个被人遗弃，给敌人提供一切支持消灭他们的世界里孤军作战，他们仰望天空看国际援助的迹象，我个人在他们眼里，看来象是第一个报春使者。

仪仗队伍分开在我们坐的轿子前呼后拥，我盯着轿前快步疾走神气活现不时掉头瞧我一眼的卫队，心头涌起无限的悲伤，唯独我，不代表任何人的孤家寡人！我并非他们的什么报春使者，至为遗憾！

一个骑马的士兵出现在一个小村子的前面，向青年军官敬礼，问美国友人来了没有？然后打马转身飞奔而去，马蹄的啾啾声消失在暮色苍茫中。一小时后，我们接近了一个村庄的边缘，看见明亮闪动的火把和灯光，听到江河湍流般的嘈杂人声。越走越近了，我看见大路两边站着几千士兵和老百姓，里面还有身穿咔叽军服的军官和旗袍、长裙的女士，人声雷动，夹道欢迎！一对夫妇迈步上前，男的正当壮年，身体结实，一张英俊聪明的面孔。我下轿上前握住了他伸出的手，听到他那非常亲热的说话声：

“鄙人是五十军军长，欢迎大驾光临！”

“郭将军，您给我的荣誉太隆重了！”

郭夫人握住我的手不放，热情欢迎的话说不完，她身穿士林布衣，娇小婀娜，一副知识分子相。这时，一片欢迎声，人头齐晃动，场面动人到了高峰。郭嵩岐将军把他军部的长官和他们的太太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从这时起，我发现自己处身在错综复杂、拘泥礼节的世界中。

五十军军部刚被轰炸过，为了接待我们的访问，村里秩序已经恢复正常。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收拾了一院小屋供我们下榻。院墙粉刷一新，桌椅摆设精致，完全是旧中国古色古香的风味。壁上悬挂画联，黑漆发亮的檀木几上摆着一个名贵的大瓷瓶，里面有一株枝节盘错的迎春花。房前两边，一边一棵阔叶芭蕉，显然是刚从人家庭院移植过来的，对着粉墙，相映生辉。这儿一切发出中国古老文明的雅静芬芳的气息，如此幽美的胜境决创造不出新四军那里严肃紧张、团结战斗，口号声不绝于耳的喧哗空气，也不可能从生硬模仿西方美国南部严格信奉基督教的圣经地区文化流派的中国基督教的文明中脱颖而出。

张医生在可爱的小后院里找到一个特别讲究的新式建筑，一个漂亮的厕所。入内登坐有两层台阶，马桶上盖着紫红绒布做的座垫，如过去保护欧洲公爵和公爵夫人屁股用的厕垫一样的豪华装饰。一见这个物饰，使我想起了米兰公爵夫人一次要雷翁纳多·达·芬奇为她设计私人的夜壶。

张医生和我小心地窥探四周知道无人窃听，哧哧笑了一阵，她赶忙说了一句：“这一套封建设备，表示出他们对你的欢迎是多么周到！”

一般认为，四川队伍是中国最封建保守落后的军队，五十军也是。但是，战争使得军队内部起了巨变，如今成了新旧斗争和争夺兵权的混合体了。天生的民族爱国主义和最落后的实践概念交织在一起的是现代人性的最高原则和一知半解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战争教育了部队：不搞现代化就要被消灭。

郭嵩歧将军代表现代化倾向，有些青年军官成立读书会订

购图书杂志支持他。在军内，他是一个最为进步、头脑开明、具有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军人，但是，他处处受到反动落后腐败堕落的参谋顾问们的刁难，使他寸步难行。这些家伙好逸恶劳，萎靡颓唐，靠赌牌、逍遥、抽大烟消磨日子。这个军队的载重车辆从四川到江南贩运走私、捎带鸦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因此地方当局不得不在艰苦转战中对外国敌人的毒品同对内走私的鸦片两面作战。鸦片生意秘密进行。官商结合销售黑货的黑市渠道建立了。涪县县长跟我讲过，他手下的人不敢检查过县的川军车辆，否则稽查就会被枪毙。

直到我作这一次访问时止，我跟五十军的接触仅限于同他的伤兵和一个青年军官打过交道。作战期间五十军伤兵穿过新四军防地山村。穿一身单衣，破破烂烂，赤脚走路。躺在担架上的连盖被也没有，蹒跚步行的一路呻吟，晚上象野狗一样卷缩在老乡的屋檐下。

新四军医院收留了五十军的伤兵，出院前他们到每个病房向病员和医生鞠躬作揖，表示感谢。新四军为收留五十军过路伤兵准备的紧急包裹站，有一次接待了一个坐担架的旧军官，他目空一切地命令张医生先看他，后看普通士兵。张医生不动声色地没有理他，最后解开他手上的绷带一看，不过擦破一点浮皮，什么伤也没有。

然而那些普通伤兵却是为了祖国光荣负伤的。他们同新四军战士并肩作战有如兄弟打退鬼子的进攻。他们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热血同流，友谊成长。也许，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势力，知道了这种情况，他们反对国共士兵团结合作并肩作战，从重庆派来了一个新的政治部主任到五十军控制军队思想。他一来

郭将军的声望下降，川军队伍里反新四军的情绪滋长，郭和一些军官反对这种情绪，但政治部主任是一个对重庆上峰独自负责拥有实权的人物。他可以随意不通过他们同意向上面打报告，有权调阅军内一切档案卷宗。他的工作看来是一个超级特务的工作。

我们到五十军军部当晚出席了欢迎宴会。西餐、糕点、名菜，银器刀叉、玻璃酒杯，台布、餐布各色俱全，还有桥牌、军官太太作陪。根据西方习惯，男女成对分坐长桌的两边，除了郭太太照常一身穿着外，所有军官太太都身穿丝绸旗袍，佩戴金珠、项练、环镯，脚蹬进口高跟皮鞋，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席作陪。张医生和我穿着干净的军服，来时特地浆洗熨平过，但在酒席筵前捉襟见肘，很不相称。尽管如此，张医生象皇后般地昂然就坐保持尊严。宴后她说穿一身军服赴宴很感到骄傲自负。使我们惊奇的是，我们的一身衣服使太太们害羞了，两天后，她们都象我们一样穿起了一色新亮的黄咔叽布军服，唯有郭太太不装模作样，照旧穿她平常穿的那身蓝士林布衣服。

军官太太们都是受过教育的妇女，有的是大学毕业生。在中国当官的可以娶到最漂亮的女人。她们温柔醇厚、通情达理，都是些健康的女人。受高等教育，同有钱人结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军队里打麻将、说闲话、消磨光阴。

她们里面有两个另当别论，表现突出与大家格格不入。一个是在上海音专学过西洋音乐刚结婚的虔诚基督教女学生。她在她们中间行动迟迟，闷闷不乐，象个幽灵似的。另一个是郭太太自己。她大学毕业，当过教师，丢下三个儿女在四川，同丈夫在一起经受战争危险的生活岁月。她是一个朴素的爱国

者，是大烟、牌赌、逍遥的敌人。有些军官怕她比怕郭军长更厉害。她象是五十军最有良心的人。我也听说她和郭军长为了部队购买必要的药材，曾向娘家婆家要过钱。

每天我坐轿去访问五十军各单位，也看了它的医院。医院为了我们访问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石灰粉刷未干。医务官和工作人员均不合格，甚至连疟疾发病原因和科学诊治方法都不知道。因为五十军去年仅得到二千奎宁锭剂，在一个疟疾流行地区杯水车薪他们也难以治疟。

郭军长和他军部几个人一天带我去军训营访问，那里有两百名待任命的军官和一百名受过教育的青年正在受训。后者出来从事政治工作。他们请我讲世界各国对华态度和日本在英美的宣传情报活动。这两个问题我从上海寄给我的杂志，集累了大量材料。我在演讲中毫不掩饰地说，在为祖国献出生命而战的人们中间也有为日本人出力的汉奸卖国贼，美国人有从事日方情报工作的，我例举了一些人的名字。我的演讲他们花了很多小时的会议讨论。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有些我能解答，有些我回答不了。不过我观察到军训营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侧面，人们在这里努力学习，争取掌握了解艰苦抗战的一切本领。

讨论中间，可以听到远处江边大炮隆隆地震声，因为五十军部分新式炮兵队在朝敌人的船舶和据点发动炮击。我们听到越来越近的轰炸机声时，才停止讨论。营房孤立 in 开阔的山谷里，我们听天由命坐以待炸，没有跑警报，每个人想着不死即活。敌机飞过，我们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继续开讨论会。

另一天上午军部开运动会，军部的警卫、参谋、郭军长和几个妇女参加了竞技比赛。五十军重视体育训练，郭军长是一

个网球爱好者。各种球场、田径跑道、拳击和剑术的赛场都布置就绪。在天清气爽春光明媚中我似乎没有见过那样健美的选手。体质上他们要比新四军战士好的多。我问郭军长为什么不向长江下游一带其他兄弟部队开展体育运动比赛，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体质和友谊。他同意但犹豫了一下说：“我担心它会遇到政治上的反对。”他的意思当然是指那些反对新四军的政工人员的反对，那些政工人员是极力阻止国共部队之间的友谊增进的。

我们常在一起看五十军前线服务团青年学生演出的现代爱国话剧。戏是好的，演得真好，因为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天才的演员。某晚，军部参谋演出京戏，办了豪华的戏装。郭军长精神饱满，多才多艺，爱听京戏。但京剧宣扬封建德性，现在中国人鄙视它。参谋顾问唱封建京戏，青年学生演爱国话剧，各有所好，又具体反映了军内两种矛盾的侧面。

散戏回来的路上，郭军长太太突然掉头问她的丈夫：“戏衣的钱归谁出？一套彩衣值几百块钱！”

“啥子事情？啥子事情？”军长吃了一惊。

“这样花钱真丢脸！我们穷得一塌糊涂、正在为国家生存作战的时候，”郭军长太太的话里夹着哭声。

郭军长对这类事很少考虑，但他的太太处处留心算计周到。他们走后，张医生笑嘻嘻地说：还是郭太太比军长强。

张医生一天晚上偶然碰见一个从前线回来的旅长，一同走进参谋部大院。张医生后来告诉我，他们一进里屋，掀开门帘，就有一股令人作呕的鸦片气味迎面扑来。大会客室里摆了几桌麻将，参谋顾问和他们的太太，政治部主任夫妇也在内正在搓

麻将，跟前一堆堆钞票和银钱。人们点了下头毫不在乎地请采访客人打四圈，真是恬不知耻不以为非！张医生说她会打麻将，但在旁边留下观战。郭军长太太正找张医生，这时不期而至。她坐在门边一言不发，没精打采，冷眼瞧着。每个牌桌上传出了悄悄细语声，接着人人起立鸦雀无声地狼狈地盯着她。

“张医生，我正找你。”她尽力提高嗓子说：“我带你去看看鱼塘去。”

张医生跟她走了。穿过漆黑的街道没有说一句话。在村边找到鱼塘，毫无所见。矮小的个子身着布衣还是不开腔，她转身走到旁边失声痛哭，张医生上前抓住她的手，安慰她道：“不要哭吧！我明白，我们的国家有两个世界，一个旧世界一个新世界，你和郭军长是新世界的。我也是。”

她们俩人手牵着手回到我们的房子里来了。

后来郭军长本人也来同我们消磨了几个小时。回忆那个晚上，永世难忘。我们长夜交谈，不象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也不象是一个军人和老百姓，而是象追求一个自由、进步、新的生活的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我又一次体察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聪明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

我从搜集到的五十军伤亡统计数字中进行研究，了解它的死亡比伤兵数字大。这种情况令人可怕，它说明了这个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极坏，老百姓在战斗中不帮忙把伤兵抬到后方。医务人员不但不符合医生条件，而且有时擅离职守。敌人进攻，他们逃之夭夭，丢下伤兵不管。大家知道国民党军队的伤兵丢在战场上总是被鬼子兵杀死。而这个军队看来没有打扫战场救护伤兵的制度。据我所知，日本军医院里未曾收留一个中国伤

兵住院治疗过。因此，五十军伤亡统计数字损失严重：死亡八千，一等残废三千。

我和郭军长在一个晚上的谈话中间讲了一件新闻：我听人说他的一个军医官在南陵前线上临阵脱逃，丢下医院全体伤兵自寻生路。有十九个伤兵爬到山坡上，雇老百姓把他们抬到新四军医院。郭军长表情严峻，询问时间、地点和具体情节。郭军长太太立即把那个军医官叫来了。他抵赖狡辩，甚至撒谎。我重述了事实，注意他特别害怕郭太太的样子。最后，他战战兢兢筛糠似地一连鞠躬退出室内。一阵沉默过后，我说在全军政治教育抓得不紧、风纪松弛、士气低落之际，临阵逃脱是不能由个人负责的。

当晚郭军长和我谈到他的军医官到长沙湘雅医院受训的必要性，并且谈到急需在东线设立分校。在鬼子随时可以发动新的攻势急需军医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派人穿过战区去受几个月紧急训练是非常困难的事。

我问过郭军长太太，为什么她不去军医院作点服务性工作。她说对药物一无所知。我现身说法我也不懂医药，但是我们都熟悉家务，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担架需要多少，饮食饭量多少我们是一清二楚的。我见过也确信有些家庭妇女负责军队医院比许多前线上的军医官和医助护士会更好的救死扶伤、活人性命。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军官太太们不能抛弃军部的无聊生活参加医院的工作，我不知道道理何在？

我在五十军向红十字会医务团写了一个报告，敦请林可胜博士速送应急医药物资来前方医院。并给医务工作人员颁发医疗手册。最后我应郭军长的请求，催促林博士视察一次五十军

医务工作并进行内部整顿。

新四军来电催我速返会晤刚到的红十字会医务视察员。于是，我对五十军的访问遂告中断，急忙动身回去报告我这次观察所得的种种印象。

一年半后郭军长解除了五十军军长的职务，因为他太进步得不到政治部主任的支持。他和许多青年军官在战场上阻止五十军对准侵略中国的民族敌人的枪口转向新四军。

三十一、鬼子的铁蹄

我们走近芜湖南面、南京西面宣城市城的时候正是六月底，北面五英里外有日本人一个强大的阵地，到长江边的大路上还有许多敌军据点。我们一部分人沿国民党政府早年兴修的许多公路的一条公路进军。从这里到滨海一带是敌我争夺的一个主要战场之一。激战在这个战场上打过而且不时爆发。

宣城曾经多次易手。我们到这里前不久最后这次失守，敌人抢掠二、三十万担积谷运往芜湖。占领期间敌人还引来了几百芜湖流氓地痞和一些日本高丽浪人。那些狗腿子，把老百姓的东西洗劫一空，向他们的主子奉送，从中分得一杯羹。

鬼子没有破坏的东西，均被狗腿子们烧光无遗。整个地区象一场恶梦。大路上满有残缺不全、四轮朝天的卡车、炮架，旁边还可以依稀辨出有红十字徽章的救护车辆。炸弹坑遍地，战壕积水，弹洞累累的军车、死骡和炮身成堆。过去路边星罗棋布的村庄已成一片废墟。见到几个衣衫褴褛的老百姓，他们象鬼一样在废墟中徘徊、卖花生、开水供应过路人。

我们走进宣城城郊的时候天快黑了，大雨倾盆而下。颓垣

败壁，危墙耸立，焦椽破屋、瓦砾成堆，破损砸坏的汽车、生锈发霉的大炮堆在暗处。老百姓在墙边用断梁、油桶、铁皮搭起了难民窝棚。可怜的人们天一黑就早睡了，低矮的开口处横着树枝作为柴门，以防野犬豺狼进棚。

水阳江河面宽阔，流过古城城墙的东面。河上两座石桥均被炸过，一座全毁，一座上铺木板，鬼子攻来，随时拆除，我们从摇晃的木板桥上过河。

抗战前宣城有十万人人口，好几万人死于鬼子的空袭轰炸扫射和屠杀。留在城里不过几百人了。一条容易摔跌的卵石铺成的街道上，一边有一些部分修复的矮铺子，里面明灭闪动暗绿的土蜡烛光或花生油灯。这条街有一幢房子，鬼子被赶走后发现里面有十几个裸体妇女的尸体。临街的门框上还有“大皇军慰劳院”的字迹。

我们走过宣城大街时，见到一幢青石砖墙洋房，进口处刻有美国美以美教堂的石碑，房墙屋顶完好，门窗都没有了，从门洞里向内望去，全部损坏。日本人把这个教堂当作军事法庭，在地下室拷审中国俘虏。从中掏取军事情报。

教堂所在大街对面有一口古井。同许多水井一样，里面积满中国兵和老百姓的尸体。饮水污染，许多老百姓死于神秘莫测的流行时疫。部队把所有水井填塞用水泥封住了。教堂对面那口井的泥盖还未干，墙上歪歪扭扭的草书写着红笔字体：“巩固东亚新秩序”的日本口号。我盯着那水井和标语，走进阴森可怖空洞无人的教堂里面。发思古之幽情，不禁想起了日本人经常鼓吹的要回到成吉思汗时代的话题，暴君的幽灵而今又在笼罩世界大地，鬼子兵以成吉思汗的杂种子孙的当然继承人的

后代自居，鼓吹莫须有的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巩固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干尽灭绝人性毁灭中华民族的亡国灭种暴行……。

我们在一座两层楼房的旅店里开了房间，这里过去是美国的一个加油站。屋顶已经炸掉，简易修理过。向外看楼下街道上危墙耸立，瓦砾成堆。一个堂倌端来了一盆热水，我怀疑地望着，他向我保证而今所有用水都是从上游河里挑来的水。

我把毯子在铺板上打开，换了一身干的军服。还没有收拾完毕两个军官就进来报告。一个是驻防宣城地区的东北军一〇八师的上校，象许多东北人一样，他们俩个都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长得英俊，特别和气，很有礼貌。他们听说我到了宣城，即来欢迎，请我到师部去作客。并盼我马上就几条街那边的训练部去作报告。在前线的每次欢迎总在心头燃起无限温暖的火焰，象身处在无声之爱，超出一般的友谊或爱情，战斗友谊之爱的乐土里，总可以遇到英勇战斗、为国捐躯、志在报国的无名英雄。

我们打算吃晚饭后去，因为走了一天，日晒雨淋，仅早上吃过一点花生，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他们坚持我们是他们的客人，在师部吃过饭就去训练部。有两三百军官和政工人员正在受训。同时部队一些军官集合在黑暗的院子里，灯火很少。

在黑暗中，我尽力讲了一通，大家必须振作勇气，坚定信心，抗战到底。在我们美国，尽管一片混乱，贪婪成性，绥靖主义的法西斯分子想要淹没自由人士和工人抗议呼声，也还有千百万美国普通老百姓和少数头脑清醒开明的领袖人物，如罗斯福总统、匹特曼参议员等，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战。我把加利福尼亚、加拿大、英国、荷兰海港工人反对装运战争物资运往日

本的罢工事件，抵制日货运动，筹募给中国捐款的团体组织等等零星片断的消息串在一起，勾画出一幅一半说谎的图画。以后的一年半中间我在中国战地向军民如是讲演，谎言多过事实。如果这天夜里我讲了真话，不过是痛苦呻吟有心人的警告：

“同志们，兄弟们！我是一个美国的公民。我们美国给你们敌人供应物资来杀害你们和你们的同胞。我们反对这个。但人数很少，我们有罪，感到羞耻。但是，美国的企业资本家估价利润高过人的生命，多数美国同胞把你们当作是“洗东西谋生活”的中国佬。

你们也许会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同你们不一样，我们的同胞识字，有公民权利，这就是使他们能人尽其材、发挥所长。如果他们愿意紧跟老板们的大棒行事，他们能够照办。不然他们就会动脑筋坚决反对。世界在他们的脚下，只有学习、斗争和思考才能获得它。我们有许多拥护人性自由的伟大教师，我们立国的基础是革命。你们老百姓虽然大字不识，不能读书，但是我们的人民比你们知道的事却要少得多。

当我在你们中间学习斗争共同前进的时候，你们对我们美国人宽宏大度，对一个帮助你们的敌人的国家的公民这样友好优待，真使我惊奇。”

我并没有这样讲话，我对他们说谎，因为有希望的人们打得最好。可是我不能对那些醉卧沙场为国捐躯的志士们把一切罪恶事实加以掩盖。我的讲话结束后，黑暗中发出了东北人常唱的流亡念乡曲《打回老家去》。然后，同来时一样，阴影在暗中齐步走了

第二天我们登上城里的宝塔山，俯瞰全城被劫后的汪洋大海，这里过去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它曾是一个旧的给新的让位的城市，十里洋场柏油马路，街道整洁，发电厂供电照明，学生在公立学校、技术大学读书。城外的郊区也扩建兴隆了。而今一片荒凉，疮痍满目。日本飞机轮番轰炸，把大街小巷、马路衢道，夷成平地，高楼大厦、民房店铺化为烬。一块一块地方不见一堵完好的墙壁。贫苦老百姓在瓦砾堆中翻拣破烂，挑拣铁器、搪瓷、簧锁、家具、衣服靴鞋等等，摆在墟市路边出售。

山边有一个旧宝塔炸坏了。炮兵掩体的空炮一部分藏在伪装簇叶下，山头城壕密布。宝塔墙壁上有日本兵用铅笔写的“美哉！一个城市的毁灭”的抒情诗。

我们走到城头一座小山坡上，那里有三所学校，一所是技术大学，那是青年学生读书的地方，学校被炸，楼舍被毁。院子里堆着桌椅残缺不全，几间教室，未受破坏，小学生照常上课。东北军占了几间作新的训练学校用。我们到那里时，教师停止讲课，学生涌出，整队齐唱爱国歌子。

山脚下有一所前美国教会高级中学的校园。学校房屋被日本人当作兵营驻扎过，房子里面零乱不堪，墙上涂满日文口号和下流的话。我们在一间房子的角落里靠地板处发现一段日文词句：

“到处是战斗和死亡，现在我也受伤了。中国地广人众，力量无穷。我们象大海之一滴，少得可怜。这场战争，没有目的，我要回家，今生不能。”

一天早上，宣城县的大街小巷又回荡着进军脚步声，这是附近乡村的身体结实、雄赳赳气昂昂的武装民兵和老百姓同驻军部队一起，刺刀闪闪，歌声嘹亮，到中心广场集合开会。广场尽头有一座钟楼，里面一口古钟，敌机空袭时可以敲响。修理过的房屋和火烧过的墙头上点缀着旗帜，贴着中英文标语。东北军士兵们“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我们走过的时候，见到两个提着油漆桶和彩笔刷子的战士朝我们微笑。后面墙上墨渍未干刚刚刷了一条新的标语口号：“民主呼声《曼彻斯特卫报》万岁！”

我们爬上钟楼的楼梯到阳台上，见到宣城县妇救会的会员们，一组青年妇女正在布置会场的最后装饰。她们都是二十来岁受过教育的妇女，聪明、热情，对一个能够亲身来到长江下游战区充当第一手报道的妇女，她们感到自豪。这一天会场讲演者尽是男人，为了尊重女性，一个妇女提到我。在大庭广众之中，她一再挥手指着我的方向，要人们看看我这个解放妇女的台柱，“男记者不敢报道的她敢！”会场上群众对我飞来敬佩的眼色。

形势喜人，鼓舞斗志。我们身在一个城市的废墟之中，人民太穷，除一身穿着外一无所有。城北五英里外就有一个敌人的强大阵地，芜湖机场鬼子的飞机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对手，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光临，但我们可没有一尊高射炮欢迎它们。岿然不动地站在我面前的每一个人正在准备同死亡相搏，他们大讲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一个妇女讲话，她坚持男女平等，妇女一定要争取解放。

三十二、过江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夜日记：“再过一星期，我将实现几个月来的梦想，即在日军据点中间横渡天堑长江进入安徽省中部敌后广大地区。新四军现在皖中的游击队有一万五千人，是深入敌后的抗日正规军队之一。叶挺将军今天对我说：“此行艰苦如穿过黑非洲，行程数月后可到重庆。”

八月三十一日日记：“今天正午，新四军军部把尼赫鲁问我“何时何地可以见面”的电报转给了我。尼赫鲁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贵宾刚到中国不久，他可能在中国停留几个月，还会访问各个战区。我给他回了一个电报说他可在鄂西老河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见我，否则我再过江乘车去渝见他。因为我要同他提出大量援华医药物资取道印度运往中国的问题，并建议他派遣印度志愿医疗队到中国接受游击战争的训练。

尼赫鲁在狱中写的自传我拜读过两遍，这本书的魅力一直吸引着我。我认为一切人物传记均能在人们的心中激起共鸣，它表达人物的思想愈真实愈普遍愈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尼赫鲁自传这部著作中许多篇章的确打动了我的心弦。如它在地方写道：“我成了一个东方与西方荒唐混合的东西。在国内落落寡合，在国外格格不入。我与西方无缘，身在西方，心是过客。一个流亡者，回到国内亦有亡命之感。”

我在中国，已经十年。来时中国对我只是一个可能到印度去的过道。中国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当然也赢得了我的关心。生活战斗在中国，土地人民抚养我成长，中国如同我的乡

主。但是，正如尼赫鲁在狱中多少次梦游喜马拉雅白雪皑皑的群峰和碧波清澈水天一色的玛法穆错圣湖一样，我始终梦想总有一天走过中国前往印度。惟恐岁月催人，如尼赫鲁说的老得难以实现自己本初的计划。我给新四军《抗敌报》月刊写了一篇尼赫鲁自传的书评。军部抽了一个同志把它译成中文准备刊登。明晚我们向长江边进军，终于有访问安徽省主席的机会了。

以上摘自我在长江南岸最后几天的日记片断。我们动身前的早晨，项英副军长情绪激动，压低语调告诉我：“苏联刚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整个国际局势一下变了。”

整个国际局势正在变化这种老生常谈的日常用语引起了我的怀疑和伤脑筋。人民中用流行的口头禅念念有词，带有催眠术的味道。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从政治上看问题我不能不懂装懂，但我看不出“整个国际形势一下变了”。我看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只是权宜之计。法西斯德国发动侵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这种看法一刻也没有动摇过。一年前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赤裸裸的暴露出他们推动德国法西斯部队向东进攻苏联的狼子野心。德苏协定是苏联破釜沉舟的回答。无论怎样，德国纳粹分子及其轴心伙伴日本军国主义照旧是苏联最危险的敌人。国际局势的格局仍然未变。

后来几个月我对国际局势的发展线索很难掌握，因为一年多来我看不到外国出版物，而中文报刊只有一家发表世界消息。老成持重深思熟虑的孤立主义与和平运动在全国轰起，这是我所听到人们说的唯一国际变化。据报道，美国孤立主义权威人士在美国国会里拥有强大基础，有些领袖得过希特勒的奖章。英、法、美三国的共产党人也致力于同所谓的“德国人

民”开展所谓的“和平谈判运动”。

有很多中国友人经常向我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美国国会拒绝在关岛设防是否受了日本人的贿赂？我以为值得怀疑。中国共产党人问，为何英国工人反对普通征兵？英国工人仅同意征收统治阶级的财富，但反对征集人命充当炮灰。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个时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尽管苏联对日维持一种不战不和的休战状态，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同日本“和谈”，因为一讲和，就等于在中国人民的血海深仇里注入解冤剂。他们清楚，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进步人类最主要的敌人。虽然国民党政府里面的当权派反动透顶，但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鼓舞人民向前看，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心。

我随新四军在江南一带生活战斗八个月之后，现在冒险深入江北赤地千里的广大无人地区。到现在为止随军转战如被迫转进还有后方可走。一到江北这就不复可能了。因为江北地区南临大江，东接津浦路，北靠陇淮路，三面均被敌人包围。日军占据江河一带的各大城市，其主力部队把守铁路江淮沿线，此外有两三条公路切断这个地区。然而几千万中国老百姓照旧生活在这里，固守在这里。有一万五千人的新四军人员不断增加，处境非常困难。

渡江小分队由一百名战斗经验丰富的军政工作人员组成，政工干部中有一个受过培训的前线服务团青年小组，我随这个支队过江。跟我们过江去的还有第一个到江北游击队去工作的医疗组，里面有一个合格医生、沈阳医学院毕业的龚大夫，四名

合格女护士，十名刚从新四军医务训练班受训半年结业的学生。

我们这个小分队仅有四个人知道行军路线和出发时间。九月一日，我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事先放出空气说我们是到后方去工作的。一大队民工担架队在天黑时来挑东西，因为仅医疗小组就带有足够半年用的医药器材用品。军政工作组带有印好的教材课本和一个印刷机。每个人奉命精简，只准带随身日用的必需品。我的打字机、照相机、卫生箱、行军床由一个民工负责搬运。军部特别指定一个参谋跟我，还有一个特别警卫员蔡禄护送我。蔡禄是八个月来一直跟我走遍江南一带的身强力壮的青年游击队员。他是一个“老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艰险有趣的战斗生涯。

因为一个外国人走过一个战区的消息很快会被日军知道，军部还给我提供了一乘遮盖严密过村乘坐的轿子。黄昏时刻，我们医疗队随担架员动身，行军一小时后在一个孤林里等冯达飞队长带领的人马，他们跟着也来了。冯队长三十来岁，当过红军团长。新四军训练营教务主任，这回负责整个小分队。

大家到齐后，冯队长叫我们整队，他第一次作报告讲了经过地区地理的确切位置。他描绘出一幅并不乐观的图画，说我们在天亮以前走过的一带地方是一个经常打仗的地区。这是下旬月上五更摸黑赶路最安全的时候，游击队到处出没，日本鬼子照例不敢夜间出击。

他说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保密。一星期前军部派出便衣侦察人员深入敌占区城市。到上下游一带侦查敌人有无异常活动。到现在没有什么显著的情报。行军途中不准讲话，不准吸烟，不准擦火柴，不准亮手电筒，一个接一个紧跟前面的人

走。晚上漆黑，前面的人上坡下地，跳沟翻渠，后面的人跟着亦步亦趋同样动作。

“走吧！”我们的队长发布了命令。我们开始成单行沿小路前进。

走了三个小时，队长向身后的人悄声传令休息。传话一个接一个悄声向下传，我们立即坐下休息，没有任何声响。十分钟过后悄声传话的命令又传来了，我们起立继续前进。

我们这样走了一整夜，黎明时我们到了一个小村庄。天色越来越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儿是个战场和站在四面山坡上荷枪站岗的民兵身影。我们吃罢饭就躺下睡觉，放心地在人民怀抱里休息。

傍晚，我们吃了一顿有一碗炒白菜、煎鸡蛋的米饭。休息片刻，继续赶路。一小时后在一个野地无人的地点等我们的队长作第二次报告。他说：没有什么新情况，从现在起我们走过村子的时候必须千万小心保持肃静，不要惊醒睡梦中的老乡们，大家穿的布鞋走路虽然无声，过村过户时还是要求大家踮着脚尖轻轻走。

我们走过睡入梦乡鸦雀无声的村庄，不时见到路边站着几个民兵的黑影，肩上扛着枪，茅屋、土房、墙院里传出一声声病人的咳喘声。这一带瘴气浓重，疟疾流行。军区没有治疗全区老百姓病的医药或医务人员。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见到一个高大民兵的身影持枪站在树影下，他悄悄地说道：“向左走！”除了这声命令和“走吧”的传令，通宵听不到人声。爬上盘山小道，下到河谷溪径，又走上山路，慢而又慢，天亮时我们发现还在不远的地

方！起早摸黑的农民在山谷内收割成熟的庄稼了！镰刀嗖嗖的割稻声，禾把啪嚓啪嚓的脱粒声，山坡田间，一片喧腾收割忙的景象。几个扛枪持矛拿着梭镖的老汉站在山包上来回瞭望，注视着山口外远方的动静。

九月三日过江前，我们在一座山上的荒凉破庙里大休息。睡觉前我们登上山顶俯瞰十英里外浩浩奔流白浪翻滚的大江，看到一个象登陆艇似的黑呼呼的庞然大物轧轧地溯江而上。西面日军盘据的荻港上空一缕缕青烟袅袅上升。冯达飞队长手指山下平原中离江岸五英里处的两个市镇说：“那是敌人的据点，今天夜里我们要直接从这两个据点中间插过去。”

傍晚，我们起来没有吃饭就走。砍倒的树木封锁道路，必须在灌木丛林中费力择路而行，我们身在洪黄山上，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一营营部设在这里。我记得陈凌衡营长坐在风物宜人、气候清凉的小院里的情景。他和麻占英副营长以前都是农民，均在红十军里当过指导员，红十军的领导人是早已牺牲的中外驰名的方志敏烈士。

陈、麻营长和营部参谋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围在一起和我们共话。他们在村子周围布置了一道警戒线，严密封锁不让山下驻防日军得到我们来了的消息。我在一群青年当中，他们的年龄都不到三十岁，冯达飞除外，他们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他们告诉我们：昨天夜战，伏击鬼子，干掉很多鬼子。我们边吃饭边听他们讲：“我们这次的战斗不是游击战，也不是运动战，更不是阵地战，是一次什么都不是的摸黑战！山下平原之敌，不过千把，如果集中我们沿江一切兵力，分成战斗小组打游击战运动战，我们一天可以把平原的鬼子扫荡干净！”

他们在桌上摊开一张军用地图。开始讨论我们的过江问题。“其实，山下平原甚至远处长江尽收眼底，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地图。我们到上岸码头时西距敌军据点荻港二十里，日军炮艇几分钟内可追上我们。横渡长江需时四十五分钟，我们的船到江心敌人才能得到我们渡江的消息，再十五分钟我们即近北岸，江北我军可在江边同时用重机枪扫射转移敌人攻击目标。”有人说。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不过一次小游长江而已，我们的人就喜欢这一手。”一个参谋说。

我记得对这一席话最典型的反应是龚医生的警卫员蔡班长的动作，他是一个贫农出身，三十来岁，几个月前参军入伍的战士。起初，他可有点害怕，现在他满副挑战姿态，昂首挺胸，打着哈哈，手指头掰得格格作响。过江会议一完他手舞之象是在对日本鬼子喊话了：“你来！快来！鬼子野杂种！”

我还记得我的警卫员蔡禄一身是胆，生气勃勃，高大个儿，站在我的身边，注视我写战地日记的情景。我把我的手枪给他检查，他拨弄调整好了说：“来吧！”我合上日记把它放进提包，小蔡挎上提包就迈开大步。他年轻力壮，总是争着帮我拿东西，坚持减轻我的一切负担。

我们离开小院到一个小林子里。我发现那儿人们正在集会、场面真是壮观！一边，一个连的全副武装战士集合在一起，我们过江支队各个小组的同志们、民工担架员坐在地上另一边。担架员都在掂量着他们的担子。天色慢慢黑下来。我们穿过人丛和什物堆，找到医务组的位置，我的秘书正在那儿同别人嘀嘀咕咕低声谈着话。

“听着了，同志们！”夜幕低垂中传来冯达飞队长的讲话声音。他在作最后一次过江报告了。他说：“今天上午，有一艘日本炮艇在我们过江下船必经的村子前面的江心里停泊。敌人放了几只汽划子靠了岸。鬼子对一切人等进行盘查，强迫人们脱衣搜身，检查额头上有无军帽痕迹。盘问人们见过听过任何散兵游泳没有。人们说毫无所闻。鬼子炮艇灰溜溜地开走了，到荻港码头停靠下来，不是什么情况特殊的异常活动。沿江上下我打进敌人据点的同志们送来的情报也告诉我们，没有发现引人注意的敌情活动。”

他继续说道：“当我们穿过山下平原敌人据点中间的时候，要是听到左右两侧响枪的声音，用不着害怕一直向前走就是了。一个跟一个的行列不变朝江边走。沿江上下十英里内有我们的部队，奉命抵抗，阻击敌人，决不后退，掩护我们过江。护送我们的武装人员掌握一切敌情。如果我们抵达江边而敌人炮艇正开过来，我们等待敌艇过去然后过江。如果情况严重发生意外，当然啰，我们就撤退回到这里来。一切的一切在于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和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如果你同小组的人失掉联系，只要头脑冷静自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一到江心就决不后退，只有过江。

“你们中间有的同志病情严重打摆子，有的脚上起泡难走路，不要管这些。今天夜里振起精神一鼓作气过大江！路上休息的时间不长，一律不准出声，不准点火，不准咳嗽！想办法不让野狗乱吠。担架员们，检查一下你们的担子，吱吱唔唔响的地方用草堵塞住。同志们！把个人的白洗脸毛巾一头塞在衣领子里，一头露在背后让跟在后面走的同志暗中见到白毛巾。

我们快到平原了，路宽好走，不要掉队！现在给大家十分钟时间作最后的准备！”

一阵督促检查急忙骚动声，十分钟过去，黑暗中传出冯达飞队长的命令：“走吧！”

我看见武装护送队的黑影子一分为二，一队先行开路，一队在后押阵。我们五百人左右的一支队伍跟着出发了。在走下七弯八拐漫长的螺丝谷曲径山道时，眼前一片漆黑，我真寸步难行，于是走出单人队列扶住蔡禄肩头，一步一步下到谷底。

在接近一个漆黑沉睡的村庄时，我们听到野狗汪汪的狂叫声，一直到我们的后队走完叫个不停，前头队伍进入另一个村子吠声又起。群犬交响吠形吠声。一路夜行无法不让狗叫！行军中除了担架员沙沙地步子、吱吱地扁担换肩的响动，万籁俱寂，不闻人声。我总是见不到什么东西，有时浮云飘过，露出星光，黑茫茫中依稀可以辨出走在我前面的两三个人的身影。

我们又接近一个村子的时候，队伍中间传出了“休息”的耳语命令。大家就地静坐休息。一个担架员俯卧在地拿出旱烟管想擦火柴吸烟，总被旁边的警卫扑灭了。我坐在那里一棵丛树下有一座小土地庙，神龛里点着一支蜡烛，刚点亮的。这是一切平安无事的讯号。我的警卫员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我们现在就要直接穿过敌人的据点中间了。”

队伍里传来了“快速行军”的耳语命令！

我们起立。开始了急行军，时而加快步伐一阵小跑。突然间，我见到两个战士手端冲锋枪在我的身边左右两旁的稻田里跑着。他们奉有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守在我的身边保卫我的安全的命令。我们有时翻过上下起伏的荒山，有时爬过高低不平的

田垄。时而快步飞跑，时而弯腰疾走，极力避免敌人的岗哨发觉我们队伍的踪影。

夜色昏茫，大地沉静，枭鸟的鸣叫，树林的清风，不时传入我的耳鼓。浮云掠过，天空的星星分外耀眼。我听到左前方远处有一声隐隐约约的喊叫声、象水牛的叫吼，它一连鸣鸣的叫了三次，接着我又听到右后方远处一声的啊呼应声，我明白了这是游击队员或民兵在给我们打信号，一切平安无事让我们放心赶路。队伍里没有传话命令，黑暗中没有报警枪声。一股暖流油然涌上我的心头，中国有这样伟大的人民，守土抗战的游击队员和卫国保家的民兵战士，叫我如何不从心底热爱！这个晚上使我更加深深地热爱他们。我们夜行过江的事惊动不少的老乡们。他们心照不宣高度保密的精神深堪钦佩！

队伍里接着传下来“休息”的命令。蔡禄高兴地悄悄对我耳语道：“我们插过敌人的据点了！”

人们打打闹闹一下子乐开了。我们在一座小山坡上休息。蹲在深沟下的人们中间有人擦了一根火柴点着一支香烟，霎那间烟头火光闪遍整个山坡，一条长龙火把明灭宛如萤火虫晶晶闪烁，我们的队伍全部清晰可见！蔡禄见此光景。怒喊一声，跳下稻田向后方跑去。担任后卫武装护送队迅速上来。他们走下山坡时我见一个个小萤火虫光一点一点熄灭了。

十分钟后，我们又继续行军，一步一步走着。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进村没有听到狗叫声。我们的小组在一个集镇的小街中走过，这时我辨别出街边摆着一长排方桌，每张桌上摆有十多个粗碗。黑压压的男女老少和孩子们，伸出瘦嶙嶙的手端着茶碗请我们喝滚开水。轮到我刚接碗喝水时，村子里什么地方

突然一只狗汪汪狂叫了起来。一个孩子的身影从桌子下面钻出几个箭步朝狗叫的方向跑去。接着一阵哈哈笑声。之后又归于平静。我把饭碗还给一个看不清楚的面老乡手里，使劲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千言万语无声的沉默表示多谢之意。然后三脚两步匆忙火急赶上我前头的同志们。

大江步步靠近了！我们走到防汛时期分洪拦水的江岸高堰防堤上。两边是沼泽地，繁殖蚊蚋所在，沉沉在酣睡中。一个鬼子亮相了：赤橙黄绿变化多端的下弦月悬照在山后暗空之中，象赤发鬼似的暗淡汽灯照着我们，照着黑茫茫暗森森的堤堰和沼泽，我能看得见支队前面长长的行列中部分人影了。大家气呼呼地疾走，小跑。担架员们缓慢而有节奏，呼噜噜地挑着重担前进。

突然，队伍耳语传出停止并疏散的命令。人们猛地站住，一阵慌乱，预感大难临头，我们蹲伏在地，紧张焦急地望着暗中的动静。这时，人们七嘴八舌，嚷成一片。于是，上面传出一声愤怒的命令：“不要讲话！”

蔡禄的手指着堤下，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前盯着堰堤下面一个村子的围墙里面正燃起一堆篝火，浓烟滚滚上升。象是在烧纸。火光一阵，随即熄灭。这又是一切正常平安无事的信号。

“快速前进！”的命令来了，我们又急忙跳起急走。除了那天上的鬼脸儿残月作怪，我们心中有数，更踏实了。

这时，我听到身后一阵跑步声，随即看到后面护送的战士们飞快从身边掠过。他们成散兵线包围住前头的村子。端着枪顺土墙进村站在院墙外观察有无敌特汉奸放火报信的活动。

堤下走来一个身穿白衣白裤的民兵，他象个夜游神。这晚

上出没在堤堰上。他过来了，我赶忙低下头不让他看出外国人的脸相。他在我身后停下说了一句“一切正常！”随即转身逍遥自在悠悠地走了。

我们没有进村去，相反，走到流入长江的一条小河岸边没精打采地停下来。有两条大船靠在河边，波涛拍岸，白浪打船，哗啦不绝。船帆高张，跳板搭好，等人上船。我们医疗组担架队一上船把担子轻轻放下就钻进舱里去了。不过几分钟两船满载。我们等在岸边，耳听人们细声细语的谈话。蔡禄拉着我的手说：“上这条船，它先开！”我和秘书连跑带跳走上跳板，竟忘了跟蔡禄道别。他当天夜里要同武装护送队赶回山里去。上船后，我听人说这一船先开，过十分钟第二条船继开。遇上意外第一船有抢先幸存的优先机会。

我们医疗小组的人们大半精疲力尽，躺进舱里不顾风险，眼睛一闭睡得跟死人一样了。一个女护士寒热发作打摆子几小时了。船尾的长橹吱呀吱呀在摇，船身在动，进入烟雾迷漫、广阔无涯的长江。白浪滔滔，水天沉沉，有如大海展现在我们眼前。从江上乱飞群鸦估测江面宽不过五英里，即十六华里。从下船处到过江登陆地实际有二十三英里即七十五华里宽。

我们提心吊胆地盯着黑森森的江岸，树木房屋慢慢消失在后。弯弯月儿当空，照在江面上，现出一条万千耀眼的银光大道。浮云片片掠月，江山层层显影。河风劲吹，满帆高张，护送我们鼓浪前进。我们兴奋之余，提心吊胆眼望着雾里长江是否会出现敌人的炮艇！竖耳听岸上是否有射击的枪声传出。

帆篷突然转侧，舵手掉转船头向浅岸驰行，一阵恐惧袭上

心头。每一分钟如同永世。终于舵手掉转船身，满帆东风，朝北向水天一线一条长影处继续破浪掠进。长长的暗影处逐渐出现堤堰林木。左面有一个浅沙洲，敌人追来时我们可以上沙滩避难。沙滩边有两条大船停在那里。我船越来越接近那两条船了。

一个舵工跺脚大声吆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什么人？”对方回过来一声怒喝。

舵工暴跳如雷地又大喝一声：“滚开！”得到的是对方一声嗤笑。另一条船上也有人嗤笑答腔。这一下更使得我们的舵工火冒三丈。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些什么人在这晚上捣什么鬼。

“我们是方庄游击队侦察班的”对方终于冷冰冰的回话了。

我们的舵工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气消了，但余怒未消说了一句：“干你们的屁事！”

我笑了。现在我们是安然处在黑夜属于老百姓的地带了。

我们的舵工象没生大气似的讲起了鬼子骚扰的事：“今天上午狗杂种们串到我们村子里，他们搜身盘查，撕掉我的衣服，摸我头上有军帽痕迹没有。问我，‘你的你的中国兵的是？’我对狗崽子们说我没有见过丘八！只晓得有一个人刚从芜湖来。他动身前人家抓住他的胳膊打了一针，要他交两块钱的什么霍乱预防针，真是满嘴胡说货真价实的骗子！我敢断定人家给他下了毒！”

“王八蛋！”他唾沫四溅“呸！”地一声骂起鬼子的娘来了。空气顿时轻松下来，人们的话匣子都一齐打开了。

“日本人来了你打算怎么办？”我的秘书问我。

“这么办，用手枪。”记得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再有情

况，总有大江噢。”

他点头同意，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不抓俘虏的。

北岸的树木越来越清楚了，还有芦舍人家，持枪的哨兵站在江边隐约可见。船一靠岸，人们纷纷向下跳，十分激动地朝一群人跑去。全村出动迎接我们。一个穿白衣白裤的人上前自我介绍他是村长。

我们走进村子，在月光底下闪烁发光的敞地上坐了下来。一群人聚在一起唱起了游击队进行曲。十分钟后第二船人登陆，我们的队长冯达飞同志祝贺我们的军事训练取得成功，比他预想的表现要好得多。

离江北游击队指挥所还有十英里路，它设在一家父子兄弟同居的地主宗祠里。可供我们小分队全部人员住宿，我们将在那里停留几天。

这回是能够脚步和着脚步，肩膀挨着肩膀用不着成单行行军了，真是快事。堰高且宽，一路平坦。到地主祠堂过夜，我们实在太累，冯队长决定我们去四英里外一个小村去休息。

静静的小村还在梦乡，仅几个老百姓出来看我们在闹什么。场上房边放着一些收割农具。大家把背包在凉席、竹床、板凳上摊开，有几个人爬进麦秆堆里睡觉。几个人有蚊帐，我是一个。我把蚊帐挂在树枝上，蒙头睡觉。北方长脚黑蚊嗡嗡乱飞，叮人成病，都睡不着。人们烧起一堆堆树枝落叶篝火，不停地顿足，拍巴掌，难以入睡。

天色一亮，我们就动身朝六英里外吃早饭休息的地方行军。龚医生和我并排走，我一路嘀咕生平没有见过大如鸟儿般的江北黑蚊，我们又累又困又热又潮蚊子叮人真够呛！

江北大堤，一面有一道水坝。流水潺潺。另一面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谷子、高粱地。离开了江南鱼米之乡，一过江来到北国麦黍之地，江南属亚热带，江北属于温带，仅仅一江之隔。周围景物如同我所熟悉的那遥远的北平景物一样。

我们就是这样过江的。

第七篇 走过华中 (1939年深秋)

三十三、张云逸司令员和四支队

我们来到安徽省中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部的时间，具体日期我忘记了，但不是九月十二日就是九月十三日。龚医生和我每天用一部分时间治疗老百姓的疟疾病。自抗战开始以来疟疾病蔓延全国。南方的军队各地来回调动把疟疾带到穷乡僻壤难以走进的地区。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日本军队中也流行疟疾，发病成灾。不过他们有良好的医疗条件，每个日本医生和护士都动员起来投入战地救护工作。

我们走进一片开阔的平原，很快到游击队司令部，砖墙瓦屋、寺庙、祠堂隐现在树木参天的林子里。大别山脉的山麓在西北面蜿蜒起伏。眼前这片平原人们说是三国时期曹操讲武练兵之地。这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急急忙忙地朝村子里走，有战士有老百姓，一队一

队的喊着欢迎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前进。

第四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和参谋长赖传珠热情洋溢地出来欢迎我们。先让大家洗了个澡恢复疲劳，接着在柳树成荫、葡萄高架的院子里的圆桌上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我们靠在躺椅上谈话，消磨了一个值得回忆的夜晚。

张云逸司令员体瘦个矮，脸上挂着一丝含蓄的微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从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司令，后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在毛泽东的参谋部里有好几年。他是一个喜欢思索、书读得很多的人。我从他那里深受教益，学到许多令人鼓舞的新东西。

我请他为我详述在皖南听人们说的一个故事的本末。其背景是这样的：抗战前四支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作战的红四军，这个军队由于它的游击战术、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一套方法出色，而获得“模范红军”的称号。经过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一系列激烈战斗遭受重大损失后，主力部队撤出鄂豫皖苏区，最后长征到达西北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改编为八路军。游击队留在苏区，单独作战。一九三七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三千名游击队战士集中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产党员高敬亭担任支队长。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日军分头向武汉发动攻势时，蒋委员长下令四支队改编为两个团，在津浦路和皖中一带的公路上活动牵制骚扰敌人的后方。

同江南新四军主力分离后，高敬亭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地方军阀。他大权在握，头脑发热，腐化堕落，讨小老婆，格杀打捕，清除异己。军部供应的医药器材他倒卖给药铺商贩，他贪得无厌，胃口越来越大。

一九三八年冬末，军部派张云逸到四支队调查高的问题，改组支队，以便加强战斗力量。但是，高有一个掌握实权的帮派集团，张云逸对他们毫无办法。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过江视察，高在司令部周围派人特别警卫，威胁等待，这就是这个支队的背景。

我问张云逸司令员以后怎样了。他奇妙地笑了笑而后说道：叶挺军长赤手空拳向高的警卫连走去说：“高司令，我命令逮捕你！”高司令呆若木鸡。警卫连不放一枪，叶挺军长把高押到支队军人大会上公审，投票表决判处了高的死刑。六月，叶挺军长批准枪决他。

高司令的两个小老婆住在部队附近，都有了子女，他们向部队领取生活费，因为她们没有过错。

听了叶挺军长空手拿高的传说，我对他的敬仰之心油然而增长。我记起了他那倔强的性格，无所畏惧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对人诚恳，斗争性强。

这个支队最近抓到了一个替鬼子充当特务的汉奸，关在司令部里。这个家伙为了保全性命，供认他曾对新四军军部江南位置所在地打过调查报告，结果整个山谷被炸，死伤一百多人。这次轰炸我也在，真是死里逃生，险遭不测。当时，我躺在暗沟里全身发抖，眼睁睁望着敌机盘旋而下朝新四军医院掷炸弹。飞机跟在一群水牛后面，用机枪扫射，打死了十六头水牛。

这个汉奸坦白了他们的特务圈子。每个圈子有一个“大哥”地主或资本家当头头。他们这个圈子的中心在铜陵县日军兵营附近。一般特务每月工资十五元，有时“大哥”赏脸对每一个军事情报给酬一元。

有几个晚上，张云逸司令员和他的参谋坐在我住的一家老乡院子里，同我谈起特务、土匪、汉奸通敌的经济根源。皖中一带拥有数千亩田地的大地主，他们逃到上海、南京、芜湖、安庆等大中城市受外国人的保护，但是他们留下代理人照战前一样收租收债。利息租谷照旧不变。日本人任命的伪安徽省长聂道良就是一个大地主，他一直利用他的封建故旧亲友关系招兵买马组织伪军。现在省内伪军约有五千人归汉奸头子的亲友指挥。

日本人并不相信伪军士兵能同游击队作战，只是利用他们作为攻占城市的警备部队。游击队俘虏和解除了毫无战斗力的几百名伪军和受日寇收买的土匪的武装。没有部队保护，人们不敢出门。伪军经过再教育可以编入游击队。土匪则决不可能收编。

鬼子对付老百姓的战术非常狡猾，支队负责人说。起初打到安徽，杀人放火，想以恐怖和暴力征服中国。津浦路沿线七英里内为无人区不准老百姓居住。近几个月来有些狡猾的日本学者提出“和解”途径。一九三九年农历春节前后，开始没收铁路沿线无人区不当汉奸逃亡在外的地主土地，然后把土地分给农民，给每个农村老百姓一角钱过节，给儿童赠送糖果饼干。他们还指出日本兵不得奸污中国妇女。

日本人在没收土地分配土地中，穿着可以说是老红军那种破烂衣服，他们还从中国通那里学到几句口号，在墙上刷写“维持和平，繁荣中国！”“放下武器，种田耕地！”“清剿赤匪！”“打倒腐败的国民政府，拥护南京革新政府！”等等一类口号。

日本人甚至拿着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书派出流动医疗组

给老百姓看病，种牛痘，打霍乱、伤寒的预防针。

但是，他们的绥靖战术全不能奏效，失败了。因为他们是梦想征服中国的侵略者，一切作为在于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巩固权力，他的士兵杀人成性，无法无天。中国老百姓知道日本鬼子的真面目，标语口号糖果点心后面的一切狼子野心是掩盖不住的。

医生和护士们每天早上起床号一吹就行动起来。到山里去给部队检查体格。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的侧面。战士们以前从未作过体格检查，新四军是首先采用这种制度的中国部队。它在战士和老百姓中间引起了惊人的反应，人们有口皆碑，一说体检无不肃然起敬。第一批医疗队来到的消息已经广播通知各单位各连队，七副抬着伤员的担架也来了。村子里筹备成立一个新的医院，龚医生对一个伤员说医疗器材药品到明天才能运到。那个伤员回答道：“医生，没有关系，见到医生我就好多了！”

群众欢迎大会，妇女工作会议以及各单位访问等等告一结束后第四天我才有时间随医疗队巡视工作。黎明，军号叫醒我们，我同医生、护士走了一个小时，经过沙沙作响的竹山树林到新四军皖中三个支队训练营住的庙里。在这里受训的有一百八十名一般干部和准备提干的战士，教务处有十五个教员，一个女护士开了一门卫生学的新课程。

体格检查于中午结束，粗略统计的结果如下：一百八十五名学员中，百分之百有沙眼，百分之二十有疝气，百分之三十有疟疾，百分之二十有骨伤，百分之五十有疥癣。闹肠胃病的人数很多，浸润性肺炎病患者有八个。没有梅毒病人。这个统

计数字同各连队的统计报表相近。部队来了以后，当地老百姓的疾病情况统计也许近似。

我在下午同训练营的学员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学习和战斗情况。他们多半是老红军战士，贫农出身。其余是手艺人，一般打过九、十年仗。有些是“七七事变”以后参军入伍的，因为战绩被挑选来学习的。有一个知识分子政委。

学员们带我参观他们的宿舍和教室。主要上课的大教室里贴了一张大墙报。挂着“战斗学习加强团结”的横幅标语。宿舍整齐清洁，没有引人注目的东西。每个房间里有一排白木床板，床头上放着每一个人的背包卷。两码长的青布包袱，冬夏两用军毯，下面放着一个书包和针线包。游击队员除了军毯书包步枪和身上的一套军服外，别无所有。

我问他们的书包里有什么东西，几个学员马上把书包放在我的面前让我检查。二十七岁的老排长胡家珍的书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实例。他是一个老红军，抗战前一直在前线打过七年仗，这次选拔到训练营来学习。他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参军时他家仅有一亩半地，欠年息百分之三十六的三百元债。他在红军里学习读书写字，负过五次伤，现在有疟疾病。他的书包里有半截蜡烛，半支牙膏，一把旧牙刷，仔细用布片包好的半块肥皂，一封代笔人书写的家书，一枚图章，三支铅笔，十三本小册子课本，六本上课笔记本，几张军报（段落划有记号）。他的十三本课本里有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和《战争新阶段》，以及几本论战略战术、军事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的课本。新四军发的小册子有《伪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敌军里的工作》、《日语入门》、《部队纪律》、《部队

大家唱》、《怎样写墙报》、《战时幼儿教育》等等。

我问胡排长学过日语没有？他说他会用日语喊话，认识许多日语词语，但还不能跟日本俘虏对话。

他把上课笔记分为军事、政治、文化三类，文化课类笔记有一般读写、算术、地理和自然科学。政治课和军事课的笔记都详细记出纲要。例如，游击战术的笔记包括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后备队，游击战争与群众，如何破坏敌人的交通，缴获敌方运输工具，以及侦察、后勤、教育等等。

政治课笔记的标题有：部队在战斗前、战斗中、战斗后的政治工作，战区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各党派的政治主张；敌军中的政治工作；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等。这本笔记本里还有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详细笔记。

在“中国革命的任务”的标题下涉及的题目有：中国革命的现状、特点和问题、投降和妥协倾向的起因、敌人对动摇分子的诱降；和谈投降是死路一条、动摇分子为何准备投降势必反共？抗战的前途，等等。我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把这类笔记要点全部记了下来。

我翻开文化课笔记本本，有一课讲自然科学的笔记。上面记着太阳、地球、气象、日蚀、月蚀、太阳系、星体、北极星、彗星、星云等等。

从书包里的这些东西也许可以看出它体现了新四军所有训练营的教育制度。这是许多干部受过的唯一教育。在政治委员的帮助下，他们希望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教育部队战士。

学习自然科学这门课程是最近增加的，我访问过国民党军

队，均无这门课。我说我要找一个教科学的教师谈一谈。一个战士把他找来了。我抬头一看，我眼前出现的一张面孔，是一副被砍伤、破坏了相貌的丑脸，从鼻子开始经过嘴巴和下颚，到耳根颈项直到背脊为止，一道又宽又深的黑疤。伤疤向两边裂开、好象被锯子一类工具锯裂，皮肉没有了，破损的下颚使嘴巴歪到一边了。

教师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我望着他那道伤痕然后盯着他的双眼，如死人眼珠一样，超出一切痛苦和挣扎之外，难以言说的表情。

从他那扭曲的嘴里吐出了缓慢而清楚的语句：“我也是一个红十字会的会员。我的脸破了相就是因为这个。日本鬼子动刀要劈我的头。”

我屏住呼吸，心跳不已，最后安定下来开始谈话，尽最大的可能温和地问他的遭遇。上海大撤退期间，张英这位教师是一个红十字会会员，在撤退中成立的临时敷裹站的急救组工作。十一月八号在上海南郊法国天主教和天文台山下成立了一个急救站。一天，日本鬼子突然向他们发起进攻。

“我们的救护车两面都有红十字”，张英说道：“我们都戴着红十字臂章，我们没有枪只得逃跑。日本鬼子杀了我们九个人。几个鬼子在我眼前举起了锯齿大刀，一把有锯齿敌人用来割铁丝网工事那种砍刀。”

张英停顿了一阵，慢慢地转过头来向空中凝视，继续说道：“我恢复知觉时，躺在小溪中。清水滴在脸上便成了血水，爬上岸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救护车部分烧坏了，绷带药品撒满地，我模模糊糊地瞧见有一个人的手扶在坟头上，我一招手

他就跑过来帮我裹伤。

“这个村民和其它老百姓躲在溪边深挖的地洞里，他说如果我答应的话，山上有一个天主堂神甫可以给我治伤。晚上神甫来了，他和村民帮忙我到山上神甫的家里住了三个星期。那里有三十多个受伤的士兵和老百姓。日本兵有时来搜查士兵，但老神甫说这是他私人的家，他们要进屋搜查的话，法国同日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麻烦了。”

“三个星期后老神甫给了我几件衣服和路费，老乡们带我走过战场投奔内地。田园寥落，十室九空，一片废墟。偶尔有几个老人藏身崖穴。我们的抗日士兵和逃亡的老百姓奄奄一息倒在路边，哀鸣遍野，天昏地暗，惨绝人寰。几星期的流亡奔逃，我到了皖南，听说成立了新四军在敌后打鬼子。我志愿参军当一个兵，但军部说战士们需要知识学文化。于是我就教起自然科学来了，因为抗战前我在吴淞当过理科教员。”

他的话讲完时，我请他许可我照他的像。我向他解释，这是他的遭遇的证据。

“什么证据？”他吃惊地重复道。我对他说，外国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一类悲惨的遭遇，他们以为是捏造出来的故事。

“干吗要他们相信？”他很难为情地问。

“我不知道理应何在。”我有气无力地回答他：“也许人们光听光看悦耳好看的东西吧。”

他低着头眯着眼，继续沉默不语。一阵难为情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他嘲讽似的说我可以照相，我赶忙问他是否喜欢部队的生活继续请他讲下去：

“喜欢不？”他回答：“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问题我从来

不去想它，一切都完了。我不喜欢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缺少教学器材。我们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尽管我写了一本小课本，作了一个地球仪和这一类小东西，您如果能够为我们搜集点教材用品，就帮大忙了。”我许诺了他，只是时过一年半后到了华西我才实践了这个诺言。

九月十八日晚上，龚医生和我到司令部向张云逸司令辞行。我应安徽省主席的邀请到省会所在地立煌去进行访问。张害疟疾，坐在床头，问我在训练营的观感如何，并说明由于刚成立缺少有经验的教员，决比不上军部的训练营。

我跟他讲起干部们对我讲的一些同敌人作战的经历和他们所见到的敌人的事情。他们说敌人装备那样好，吃穿那样好，抓一个鬼子俘虏需要三个人，通常非要把他打伤才能活捉。我们的武器差，子弹少，吃穿坏，医务人员和后勤工作跟不上，生活上困难重重，但是大家毫无怨言。相反，他们都有足以使西方国家的士兵听了吃惊的克服困难的办法。

一个战士谈他在攻打从长江岸边到安庆市的公路上日本汽车护送队受伤的情况。他说：一天晚饭后，一个民兵跑来报告临近的日本护送货车队的消息。战士和许多老乡，立即在大路堤堰两边斜坡一带占好位置，就地埋伏好了。他们看见敌人五辆货车在五十名骑兵队的护送下，慢慢由远而近。游击队员们知道鬼子骑兵队的牲口不可能赶到堤下，所以他们一直等到护送队靠近他们身边才向马队扔手榴弹。我看见鬼子的骑兵队被炸的人仰马翻，摔在地上，滚爬逃命。嘶叫的牲口四处狂奔，有的掉到堤下马和人一同摔死。我们一家伙干掉他们多少人具体

数我不知道，但头一阵我数了一下有十二个，别的人滚下马被马踏尸如泥的为数也不少。我们抓了六个，都受了伤。杀了三个，因为他们受了伤也不停止射击。

老乡们刻不容缓地动手卸货车，妇女和儿童也拿着扁担绳子来了，真是一次大搬家，末了老乡拿来柴草木头一把火把货车烧了。人们把死鬼子的东西都剥光了，除了破军服、大皮靴，行军走路拖沓笨重又滋滋作响，游击队谁也不穿。战斗结束。游击队缴获二十二支新式步枪，五匹洋马和许多军毯。三人阵亡，两人负伤。”

张司令员边听边在本本上作记录。然后问我对训练营教育本身的想法如何。我以为政治课和地理课讲得太抽象空洞。人们学了一些外国国家的名字，但具体方向位置在地球上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我对他说，特别感到缺少一张地图，有些政治课看来也太理论教条。教政治课的知识分子除书本知识外一无所知，他们的一套观点都是外国作者书本上的东西。中国有自己的革命的历史和伟大的领导者们。在我看来，有些东西对工业发达的苏联可以用，但拿到不发达的中国就不适宜了。

张司令员立即叫人把挂在司令部墙上唯一通用的世界地图取下给训练营送去。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这就是不顾一切一定要把教学搞好的决心。

三十四、游击队伤员

天色未明，我们就走。翻山越岭，过溪涉涧，沿着蜿蜒崎

岖的羊肠小道赶路。所过村庄，大路边的沟渠积满青苔，绿色蚊蚋麇集的泡沫。我们休息时人们成群来求药看病，他们满身疥癣，妇女们蓬头散发，儿童们尽是癞痢秃头，有的连毛根俱无。夏天，霍乱流行，冬季天花猖獗，沙眼、疟疾、赤痢到处肆虐。

我们有一次冒险穿过了敌人卡车通行的公路。下午站在一座高山山头上俯瞰山下的壮丽景色，蓝天白云青山翠谷，下面有一个碧波万顷的长湖，广阔的田野里一片金黄，绿树丛中现出小小村庄的白点，像珍珠一样闪耀发光。一个警卫员手指那边一座寺庙说：“那就是我们的医院。”

一小时后，我们下到深谷朝庙宇走去。古树参天，盘根错节，金顶凌空龙虎跃，出现在眼前。一队身穿灰布洗褪了色的军装、手拿红绿三角小彩旗的伤员们站在庙门口欢迎我们。见我们一行走近，即唱起了游击队员之歌。他们中间出来一个人用左手敬礼，右手生硬地揣在怀里，手指头如鸟爪子般僵硬弯曲。他的面容清秀，英俊漂亮，目光有神。脸上全部表情流露出一种异乎常人的气概。

他领着我们走入欢迎行列，近处一看多半是肢体不全五官残缺的伤员。有的缺臂断腿，支着拐杖，有的手断骨折，吊着绷带。几乎人人都是终生残废，然而个个都在二十上下。要有一个好医生他们就不会成为畸形难看的人。看他们的脸色苍白，显然由于发育不全痛苦过度而患有贫血症。

晚上我坐在圆桌边同几个残废伤员在一起，那个英俊漂亮神气古怪的人坐在我的对面。他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名叫陈方春，二十六岁，南京陷落后他参加了新四军，参军前是一个贫

农，未上过学，不会读写。入伍以后常在前线，负过三次伤，住院养病，无从学习。现在的伤员都有几本课本子，互相帮忙识几个字，因为里面没有读过书的人，正确与否不得而知。

“你那只右手是怎么打断的？”我问。

“一天晚上，天下小雨，”他开始说道。“我们的队长说我们要出击怀远来的敌人，这消息真使我们激动连天气坏都忘记了。时间是八月十号。我们的队长讲话说：我们战无不胜。怀远城里的敌人派出了一个纵队来围剿我军，还有一连伪军由一个叛徒带队，狐假虎威前来叫阵。他们有一挺重机关枪，三挺轻机关枪，人人都有步枪和手榴弹。打算天亮前包围我们，消灭我们。但是他们的行动总是落在我们的后面，我们半夜吃饭，两点行军。我们要热烈欢迎他们一下，让他们在大热天里跑一整天。今天夜里我们和钟全老百姓转移到宋营寨去。对他们招待不周，欢迎失礼。鬼子的鬼天皇会原谅我们的，他们自己也会感到不大舒服的。”

“我们哈哈大笑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敌人到了钟全，不见人影，别说欢迎，只有一个老人躺在家里。他们问他我们的人在哪里？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听说过没有？人老糊涂耳背记不起来。于是他们奔向宋家村，以为能够出奇制胜就地一举消灭我们。夏日炎炎，太阳当顶，鬼子才赶到宋家村，他们汗流如雨，狼狈不堪。收兵怀远又怕丢面子，便开到另一个村子里，召集全村的人说日本大皇军为了保护老百姓前来中国剿灭共军、国军，共军指我们部队，国军指国民党部队，一旦老百姓有了保障，大皇军就会撤退。

“好呗，老百姓也欢迎呗，他们有的悄悄说白话，共军在龙王庙，当然喽，我们并不在龙王庙。听说他们要去那里，我们决定在那里给他们一个盛大欢迎。”

“我们的队长挑了三个最好的排，我也在其中。我们有三挺轻机关枪，沿龙王庙一带高地占好阵地。老百姓拿着大刀、长矛、梭镖、斧头来助威，有的抬着担架准备送伤兵下火线。”

“过了不久，鬼子来了。这时他们疲于奔命，跑了十二个小时的鬼子兵直扑龙王庙，哒哒哒哒，鬼子哇哇直叫，血肉纷飞，一场恶战。鬼子边打边退，边退边逃。起初还背着死伤的鬼子，后来就干脆扔掉逃命。我们把他们武装‘护送’到怀远城时，残兵败将没有几人了。我们接战鬼子，招待不周，大骂鬼子，护送到底。在护送战中我的右手中弹负伤了。”

“那可是场面盛大的欢迎，也许是非常客气的欢送骂战吧。”我很敬佩地说，人们笑开了。

“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教训很多。”陈方春象背书似的滔滔总结道：“第一，经常活动，特别是接近敌人的游击队必须经常活动，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这一点我们作到了。第二，掌握敌情，必须准确地迅速地掌握敌情，加强装备力量。我们的情报工作太慢，而且后备队伍没有跟上去，以至这次战斗未能彻底干净全歼敌人，这是我们的教训。第三，跟踪追击，战斗打响，敌人动摇。必须猛追逃跑之敌。我们这一仗行动欠快，致使许多鬼子漏网，也是不足之处。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应该吸取的教训。”

“现在你不能打仗了，今后想做什么工作？”我问他。他想到训练营去学做政治工作，要不就到群众运输站去搞民运工

作。“运输站里可以遇到来往的人，可以收听广播，知道世界大事。我们只知道鼻子底下一点点事，外面世界一团墨黑。你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

这时室内挤满了一屋子人，有的站着，有的蹲下，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挤在板凳上。我一转身就碰到人。蜡烛光照在人们的脸上，眼珠子生动闪亮逼人。我问一个人的姓名，他反问我“你真的有一架十个指头同时写字飞快飞快的机器吗？”

我的秘书拿来我的打字机，我当场表演打字，室内一片啧啧赞叹声。有的人问值多少钱？我说出了美金和法币的价值，人们瞠目结舌大为吃惊，对面坐的那个英俊漂亮、特别敏感的人站起来说道：“你很阔气！”

我否认这个，甚至一再说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富有。有人问一个美国工人一天挣多少钱？我还没有回答。一个人就插话道：“你当然会说一个月挣五块十块不等。”“不，不是一个月而是一天。”我坚持己见，人人吐出舌头摇头不信。我对美国的生活费用花在衣食住行、医药费、教育费等等作了说明。美国工人的孩子上学校不是一两年而是十来年。他们听了很吃惊。

“美国工人也有红军吧？”一个人问。我说没有。他问为什么没有，想知道为什么的原因。接着一连串的问题象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海上邮轮多快？美国火车跑得多快？电影是怎么放映的？钢琴是什么东西？我用照相机作示范解说，接着一个一个对着镜子转看下去。我摊开地图，讲到照相，详细讲解疟疾、伤寒、赤痢、霍乱发病的原因和预防的办法。我说地球是圆的，我自美国来，离开中国一次又回到了中国，我把访问苏联和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见闻、工农生活情况告诉了他们，

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时间过去了，桌上堆满了花生壳，杯中茶常满，知心话说完没了。我说三更半夜了，大家请休息吧。但是人们议论纷纷，兴致勃勃，总是说我是来到他们中间的第一个外国友人。我要是真的富有四海能够周游天下的话，为什么我要到敌人的后方来，他们可想不通道理安在。他们又问我有无子女，我说没有。为什么不结婚，我说独身。结过婚离掉了，为什么要到前线来到敌人的后方来？生活战斗、学习工作就是我的最大幸福，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乐趣就在这里。那个英俊的伤员很激动的赞叹了一声又大声说道：“你具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呀！”我说“没有。”但是他说“具备！具备！”

然后他们请我唱美国歌子，我唱了。他们也唱了几支游击队之歌。一天跑路，过于劳累，晚上谈话，好比打仗，我请大家休息。对桌那个情绪一直高涨脸孔漂亮的人微微一笑说，“真抱歉之至，不过明天上午有一个很大的群众欢迎大会。”他们希望我讲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经验教训。“讲演时间三个小时够吗？”他问。“足够了”，我向他保证。希不希望我在会上也唱一支美国歌？我问。他说希望我唱。

他又郑重其事的说休养所请我吃饭，人们希望我讲话，讲国际形势问题。时间没有限制，完了提出问题请予解答。

“我的上帝！我要好好想一想。”我叫了起来。我的秘书告诉大家说我提到了上帝，大家睁大两眼看着我，并且问我可是一个基督教徒。在他们看来，基督徒就是传教士，传教士就是洋鬼子，洋鬼子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回答说我不是一个基

督徒。为什么不是，这个问题议论开来，一张张面孔亲切地向前靠拢，又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我说我需要休息一下，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堆满精黄稻草发出新鲜甜蜜气味的豪华铺板旁边。人们对我隆重款待，铺得特厚。我弯身解下绑腿，头脑发胀昏沉沉地爬上草堆一觉睡倒，喃喃自语：“你同伤病员打交道，搜集材料，好得很！机会不多，真难得！”

三十五、桂军基地

整个一个星期我们翻越层峦叠障、势与天齐、高峰窥云、长林蔽日的大山峻岭。正午的太阳把我们的皮肤晒成黄褐色，晚上的严寒把我们的手脚冻得直发麻。秋色宜人，空气里充满松竹华栗的树木香味。我们有时在修竹茂林中歇息，山坡路边奇花异草铺盖如茵，蓝铃花、金色菊遍地盛开。紫红的枫树杂在松树丛中分外媚人。下到谷底，山村金黄，打谷场上晒着金子般喜人的新谷草堆，箩筐里盛着白干香味冲鼻的高粱酒糟。

有时真难以看出我们是在打仗。记得有一个外国记者访问中国后马上写过一些血淋淋的报道。有两个记者独出心裁的报道“敌后”老是屠杀的场面纯属主观杜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到“敌后”实际看过。不错，当日本的铁蹄经过这个地区大举向武汉推进时，广大地区曾经受过血洗屠杀。但是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领这个广阔的省份，使三千万人民屈服于他们的屠刀之下。多数县城过去而且现在受到轰炸，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烧光抢光。特别是日军进军首当其冲的一带地区被蹂躏殆尽。尽管敌人专横肆虐，然而全省大部分地区在广西

军、新四军、地方游击队和县自卫队的联合攻击下，正在清除敌人的势力。铁路线、公路线、大江大河以及大城市的交通枢纽，迄今不时恶战，争夺激烈。但安徽省市县地方乡村政权已经重新建立，权力及于敌人盘据的城市的城边。日军大的部队除了白天敢于出城外，龟缩城内不敢逾雷池一步，甚至在有些县城里的日军已成瓮中之鳖，待毙之囚了。

尽管这样，敌机从头顶上空有时飞过，我们常在树下找个地方藏身等它飞过去并不害怕。有的敌机侦察大的目标盲目投弹，有的飞机是在江北执行运输任务的运输机。

广西部队于抗战开始时离开西南老家奔赴各个主要战场，我第一次同广西军队接触，机会难得，急忙赶路。二十一集团军的基地在皖西大别山中。总司令廖磊将军兼任安徽省主席。他所以知名不待言是一个有将才的军事人材，还是一个较开明的行政长官。

他治理下许多地方的变化可以看出。在一个青山翠谷里有五所高级中学联合新修的竹篱茅屋校舍。坐落所在，便于疏散迁移的三所高中，注册学生人数将近一万五千。敌人逼近武汉时有一万七千学生和五百教职员及其家属流亡西迁。其余学生，留在敌后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军民游击队，现在有的复学读书。我在江南的泾县附近参观过这样的一所高中，在皖北还另有一所。有的学生毕业后参加高考到内地去进大专院校，大多数学生留在当地从事县政乡村建设工作。

我在有一万人口的苗运庄镇对皖省当局推行的保甲制度进行简略研究。我们在街头遇见三个女学生两个男学生，他们刚从省会新成立的军政训练团受训回来。三个女学生有两个是镇

立国民小学的教员，一个是附近村子里区小的教员，也是区长。两个男学生负责地方乡自卫队的军事政治训练，自卫队由五十名脱产农民和三十名后备队员组成。秋收以后这两个青年将开始集训镇上的一千名镇自卫队员。镇长和一个三十来岁的知识分子，晚上来看我并说明他们推行的保甲制度。

这种保甲制度曾引起过激烈的论战，有严厉批评反对的，有盲目赞成拥护的。国民党政府前些年里推行保甲制度，作为围剿工农红军的强有力的工具，凭借这种反动的“一家隐藏共产党十家甚至百家连环保的作法”打内战。而广西省的保甲制度却成为县政乡村自治的民主制度，尽管一切行政官员的任命是指定的不是选举的。广西部队来到安徽、桂系军长主持皖政，保甲制度开始推行。赞成保甲制度的人们说下级官吏经过选举，最后县市以上官吏普选产生。但是国民党政府总是这样那样借口拖延实行民主。

几天后我们到达大别山脉最高峰下的流波潼镇。镇墙高固。驻有二十一集团军炮兵训练营留守。敌机经常轰炸，居民死亡甚众，敌特化装成商人、难民混入镇内。墙上贴满打倒汉奸汪精卫等卖国贼的标语，还有一些标语表明我们已经显然离开了新四军的防地进入另外一个政治思想完全不同的王国。那些标语口号并不反动，到处张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优待抗日家庭”，“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抗战救国民族复兴的最高纲领”，“拥护民众教育，扫除文盲”。等等等等。

这一带地区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老红军根据地，在敌后随军访问刚离开的这支军队，就是当年守卫这个地区的老红军。过去的遗迹直到镇边一路犹存。城门口的卫兵对护送我的

新四军警卫人员亲如兄弟，但一看我这个蓝眼睛高鼻子的人走过，就大吃一惊，大喊“护照！”我拿出了我的护照公函，卫兵同我们的队长开始用奇怪的土话谈开了，双方对话每一句重复多遍。可真费劲。队长说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朋友，一群士兵围上来，七嘴八舌谈起世界大事来了，我听出他们纷纷议论一个给鬼子出售卡车武器的国家的人是否享有进入流波潼镇的权利。

我们的队长替我说话，出售卡车武器给鬼子完全同我无关，那是爱钱如命一无所知的美国“商人资本家”干的事。最后他们让我们通过，我们进门时，一个士兵对街上的士兵大喊洋人来了，消息一下传遍全镇。我们在一个小客栈下榻，这时出现了一个青年军官，他行了一鞠躬礼，然后索看护照，完了后对我作出保证说我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他的服装笔挺，办事敏捷，气宇不凡，吐辞清晰，回顾我的警卫人员衣服破旧，但他们却昂首挺胸，神气严肃。有的单衣上的纽扣早就掉了，有的打摆子腿脚流脓，一个战士肺病到了晚期，硬坚持护送跟我同行。他们几个月前发过五角钱的津贴费，以后没有领过半文钱。途中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鞋，每天晚上我还给他们看病。

对比周围那些矮小结实身强力壮的广西士兵，我有了许多思考的材料。广西部队有纪律，管理好，害疟疾病的人无疑是有的，但我检查他们可没有沙眼、疥癣。我很快打听到这个部队打破传统，无论冬夏天天洗澡，同美国印第安人某些习惯相

同。有许多越南人，印度支那的混血儿，个子矮小，样子吓人。他们的队伍走在流波潼街上整齐一致，步枪、机枪换肩，子弹带佩刀锵锵动作整齐。唱着抗日军歌真是激昂慷慨，我以为他们即将奔赴战场冲锋杀敌。我不禁肃然起敬问身边的广西军官“他们可是出征么？”“不，他们去看电影。”军官回答。由于国民党政府电影教育部门给部队每季度分派一部新的影片来，部队可以跟上时代了！他说。

影片里面设计大炮的场面倒是壮观，多年以来美国电影和中国一类复制影片使我完全失望，无法得到一个抒发愁怀的机会。如今我领悟到我要是背扛机枪、拉大炮，一定会去影院消磨光阴，饱尝香艳影片。

尽管这样，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去看电影，那一天我们走了七十里（合二十三英里）路。我们牵着一匹老马，赶着一匹兔子般大的小骡子，在崎岖狭隘的山路上走着，牲口经常卧倒在地，我们一前一后把它赶起来，重新放好行李，马是属于部队的，警卫员不敢把它扔掉，尽管它气息奄奄无甚用处了。骑在它背上象陷入无底深渊，四蹄打颤摇摇欲倒。

吃罢饭后，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拿了一支蜡烛，倒在木板床上，外面更夫敲打梆锣，告诉三更五更。尽管疲惫不堪但总是失眠睡不着。从外面那些广西蛮子想到武汉的书斋，朋友以及天外世界。

第二天下午，我们翻上天堂山口。西北两面一个东西狭长南北宽阔的山谷，景物极其壮丽，山下的史河从东北蜿蜒流过，河水蓝天青青一色，闪闪耀眼。那就是我们此行访问的目

的地。山峦起伏高峰入云的大别山脉就在眼前，我们必须翻爬那些盘旋山头的羊肠小道。夕阳西下，到了安徽战时省会立煌^①的广阔深谷。二十一集团军军部设在附近村子里，村边有许多新盖的竹篱茅舍。一队队穿黑布制服的男女走过平整过的操场，场前大门上挂着“安徽学生军”校牌。

两个穿军装的姑娘沿街急忙赶来，掉头回顾，然后停足问我是谁。她们听了坚决要我到校部去。姑娘们引我走进一个简单的小小办公室，姑娘们向我介绍她们的校长麻齐英中将。

麻齐英中将是美国西点学校一九二四级毕业生。学成回国在本省广西创办一所陆军军官训练学校。现在是安徽省学生军训练总监。学生军有五百男生一百女生和一千名军事轮训学员。前者为高中学生，后者受训后担任县武装部民团团长，地方游击队司令。麻还兼任省长廖磊的特别顾问。在省内并享有进步青年领袖人物之一的盛名。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于香港豪富的望族之家，强调学军一度过着最豪华的奢侈生活。他告诉我，他设宴款待过西班牙国王加冕皇太子，这次豪华宴会一连十个小时，吃了七百道菜。

然而，抗战爆发以来他就上了前线，他说的完全是英语，只不过是广东官话而已，一个女学生是他的未婚妻，会说官话，也会几句英语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

一踏进立煌谷我就观察到这儿是一个是非之地，这儿是一个新旧斗争激烈玩弄政治阴谋的世界。麻齐英马上告诉我，曾是上海银行家我的老朋友章乃器在这里等了我两个月，终于

① 立煌，安徽省金寨县。——译注

被排挤走了。“这么说来章乃器是被撵走了！”我直率地问麻。“不错，他太老实太进步了。二陈集团也不欢迎您来，但省长和我们欢迎您来访。”他同样直率地回答我。

章乃器是战前上海民主运动爱国领袖人物之一，被国民党政政府以“危害民国罪”莫须有罪名逮捕坐牢的七君子之一。他出狱后抗战爆发，到民主气氛较浓的广西省。一九三八年广西将领主持安徽省政时任命他为财政委员。我到立煌前不久，“二陈CC集团”夺取了安徽党务大权，章乃器成了他们的第一个受害者，他被排挤撵下了台。重庆任命的一个新财政委员带了一批随从接替他的位置。麻齐英中将也是“二陈CC集团”的眼中钉，经常受到攻击。

我刚刚坐下不久还没歇一口气，麻中就将就召集学生军集合，五分钟后我就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面对着几百个鼓掌欢迎的学生听麻将军宣布：“现在，特请史沫特莱女士向大家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的报告。”

我们这天走了九十多里路，我真劳累，也无可推辞。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一个半小时后我躺在稻草铺的架子床上，由于过累，饭也不吃就睡了，但是一连串的印象在脑海翻腾。我们的护送队长因旅栈房价一晚五角还不供饭吃而非常恼火。……麻将军送我一听上海香烟，立煌县市价要十元。……他说省长的座车，省内唯一的一部汽车明天送我去立煌省会，五加仑汽油要三十块钱……。

三十六、战时的安徽

我好比一个囚犯靠坐在廖磊省长的座车上。到立煌县的半路上，汽车超过了警卫护送人员，他们神情严肃地看着我。

在省政府大楼里，我们会见了省长廖磊将军。他走出了大厅，仪表颇象没有佩戴勋章，身穿军装的古罗马议员，举止稳健，彬彬有礼，毫不讲究俗套地欢迎我，并问我对这个敌后抗日基地的首次印象如何，“你们的士兵力量溢于言表，身强体健，充满活力，象是另一种民族的队伍。”我说。

“我们是山地老百姓，”他解释道。并说无论冬夏，天天洗澡可以预防多种疾病，但是还同别人一样免不了得疟疾病，道理何在，他不明白。广西队伍的伙食很好，即使吃得好的人也得疟疾。

他告诉我附近有两个后方大医院和两个收容所。医院直属军政部陆军医务署，医院行政主管和业务经理敲诈伙食棺材经费案被发现后，他任命了一个广西籍医生作为医院主管。“敲诈”分子如何处理了他没有谈。因为广西佬是一抓住把柄就不轻易放手的。他继续说这两个后方医院的麻烦在于必须远离前线，不然要受到敌人的破坏。收容所离前线较近些，可是都无法得到所要的医药物品，需要更多的药物，他请我能给予这方面的支持。

他好奇地盯着我，仔细考虑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不知不觉地谈起广西两个集团军特别是他任司令的二十一集团军的事来。他说，京沪战事的主要问题是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的优势，

打法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抗战以来部队学习夜战，使用伪装。山地提供了天然保护条件。防卫工事现在伪装很好，部队学习游击战争和运动战。敌人仍有摩托化装备的优势，但中国方面继续破坏交通道路。自从一年前武汉失守以来他的部队打了两百多次游击战。敌人的“扫荡”大半扑空。二十一集团军活动于皖西鄂东一带，有时派出部队向东到长江下游一带执行特殊任务。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来，敌人损失超出桂军两倍。

我问：自抗战以来有哪些主要收获？

他答：战地教育，它与纸上谈兵的书本理论完全不同。民族意识这又是一个主要收获。我们的部队知道这是争取全国独立生存的生死斗争，不单单是保卫广西老家而已，他们认为作战光荣。他们如果没有得到打仗的机会就感到碌碌无为，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

他说话的语调含蓄克制，象是操劳过度，或是意志消沉的样子。年纪不到五十。面容消瘦苍老得多。

十一个月前武汉失守。廖磊于武汉失守时受命主皖。当时，敌人占据了安徽全省六十二个县的四十一县，毁坏了全省的经济和文化生活。这就是说，拥有三千万人口，渔米之乡富有的安徽，中国的心脏地区之一的毁坏，对全国而言是一场浩劫。随后十一个月里敌人被迫放弃了二十一个县，仅在一两个县城里驻守盘据。一九三九年元旦廖磊宣布了他的解放，改组、管理、教育等安徽省政的四十二条战时军政纲领。广西送来了军政吏治干部等和包括第五战区李宗仁将军派来的成百上千的男女学生。

安徽军政训练学校及其七个分部训练四千名行政人员已经

离校，计划给四千个城镇及四万区乡各配齐一名受集训的行政人员。各个分部负责培训财务统计、农业合作、小学教师、电台情报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一个平民军事训练学校，安徽学生军校（我已访问过），保安团和军事训练学校正在培训一千名下级军官。

皖省政务，繁重艰巨。每项改革必须诉诸武力。许多官吏都是新手，没有经验，基本教育知识缺乏。我在立煌县停留了五周，时间越长，所见问题越多：新与旧、民主与独裁之间，有时腐败堕落与正大光明之间的斗争层出不穷，日益激烈。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带有国际普遍性。

执政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总是一切黑暗势力和阴谋诡计的总代表。它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它长期以来仅代表有产阶级，凭借独裁手段和玩弄阴谋诡计抓权不放，缺乏群众广泛拥护，早已失掉民心。国民党内反动的一帮“二陈CC集团”，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反革命派别是臭名昭著的害群之马。陈果夫派了一小撮亲信分子到安徽，不但想夺取某些新四军的阵地，而且还要夺广西部队的军权。方治^①被指令担任安徽省政府教育委员的二陈分子。他是一个獐头鼠目，花言巧语，当面说得好听，背地拼命捣鬼的党棍。方治第一个行动是检查封闭各校的出版物，包括书刊报纸，甚至廖省长指导下的立煌人民动员委员会办的《大别山日报》也被查封。

由于廖磊坚决主张国家统一，博得青年好感，因此，他成了“二陈CC集团”的眼中钉，二陈分子暗中勾结一伙反革命分

^① 方治，国民党党棍，时任安徽省书记长。——译注。

子，其中包括同桂系军队有千丝万缕联系而以“湖南帮客”闻名的军部政工小集团，和三五个有个人野心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分子出身的广西文人政客。这是荒唐的杂拌，是一个民族在争取生存战争分娩中，一个文明在过渡时期中的特征。

湖南帮客圈子的一些人在最反动的分子中特别卑鄙，因为他们逢迎拍马，通过廖磊“如夫人”对廖施加影响。廖同许多老一辈民国人物一样：一只脚踏着过去，一只脚踩着未来。据说他有一妻三妾。一个姨太太跟他在立煌。她是一个湖南人，没文化，很美丽，有野心也不规距。人言啧啧：“她会告枕头状”，宠幸亲信。她的哥哥当上了廖省长的侍从长，军部参谋长是她的红人，这个参谋长不参不谋，好写艳体旧诗，“二陈CC集团”在国民党办的立煌县民报上一一予以发表，攻击受过教育的青年不是共党就是共党嫌疑分子。国民党阀和湖南帮客本是一根藤上的瓜，他们归附旧世界，生怕“新人物”夺他们的权，沆瀣一气很少差别。据说他们打击各种民主力量，用许多同汪精卫暗中勾结被廖省长赶下台的地方政客。

廖对民主力量新人物尽力保护，站在各派之间调解矛盾充当和事佬。“新人物”一来当然是最危险的。我到这里不久这个称号就加在我的头上，我知道迟早会牵扯到莫须有的扯皮事里去的。

立煌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是老家伙们攻击不遗余力的组织，是廖任委员长经廖批准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具体领导人是前北平某大学教授章伯钧，《大别山日报》的现任主编。我到立煌县前一周刚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辩论会，委员们受到保守派分子的多方指责，争论的主题是民主的意义和争取民主的

需要。这个组织有十四个流动工作团巡回省内动员民众，训练民众。三个流动话剧团，会员派往各地加强行政管理工作，战前的男女老教师担任各团指导。发行了《青年月刊》、《洪水》《文化月刊》三种刊物，出版教科书、地图、抗日标语、战时统计等等图书。所属妇女委员会成立了成人夜校识字班，一个分会为附近难民成立了一个纺织工厂。

青年和妇女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妇女会议有全省各地来的妇女代表。一个下午和晚上各代表讲话，我是主要讲演者，因为我是外国朋友。大家希望我作关于国际妇女运动的报告。这是我担任过的最难的一次讲演。因为我只掌握一些零星片断材料，我尽力而为，我知道中国内地妇女的情况比她们知道国外妇女的情况总算要多。屋子里挤满了妇女，彩旗标语布满礼堂，标语有两条颇为独特：一条写着“全中国反法西斯力量同世界妇女联合起来！”“史沫特莱是中国伤兵之母！”

一队身穿小小军服的战时孤儿把从山坡上采摘的一束鲜花送给我。他们用流暢的语言请我向美国儿童转达中国儿童战斗到中国解放自由的决心。针织厂的女工代表送我两双白棉袜子。青年委员会妇女写了一首欢迎我的诗，诗曰：妇女几千年被踩在男人脚下，而今见到了曙光。

我从这些妇女代表中又一次了解到中国妇女工作困难重重，受到令人可怕的阻挠。许多妇女说日寇不灭决不结婚，一结婚就不能工作了。她们深受许多封建礼法的束缚无法解脱，溺杀女婴，虐待童养媳等等问题，真是罄竹难书。

妇女委员会秘书朱清霞，一个已婚二十多岁的女学生有一次告诉我：“大别山过去是老苏区，那儿的妇女放了脚，剪短

头发，念过书，参加公开社会活动。国民党中央军一来，见短发女人就喊共产党分子，就杀头枪毙，而今那儿的妇女都留长发了。我们第一回去组织她们动员她们剪短头发参加抗日团体，她们吓得要命，以为白色恐怖又来了。

“奇怪得很，那些老苏区的妇女多一半既不会写又不会读，八字不识一个，然而她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和世界大事，人前讲话大会发言无不口若悬河，头头是道。最后我们让她们相信公开参加社会活动不会杀头，她们和村子里的男人出来办抗日团体的事用不着我们去越俎代庖了。

“我们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发现妇女工作非常难做。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标准跟乡村妇女的生活习惯、看法、标准完全不同，因此很难找到接近的共同语言，于是我们招了一队妇女来培训。

“我们还有一个古怪的问题。苏区禁止强迫婚姻。男女双方许可挑选意中人，结婚不许要嫁装。国民党说这是“自由恋爱”。现在苏区不存在了。有些男人提出照旧习惯儿时订婚的妻房该应归他为妻。这样的妇女被人拐走抢走有的是，其中也有内战中丈夫阵亡的寡妇，也有现在在八路军、新四军里的丈夫的爱人。儿时订的婚姻在法律上有拘束力，我们妇女委员会总是要拐走妇女的男人把妇女送回娘家，麻烦事没完没了。”

我到立煌不久在一个可以容纳五千观众的大会堂里看了话剧团的两幕话剧。一个剧本是以前省会所在地、现被日寇占据的安庆为主题，写的是夜袭安庆。五四青年节的晚上，安庆城内伪军开门让广西军一团人进城，战斗持续一夜，天明时广西

军队连同城内伪军为了防空疏散，退出安庆城，留下一座被粉碎的敌人据点。剧中有一个演日本参谋官的人物，他出身于中国并在中国受教育。设想他是同情中国的。

演出结束，请我讲话，我起立提了一个请观众讨论演出剧本的建议。一个官员反对我的提议，说观众不太开通不便讨论剧本，未卸装的话剧演员支持我的提议并请我领导讨论。两个剧本的编导提出他们可以回答批评的意见。

我说演出特别好，但把一个日本参谋官作为中国的朋友演出，思想上不能通过。他果真是中国的朋友的话，为什么他仍留在日本军队里？编导回答说，日本参谋官的民族性格被生活淹没了，安庆战役中五四夜袭确有其人其事。

堤防决口了，台下许多士兵学生起立七嘴八舌议论开来，有的气呼呼地跑到台上发表自己对剧本的看法，他们措辞婉转巧妙。有一个士兵说，剧中人的对话太高尚，老百姓听不懂。另一个士兵指出，日伪一帮酒席宴前空谈什么可怕的游击队，但不见游击队的攻打，只有一个维持会长汉奸的老婆吓得自杀的事真是荒唐之极。比这更卖国的卖国剧可真没见过，他大声喊道，游击队应该把酒会上的下流走狗通通干掉才对！

编导回答道：唉哟那就是真实吗？如果敌人总是死在台上，还何必继续抗战？用事实唤起老百姓才对！

三十七、阴谋诡计

摆在廖磊省长面前的有许多棘手的困难问题，最后一件使

他恼火致命的事荒唐可笑。他的三姨太同麻齐英中将长期扯皮成了死对头，因为麻氏是一个不讲策略的人，他既反对“二陈CC集团”，又公开反对三姨太的“湖南老乡”。

麻齐英爱养马，他用钱买了一些好马，里面有一匹红鬃烈马，是一匹骏马，他把这匹马借给一个到前线去的游击司令，后者派一个马夫把骏马送回立煌，三姨太一见就把它攫为己有，并赏给他的相好者作座骑。一天麻廖同车，麻见到他失去的马就请停车追问骑马的人。骑士说这马是廖太太赏他的，是廖舅爷过手的。

廖省长脸色苍白，十分生气，回到军部，责问小舅子并大发雷霆说，今后再犯定交军事会议审理。失马得马的麻齐英一下子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如果我知道他的为人定劝他不要在三姨太鼻子跟前驰聘往来。三姨太和他的兄弟廖舅爷在伺机报复。

这点小事掀起了大波，广西文武官员本来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早有一触即发之势。民政委员陈良楚是个死老顽固，他骂麻中将是个赤色分子，因为麻设宴请过新四军叶挺军长，并且廖省长从此给新四军皖中支队每月拨款两万元的军事补贴费。陈良楚，湖南帮和二陈集团三面夹攻游说廖氏，不给新四军拨这笔津贴费，但廖省长坚持照给说新四军游击队也是抗日杀敌的同胞，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如何，麻中将当时担任《大别山日报》的主编。廖省长在三面夹攻中只得劝麻辞去报社主编职务，麻这一次摔交并未平息三派的积怨，他们磨拳擦掌，磨刀霍霍，盯着麻的一举一动，非致他于死地不可，他说过一句地方官员应该民选，保甲制度的狂热鼓吹者、绰号“陈

老保甲”的陈良楚这个民政委员抓住这话作为把柄，煽风点火挑起斗争。

我同“陈老保甲”谈了几小时话，从谈话中我认识到此人并不简单，很难捉摸。他是一个矮胖子，人到中年，留小胡子，两颗金牙，大嘴巴，自以为漂亮。他是立煌最有一手的阴险人物之一，造谣中伤是他的拿手好戏。这个阿谀奉承拍马巴结的笑面虎背后捣鬼，当然麻齐英不是他的对手，陈老保甲作为民政委员任命了三个托洛茨基头头，担任新四军活动地区的特别顾问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以立煌为中心的反共的侦察造谣他称之为“火拼”的组织。

“陈老保甲”自夸了一阵保甲制度之后，告诉我对土地制度采取任何改革真是困难重重，老虎吃天，无从下手！他拐弯抹角话中有话的提出，我作为一个外国朋友，对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如果独行其是，执迷不误，个人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谈话结束我们分手时他又特别说麻齐英委员为人既好又心胸开阔！张口一笑露出了他那两颗金牙。我打定主意请麻提防他下一步行动为上策。因为我应廖省长之请作客在此，对麻的什么举动必定同时栽到我的头上。

真是无巧不成书，火上加油火焰高，廖省长一天接见了一个难民代表团，代表们提出了一个控告新任教育委员、“二陈CC集团”分子方治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反动透顶的十大罪状的呈文，代表团要求法办贪污难民救济金的方治，请求廖省长开庭公审方治。由于“二陈CC集团”在国民党内掌握大权，廖省长不敢冒犯方的后台，只好不了了之，无所行动。难民代表团到各机关各单位提出申诉，甚至把他们控告方治十大罪状的

快邮代电长呈也给了我一份，于是，立煌满城风雨谣言四起，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书，一条罪状指责方治留学东京时同女人乱搞的腐化堕落生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四千年历史，有漫长的回忆，人们真难忘记过去。

廖磊省长在各方夹攻怒火熏心下，一天突然中风病倒了。他的三姨太不懂西医，起初请了一些草药郎中天天给虚脱的省长滥开药方以为服后总有一剂见效。二十一集团军刚来了一个洛克斐勒基金创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有学问有经验的医生，但是三姨太不让他看省长的病。草药郎中先生的药方毫不起作用。她记起了麻中将从四川峨眉山和尚那里学到“神针”妙法。麻齐英曾跟峨嵋和尚学过针灸疗法。他虽然在美国西点军事学院受过教育，但可相信他这万病一针纯属迷信的神针。我经常看见他从小小的银针盒里拿出他视若至宝的神针给人治病，有一个生杨梅疮的老地主坐轿找他扎过针。

然而当廖省长的姨太太要麻中将与省长施行针灸疗法时，麻却断然拒绝，提出条件说，廖姨太必须写一张如针灸无效省长病故她不追究他的责任的签字文书。姨太太死活不肯写字据，并且骂他唯恐省长不死。进而加油添醋，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说他鼓动立煌安徽学生军校某些学生造反闹事投奔新四军。无风不起浪，麻对情绪不稳的军校学生过去曾经插过手，派游击队外出到皖西而不是去投新四军也确有其事。廖省长服了枕边灵怒火攻心大发雷霆，姨太太对军校学生的事一无所知，毫不在乎省长的病情转化，一味攻击麻校长，因为麻使她和她的兄弟为马的事丢了面子。

我们的住处挤满了劝谏麻跟省长扎针的大小官员，他顽固

坚持非要廖姨太给他签字书不可。警备司令赖光到麻那里打招呼说那女人正在掀起反对他的风浪叫他当心，他不在乎地说她不过是一个无知识的小老婆成不了气候。

这一切等等正在幕后进行。而廖省长病势垂危处于昏迷状态。最后广西部队军政界要人撇开三姨太的干扰让协和毕业新来的医生诊断省长的病。在他的治疗下省长恢复了知觉，由于心力衰竭，病入膏肓，自知不起，极力争扎，临终前可怜地立下了遗嘱，喃喃自语：“安徽为何无望？知我者何无一人？”他的遗言如下：

余为军人，任军职多年，抗战军兴唯思精忠报国，杀敌捐躯。往岁授命，主持皖政，敌氛方张，诸事孔殷，夙兴夜寝，积劳成疾。江淮不靖，皖苏难防，江淮不守，中原即失。大别山区苟不加强，开始反攻即无基地，深望吾党政军袍泽同志在总裁领导下矢勤矢勇完成建设安徽，复兴中华，最后胜利大业。九泉之下余可瞑目矣。余之精诚处境详请李（宗仁）白（崇禧）座右督鉴。

姨太太对省长的病恢复缓慢很不耐烦，又出面干扰把军医打发走了，又把三个草药郎中找回看病，两天后她发疯似的打电话给军医，但时间太晚了，省长得了肺炎，不幸于十月二十一日晚间去世。

省长死后一小时，我和我的秘书，麻中将及其未婚妻围坐悼念廖的死，突然姨太太的兄弟带一群马弁破门而入，手拿盒子炮，枪口冲向麻。我惊恐站起，姨太太的兄弟一把按住我推我坐好。他们让麻齐英回房子换衣服，我们听到他房子里有喊叫挣

扎声，后来我们知道他想给警备司令打电话，但耳机被人打掉了，他摸他的手枪，但枪被人下掉了，最后他身穿睡衣被人们五花大绑推出消失在黑夜里。

我们抢到电话边叫警备司令，发现电话线从电池上被人掐断。我的秘书最后接通了警备司令的电话。他过后不久来告诉我们他已发出警报把所有马弁和麻齐英带到军部作为广西犯人审理，一星期后他在严密护送下被解往重庆，他的未婚妻同他一同走了。

自此以后，立煌施行戒严，人心惶惶。“陈老保甲”暂行代理省长职务，谣传他可能被任命为省长。民众动员委员会的人们准备打，有的已经失踪。但在二十五日廖省长出殡那天他们许多人同省政府机关部队声势浩大地出现在殡葬行列里。丧事过后我听到几个青年激烈指责省政府贪污了葬丧费两万元，实际开销不过几百元，余款不见了。

安葬仪式过后，民众动员委员会会长章伯钧教授立即来警告我说，国民党沿所有通到我的住所的路上布满了便衣特务，妇女委员会的三个姑娘穿过警戒线给我类似的警告，并说她们要离开立煌了。许多青年在送葬后甚至没有返回营房。大家劝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一个使者带来重返新四军的邀请信，我决定要一张军事通行证。

隔了两天，一个矮矮胖胖的官员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惴惴不安地坐在椅子边，那样一付低声下气，逢迎巴结的面孔使我怀疑他有什么事要求我。他说是奉省府之命前来向我报告，立煌与新四军之间的道路被山洪阻塞不通，我不能蹚水过去，我说我蹚过洪水没有关系。他提出反对意见说还有国民党中央政府

禁止外国人访问皖中的一道指令。

我要求看这道指令时他失神地摇头晃脑说这是秘密。我再问既然保密为什么要泄露？他忸怩不安，吞吞吐吐地说是因为省府对我的安全要负责任，我说，我毋须省府对我的安全负责，他可放心，他说他非常发愁，并巧妙地补充了一句道，为何不去其他部队访问呢？“我会去的”我说，“首先我要给红十字会医疗队发一个电报把我的确切路线告诉他们，再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发一个电报告诉他，我穿过华中前往他的长官司令部。

青年军官惶惶不安地起来一再赞扬我的不辞劳苦为中国鞠躬尽瘁的劳绩贡献，望我注意身体保重健康，我当面笑笑，谢谢他的关心。

他前脚出门，接踵而至又来了另一个省政府官员，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参加了对我的申请军事通行证的讨论会议而来，一开口就问：“那奴才刚跟您讲了些什么？”我如实告诉了他。

“一派胡言！”他喊道：“二陈CC集团头目听了你的申请二话未说仅说了一句‘她不能走！’别人静静坐着不敢发一言。”

他问我作何打算，我说走过华中到华西去。在目前局势下回新四军无济于事。他板起面孔盯了我一眼，起身同我握手告别。

十月二十八日清晨，立煌保安团派出一队人护送我西行。廖省长和麻齐英的至好、警备司令赖光抚摩廖磊省长去世前送给我的黑骡子无限悲痛不住摇头，依依不舍向我道别。接

着戏剧团团长伸开两臂歇斯底里地喊道：“千言万语感激不尽！送君西行，一路平安！我们还是要在这一工作战斗下去，尽一切可能，多少事会有点帮助的！”

最后代表民众动员委员会的会长年青教授章伯钧前来送行，祝我一路顺风，旅途平安。他一直送我到立煌城外，望着那迂回曲折盘入高山的崎岖山路，别时问我。“我现在就跟你一起走，您看会出什么事不？”我说请你跟护送我的警卫队长说一声就得。显然，我这位朋友真想走的话时间不会太长的，我走到一个山头上回首看山下他还站在我们分手的地方向我挥动着双手。

三十八、赤地千里

走遍华中，整个地区白天只见到满目疮痍，一片凄凉的景象，晚上可听到同是天涯沦落人，那里是我们的家乡的歌声。回忆这一段旅程。赤地千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离立煌西行。翻越高耸入云的大别山脉。全是岩石的山峦，有时攀登险峻的山岩和越过深不见底的渊谷。站在一座山头上看周围群山，山峰有如大海中的浪滔，水波起伏，青峰顶上。密云翻滚，有时一阵急雨迎面打来。使得我们浑身湿透。雨过天晴，老鹰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起落，雁阵惊寒。声断南飞，高山上的大松林发出可怕的叹息。飒飒作响，山坡上蜡树盛开。黄夹白豆挂满枝头在染黄的树叶里晶晶发亮。还有五颜六色的灌木丛树夹在其中。

我们从雄伟壮丽、巍峨独特的高山下，到贫困带来疾病痛

苦的美奂美仑庄园，周围衬托出破落的农户村庄。危楼高墙，碉堡森严。枪眼密布，地主已逃亡。留下二财东收租要债。

我在村边看见一个赤脚妇女把着两个赤脚农民套着犁头的犁把，衣不遮体。破烂不堪。后面还有一个妇女提着粪筐把干粪一把一把地撒在犁沟里。抗战以前，豫鄂皖边区多年曾是红四方面军守卫的老苏区。经过多年的围剿内战，国民党才把这个苏区攻下。多少老百姓被杀迄今无人知道。但如今田园寥落，人烟罕见，村庄废墟到处在目，树上路边的老红军口号，尽被白石灰水涂刷掉了。

村民太穷，什么吃的东西我们都买不到。一天晚上我们到一个较大的村子里决定投宿在一家农民的空屋里，茅屋土房，墙已倒塌，屋顶破漏，可见星斗。我们买到两个鸡蛋，几升米和几头大蒜，吃过没有油水的晚餐，躺在草铺上过夜。

仅我“阔气”，有一支蜡烛。老乡们天黑就睡，或在屋前低声聊天。我躺在铺上想起痛苦的遭遇，这时突然听到夜半歌声。一个男音声声在问，一个女音声声回答。古老山歌犹如古老中国，词儿我听不懂，情词激发出人民的希望和忧伤。一声声一声声地诉怨，走遍旧日的街房走遍旧日的乡村，是荒凉与寂寞、饥饿与寒冷……多少人曾经生活和死亡在这古老的大地上！流离乡土，埋首荒丘！人民的忧伤多么凄凄惨惨切切！我打床头坐起，出神地听着，使我心房紧缩，长夜漫漫何时天亮！

山歌声听不见了，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村子在沉睡中。这支歌当我走过河南，那个水、旱、蝗、匪、饥饿与贫困总是伴随人民的广阔麦地千里的中原平地时，一直在我的耳边回旋

激荡。这赤地千里荒凉景象是怎么回事？年青的护送队长悲痛地回答我道：“比比豫北，不消一提。豫北的老百姓精打精光一无所有！”

我们在大别山脉的西山脚下的村子里看见一家地主庄园的围墙上用石灰刷的“军爱民、民拥军”潢川县青年会宣的口号。写这标语的人是谁？我们一路不见。他们敢写，然后跑了。记得在立煌县时有三个潢川县来的女学生在青年会学习，莫非是她们么？

十月三十日晚上，我们一行安全抵达豫南鄂北烽火连天毁坏无遗的战地边缘的商城县政府。商城可以听到北面三十英里外敌人阵地发出的大炮声，和南面鄂北敌人在这一线设防最坚固的据点传来的隐约炮声。广西部队向敌人据点进攻，商城县游击队奉命前往增援。

县长带游击队上前线去了。我问县政府的官员我也上前线去如何。他们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地说：可太危险了，鬼子盘据商城九个月，今年五月间才被赶走。商城县过去人口二十五万，现在不到五千，人们过着没完没了的逃亡流浪、流浪逃亡的生活，鬼子不时进行扫荡，深入豫南企图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商城县县长郭鼎曾任县保安团剿共司令。他一外出我便成为县商会会长的客人，他们安排我在商会一间房子里下榻。我在那里会见了商城县头面官商人物。我们的主人们说明，因为这里过去是老苏区，所以商县城没有群众组织。商会四面高墙的粉壁上写着大标语：造谣惑众者斩！忠孝为齐家之本。

商城县国民党书记长闵尧是一个我生平仅见的冷酷凶狠的

青年。我问有哪些县人民团体组织，他例举了县商会、县保甲会、米行、粮行棉行等商会，有一百二十名的理发同业公会。有四百会员的木匠砖瓦同业公会等等一串名单。还提到“城外”有一所小学和一个农民团体。

我要求同理发匠、砖瓦匠和木匠公会的代表谈话，他说他就是他们的代表。有话可以同他谈！我问城外农民团体在哪个村子里，位置在哪一带，他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地说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他想把他们组织起来。不过嘛，为难得很，因为这里是老苏区。国民党计划在潢川办一所群众组织人员的训练学校。红军占据商城、潢川两县四个月之久。国民党军队把周围的山林树木统统烧光才把他们赶走。显然他得意忘形说走了嘴，随即狠狠地补充说是红军自己火烧一切森林树木的。真是可恶之极！我问为什么红军要放火烧山。他回答道：“树木森林属地主所有呗！”

我的东道主商会会长是一个老人，他被红军捉去以反革命分子罚过两千元大洋的款。逃到汉口后随国民党军队衣锦还乡。他的过去，我不提起。因为他是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旧世界的人物，同这类人交谈，我总有如临大敌难以应付之感。他戚戚寡欢，谈地主眉飞色舞，谈农民缄口不言。

商城位于大别山麓，是一个战略要地。附近发生过大战，敌人攻占商城前，飞机炸毁了城内一切房屋建筑，五月里被赶出商城时，把城乡烧光、杀光、抢光无遗。

商城县政府派出十五名武装，护送我到西北面较大的县城潢川。敌人一度占据潢川县三个月。由于潢川县附近有一支游击队闹事兵变，部分人投敌，其余人正在打家劫舍、拦路抢劫，

因此我们的启程推迟了几小时。我们要走的这条公路是江北中国的主要“命脉”。这条路已经破坏，战壕深沟深入公路两边的麦地里，防止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通过。把战争物资运往河南、安徽、远至山东甚至东海前线部队的独轮车辆，骡马牲口和挑脚民夫络绎途道川流不息。这是鬼子和土匪打劫出没之地。

我在商城县所见“民众动员”的唯一证据是出发前我雇的两个挑夫的事。我向县政府当局提过要人帮忙挑运行李、打字机、照相机、胶卷、医药器材设备等等物件，他们派出武装到城外，半夜三更，闯进农民家，抓了两个人，给我捆绑着送来了！三更过后我听到隔壁房里沉重的脚步拖曳声我才清楚这么一回事。我走进房子见到两个穿得破烂光着脚板的农民蜷缩在角落里。如果我不用这两个人，县政府又会另外照旧抓两个顶替。我的秘书对两个农民说我们会给他付工钱吃得好，他们只是向后退缩，两只怀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们在一条街上休息的时候，一个挑夫在人丛中跑掉了。班长到街上去另外找人。同时我注意到在我探身摸索篮子里放的途中零取的食物、香烟和用物时，另一个挑夫瞪眼瞧着我。吃的东西抽的香烟通通不翼而飞！挑夫小声小气地告诉我，马弁们早上吃掉了东西拿走了香烟，还到处搜钱。这时我记起了那个警卫护送班长问过路上是否真有特殊部队在前头接我们的话，有一张非常机灵面孔的小警卫兵告诉我的秘书，警卫班的兵过去都当过土匪。于是我对秘书说：“我们在县衙门口前不远小偷就光顾了，此去路远免不了大盗会光临。”

确是如此。我们走了个把小时，全体警卫兵把班长包围住要他给他们发三个月的欠饷十五元。班长答应每人两块五角，

拿出记事本动手记名姓。士兵们反对，讨价还价争来争去由三块四块最后说到五块，买卖再无进展余地，士兵们黯然接受五元，坚决要求小警卫兵高声念出记事本上记下的一切。

争吵并没有解决，我们胸中有数，随时有围攻要钱爆发的可能性。继续赶路。途中我们了解到那个小警卫兵的出身。他非常机灵，沉默寡言，我们谈到商城见闻和老红军传说时，他插话道“红军红军，富人的仇人，穷人的亲人，富人恨它穷人爱它。爱憎分明好得很嘛！红军有俱乐部歌唱队，医院学校俱全。我小时候就参军了。读书识字就在那里学的。”

夜里我们到仁和集镇投宿，它在山坡上，被轰炸和洗劫的遗迹犹存，景物萧条凄凉满目。进镇前我们想买点吃的东西闲逛了一阵，在枝桠参天的大树下找到一个灯光暗绿的小吃摊，有馒头，大蒜头和开水可买。我们站在小摊旁边时，街上一小队穿军服的人从街头下来了，他们谈笑风生，情绪激昂，个个精神饱满神气十足。我盯着这些人，突然他们里面一个人叫起我的中国名字来，我也马上认出他们是八路军人。他们是到安徽新四军部队里去担任军政干部领导工作的。他们走过华北，随行的有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年青的英国人乔治·何格。

他们一路住在农民老乡们的家里，没有同官绅见面，沿途所见一切使他们满怀胜利信心，形势大好。他们兴高采烈的欢笑。战争打得漂亮，人民觉醒了，政治上的偏见依然存在，军事上胜利到处是。捷报骤传！我们把几个月来的经历一说，他们张口结舌困惑莫解。

他们走后，我们回到住处。我们怀着满腔悲愤，无限忧伤

的心情动手写作。时至今日，我同各方面的人物打过交道，虽然所持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均从人类进步的思想出发考虑问题。尽管历史会出现暂时的黑暗和干戈纷扰，我们一息尚存、大家都充满解放中国、振兴中华推动社会向前进的信心和希望。现在我似乎脱离了八路军新四军那个可爱的人物圈子，陷入黑暗、贫困和压迫的汪洋大海。我沿途所过之处，眼不见希望的标语，耳不闻自信的歌声，人民群众并不积极活跃。走到哪里，贫病交加的乡亲们围住我。求诊乞药，有先天性梅毒的婴儿、皮肤病人、癞痢头、烂眼睛、化脓腿，等等等等。应有尽有。有人告诉我，潢川县有一个教会医院，我劝他们到那里去看病求药，他们失望地说医院要钱，有病无钱休去。

写到这里，不禁长叹：“都因为贫困、肮脏和疾病！我已用掉一半药物。可还没完没了！唯有巨变始可了结这个悲惨的世界、人民的苦难！”

一队结实的农民在塬上练操。向下看，上溯到古代周朝的潢川古城在望。内城位于一个高山坡上。一条小河环绕县城，雨水冲刷外城呈现锯齿状。使我想起了位于山坡上被山脚下蓝色的河水冲洗的中世纪堡垒布拉格。回首东望无边的麦田那边，隐约现出绵延起伏高峰入云的大别山轮廓。

老百姓一下涌出村子朝麦地里逃跑疏散。空袭来了！我们爬在一个坟山的墓沟里躲警报。北面天空出现九个小黑点，越来越大，机声隆隆，掠过头顶向南飞去。

下午四时，我们过桥，河水清澈，经过城垣，城门口两边墙上写着大标语：镇压里通俄国的赤匪！头可断血可流决不投

降屈服！

内城戒严。我们登上石阶通过三道警戒哨，每道岗哨都对老百姓检查甚严。县政府衙门口高高在上，周围铁网工事防卫森严。

买大富，国民党员，潢川县特派员，是一个青年军人，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的侍从副官。他欢迎我到潢川，命令为我们作饭，并引我们先看后花园，我们发现自己身临另一个世界。大而可爱的花园里有两个灌木园林。万紫千红芬芳争艳的月季花正在盛开。石桌石椅已经凋零剥蚀，旁边有一座远在基督以前统治这里的陈侯王墓，玉石嵌砌、外观矮小。

买特派员和这幅图画相称，他彬彬有礼，非凡英俊。他的服装雅致朴素。开初他亲切尊严地商量我的住处问题。城里有三个基督教堂，它们的屋顶上都升有国旗，到现在没有被炸过，他建议我到那个教堂去住比较安全，因为天天空袭。至于天主堂则可疑。一个神甫在敌人占领潢川期间为虎作伥帮助日寇已被当局驱逐出境。副官报告城内旅馆太脏。最后我同意买的意见，到美国路德教会去住。

生活在教堂里，住宽敞舒适的房间，吃丰盛的可口的饭菜，睡柔软钢丝床铺，室内有一幅猫儿弹四弦的名画。

福音堂里有两位挪威籍女士：帕特生小姐曾任护士，桂嫫小姐现在是福音传道牧师。刚自北区巡回布道两周归来。帕特生小姐饱经风霜，见到中国的黑暗面特多，她百事冷嘲热讽很老练世故。她说中国人实际，尽是唯物主义里手；贪污腐败成风，土匪强盗横行。在我的眼里她可是一个铁石心肠，会做生意的能手。桂嫫小姐富有辩才，偏见较少，对中国多表同情。

上次巡回布道中在一个村子里，她和一个中国“圣经妇女”教友晚上安全住宿了一夜，村子里的老乡们怕土匪都逃光了。一个军官警告她们俩个马上离开，但是安然无恙。老百姓第二天回来了，她照常上她的圣经班并主持了一个复兴会。她说她的信徒都是老太婆，她们把她教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每次回去总得重教，回回如此抄夹生饭。多数基督信徒都是怕死的老鬼，这使我好笑，而我所见到的一般年青信徒则又大多是为物质利益而信基督教的“鸡斗徒”。到现在我还没有发现基督教战士。

我到潢川县军医院门诊所进行访问，发现伤病员很多，但缺药物。他们说因为支付不起挂号费和公开病房每日收费五角的床位费。他们从来不把伤员转到教会医院去。路德教会医院免费接受汉口国际红十字会的医药器材，但拒绝免费收留伤病军人。帕特生小姐振振有辞地争辩道西药仅给难民，本区没有难民收容站，军队有的是钱，伤兵要看病，军队有钱付，至于官长总是有钱。她对穷人开了一个小门诊部，病人须持贫民证。

一天和我住在一起的秘书告诉我，教会医院门口有一个伤兵躺了四个小时之久。因为交不出八角钱的挂号费和一天五角的住院床位费拒绝接受。我发现这个伤兵躺在担架上，伤口流血，奄奄一息。我付了挂号费和一个月的住院费，马上去找铁石心肠的中国信基督教的医生赶快抢救病人。有钱能使鬼推磨，付了钱，伤兵收下了。

我向帕特生小姐汇报：这件事我不能不向国际红十字会作出报告并加以报道。她翻查文件仔细阅读，最后坚决要把钱退

还给我。但是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并未收留一个伤兵。医院对这类病人一毛不拔，而国际红十字会总是给医院拨款。在我看来教会活动有时好比是一种买卖生意。遗憾的是，我还寄居教会之家。

我同特派员买大富在一天下午谈话中间，空袭警报来了，谈话中断，我们同跑警报的老百姓蜂拥而出，穿过古城缺口到麦地里挖的容纳一人的防空洞里躲了起来。我钻进一个“狐穴”。看周围万头齐动，伸出地面仰望天空，人人头上有一把麦草或几枝树枝作为伪装。

生活在山头上，有部队作警卫，物资享受舒服安逸，而人民生活痛苦的煎熬中。买特派员对此也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百姓疾苦，漠不关心。我想起了旅途夜半男女的穷愁哀怨的歌声。他是决不可能也不会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痛苦的。除非翻天覆地覆中国来一个巨变，作中国人真苦到尽头够难生活！

当晚，我同买特派员、潢川县长、驻防县南前线的广西军第七师副师长王昌平少将共进晚餐。我们站在一张军用大地图前面研究中日军队的布防位置，他们告诉我抗战开始以来双方的地理情况。

王昌平少将长相好似树上的节疤，广西人，矮而壮，丑八怪，光光头，罗圈腿，眼睛灵活，纯朴，我喜欢其人。同英俊潇洒的特派员比，他恰好是直接对立面。他似乎并不关心“保持一切事物安于现状”，他不仅从军事标准而且从人心向背这个标准来判断抗战胜利。他说什么是人心向背的标准？那就是老百姓对待敌军和对待自己军队的态度，战争第一阶段，老百姓不是离乡背井远方逃难，就是东奔西跑吓得要命。但如今不同

了，敌人扫荡过来，百姓就近转移等待敌人被打回据点去。进村骚扰的鬼子如果人数不多，百姓并不逃跑而是统统把他们干掉。

三十九、传教牧师

走过华中，我见过许多传教士。他们当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美国路德会挪威籍牧师史金斯涅士医生。他的医院坐落在驻马店南的确山县城外小丘上，医院粉白色的屋顶，在一坦平原，十几里外就能看见。院子内插有十三面美国国旗，但是日本轰炸机先后三次从南面飞临它的上空俯冲投弹，两座楼房完全炸毁，其他房屋严重破坏。

确山在平汉铁路线上，南面二十五英里的长台关有日本兵营，再南面的信阳是武汉敌军驻防重地。驻马店北的铁路已经拆毁成为麦田，钢材给驻马店一些工人开的小铸造厂，为部队和游击队铸造兵器。

敌人离确山很近，城里拉空袭警报五分钟后敌人的飞机即能飞到确山上空。每天有四五次警报，晚上有月亮也有一两次。教会医院周围十多里处不见树木，连藏身之处也找不到。因此敌机可以随意低飞，扫射医院跑出的人。史金斯涅士医生夫妇和两个美国护士以及新近培训的中国女医助，住院病人，一听警报唯有听天由命站在那里等待挨炸。

我病了，确山县长给史金斯涅士医生写信问他是否可以让我住院。有关这个医生的许多传说我听人说过。一个说法是，他的脾气古怪倔强，一念到“异教徒”三个字就骂不住口，恨声

不绝。在县长给他的信里附了我的一个便函。上写“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请您帮忙不能不告诉这点”，回信时他请我去，并加了一句话说：“您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我可是”。

他胸前挂着白围裙走下山坡说他家里有房间，不但我可以住我的秘书也可以住。我很不安地跟他走进屋，甚至我的秘书也现出很讨厌传教士的样子，他们的住房和生活太舒服豪华，太宽敞漂亮了。

他的家并不豪华，虽说是在一贫如洗的穷苦老百姓看来是奢侈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下层阶级的家庭，干净整齐收拾得有条有理，家具还是二十四年前从美国带来的，擦得光亮一新。我很快从一个护士口里知道史金斯涅士医生和他的妻子都未存钱。他们的儿子女儿在芝加哥中学毕业即各自谋生。女儿上护士学校，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充当护士。

医院装备可收容八十个病人，现有一百三十个，曾经多到两百。它的药品由汉口国际红十字会发给，但它不象潢川教会医院那样军民有别，歧视对待。它对士兵、难民、老百姓以及教会和县里非教会的孤儿均免费治疗，一视同仁。此外，史金斯涅士医生对能够付得起药费的病人卖药，并供给部队急需的外科手术工具和麻醉剂。

这个医院的中国医生和护士在上次严重轰炸过后纷纷离开，有两个女护士参加了活动在平汉铁路一带的新四军挺进游击支队。史金斯涅士医生是唯一主治医生，一天二十四小时忙个不停。早晨五点或五点半起床到空袭警报以前作好手术。上午查房看每个病人，上下午抽出两小时对门诊部成十上百军民和个人看病。能付一角钱的挂号诊断费的病人就好得很，并不

强要，也不用对赤贫病人进行“家庭情况调查”。

这个传教医生在生活上、工作上表现他是一个倔强的基督徒。他说根据他往日同那些没有同情心、责任感和不老实的“异教徒”医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总是说话刺耳。甚至声色俱厉。唯有基督教才使人们富有同情、诚实忠于本职工作的德性，这是他的铁的信念。他用“异教徒”这个词儿的准确程度，同美国南方人们污蔑黑人的用语称黑人是“黑鬼子”一样准确。但是，他对老弱病残伤病患者的工作态度。我看他是一个献身为人民服务的传教牧师医生。

对中国人民这种态度，他有他九死一生令人胆寒可怕的遭遇所致。去年九月初旬某日，有一个高级军官送他的有病母亲到医院看病，并且派卫兵驻在小小的医院和教会院子里面。老太太死了，尸体停在院子里十几天由卫兵们守护。史金斯涅士医生的妻子到山里去了。他一天辛苦过分疲劳了，夜里被吵闹声惊醒。他喊住在附近的佣人一个厨师：但无人答应。四个卫兵把厨师捆起来嘴里塞上棉花，破门而入，用枪和斧头威吓他逼他要钱。在卧室抢走了他的怀表、电筒和一点零用钱。

他们还是要钱，但他说钱在医院的保险柜里，不过他又记起屋里确实有五百块大洋藏在顶楼上以防鬼子土匪来抢医院。钱是医院的钱，多少日月积攒下来准备采购药物的看病费。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不能说谎，于是他对强盗说了钱在那里，并跟他们上到阁楼顶上。强盗们拿了五百块大洋还是逼他要钱，骂他扯谎，用一把剪刀动手划破他的大腿，鲜血喷出，医生跌倒在地上，强盗们最后决定把这个穿着睡衣、光着脚、血流如注的医生带到医院去要钱。一个强盗把他拖到园门口，叫别

的人跟上，但是无人答腔，他们暗中逃之夭夭，连钱带人不见了。这个强盗怕失掉他的份子，放下史金斯涅士医生，暴跳如雷大喊：“待在这儿！你敢走俺就宰了你！”一晃就不见踪影。

医生想横竖一死还是逃命为上。他连滚带爬跑下山坡，跌倒在一个吓昏了的医院守夜人的脚下。尽管有两个人应该帮他护理，但史金斯涅士医生第二天还照常到医院上班。高级军官调查了这个案件。但要求举出强盗名姓。史金斯涅士医生不胜愤慨地诉苦：

“他们毫无作为！没有一个人受到处分！半年前国民党政府下令部队归还我五百块钱。蒋介石夫人给我来信对抢钱案件表示歉意并赞扬我在中国的工作。蒋介石派军队守卫医院，这样白天晚上有兵站岗放哨了。”他迟疑了一阵又补充了一句：“我可是用钱买的警犬啊！”

史金斯涅士正在诉说他的痛心经历时，三架敌机已飞临这个插有美国星条旗的医院上空，再来一次尝试。一颗冒出黄色化合物的燃烧弹落到屋顶上，但没有火烧医院，仅有一个站在医院院子里的人受伤。

有的传教士相信并且宣讲上帝保佑基督徒不保佑异教徒。后来我听到有的传教士警告中国老百姓，说什么他们如果逃到庙寺庵堂里避难就会被杀害，如果逃到教堂里上帝就保护他们。

史金斯涅士医生同伤兵病人在一起工作时勤勤恳恳，他是一个现代科学家，同外国会友一起祷告时，念念有辞。我对这个医生的人格十分赞赏，因此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祷告会。史金斯涅士医生在会上宣讲“驱除魔鬼”一章，看来他相信圣经

的每一章节和每一词句。我最赞赏他自己内心斗争的一段祈祷。他惶恳哀告上帝洗净他过去遭苦难的一切记忆。上帝并不保佑伤人的坏人们。恳求上帝给他和他的会友同事们忍受空袭轰炸和不怕其他灾难的平安无事的信念。我把他的祷告记在我的日记里如下：

慈悲的父，保佑中华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会员们，他们正在前线各地救死扶伤活人济众。请主上帝，给他们勇气继续工作战斗下去，引导他们向基督。保佑救死扶伤活人济众来到这里作客的贵客，请主上帝给她以勇气继续工作战斗下去，引导她向基督。引导中国最高当局不要偏心狭隘，对为国家作战的一切军队都要一律对待。

啊慈悲的父！使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下获得自由和解放，带来最后胜利和安乐和平，教日本知道他们的错误终久会自食其果。

四十、修道女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天下午，我们在南阳的途中遇到了雨，连绵细雨：一路上下个不停。天快黑了，我们急急赶路。我的武装护送队在黄土烂泥路中滑倒摔交恶言恶语骂娘骂天。我的大黑骡子如履薄冰转来转去。我们一路上见老乡就问“到南阳还有多少里路？”真是越问越糊涂，有的说三十五里，有的说二十里，有的说快了，有的说差不离，真是随口答腔，有意说笑，谁也承认他不准确知道。

我下决心打发护送队回唐河去。倾盆大雨中土匪不会拦路

抢我们，附近的日本敌人也不会出动袭击我们的。当我们走到一个村子里在一个凄凉黑暗的小茅屋里叫烧开水时，我改变了打发他们回去的主意。

满载邮政包裹的独轮大车在茅屋底下避雨，我们问邮差，“到南阳还有多远？”

“二十五里”，他回答道。中国的邮政工作者遍及穷乡僻壤，起早摸黑风雨无阻的既平凡又伟大忠于职责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他们似乎什么都知道。邮差答话时，我发现有五个兵盘腿坐在炕上，面前摆着一张小桌。虽然光线模糊，我看他们一身肮脏不堪，头帕发黑。一个兵把小锡壶放在炭火边热酒，一杯杯斟好，然后划起拳来，谁输谁干杯。他们一脸横肉毫无表情，象是梦中的好汉英雄人物。这情形使我发寒。我掉头问邮差：“那几个兵是些什么人？”

他打量他们，想了一会，然后回答道：“他们既无军帽，也无臂章，不可能是那个部队上的……他们身上有枪……”他停顿下来环顾我们这个团体又补充说道：“不过嘛：你们的枪足够防身，我看。”

于是我打消了让护送武装回唐河的一切念头。

寒风呼呼啸号，冷雨哗哗啜吟。水珠湿透了我的棉大衣也浸湿了我的内衣。我们的绑腿和棉鞋淋淋湿透，我们的军帽成了湿布。我的大黑骡子在泥泞中摇摇晃晃移步。我试着下骡步行，烂泥吞没了我的鞋子费很大力气才找到它。

时间快十点，南阳城已近。我们走上城南十里的光亮的公路，两旁绿树成荫。城南一条河，水面宽阔流入一个湖内。我们松了一口气，把牲口拉到平平的渡船上过白河。南阳是一个

军事重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都有哨兵盘查我们。南阳多次受到轰炸，破坏严重。市民一早下乡疏散，下午三、四点回家照常营生。全城晚上热闹异常，商店旅栈开门，菜市场非常活跃。大街两面许多房屋已成一片废墟，有些地段的瓦砾堆已清理干净。

南阳县长热情地接待我，并且滔滔不绝地讲起南阳周围的军事设施来。因为他白天整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所以他十分精神抖擞，一谈就几个钟头。而我们这天行了十八个多小时的路，大半途程在泥泞大雨中走过，仅清早四点吃了一点东西到这时饥肠辘辘实在饿得发慌不堪。

热酒的力量使我们提起了精神，我打开日记本记下县长的谈话要点。他说：“轰炸并不特别严重，敌机只是骚扰我们罢了。部队在城外，省政府已迁洛阳办公，要炸也只炸伤老百姓和街道房屋而已。”

“哎哟！”我唠叨了一句。

“小学、初中、高中都疏散到乡下去了，总共有八千多学生”，他继续说下去道：“难民的数字是五千六百二十二，都是水灾无家可归的灾民。我们把他们安顿在能供给更多人口的家里。”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人最后提醒，使得县长想起让我们后半夜睡一觉不致有害身体。但县政府住满了军队，拥挤不堪，不可能待客！旅社在城中心也不可能，因为跑不到城外飞机就来了。看来还是把我安排到哪个教堂里去为好。

我们在县长秘书的陪同下，在大雨中经过半小时走到挪威传道会门口，几天前刚刚炸过，屋顶倒塌，一堆瓦砾。再过去是南阳天主堂圣母院，我们趟过积水的街道朝这个女修道院走

去，狠狠敲打它厚重的大门。很久才听到后院看门人的发抖声音，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一再问我们是什么人，哪里来的，上哪里去，三更半夜敲老百姓的门干啥？大雨倾盆，反复问答。最后叫我们等着。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痴痴等在门外。嘀咕怀疑是看门人睡蒙头觉去了。我们正准备去找旅社时听到大门里面妇女一阵哧哧的笑声。县政府秘书告诉她们我们是什么人，县长请她们接待一个美国女士住下。

“哎唷！不行不行！”一个温柔细小的妇女声音应道，“我们的生活跟中国老百姓一样，没有舒适的东西能使美国人满意的。”

我说我并非图舒服而来。门内又是一阵意大利腔调的哧哧笑声。然后一个人说：“我们生活简单，不过对您欢迎。”

沉重的大门慢慢地向后拉开，一根大树干作门闩，风灯光下，一群身穿黑袍，头戴小黑帽的修女惶恐不安地站在那里。她们惊魂未定，生怕是土匪还是日本鬼子来了。年龄最大的一个修女，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修道院院长艾敏尼娅·马林维尔妮妈妈，请我们进院。

修女们急急忙忙领我们到会客室里，两个秘书和我加上三个挑夫六个浑身湿透的人，各自脚下淋一滩水。我们商量的结果，我的秘书住在一个神甫的家里，县长秘书回家，其余的人去住旅社。大雨滂沱中各人终于走了。我同主人们打招呼。修道院里有十个修女，五个出来。一个青年修女艾敏尼娅德·加坦妮略会说英语。会客室是中国式的大长间，青砖地，白粉

墙，四壁有圣母像和图像，中央一张长桌，四周摆着靠椅。她们问我这房子可舒适不？

我告诉她们安逸得很，在桌子上、柜子上、板子上、地板上铺上行李我可习以为常了。她们都很激动，赶忙给我预备一张床。不一会儿，她们抬的抬、抱的抱，垫被盖被，有的抱着雪白床单枕头，有的拿着红毛毯，有的端着一炭盆木炭火，进来了。我脱下湿衣服时，她们用另一床毛毯包住我，并在我的面前摆了一个覆盖了的盘子，揭开雪白的面巾。一眼瞧见牛奶、面包、莎乐美、蜂蜜、黄油和一罐咖啡。“哎唷！希罕的很！甜蜜的咖啡！”

“吃莎乐美，意大利香肠，喝一瓶弥撒酒如何？”年青的女修道士问我，说这是道友们自酿作弥撒时喝的酒。这个修道院差不多能自足，它养猪、牛、鸡、鸭，有蜜蜂房，有葡萄园。修女们自己作饭、洗衣缝衬、擦地。还自作面包、黄油、香肠、乳酪、甜酒。

有几个修女是受过训练的护士，艾敏尼娅德修女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实验室技术员，她还帮助洗衣、作饭伺候进餐。这是我访问过的外国教会。组织外国人进行体力劳动的第一个教会。一般说来外国人在中国是从来不干体力劳动的。她们什么都干，这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唯一一个。

我吃饭的时候，她们在旁边姗姗走来走去、含羞带笑温柔有礼貌地问了我许许多多问题。我走到行军床边，她们放正枕头，铺好被子，盖严毛毯，拍我安眠。

“太舒服奢侈了！”我的手在细软洁白的床单上摸弄不停。两只眼睛朝天花板和四面墙壁望来望去，天花板已经支

离破碎，墙壁现出两条长及墙根的裂缝，玻璃窗用木板钉住。

“那是空袭破坏的结果”，艾敏尼娅德修女面色惨然地解释道：“还好没有命中，周围许多房子统统炸坏了。我们的房子也震坏，墙如倒塌可真遭殃，我们可吓坏了。”

她说修道院幸好没有命中，是因为他们个个祷告天主保佑。她们还在防空洞上面升了一面大的意大利国旗，房顶上升了一面国旗。每面国旗角上她们还缝了一幅圣母布像“圣母保佑了我们”，她说。

每次空袭过后，有的修女背起急救药箱上街去抢救炸伤的老百姓，其余的修女在门诊部等待抬进来的受伤者，她们有一个二十张床位的小病房，经常满员，每天有百多个病人上门换药包扎。后来几天我注意观察护士们在门诊部勤奋工作，许多药品很快用光了，有些特效药根本没有。

“我们是护士，但非作医生的工作不可。”一个修女说：“我们只能作小手术，大手术要送到老河口教会医院去，离南阳两天路程，太远太远了。”

修女们每周去监狱一次，从事医务和宣传福音的工作。有的妇女每周到城郊三次去看穷人的病。艾敏尼娅德修女讲到这里时双手交叉无限感慨地叫道：“哎唷唷，象河南这样的皮肤病秃子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东西，意大利可没有，即使在英国我也没见过！”

第二天黎明，小教堂院子里的嘈杂声把我吵醒。不久，房门开了，水汪汪的眼睛，笑眯眯的艾敏尼娅德端了一脸盆热水进来。之后，又送上一份西餐早点。昨天夜里她把我的外衣晾

干了，把我的衬衣袜子脸巾洗得干干净净。

我终于来到一个地方，有机会在这里给《曼彻斯特卫报》和红十字会医疗队写出我的文章和报告。艾敏尼娅德是一个美而艳的青年修女，水汪汪蓝色的大眼睛闪耀着青春的欢乐和艰苦处世的稳重经验。她过着修道院的道貌岸然的生活。尽管如此，她那直来直去的语言和那一身修女服装的风度总难使我理解她能皈依天主正宗。我倒乐意瞧她的一双手粗糙健实同农民的手一样，喜欢听她谈修女们干体力劳动赞美上帝。看来上帝对她好比近邻。她是意大利一个贫农家的女儿，十六岁进修道院。她念念不忘地悲伤地提起她前年收到去世的母亲的话和在火车窗口见过她母亲慈祥送行的面影。

为了把她培养成为教会的完善仆人，教规打破了她的个人意志，摧毁了她个人的愿望，她施洗赎罪积极维护教规。她当见习修道士的时候，在修道院的传教杂志上读过有关中国方面的文章，即表示内心要到中国的强烈愿望。因为有了这个愿望，她被送到英国而后到她希望前往世上落后的地方去。她接受了这个差遣作为侍奉上帝最完善的途径。整整四年到中国的这一希望快成泡影时，突然接到通知命她马上动身来中国。

耶稣教徒说中国人是“异教徒”。天主教同样。看来天主教比冷冰冰认罪的新教徒要灵活得多。天主教有如中国的释道两教，有偶像天主圣母。五颜六色神秘壮丽的徒众，司令念经，烧香顶礼。我想起在欧洲路边上见过许许多多基督圣地，血淋淋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令人作呕。倒不如中国每个村子里路边上管上不管下的小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公婆婆偶像更使人感动。

每当河南有一个传教士当着我的面说“异教徒”时，我就

提醒他，我也是个“异教徒”；我的话几乎使他跪了一个礼拜，祷告上帝拯救我的灵魂。我仔细阅读了他给我看的教会宣传小册子，然后硬要他从不怕死的观点出发给我指出宗教的某种原理在什么地方，我说耶稣是一个社会革命家，他之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因为他同当时的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你死我活的斗争，我的话几乎把他吓死了，我的年青的修道女友为传教士们辩护说，传教士们是抛弃了家庭温暖和安逸向“异教徒”宣讲真道的，关于“安逸”并不见得，我对她说，并不如此，而且我还是提醒他们，现在的革命者也抛弃了家庭温暖过着忠于主义原则的艰苦生活。

我倒不在乎，信男善女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异教徒也罢，非异教徒也罢，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在于人们要为人谋幸福，不出头干涉穷苦人的解放事业。我这种思想，修女们无法理解，她们从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观点出发，毫无政治动机，而她们的神父则反其道而行之。她们送了我一道天主教护身符百般劝我带在身上，又劝我空袭中间呼喊圣母保佑。我可受不了愤然谢绝她们的美意，我宁可依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不仰仗天主圣母的神助。

离开了南阳，我给修女们赠送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药品和捐款，作为空袭受难者和伤兵的急救费用。一九四〇年七月五日我收到艾敏尼娅德修女给我的来信，摘录如下：

我们这儿在下的每个人的命运确实悲伤，等待佳运极乐的来临。

几个月前战地送来许多伤兵和发高烧的病人，我们有两个护士每天到部队后方医院去帮忙，我自己有时非常愉快地同

修女们去那里，可是我们有一个修女从伤兵那里传染了伤寒，第二天修女们也得病不起。五月六日，南阳，遭到特大轰炸，炸死一百多人。五月十一日，我们两个修女卧病在床时，日本飞机来了，投下两枚炸弹，落在修道院修女睡的房间几码外的地方……。

无论怎样，我们将留在这里同我们受苦受难的兄弟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上帝慈悲，不但会继续保佑我们，而且会给我们力量为受苦受难者克尽绵薄……。

艾敏尼娅德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给我写的另一封信上说：

“我们的消息同去年一样。日本鬼子经过两天的狂轰滥炸，短暂休歇之后，这回真攻占了南阳，幸运的是，大难临头老百姓害怕，几天前大半离开了南阳城。占领前几天我们一个修女得了重病，我们住在城外十二里金家岗村子里的主教接她上他家去住……。日本人出乎意外地占领南阳前先经过那里，把村子捣成平地，我们救护了四十个受害的村民，至于南阳人数更多。一星期后我也病倒，险些丧命。又几天后我们另一个修女也得急病上了天堂。现在还有一个修女得了同样危险的急病，岌岌可危。

南阳沦陷前我们的房子被燃烧弹破坏无遗。我忘了把这情况告诉您……。日军撤出南阳他们纵火烧城，市内大火象一座火炉……。

亲爱的朋友，您太好了给我们送来钱和药品，除了您，上帝仁慈差遣您来相助，现在我们毫无援助……。自从分手后对于那些上门求助的人们，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给予救济，除

了这个我们来到中国别无所图。您送给我们的打字带我很急需，遗憾的是没有收到……。

回想起来，那样一个黑夜，那么大的雨，您是如何到我们这儿来的情景如在眼前，我们欢喜极了。我们生怕不能给您适合口味的东西让您安宿。您一点也不做作，我们真感意外。自那以后发生了多少事啊！

可尊敬的艾敏妮娅院长和全体修道女友托我致意祝福您。

您诚实的艾敏妮娅德·加坦妮略

四十一、皖南事变

无论哪些事变，我都没有心情报道。写中国从不屈服，英勇战斗、宏伟壮丽的光明面是容易的。但中国毕竟是中国，并不孤立，世界之大，毕竟不只有中国。中国这个小天地在世界大家庭里有它的难兄难弟，人们可以从世界其他角落的力量因素来研究中国的情况。从世界每个角落既团结又斗争互相对立和矛盾斗争的另一方面，去观察各种社会发展的因素。

离开立煌一年以后，我收到华西一个新四军的医生给我来的信，告诉我青年教授章伯钧和立煌民众动员委员会全体男女学生一千多人，冲破险阻投奔新四军去了，他们是成群结队出走的。新省长李品仙以往并不特别反动，主持安徽省政后，奉有抑制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命令。青年们在风云突变的新情况下不愿留在立煌工作，不甘心同室操戈骨肉相残打内战。他们不是共产党，但共产党向他们敞开了大门。留在立煌的青年继续工作战斗，身在立煌心向别处。在我看来顽固守住自己既得利

益的旧世界的人们是极其愚蠢的。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新四军第三支队四千男女战士被国民党军队八千人围歼在长江南岸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愤怒声讨国民党政府挑起内战的暴行。山林树梢上挂着医生护士政工干部的尸体。伤病员的命运如何，我不敢想。怒火满腔，同声愤慨。

消息告诉我们，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受伤被俘，送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军事法庭，顾祝同这个人就是抗战前对清江新闻记者之死应负责任的屠夫，这，我以前曾经报道过。据共产党人说，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战斗中受伤不幸牺牲。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叶挺将军的谈话：

“像你和我这样的人，既非国民党员又非共产党的人，内战一来遭遇会怎么样呢？”他问。

“首先被杀害的可能就是我们这样的人，”我这样回答过他。

消息普遍传开，国民党政府首先试图封锁报道，然后极力加以否认。关于这类事态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很大的矛盾。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白崇禧，对事变命令应负责任。我听说接火报告送到重庆时，立即停火的命令已经发出，但顾祝同扣压了电报。国民党政府在消息传开之后则力图把它说成是“军事必要”的行动。

政府报纸最初的报道是荒唐和愚蠢的，一条消息指责新四军叛乱进攻国民党中央军队。另一条消息指责叶挺将军和全部新四军“阴谋”首先占据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大三角洲地带，然后占据句容、丹阳等县作为反国民党正规军队的活动基

地。新闻记者写这类报道是知道谁也不会进行分析或查看地图的。至于外国人当然不去管它。人们请看地图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洲地带为日军所占领，并且是日军进攻华中的主要军事行动基地。句容、丹阳正在长江南岸，两县均为日军要塞。如果新四军占领这些地方的“阴谋”属实，那一定是消灭打败了国民党一切正规军队的日本军队的“计谋”。官方报纸为什么不指责叶挺将军和全部新四军也有占领南京和东京的“阴谋”呢？这倒使我感到非常奇怪。

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处境是严重的。据我从各方面搜集到的材料分析，情况是这样的：当英国在一九四〇年年中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切断中国国外一切军事供应时，日方立即向中国提出自由和平谈判条件。和谈条件对内始终保密，但广西部队一个熟悉内幕的军官告诉我，日本人提出踢开汪精卫承认蒋介石为半独立中国政府主席，除沿海战略港口驻防撤退华中华南一切日军，但日本要求黄河以北华北一切土地为日军所有。日本人从未放弃夺取中国领土华北的野心，它使中国首先陷入战争，被迫抗战，保存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日本占领华北不仅可以掠夺这个地区的粮食、钢铁和其他战略资源，而且可以作为进而攻取全中国的军事基地。它被构想为反共反苏防止苏联扩张共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军事基地和“环境卫生”区。然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正在这个华北地区坚持武装抗日的军事行动。

滇缅公路的封闭，日本和谈条件的提出，最后迫使新四军驻防江北的命令，种种蛛丝马迹令人怀疑不是偶然的，因为八路军自抗战以来继续不断地受到蓝衣社分子胡宗南的五十万大

军的严密封锁。胡宗南军队可说是中国装备最好、给养最足的精锐部队。自一九三八年春台儿庄战役以来，大多数胡军没有对日军放过一枪，而在八路军后方筑成了三道封锁线。国民党政府一年半拒绝给八路军发武器弹药、军费和医药物资，因此共产党人在各个战场上，为争取国家的独立、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抗战的胜利，处于日军在前、国军在后的孤军抗战的夹击中。

国民党政府命令新四军撤离长江下游开往黄河以北地区。这个地区常年洪水成灾。八路军在黄泛区里的部队经常无法供养自己的部队。一九四一年年初，一个澳大利亚传教女护士设法深入这个地区到达陕北朱德将军的八路军总部。她就是凯撒琳·哈尔小姐。她告诉我，走过赤地千里的广大烽烟地区，疮痍满目，一片荒凉，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其他地区伤寒猖獗，饿殍满涂，十室九空，荒无人烟。哈尔小姐随身带着钱，沿途买吃的东西，很快得了脚气病全身浮肿，她被迫离开那个无人区以保全性命。

新四军为了顾全抗战大局终于同意转移黄河以北这个无人区，但请求国民党政府发给供养部队的冬装和军费，保障部队沿途的武器弹药。请求遭到拒绝。因此共产党人相信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限新四军撤离江南防地转移华北的命令是来自日方提出的和谈的建议条件，在国民党政府里面那些暗藏的妥协求和汉奸分子，总是督促蒋介石接受日本议和条件。

尽管形势险恶，国民党政府蓄意制造矛盾挑起事端，但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忍痛服从命令从南京东西两面撤离防地渡江北上。第三支队连同住院伤兵留在开辟的新区坚守阵

地。支队终于受到包围，人员惨遭杀害。历史的悲剧演出，汪精卫的汉奸部队乘虚而入，占领新四军撤离前的广大土地。

一系列事变把中国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中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这是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对新四军的挑衅进攻，交还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全部人员，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恢复叶挺将军自由，继续充任新四军军长。并且主张废止一党专政，实行各党参政的民主政治，事变同时不顾国民党政府所谓新四军“叛变”的通令，任命了新四军各支队负责干部继续抗战，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中国共产党声称他们有责任有能力挺身而出收拾大局，继续同日寇和亲日派作战到底，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决回击国民党部队的挑衅。

国共两党所有这些事变矛盾的根本原因，从军事情况得不到解答，必须从政治社会力量进行探讨。内战的幽灵即使在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以后，还不时出现，从来没有消失。八路军新四军动员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武装老百姓，统治阶级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对八路军新四军在人民群众中的成长壮大恐惧害怕得要命。逃奔到华西或沿江沿海城市的地主恶霸眼看着农民站起来了，手拿武器同日寇作战。他们这些人战后会放下武器重返家园照旧生活下去吗？当然不可能！对于地主，旧梦已经破灭。

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声明中国经过民主阶段才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教育部队和人民，全中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前进。不能否认他们同耶稣教徒和资本家一样毫不妥协自行其是！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们的言行如一，讲什么经，行什么

事。为自己的信仰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人们谁也不如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同人民在一起，手中有枪，站在前线，他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尽头，人民，人民又跟上来了。后来我在重庆听到一个高级官员拍案叫道：“共产党员死在战场上的人数使我心惊可怕！”

后来我总是听到外国人散布“苏联给中国共产党秘密输送武器”的谣言。我极力劝他们看看地图，想想八路军新四军被外部世界广大地区隔绝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中苏地理上横亘着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秘密输送武器的谣言纯属恶意中伤。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新四军被包围聚歼为止，苏联给中国提供武器弹药财政援助比其他国家或列强国家提供中国的援助要多得多。但这些援助物资直接送给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送到共产党军队手里。苏联政府如果真有给中国任何个人军队提供军需品的企图，中国早已四分五裂不可收拾。即使国民党最反动的官方发言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指责苏联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什么东西。即或偶尔苏联给过装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处境也决不可能如是艰苦。苏联顾问在国民党中国代替了德国顾问的地位，但是纯属军事战略性质的，苏联顾问没有一个得到许可到八路军新四军充当顾问的。苏联政治工作人员在中国没有，军事顾问人员只能同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官相处往来。

皖南事变国民党政府给地方部队和共产党部队发军费和军火，后者只能从军费内开支医药物品。事变后，从香港采购或海外捐助的医药物品禁止通过送到八路军的伤病员的手里。我不能不指出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

国民党政府的发言人不时指责八路军新四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只是“煽动群众”。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日本军队知道很清楚。我访问过十多个医院住满了共产党的伤病员，也许，国民党政府认为共产党医院的伤兵太少了。不错，共产党部队要有足够的武器军火、营养充足、身体结实能抵抗疾病，伤病员人数会大大减少。国民党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政府给共产党更多的军费，共产党不会把它拿来改善部队的生活条件而是更多的扩充队伍。这个说法，完全确实。共产党人相信中国人民决不会当亡国奴，只要人民武装起来了。他们深感人民手里有了枪，就会知道如何打退侵略者。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向全国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国内矛盾投射了一道耀眼的强烈光线。他开始说明八路军、新四军三年来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军费军火。但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寇二十四个师团交战，占日军在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八路军伤亡人数：阵亡指战员二三〇三四人，伤指战员四〇八一三人。新四军伤亡人数：亡指战员六七五五人，伤指战员一〇八五六人。这篇文章透露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牺牲了七十五名高级军事干部，可见战斗的激烈。

朱德将军总结一年战绩：八路军杀伤日寇和伪军二四〇〇〇人，两军俘虏敌伪共计三八九八五人，缴获大量枪炮武器军需物品。仅新四军就缴获新式步枪一五七二一支，轻重机枪三〇一挺，以及包括服装、粮食、医药在内的各种军需物资。中国共产党人简直是靠日寇才生活下去的！

拜读朱德将军向全国发表的文告，我感到他总结出来的枯

燥乏味的统计数字后面，洋溢着马拉松战斗精神，在他的结语面前，温泉关的列欧尼达斯为之逊色。朱总振臂高呼：

“胜利是不可以坐待的，胜利是要以血肉去换取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敌后的军民，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宣告：我们本着一贯团结抗战之精神，历千辛，排万难，继续坚持敌后抗战，继续巩固国内团结，并与一切反侵略国家的盟军携手并进。不仅在把日寇驱除鸭绿江之前，即在我国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也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同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世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上旬，有一条小消息报道安徽省立煌县一带曾受到日寇的骚扰和占领。我曾在那里住过五个星期，那个青山翠谷，流水人家，竹篱茅舍，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生活战斗学习工作争取新中国的呼声历历如在眼前！安徽又好比大海一滴水反映了整个世界。我过去相信而且仍然相信：那个固若金汤的山城堡垒金家寨，如果没有同室操戈反动派从内部削弱抗敌力量，日寇是决不可能占领它的。人们单有枪炮，不能获得胜利。

第八篇 冬季攻势

(1939—1940)

四十二、鬼子的刀剑

“日本杀人犯没有刀剑，美国给了他们”。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这样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我到老河口李将军的司令部，第二天，他请我向我们美国同胞捎一封短信。他的短信是：

“中国希望美国宣布对日本完全禁运战争物资。我相信美国人民对中国是同情的，对日本狂轰滥炸不设防的城市是特别反对的。但是美国人民的意志完全受制于少数资本家的私利，这是可怕的事情。日本杀人犯没有刀剑，美国给了他们。”

我们谈了整整一天，先是我访问他，接着他回访我，然后我们海阔天空畅谈了一整天。

他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友好人士，而且消息灵通见识惊人。外表平常，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公民差不

多。他过去是一个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广西籍军人，具有大多数叱咤风云的军人的直爽和坦率的性格。

他的司令部设在老河口郊外一个小村子的两间小屋里。泥土墙四壁用本地工业合作社制作的有光纸裱糊，天花板的黄木板没有油漆。地上铺着干净的黄席子，大一间房作开军事会议用。一张长木桌，上面铺着青蓝布下垂及桌子脚。中央摆设一个孤零零的黄色大花瓶，瓶中一树经过人工剪压冬季盛开的腊梅。一面墙上挂着一幅黑白军用地图，图上标明了日军位置的红圈圈和黑块块。这幅地图给房间增添了简洁朴素的美。

李将军的办公室兼起居间就在这间会议室的一头。有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堆满报纸文件的书桌和一个塞满书刊的书架。两把安乐椅和木炭火盆，周围零散放着的几把硬木头椅子，墙上挂着他夫人和两个孩子的彩色照片。房间里面散发出和谐甚至是太平的气息。一片面包，一坛酒，和这栋小屋子……

这个文雅而博学的人指挥了一个广大地区，并且必须知道就是他使日寇在台儿庄第一次受到军事上的重创。他的谈话内容大部分涉及世界大事，因为，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深知中国的斗争是和世界各民族的斗争紧密相连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这样觉醒要了解国际斗争现状。李将军自己刚刚成为亨利·史迪生上校的反侵略同盟会会员。他问到辞去美国海军武官职务为了把中国抗战情况告诉美国同胞的伊文思·卡尔逊的近况。他问美国为什么在太平洋不同苏联合作。美日商约的终止有效使他乐观，他认为美国政策在改变，但他在估计中国抗战时并不以此为依据。

谈到战争时，他说：

“我们用空间换取时间。我们已经拖长了战争，发展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组织了人民，改进了行政机构，打一场消耗战。我们的人力是无限的，随着日寇的入侵每进一寸，我们的民族觉醒与日俱增。时间和人的精神是我们的同盟者。日本人知道在中国是不会得逞的，他们既不能抛弃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不能从陷入的泥潭中抽身，因此，他们叫喊和平，只有卖国贼如汪精卫及其同伙一帮无耻的官僚政客、机会主义分子卖身投靠，充当他们的应声虫。日本要和平的叫喊，正如希特勒占领波兰、捷克后叫喊和平一样，是杀了人的强盗谈慈悲的鬼话。”

他有一次发表了严厉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开始到现在，美国资本家向欧洲不向日本出售战争物资杀人武器了。我们希望美国对远东的政策有所改变。”

下午，我谈了我的经验和观感。然后他跟我说，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期间，我可以上前方去看看，作好了准备我可以坐他的汽车送我到南方的樊城去，第十一集团军广西部队驻防汉水，他建议我可以到一七三师钟毅师长那里去采访。

我们互致敬意，挥手道别。这一天是我在中国最有深刻印象的日子之一。

离别前，李将军嘱我留意五战区的朝鲜志愿军。我作好访问他们的准备。

到老河口，朝鲜志愿军队长李延生大尉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四个小分队，其中有一个妇女分队的情况。接着他便回答我提出的有关分队的许多问题。据说朝鲜志愿军在这里有五百到一千人，政治工作人员在四个战区里工作。自从日寇开始首次使用

朝鲜士兵以来，朝鲜志愿军便转移到使用这些士兵的前线上去。

老河口的朝鲜志愿军担负着沉重的工作任务。他们把送来的敌人各种文件广播新闻加以研究、分析并译成中文。对前线日军散发。第五战区政治部办了一个日语学校，他们在这个日语学校里教两百名中国学生日语。他们每天三个小时向日本俘虏上课，讲中日战争的背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社会科学和汉语课。

一个刚从前线来的朝鲜志愿军人胡伟北跟我讲他和他的同志们接近日本人所采取的方法。老乡们带着传单进入敌占区到处散发，志愿军战士们晚上爬到日军阵地把传单挂在铁丝网上。他们把系有反战标语的风筝放在空中，把捆在石头上的传单扔到敌人的阵地上，有时用弓箭射过去。在中日战壕接近的地方，他们通过喊话筒用日语讲话或唱反战歌子。

胡君说他有一回对日本士兵一连讲了两夜的话。第三天夜里一个军官从战壕里伸出头来恶狠狠地问他是什么人？我讲了一个日本姓名和地址。“我挑选了一个人尽皆知东京地名。我跟军官说，他对日本士兵讲话说中国人打死日本俘虏完全是造谣，我还说侵略中国的大炮子弹都是日本人民的血汗。”他解释道。

“你是一个卖国贼，给大日本皇军丢尽了脸！”那个日本军官咆哮起来了。“我们要把你五马分尸砍成肉酱！日本靠战争越富越强了！”

“大大的骗子！你们长官造的谣谁人不知！”胡君高声喊道。一排子弹打过来时，他躲进中国战壕里了。

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把所有的日俘交给朝鲜志愿军管理，

有点因果报应的性质。志愿军人在前三个月考察了四十名日俘，留下了三个愿意受训进行反战工作的日俘，其余的转送到重庆去了。他们给我介绍了三个日本俘虏兵，并且请我看一下他们的工作。伊藤过去是一名棒球选手。认为自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很有文化修养的人。他傻乎乎地在三张大白纸上乱涂乱画了他所谓的中国宣传画，我想表示客气礼貌感兴趣的样子，但摸不清画的中心意思是什么。一张宣传画标题写着“胜利”，画一个得胜的中国兵在用刺刀枪挑一个打败了的日本兵。我们看着这付作品，知道了他若不是一个骗子，就真是一个坏蛋。我问伊藤：“你为什么画你相信的东西呢？”他吃惊地白了我一眼，其他两个日俘低着头脸色刷白地坐在那里。

我要走了，三个日俘提出可否和我谈谈他们的个人问题，尽管不明白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还是请他们和李翻译官在次日下午到我的住处挪威教会医院去喝茶。他们准时来到，中国佣人们一听说几个日本鬼子在花园里，吓得不敢出来，站在屋里隔着窗子向外看着他们。

东京工人松井胜太郎先是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一双手，然后两只眼睛目光阴沉地看着我，压低语调说道：“我们是战俘，因为帮了中国人一点小忙，再也不能回家了。中国人并不相信我们，很难看出我们这样处境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前途。”

我当然也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前途，因为战争会继续打下去若干年。我问他们是拥护日本现政府还是反对？如果反对的话他们要哪一类政府？他们说这一类问题在被俘以前就从来没有想过。伊藤当过演员，他说日本人谁也不想自己的国家失败

受苦受难。他并不希望战争，被迫打仗完全是不得已。他希望有这样一个政府，其中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占有一切财富的富人。这些想法他承认是朝鲜人教给他的，至于自己所在的日本军队里的士兵是否有这样的思想他不知道，如果有，他没有听士兵谈起过。

棒球选手说他“经常到学校去玩棒球。高等学堂毕业后就去经商做买卖，始终没有什么危险思想。恨过战争，深感个人无能为力。现在开始想社会问题了，但害怕战争会多少年打下去。日本人会是最后胜利者的想法总是有的，这个我承认，皇军是强大无敌的。”

他讲到日本军队士兵和日本人民的危险，但一句不提中国人民受的苦难。我使劲地保持温和的口气问他因为中国人现在不信任他就该骂中国人对不？我提醒他说“你们日本军队杀害俘虏和伤兵，甚至强奸幼女和老妇，我就亲眼见过黄毛秃顶的儿童，精神错乱的妇女，这都是你们皇军干的坏事，人民管你们叫鬼子，最后胜利不会是鬼子的。”

伊藤粗暴地说：“那是由于没有受过教育的苦力当了军官的缘故！现在我国政府颁布了苦力不准当官的命令！”

伊藤和松井胜太郎都露出不安的神态。伊藤却执拗地掀起他的大下巴对着我。我想和这样的家伙谈话简直是对牛弹琴毫无益处，转身问松井是否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前途？他说：“除非日本来一次革命，我们不会有什么希望前途。”接着他又补充说道：“革命如果发生，日本军队会发生什么变化？特务制度那么利害，我们的士兵敢怒不敢言，屁都不敢放。一个兵不想打仗，只有自杀。”

我问三个俘虏为什么他们在军中不想担任领导职务。在俘虏营里他们也有此机会，重庆也有些日本人如作家鹿地亘正在向日本俘虏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松井嘀嘀咕咕似信而疑地说：“我们是头脑简单的人，我们领导不了革命！”

“你可以学习嘛！”李翻译官回答他说。有点好事似的盯着他，在李翻译官的鼓励下，我对他们补充说道：“你们都还年轻，能拿出几年时间进行学习。西方国家的人能够学习到，难道你们比西方国家的人低劣不成？”

伊藤的肺可气炸了，他又一次和我争论说日本人并不比任何白种人低劣。我回答说：“好得很，你能举例说明比许多死在日本人监狱里的革命者不低劣吗？那些革命志士是不比任何白种人或有色人种低劣的。他们的事业你们能继续进行下去吗？”我向三个日本俘虏提出挑战：“你们要是不进行工作，你们的军队将以杀人犯、强奸犯载入史册。好了，我别光指责你们的军队了，今天中国一位将军告诉我你们没有刀剑，是我们美国给了你们杀人武器，因此你们我们双方都是战争罪犯。”

李翻译官像是触动了什么灵感似的，热情洋溢地用日语低声帮忙翻译着，三个日俘坐在那里鼓着眼睛盯着我。

四十三、中国工合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遍布华西一带地方。早在一九三九年的上半年，老河口就有了六个纺织合作社，一个造纸工业合作社，一个生产改良纺纱机合作社，一个蜡烛、肥皂、棉花、纱布综合化学原料合作社，三个炼油合作社，半

年后省内有二十四个合作社，其中有两个合作社由第五战区妇女委员会经营。

一天早上，我走进一个合作社，看见六十个难民妇女在纺纱织布打袜子。这个小单位是我几年来到过的最欢乐的场所之一。当我进去时，人们正在机器旁边唱着歌，这是我头一回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听见这样的歌声。全市一个晚上有三次空袭警报，大半时间睡不好，工人们似乎不受影响，因为跑警报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白天，全市大多数人跑到乡下去睡觉，下午才回家，但合作社整天工作，即使警报响了，工人们也不离开。

合作社是一个家庭式的小自治团体。管理委员会由社员自己选举产生。社员全体每月集会一次，听取业务报告。讨论工作、经济、个人问题，提出改进意见。他们一天工作八小时，开小组会议，出墙报，上夜校，甚至还有自己的剧团。禁止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做工，有一所合作社小学容纳孩子上学。儿童和老人享受补助金待遇。

一个社员每月平均收入十五元，如有赢利社员按股票分红。上一年生产获得三百元利润，工人们决定抽出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储蓄起来，百分之三十作为公积金，百分之十用于公用事业，如买教育和医药用品等。百分之十作为社员的养老金和救济金。他们已向重庆中国工合总部申请一万元的长期贷款，如果得到批准，他们希望贮存大宗原料和再招收一批工人。难民里面的待业人员很多，里面有许多熟练工人，有的则尚需训练。

这个合作社有两名经验丰富的“高薪”专家。他们两人是难民中间受过教育的难民。一个是经理，每月工资五十元；一

个是出纳兼会计，每月工资四十元。经理的工作不受上下班时间的限制。他认为这座小工厂对赢得战争很有帮助，厂房前面有一个小货栈出售产品，他计划在市内另开一个大栈，这会引起大商人的麻烦，但迁移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工厂老板和国民党官员认为合作社毁了工人，因为工人的经济独立骄傲的了不得。他们说，合作社作为战时需要的临时单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战后怎么办呢？与此同时，工人们却抓紧合作社不放并且拼命地工作。一个织布工人一边和我谈话一边用脚蹬着机梭不停地织布。他本是安徽的一个小商人，战祸使他家破人亡，为加入工合学会了织布手艺。一天织布二十码，“休想叫人离开工合了。”他说。

十五个女孩子在织袜机上操作，她们一天能打五双袜子，以每打袜子五元六角的价格卖给大商店。经理说市场上袜子零售价格太高了，商人们向政府提出要挟说，如果不降低售价则要求放松对日货的封锁。

一个女工白了一眼喊道：“我想政府不会这样做，要是我就封锁更严一些，我们和廉价的日本货简直竞争不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社，每个人的日子那就好过了。”另一个女工说道。

我想起了抗战前的腼腆沉默的姑娘们。而战时的工合却培养出一批新型的妇女，她们是一代新人。

说实在的，经理有他自己的烦恼和不通的想法。他认为生产工作和救济工作不应当纠缠在一起。现在的工业合作社有时免不了赔钱，原因是供养许多非生产的儿童和老者。他主张只招收生产工人，而且这些生产工人的收入足够养家。然而他

说，他“知道工合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决难民问题和为人们找生活出路。”

我们谈话时听到呜呜鸣的吓人的警报声和附近天主教堂钟楼上当当的敲钟声。工人们昂首静听，歌声、呼啸声一律停止。由于厂房位于老河口的边缘，天主教堂上又飘着意大利国旗，挨炸的机会比市中心要小一些。我从通往街道的门口望去，看到合作社小学的孩子正整队向教堂走。但小工厂的机器仍在隆隆地响着。

“警急”警报响了，每个人更加全神贯注地听着，干着。机器呼隆响声的上空不久响起了炸弹滋滋下落的号吼。

“又一把刀剑！”我想起了李宗仁的话，心情很难平静。炸弹的咆哮声终于过去并消失了，今夜或明早又会怎么样呢？

四十四、“告诉你们美国同胞”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晚上十点钟，我在鄂中樊城一个小客店里等着。到樊城在广西第十一集团军作客住了好几天。终于走进一个年青军官，他说：“钟毅师长现在有时间了，他在附近恭候您。”

他领着我和我的秘书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大街，经过炸毁了的颓垣破壁，走进一幢部分坍塌的破楼房。登上摇摇晃晃的楼梯进入一间大厅房里，那儿挤满了人，看来都是不速之客。摆着许多长板凳椅还有三张桌子。地板上、窗棂上满是尘土，零乱不堪，也许是冬季攻势即将开始的缘故。我知道，千万人的命运在这间房子里已经被作出了决定。

在桌上靠近闪动淌泪的蜡烛旁边翻放着一顶军帽。暗淡的烛光下我见到一个身穿咔叽军服的人，端正笔直，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脸朝着我，一双黑眼睛在打量着我，中等身材，看来年青，后来我知道他的年龄是三十九岁。他的面孔与其说英俊不如说清秀。说话富有感情，语音柔和深沉，含蓄机智，这种声调我很熟悉，我几乎和具有这种气质的人总是能交上朋友。

这是我同第十一集团军一七三师铁军师师长钟毅少将的第一次会见。我们隔着蜡烛相对就坐。我仿佛对他早有了解似的感觉，他也可能在说“好像过去告诉过你了。”

这个晚上他的一席话本是死记硬背的老生常谈，但出自他的口里句句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说：“我们有我们的信念，胜利是不会轻易到手的，但是我们将打到胜利为止。请转告你们美国同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念。”

后来他在师部告诉我，他出生广西省扶来县，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破落地主的书香世家子弟。为了继承父亲的衣钵，他本人也念过书。国民革命运动唤醒了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于是他进了一个讲武堂读书。一九二七年国共分家内战开始时，他拒绝“剿匪”，辞职到日本学习，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归国后继续在上海任教。抗战开始，他重返军界任职。由于中国军人的晋升是根据战功而不是资历，他现在的职务是少将师长。他的师多次担任后卫掩护部队撤退，人员一次又一次被打光。本年五、六月间日寇大扫荡中间，他又一次损失了大部分主力部队。目前正训练广西来的新兵。

第二天黎明，我和我的秘书以及钟毅师长的秘书乘船沿汉

水顺流而下直到师部。船刚抵岸下锚，敌机已临上空。我们望着它们盘旋俯冲轰炸河对岸的古城襄阳。那里有一个美国瑞典教会医院，已经住满了空袭的受害者，现在必然更加多了。医院尽管坐落在襄阳市郊而且升有美国国旗，但已经挨过两次轰炸。

钟毅师长在他的司令部所在地村子里的房前会见我们。他没戴帽子，又用深思的语调热情地向我们致欢迎词：“你是亲临前线对我们关怀备至的第一个美国友人。”他并且补充说道：“这样的友谊是宝贵的，因为前线音讯阻塞要好几个月才得到出版消息，部队里仅有发报机能收到电台的新闻。”

他向我介绍了一个英语说得流利研究过政治科学的青年。我才听说不久前有许多青年被怀疑有“危险思想”从第五战区司令部里“清洗”出来了，在这里我又一次摸到了一点社会矛盾的线索。钟师长听到这次“清洗”，即电召这个青年到师部帮他学习政治学。

副师长是旧中国过来的人，尽管佳肴美酒一席，但早饭前他还是谦让一番说粗茶淡饭请多包涵。饭间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钟师长问及我的一路旅行和工作情况，并讲到全国各地糟糕透顶的伤兵问题，他这个师里有一些医术精湛的医生，但药用品有限。饭后我们又到他住的房间里休息，谈了几个小时。他不停地走动，讲了他的上一次战役。他的声音发抖，眼里冒出怒火，说道：“我能听到伤兵的呼喊声，但我无能为力。”日本鬼子对他的一个团施放了毒气。

我问如果日本军队吃了大败仗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的想法如何？

“这就难说了”。他回答道：“他们的士气是靠胜利维持的。从战略上看，他们要维持一条从绥远到广州的战线，对他们是危险的，但他们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国际地位，多方面进行工作。我敢断定他们同苏联之间的和平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两国交战的时候会到来的，日本会被打败的，但目前尚未成熟。日本注意到了荷属东印度。那就会使他们不依靠美国的石油和其他物资供应了。”

他开始向我提出了一些有关美国政策和日本人在美国的情报宣传工作的范围等等问题。他说美国除了希望中日两国被战争拖垮以便战后更易于受它的剥削，真难理解美国的举动何以如此笨拙。”

三个青年军官乘机会很难为情地领我进入他们的“俱乐部”房间里，一间矮小的茅屋。里面摆满了战争图书杂志，墙上挂着地图和锦旗，居里夫人、马志尼、巴斯特、林肯、华盛顿以及许多名人的像片。中间挂着国民党的党旗，下面有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一批年青军官走来把他们的练兵方法告诉我，随即带我到礼堂里去作报告，那里有二百青年“政治兵”在等候着，笔记本、铅笔都准备好了，因为这个师采用了训练有文化的士兵在队伍里当政治教员的新制度。团长做了介绍说我“是一个关怀我们亲临前线的中国的外国友人。”并宣布我向他们做有关敌后情况的报告。

一天清早黎明的时候，干草地上盖满浓霜，露珠儿晶莹，我为了准备另一次讲演试图驱走身心的严寒。钟师长和我站在一个土墩上，他把他的师部参谋人员向我作了介绍。我把大衣

领子翻到脖子上，尽力讲述国际形势。事后大家回到司令部里，参谋们尽管他们了解的国际大事比我还要多，然而提出了许多有关世界性的大问题。谈话时我们吃着甜酒冲鸡蛋。这种上味招待是对我个人的尊敬，因为这个师和所有部队一样，一天只开两顿饭。

这个师的大检阅很快开始了。重庆来了一个高级军事检查团检查参加冬季攻势的各部队的训练和装备。他们到达防区时，广阔的平原和荒山秃岭区呈现出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的壮观。我好象在盯着一幅古色古香的拿破仑战争油画，部队齐步跑步前进，在设想的战斗中奔走，到处是炮击炮火的沉重落地开花响声，机关枪的哒哒声和步枪的劈啪声。我作梦也想不到这些人在半年内会大部分战死沙场。

军事检阅和演习结束时，我们回到师司令部，围着一张摆满丰盛筵席的长桌而立。冬天的太阳照在军官们的金黄红领章上，颜色闪烁发光。他们向来回在身边走着的钟师长祝贺，他这个师是国民党最精锐的一个师，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人们的发言。审慎地回答问题。有时他停下来和我交谈几句，我感到他内心里有一股忧郁之情。

当天晚上，在竹篱茅草盖的食堂里摆了七桌酒席。我坐在钟师长和重庆来的一位视察员之间。我们对面是身材高大的八十四军的莫军长，一七三师是该军的一个师。席间谈话开始是一套形式和礼节，有了点醉意，个个都端起酒杯，信口开河随便议论起军事演习来了。

我就坐时，钟师长举杯，张嘴抿了一下，说：“你使许多中国人感到羞耻。”

“你也一样，”话刚出口我犹豫了，因为我看出他的话出自肺腑不是应酬客气。如果他知道我害怕空袭，自己说过不止一千遍我憎恨战争也不拥护战争的话，他真的会如此说我吗？而他又如何呢？当他站在那里手指头转动酒杯，盯着酒杯并不喝酒时，我琢磨他的为人，不，象他这样的人也是不拥护战争的。他是属于实验室和讲台上的人。但是他却能随心所欲，既无实验室也无大学可以作为他的用武之地。

他起立，大家也站了起来，顿时全场肃静无声。他开始讲大检阅演习和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他的师参加冬季攻势对全师宣誓要为祖国效忠。讲话毕，我们全体坐下前出现一阵长时间的静默。

高级视察员到别的部队去了，但一七三师的夜间演习仍继续进行。我和钟毅及其参谋人员走了出来，沿着漆黑的小路，穿过有哨兵悄悄卧伏的稻田。没有月亮，只有暗空中微弱的星光。唯一的声音是我们的脚步声。“敌人的照明灯！”钟毅喊了一声。队伍卧倒在地，一动也不动，他们准备好了枪，我继续向前移动，到了一个阵地，观看士兵匍匐前进，包围一个沉睡中的村庄。当然，那天夜里的演习是以夺取敌人的全部阵地结束的！

演习结束后，士兵们行军回营，唱着译成中文的“马赛曲”战歌，在黑暗中解散。

当我坐在点着巨烛的桌子旁边和这些朋友在一起聊天时，有时我象是在探索中国的心脏似的。种族和国籍的隔阂都消失了，我们是追求同一目标的朋友。钟毅又问我英、美、法等国是否真的希望中国得到胜利？这问题我想过没有？英国确实害

怕中国的胜利对印度人民的影响。法国怕死了印度支那。我同意并深信中国如果不被征服和成为法西斯专政国家，那中国一定会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先锋。但我深信各国人民只要他们懂得了真理，就会同情中国。

有一次，钟毅又提到折磨他的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和伤脑筋的事，他的话还没有讲完我就知道下文他要说些什么。我们谈到日本朝着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其他战略供应物资不停地推进。美国与其容许日本从荷属东印度购买石油，不如恢复日美商约这个问题我想过没有？我想美国有可能。美国商人会不会逃避给日本战争物资以“道义上的禁运”吗？我想他们当然会。他有一次问我，尽管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千百万人民大众受剥削挨饿并引起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国还是应该采用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我想过没有？他的问题使我惊奇。接着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们现在害怕生活。他们积累财富使他们自己和子女有安全保障。但是哪里还有什么安全保障！”

夜里我躺在稻草垫席的床上，谛听着夜籁多少遍多少遍地想着我和前线的志士们精神上已经联在一起，无形的纽带虽然看不见，它却比钢铁更结实比血肉更相连。

我跟钟毅的一个团长到战场附近的团里去的前夕，举行了最后一次聚餐，摇晃的烛光照在瓷酒杯上，照在盛着白干和温热的酒壶上。我希望写作一篇有关这个师进行一次战役从头到尾的战斗小说，只要一切准备就绪，我作好了回到师部的安排。钟毅考虑到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凶猛的打法，开始犹豫不决，后来说他满腔热忱欢迎我回到师部里来。那晚上的聚餐，谈政治很少，我们更多的谈论诗歌小说、文艺戏剧、讲故事，尽量饮

酒，我为那些舍身救国、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官兵祝酒。钟毅举杯为“勇敢博学的女记者”干杯，我对此提出抗议说我“既不勇敢也不博学”，仅有一点历史的好奇心”而已。于是满桌欢腾，大家又为“历史的好奇心”而干杯。

那天晚上的话题多变，内容古怪极了，记得座上有一个信伊斯兰教的青年军官吹牛夸耀可兰经的威力，他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死了，把可兰经放在他的尸体上又活过来了！一个青年军官改变话题说人世上要称心得有三件宝：一所美国房子，一个日本妻子和一个中国厨子。我对青年军官说世界上最顺从的女人是日本女子，所以他才要日本妻子。钟毅听了加了一句，问我是否见过西安附近有一座妇女贞节大牌坊，她的军官丈夫在前线，她在寒窑守节十八年等她的丈夫回来团聚。钟毅的视线从眼角盯着我问道对这样的一个妇女我是怎么想的。我还没答话副师长接着就说，这个故事是对中国妇女的赞颂。我说这种表现是卓越的，但不知那个军官在十八年里作了些什么？我从哪里能够见到一座男人贞节的大牌坊呢？

一个青年诗人罗凡起立，彬彬有礼地说：“我为贞节的军官牌坊而干一杯！”接着他哈哈大笑并坐到位子上。

座上的人们彼此高声争论开了，忘了我在场。钟毅却转身问我：“在那十八年里一个现代妇女会做些什么？”我反问道：“一个现代军人会做些什么？”副师长看到我们谈吐轻率，有点吃惊似的，我们转身从蜡光晃影中一笑置之。

次晨黎明时刻，钟毅陪我们走到河边，我们站在河边沉默片刻。我开口说道：“你们奉命开赴前线的时候可要通知我，以便我回到你们师里来写你们的战斗。”

“我会欢迎你的，”他说。接着伸开他的手掌，我见到了他的手掌中有一枚小绿玉戒指。

“这是到前线去的人送给我的，”他说。“它不值钱，但是希望和信念的象征。请收下吧。”

我说不出话来。

我们在河边踟蹰一阵，然后牵马上渡船过河。到了对岸，我们骑着马儿上了一座小山朝一个村子疾走。河那边的钟毅还站在那里岿然不动。我掉转马头举起了手，他一直举臂直到村子的篱墙把我们的视线遮住为止。

和我并辔而行的麻子团长在马上大叫了一声，马蹄突然飞奔，踏着霜冰的大路向前线急驰。

钟毅的一七三师五一九团给我的款待使我非常高兴。团长杨章诚上校是我的东道主，几乎全团出动欢迎我，杨团长象一块久经风雨的岩石。士兵爱戴他，信任他。称他是“头脑冷静，心肠火热，一身是胆，天生不怕”的人。有时候我见到他拍拍哨兵的肩头问他的日子过的如何，哨兵连忙立正笑嘻嘻的回答一切顺利，并问他大冬天可舒服不。

“我当兵时刚十六岁，”杨团长回答我的问话。”而今我已是三十四岁的老兵啦，全团数我年纪大。”

他也是口齿最不清楚的一个。我很吃力地听着他期期艾艾的讲话。“我的家庭是贫农，离家时，家里人用红纸包封两角钱叫我节省点买东西吃。我的姑母叫我出门莫参军，要出门就到外国去发洋财，我说‘没意思！我要精忠报国！’姑母说：‘报你娘的精忠国！’我没有结过婚。我长得这样丑，姑娘谁也不嫁我，她们叫我‘杨麻子’。鬼子入侵中华，我当了营长。

一二八战役我军在苏州作战掩护部队撤退。我们转战华中保卫过武汉，现在是一个团了。”

我在政治兵训练营里给政工人员上课，在营房里和士兵谈话讲千百个战斗故事。初到五一九团头一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劳累的日子。这个团的兵士，近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工人占百分之十，学生百分之十。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文盲。不过他们正开始读书写字的比赛。“以后来瞧吧”，他们说。

晚上我和青年军官们围坐在营火旁边，听他们讲战斗故事。火光映照出人们的背后墙上一条“百炼成钢”的标语，但我注意有一个青年军官耷拉着眼皮既不张口乐一下，也不哈哈大笑，出神地坐在那里。他有一次望着我的脸，象在搜索什么战前早已丢失的东西似的，他坐在营火边活象一个幽灵，杨团长一次讲话中才使我恍然大悟。他说：“九一五团的前身是一三一师，全师人打光了，仅剩下一个团，大多数人是新兵。我们牺牲了许多军官师部提拔我当了团长。”谁也不跟他扯皮闹摩擦，因为每个人的晋升都是这样的办法，都是火线上练出来的兵。

一个军官告诉我，抗战头几个月里肉搏中对举手投降的鬼子决不宽恕。全中国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案，几十万老百姓和动不了的伤兵被鬼子杀害了。杨团长一看到恳求饶命的鬼子就高喊：“杀！杀！杀！”身先士卒，冲向敌人，不留一个活的。

副团长郭平，抗战开始时是一个学生，也是一个诗人，他是广西一家报社的记者，但很少有时间写作。他说他今年二十五岁，徐州失守后他带一连人掩护全军撤退有功受到表扬，一

三一师担任后卫掩护作战，负责各村老百姓的疏散。

然而在我要求郭平给我讲一些英雄事迹时，起先，他说无可奉告，想不出一个！接着他谈了几件事：副团长刘希礼一次带领他的一连人歼灭了鬼子一支汽车押送队，杀死了一个高参，缴获到一些有价值的文件。鬼子带的一些女人也被打死了。刘副团长还有一次被鬼子包围，坚守四个村子的战略据点一个小时，一半人牺牲了，他自己也两处负伤。刘副团长完成了任务，命令少数活着的幸存者撤退，他自己和一个受伤的传令兵断后，还杀了七个想活捉他的鬼子兵。

郭平和团政治部主任协助编辑出版一份前线杂志《白刃》月刊。这个刊物在本团驻防半年中诞生在战壕里，上面刊登战士们写的故事，文章诗歌。我挑选《白刃》月刊上登的战士日记，摘录几则如下：

天空有几颗星星眨着眼睛，寒风凛冽，我们走过静静的山村，没有狗吠，鸡也不叫，不闻人声，逃避一空，但愿我们回来时不是这般光景。

我们要保卫随县，必须拿下和占领1752号高地，我们经过农舍，爬上一座矮山。散开队伍，布满山头，听候命令。接着劈啪！劈啪！劈啪！步枪声到处打响了，战场上一片喊杀声，震动山岳，烟雾迷漫。一小时后，象喝醉了酒似的红太阳升起了，冲锋号在吹，白刺刀上好，我们跳起向前冲过去。机枪扫射开路，大炮震耳欲聋。

我们象风暴席卷1752号高地。来回拼杀！杀！杀！不停。敌尸遍地，血肉纷飞，鲜血染红了枯草。一片粘腻腻的大地。

战斗结束，我们整队。看我这一列人短多了，我们连阵亡

二十人。连副受伤，连长阵亡。一班长和两个营副负伤，已送医院。

另一个兵的日记写得更加流畅：

早饭后，一天的活动开始了。灿烂的朝阳照在我们的阵地上，我们活跃起来。老曹坐在一块石头上唱京戏“南阳关”。他的声音是破嗓子。听他一唱，我真难受，谁也拦不住他唱。

忽然我记起了广西学生军今天下午会来前线对我们演讲。便取出了小刀和镜子刮起胡子来。老曹大声问我：“你小子收拾什么？”

“广西学生军今天要来，如果我刮了脸，也许有个女学生会看上我。”

“人家岂能看上你，不如不想她。”老曹说。

老曹是一个专门看娘儿们的王八蛋。他腐败透顶。上回襄樊慰劳代表团来时，他象饿狗盯着野鸭似的望着女团员。

“你真是一个王八蛋！”我对他说。他毫不在乎，转而高声唱起了“徐策跑城”，我又感到难受，便拿起水壶，用水浸湿下巴刮光了胡子。

说来就到，下午，广西学生军来了。七、八个男女学生，都很年青，男的留发两寸长。他们的服装和我们一样，只是没有枪。他们头戴皮帽，胸别红徽章。一男一女来到阵地上，同孩子一样，年纪约莫相同，我猜想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管我们叫老西（老乡），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同是广西人。我们告诉他们而今不只广西人是老乡，每个国民都是老乡。

他们给我们上课，讲到我们广西的家乡情况。他们说桂林经常受到轰炸，但破坏并不厉害。政府已经下令免费供应军属

二十七担平价米。我们的家属不纳税，不出义务劳役。我们不必悬念家里人。他们说，因为我们的家庭已经受到了优待。

老曹一直盯着那个女学生发了呆，他真使我们感到作呕。他居然对那个男学生说：“我还没有年青的老婆，对此你们还有何可说？”

“没关系，”男的说：“如果你胜利返乡，和你结婚的妻子会引以为荣。”

“遗憾的是我长得丑，又没功夫刮脸，”老曹答。

那女学生笑着说，如果他在战场上成为英雄，那么回到家乡就可以找到最漂亮的姑娘结婚。“嘘”老曹只吭了一声。

学生走后，我们大家都嘲笑老曹，但他对我们说笑我们自己吧，好多日子我都不乐意听老曹唱戏，与其难过。倒不如去抓个把鬼子的大头目为好。

在华中战场上接连几个星期和好几个月里，我总感到奇怪的是得不到钟毅师长一师人的消息。也许在戎马倥偬，前线混战中我怎能收到一封信呢？我经常打听这个师的下落，人们说东说西，有人听说它已转移到大洪山脉的主战场上，但也不能肯定，无人知道他究竟在哪里。冬去春来，日日夜夜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的追逐中，我不知走了几千里路，大部分途程是步行，给士兵们上课，对老乡们讲演，为伤病员服务等等等等四月里，因患回归热并发症疾病，迫使我到后方宜昌的教会医院去，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就首途去重庆。

一天，在华中前线曾和我在一起的青年诗人罗凡过江来看我。他带来一封辗转投交的信给我，信是钟毅用英文写的，虽则他掌握的英语还不到熟练的程度。发信的日期是二月初。他

信上说他的师将开往陈县前线，我可以在那里会见他。信的最后语句象是永别的口气使我闷闷不乐。他写道：“你是一个作家，不要忘记，你必须经常告诉你们美国同胞说我们将战斗到死，直至胜利。”

我请罗凡稍等些时候我们一起回去。可是疟疾给我以无情的折磨，我只能在发病的间隙时间里上一点课，用抽彩的办法出售在前线得到的我的一些纪念物，拿这些收入购买医药物品。我把这些用品送给许多部队，其中包括送给钟毅一师的一些药箱。我还请重庆国际妇女俱乐部接纳一七三师为会员并为该师作外科手术工作服。

罗凡一天又来看我，他说钟毅那个师打光了，钟毅本人不是被俘就是战死。我不相信，指责说这又是谣言，但也难说，如一股阴风朝我袭来。

罗凡又来了，他带来一个广西军官来看我。我象在梦里听他们讲钟毅师长舍身成仁，为国捐躯的经过。敌人在飞机、坦克、装甲汽车的掩护下扫荡鄂北。钟毅一师人又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背靠唐河，试图对敌人进行反包围。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他的师部所在地庄泰镇被敌人包围，在激战突围中五十名战士和政治部一批军官英勇阵亡。钟毅师长和两个护兵逃到稻田里，鬼子围上来时他拔出手枪自杀成仁。

一个逃出命来的护兵雇请老百姓在鬼子践踏过的稻田里找到他的师长，掩埋了他的尸体，钟师长的兄弟到老河口后去战场，他挖出钟毅的遗体，现在运往重庆举行国葬。沿途军士奏着哀乐，唱着挽歌。

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我注视着窗外暗空摇动的枝影。夜，

象我的心情一样，阴郁而又怀念。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钟毅死难时的情景，我一幕又一幕地见到他站在河边，挥手道别，“一路顺风……”出现在我的眼前，这“是希望和信念的象征。”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我看见了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汽车穿梭般的来往，那些杀人武器都是来自我们美国军火商人，我的身心充满了痛苦，无限凄怆。我看见了扑向唐河师部的鬼子在横冲直撞，每个窗户，每条壕沟，烟雾滚滚，火焰熊熊，烧遍了四周的原野。我听到了火光声中，麦田地里钟毅用手枪对准自己的枪声。这一幕景象好比全中国的景象，全世界的景象，我的心象一潭绝望的死水。我没有回到一七三师去和我的朋友战死在一起，被我自己国家买给日本杀人犯的刀剑利器所杀死，我自己感到可耻。

几个星期过去，华中前线来了两封信。一封是八十四军军长莫许志将军的粗毫笔体的公函，他详尽的叙述了钟毅是如何光荣牺牲自杀殉国的。一封是正在补充训练的一七三师师部余众来的信。师部请我为广西军队出版的一本新书撰写回忆钟毅的文章。

这年秋天，我到了钟毅的故乡广西省，见到了他的兄弟并且谈了话。之后，我走到桂林城外的山上，独自站在他的墓前。镜花水月并不真实，唯有我的回忆是真实的，我的回忆和手中戒指，以及他风云驰骋沙场，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他走过中国大地，横扫江汉平原的面孔，士兵们在他身后齐步正步跑步卧倒滚爬的身影，唱着歌向前进军的人民子弟兵，在那遥远的地方悄悄传来钟毅的声音在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念，请告诉你们美国同胞啊！”

四十五、湖北冬天里的士兵

我于十二月下旬到达四川队伍第二十二集团军的湖北野战区司令部时，国民党军队的冬季攻势已经全面展开。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奉命同时发起进攻。随后几个月里，我们在无休止的大炮和飞机声里度过。大地在发抖。

指挥鄂北国民党左路军的是北方的孙良诚将军，右路军则由北方名将张自忠将军指挥。孙良诚的战地司令部设在靠近日军主要基地信阳的桐柏山，沿平汉路一线有孙的爆破队，有一师人意图把鬼子赶出最北的据点张太关（距离确山史金斯涅士博士的医院不远）。我们得到敌人在该区已经使用毒气的消息。第二十二集团军连钢盔都没有，更谈不上防毒面具。

我区川军攻打武汉敌军的半圆形防线的外线，敌人的主要据点在随县，由随县向四面八方延伸许多触角，特别对我前面六个战略山头进行了严密封锁。川军部队在敌人据点之间各地深入打进了楔子，企图孤立、包围消灭日寇。

国民党军队希望摧毁敌人的外围防线，也梦想拿下武汉。但是大家心中有数：凭自己的装备除了削弱敌军力量，此外无能为力。他们知道即使夺取了敌人一个据点，没有空军是守不住的，而前线一架飞机也没有。敌人的侦察机轰炸机从远方飞来，从容不迫地选定目标，狂轰滥炸。在六个战略山头阵地上，日军筑有坚强工事，三十八门近射程大炮据险防守。第二十二集团军刚收到重庆来的两门野战炮，但炮弹要用人夫、骡马

运送到远在汉水上游的樊城，距离十天或两周的路程。

我们骑马离开枣阳的一路上，川军的一个副官口若悬河，喋喋不休地唠叨着，“来我们军里的苏联顾问真是一个怪人”他直截了当地说：“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滑杆也不坐，上山牵着马，骑三十里就下来走，说是让牲口休息休息！天要下雨，他就帮士兵挖工事，尽管溅满一皮靴泥，八路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因为政府给他们钱和衣服，他们才打鬼子。”

“你从哪里听到这一套古怪想法的？”我插话问他。

“从政治部主任那里。”他回答道。

我向他解释，他听来的这一类东西无聊透了。

四川军队在中国以封建和落后著称。其举动证明属实。但二十二集团军已成为一个新旧合流的古怪混合体。孙良诚的这个军尽是文盲，来自四川破产的农村，父亲祖祖辈辈受尽地主、军阀、官僚政客的剥夺，抗战军兴以来，四川士兵受到民族意识的鼓舞，英勇而豪迈地为一个什么也不给他们的政府舍身战斗，我亲眼见到他们作战勇敢顽强，在中国要自豪和勇敢并非易事。

从枣阳来的公路上，长长的车队在川流前进，牛车、独轮车、挑夫，偶尔夹杂着驮马和骡子，满载着军用物资和崭新的冬装向前移动。

我们骑着马向战场奔驰的时候，我想，世界上还有比这里更孤独寂寞而阴沉的地方吗？这儿已是冬天，霜冰冻封的平原上呈现出沉沉的灰色。蓝色的桐柏山在远处连绵起伏，贫苦的老百姓在那里剥树皮吃。伤不重和有病的士兵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

下沿着公路蹒跚而行。担架队里躺着的伤兵，有些人还穿着夏季的单衣冻得发抖，轿夫抬了一段路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伤兵的身上，他们和伤兵不一样的是自己有贴身内衣。

进村子里，轿夫休息，付一个铜板喝一壶白开水。老百姓要钱，这并不是没良心不讲人情。劈柴要钱，要一大笔钱，而老百姓，贫无立锥，穷得连饭也吃不上。人情，人情在吗？在中国谁给谁只有挖去心头肉。谁能割舍？

护送队前面的手推车上，挤着咬紧牙关，熬住颠簸面无人色的伤兵；后面的手推车上，堆放着一路倒毙、不幸死亡没有名姓的尸体。他们脚上的鞋子被脱掉，因为活人要穿。死者的脚，都是贫苦农民长茧的粗脚。腿上伤口的血已干，有的板结连成一团。不知什么缘故，他们的脚使我感触很深，因为它告诉人们死者生时的劳苦奔波和忧伤。

我们有一回靠近护送队的一辆牛车时，一个脸如白纸，臂缠绷带的伤兵向我们诉苦，哭道：“我再坐下去就要死了！我再也熬不下去了！”

前线没有夹板，这个伤兵的胳膊只是安置在吊着的绷带上。我把他扶到我的马上，领他到公路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的裹伤所里去。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裹伤所里出来一个穿白围裙的医生，他讲求效率而且很有礼貌，他有一个合格的助理医生和十五名裹伤兵。他们温和而有耐性的把伤兵领到一个整齐清洁、收拾好了的房间里，非常小心地更换绷带，还招待伤兵饱餐一顿，菜里面还有肉。

我在帮助伤兵找裹伤所中间，想起了上海、香港那些私人开业的中国的合格医生，他们至多给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一个月

的收入。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医生不过两百人，参加保健卫生站的几百人而已，我有时候不但轻视那些医生，而且也看不起政府。直到现在抗战三年多了，国民党政府还不征集医生入伍，蒋介石说他恨死了医生，他这句话可以引用，蒋介石不仅把医生恨死了，而且还把整个地皮也刮光了。

军队不应该因为缺乏医务人员而受到责备。他们到处搜罗医生。尽管如此，我读到一国民党空军医生给他的同事的一封信，信上催他回到后方来在空军里谋一个差事，因为“一个飞行员比一万个兵更宝贵”。并且附带说：“因为空军的薪水很高，工作轻松，有足够的时间读书！”

一天早上黎明时刻，我站在路边看到数千穿灰军装的士兵和满载驮子的牲口，向战场上走去，接替打了两天两夜尚未休息的火线部队。他们稳重庄严地疾走，想在敌机飞来前走出深谷，他们行军的步伐掀起了飞扬的尘土。漫天尘土中过来了第一批抬伤兵的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夜战受伤的伤兵。担架兵气呼呼一路小跑着，伤兵眼望着灰暗寒冷的天空。有的盖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和毛毯，他们静静地躺在担架上，象斯巴达英雄一样躺在盾牌上归来。

此时此刻，我感到再没有人比军医署长卢志德和林可胜认为战士是可爱的人了，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准备了成吨的含有吗啡的浓缩消毒外敷药物。这是向传染病进行斗争以及预防休克致死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他们两位医生仍一如既往，内心里充满了同情，从来没有表现冷漠。我不止一次的听到人说卢志德医生为了早上去军医院去视察工作他晚上住在野战帐篷里。我在河口后方医院看到最亮敞的房间不是办公室，而是病

号房，使我感到惊奇。战区医务主任说：“卢医生吩咐我们，把最好的房间给伤兵，剩下的给办事人员。”

我跟着担架队从战场走到裹伤所时回想这些往事。秘书和我帮助护士兵把伤兵扶下担架，或者把重伤号抬到地板的草垫上。前几天躺过伤兵的草垫被弄得脏污不堪，血块斑斑。我们必须收拾干净或者从外面草垛上拿来新的铺上。

我看见一个护理兵把一个不省人事的伤兵手上旧绷带扯下的时候，伤口出血不止，病人性命垂危。我请所长急救，他是医术高明的合格医生，正患疝气病。他检查了手的伤口，然后从工具箱里取出一根缝衣针和丝线，把几把镊子、夹子、刀子放在脸盆里煮沸，没有床单、毛巾、肥皂、皮下注射针，稻草床铺就是“手术台”，所长动手术截肢，我当他的助手。

事后我找伤兵们谈话，我一提到重伤号真少，一个兵就喊叫起来：“别人逃不脱呀！我们几个人因为爬得动才得了命，我们爬了八个钟头才找到担架！”

一个兵的面孔吸引住了我，他静静地背靠着墙坐在那里，他的头上裹着一个大绷带，他的脸色煞白。

“你给我讲讲你是怎样负的伤，”我尽量用温和的口气说。

他好象在打量着我，但没答腔。”他是一个机枪手，”有人在说。那人自己想回答，口张开话说不出来了，他很费劲说道：“一点子小事，为了国家。”

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弱了，一头扎进胸门口。一个护理兵和我赶紧上去扶他平卧在稻草垫上，我们扶住他时知道他已断

了气。

冬季攻势头三个星期里从战场下来的两千六百名伤兵，两星期后送到樊城第一后方医院的伤兵仅有一千名。

有时候，我在马背上记下日记的要点，字迹潦草，不是鸡爪子爬的鬼画符，就是我抽疯病发作涂画写的草字书：

十二月某日，时间已忘。战斗极其激烈，双方损失惨重，野草枯黄，浓霜雪白。士兵操练，打少林拳，唱民歌。我走过时他们举手行礼，他们那双黑眼睛使我想到：“我们是快死的人了，向你敬礼，骑在马上外国女人！”猛然一阵弹雨，弹片纷飞。该死的敌机俯冲，轰炸前搜索目标，象捉捕无法自保的猎物喜得发狂的恶鹰。

离开战场边上的荔山镇，今天没有震撼山岳的厮杀声，只有山间小路上的殷红血迹。

老乡们在犁不愉快的旱地，磨玉米。单门独户分散的农家茅舍尚未破坏，一些有守望台的地主大庄院完整无损，村子里到处都是军用电话线，挂在树枝上，挂在东倒西歪的临时电线杆子上。每座山头都有哨兵盘问口令。山腰里一个小孩子用长砍刀在砍树枝。时走时停，唱抗日歌曲。

社会上川军很落后，但富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虽然没有民众动员工作，老百姓仍自动起来不用招就抬运伤兵。信任军队并留在战场附近，他们拆下门板作成临时担架，或把竹床翻转过来，床下绑上绳子用以抬伤兵，他们低头看路，脚步如飞，汗流浹背。

给红十字会的报告已经寄出。

四十六、唱歌的将军

厉山前线川军一二二师兼一二三师师长王启元中将，在挖有战壕和防空洞的高山上的一个古庙里设立了临时师指挥所。从那里他可以俯瞰厉山河谷并观察远方敌人的阵地。日本人用大双筒望远镜也能看到整个山谷和中国士兵的行动。敌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侦察，发现骑马的人，知道他们是军官就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司令部隔几天必须搬家一次以免被敌人发现。

王师长以前在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里当过将官。他身躯魁梧，肥胖，精神健旺，大嗓门，那么大声在电话里说话，对方往往听不明白。他的参谋长习以为常地拿起电话耳机用标准口音重复他下达的命令。

看来王师长是一个忠厚直爽的人，不会耍权术和玩弄手腕。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而且也不容别人回答他说“对不起没听见”。他是驰骋沙场戎马为生习惯了的人，我想，他要是向全体官兵讲话，侃侃而谈，全师人会聚精会神一字不漏地听下去。

战况并不严重，但双方伤亡惨重，需要补充兵源，他用大嗓门对我说。鬼子是武汉火速增援的部队，王师长已派部队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他本人则在等候两门刚刚运到的新大炮，明天即可进入阵地，射程比日本大炮远。他要把最近的敌人的三个阵地炸平。如果我想观战，次日即可骑马和他一起看第一次炮击。

他带领我爬越翻过保护山头阵地的战壕沟网时，谈起他生

平的一件快事。他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多年前在北京受过一个美国传教士的洗礼。传教士的照片他仍然随身带着，夹在一本《普天颂赞》的书里。

我问他为什么要作一个基督徒。“哎呀，这我可说不明白，一种感情罢了，”他说。“我喜欢唱歌，常去唱诗班。唱歌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是很快活的。”

对我的到来，王师长和他的参谋长决定在我住的老乡家里设宴洗尘。他们买了一只鸡和一些萝卜，出钱请老乡烹饪。农民未收费。他们尊重王师长，站在王师长的身边象老朋友一样交谈。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围着一张方桌，点着一盏花生油灯，纵谈战争和天下大事。

将军经常带着他那黑皮中文本赞美诗，当他感到需要一点精神安慰时他就唱起歌来。有一次将军饭罢，用他的大手抚摩着那本道林纸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我记起了我和冯玉祥合唱这首歌，”他说。“那是多么好的日子啊！我们经常唱呀唱呀！”

他是个谦逊朴实毫不做作的人，一请他唱歌，他张口就唱，他那深沉而柔和的声音在农民的屋子里缭绕激荡。好啊！我想起了屠克基黑人歌手和保尔·罗伯特的歌声。当他唱到赞歌收尾“阿里露亚！阿里露亚！”时，真是声震屋瓦，音荡四壁！

他仔细地翻弄着发黄了的书页，查找别的歌曲，不用别人催促，接着又再次唱了起来，唱了又唱。当他唱到“神圣！神圣！神圣！我的上帝万能！”时，我再也坐不下去了，便走到门口去看望夜景。大地似乎在唱着赞美诗歌。外边，守卫我的屋子的两

个哨兵在坚实的打谷场上走来走去，这时笔直地站在那里。北风掀起他们的长大衣的衣角，一弯月光照在他们的刺刀上，照在远处平静的池塘上。树上干叶和白果被风吹的沙沙作响。月光透过树梢枝头落到打谷场织成的罗网，树底下的荫影里可以见到一个小土地庙。

歌声停止，我们凝神谛听，南面传来了大炮的轰隆声。

王师长突然对他的参谋长说：“马坪方面的炮声，我得走一趟。你留下。”

他收起赞美诗，一言不发地走了。我们坐下来一直听那南面传来的隆隆炮声，很久很久。

次日下午，我们骑马登上一处高地，上面挖有纵横交错隐蔽很好的掩体战壕，每个山丘都设置了一个窝棚似的警戒哨所。

我们站在高地上可以看到敌人的阵地。涇水从峭壁悬崖下流过，一二一师部队沿河布防。向东七英里处屹立着昆山山峰，山顶有一座大庙，日寇驻有重兵把守。从望远镜里看到一道长墙蜿蜒在半山腰间。另一道墙在大庙附近。山东南是诸葛潭，潭与山中间是张家岗。

这天本来许可我可以亲手点放一尊大炮，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中国朋友太多，根本就没有轮到我的机会。

我们下山走到一家独居山下的老百姓屋里，这家民屋被选作临时野炮指挥所。四周树木成荫，附近一片杂乱的小松林，栎树底下有一个土地庙，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道貌岸然地坐在神龛上。

屋里正办喜事。令我扫兴的是，新郎不过十四岁，新娘却有十六岁。女客在一间房里吃席，男客包括小新郎在内在另间房里喝酒。有些男人不知不觉地酒醉饭饱后躺在稻草堆里打呼噜，我们离开前他们又醒过来进屋里又吃起来。

王师长和我走进新房向新人道喜，并夸赞了新娘子的美貌。她浓装艳抹，服饰华丽，但有点俗气。跪在我们前面向我们端茶献饼。我们品尝过后，把结婚礼物一个小包封的喜钱放在茶盘里。我向女客们打听三个月前鬼子盘据这一带高地时搞了些什么名堂。她们告诉我，鬼子在我们的军队的战壕里发现了瓦罐粗碗，看出了老百姓给自己的士兵送茶送饭，于是他们便把留在老屋里看屋的两个老婆子一个老公公勒死了。

腾出另一间房作为王师长的指挥所，他开始对着接通炮兵阵地的电话线的话机哇哩哇啦大叫起来。参谋长耐心地等他说完，拿起话筒用标准口音重复了一遍师长命令。

“得了，我们还是吃饭的好。”将军喊道，这时伙伙头端上饭，摆在院子的一块木板上。王师长弯下他那高大的肥躯在一张三脚小凳上坐了下来，望着地图细声细语嘀咕着。我们刚要举箸吃饭，第一发炮弹震动了院子的里外角落，我站起来，端着饭碗，听着炮弹划破天空的长啸。“这是抗战以来我见到的国民党军队破天荒第一次进攻，我们正坐在这里吃饭哩！”我想。

为了不让敌人的望远镜发现，我们沿着一条流水沟慢慢地走到松树林里。我们这伙人中间，只有王师长拥有唯一的一架双筒望远镜，每一发炮弹打出后他对准昆山，调整镜距，然后大喊，给大家传看，我们看到了敌人阵地，过了很久一阵，镜

片上喷射出一股浓烟和碎雨，待一会儿，传来了炮弹炸裂的回声。

王师长把挂在一棵树枝上的野外电话机拿在手里，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嗓门向炮兵大尉下命令。有一次他把望远镜塞在我的手里，这时一发炮弹带着火光冲破天空，我看着看着最后看见了昆山敌人防守阵地中心升起了一股浓烟和碎石雨，我欢呼起来，别人也跟着叫好，有人从我手里抢走了望远镜，王师长拿起话机，尽量低声说道：“你们打中了，就狠狠揍吧！”

时间四点半，山谷和远处山头上喊声震天，打开了一道缺口，我们听到了迫击炮的轰隆隆的响声，夹杂着哒哒哒哒的机关枪声和有节奏的步枪劈拍声。在这儿，天黑得快，每发炮弹射出时迸发出一道火焰暴露出炮兵阵地。炮兵大尉请求停止射击。王师长表示同意并下命令大炮立即转移新阵地，因为天一亮，敌机肯定会来轰炸。

然后，我们骑马去厉山山谷。黑云消散时，看到右边有一座天主教的小教堂，它已彻底破坏，没有门窗，只剩下墙和屋顶，王师长进去祈祷，要我们等候他。有人说：这是天主教堂，你是耶稣教徒。但他回答说：“在上帝的眼里都是一样嘛！”我们骑在马上在外边等他。空无所有的教堂里发出他呼喊上帝的声音，他祈祷上帝，祷告上帝保护部下，祈求上帝战胜鬼子。

伤兵在天亮时来了。同时，战事转趋激烈，墙壁在动，但我们听说两门大炮压住了敌人三十八门炮，大家引以为豪，敌机在上空嗡嗡叫，盘旋侦察，寻找目标。

我背起急救药箱匆忙向最近的裹伤所走去。快到所时，见

到两头公牛拉着一门缴获的鬼子野炮在公路上慢腾腾地走着。炮身上用绿树枝伪装了起来，树枝中间露出跨在炮筒上的兵士的笑脸。我正要拍下这个镜头，这时王师长赶上来了。他仔细察看大炮，声称这是一件巧工艺品，是一九四〇年造东京牌号九点三厘米炮。

昆山已被包围，在山坡上抓住了十名东北伪军。敌人的制高点多次被易手，有的已经拿下，守军已被歼灭，工事已被摧毁。青年营长罗富平带领的一营人好象下落不明。终于发现他们在攻打庙儿铺敌人的留守据点，一个班找到了罗营长和打剩的一百战士在堡里据守，他们又夺到了一门野炮用来打鬼子。

诸葛潭拿下来了，四十名黄石会的“大刀”队队员给部队带路，走羊肠小道向镇子扑过去。队员们带着梭镖大刀和土造铁剪，摸敌人工事，用铁剪剪铁丝网，这时，出来一个鬼子军官向附近屋子走去。大刀队员们冲进屋子，战士们扔手榴弹。鬼子兵一个个都被活捉了。

队员们在诸葛潭发现了两辆美国大卡车，一辆车上装着炮弹，他们卸下了炮弹后把汽车砸坏了，一部分人跟着队伍把弹药和一门野炮运下山，有时人们扛起大炮在公路上走。日本国旗、枪支弹药、军械器材、汽车备件、工具等等战利品源源运抵司令部。几百人获到了军毯和大衣。

黄石会大刀队负伤的农民们躺在担架上，身边放着梭镖和血迹斑斑的黄绸缎带子。

“人家说你们系上黄带子就刀枪不入，伤不了，并且毫不害怕，你们相信吗？”我问他们。

“如果我们怕死就不去打仗了！”一个人回答道。我无言

以对。

我沿着厉山往东的战场外骑马疾走，王师长提醒我们必须尽速赶到一二二师司令部，因为有消息说敌人在昆山据点山头周围正集结强大部队。

厉山遭到很大破坏，穿过危墙林立、瓦砾成堆的县城，我们遇到了几百名带着锄镐从战地挖工事回来的老百姓。我们一路上还看到衣衫褴褛，患沙眼病的乞丐站在路边，嚎啕大哭伸手要饭，他们是难民，我们没有东西施舍。过厉山两小时走过一个小镇子，那里有一连疲惫不堪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睡着了战士。

我们快马加鞭赶路，马蹄扬得尘土滚滚，烟雾大起，昆山方面的炮声隆隆不绝于耳，西面山脚底下森林在起火，山坡升起一阵烟幕，敌人的侦察机象鹰一样在平原山头的上空盘旋，接着南方飞来一中队轰炸机，分成三组，选择目标，滥肆轰炸。

我们通过一个狭隘的山谷时，偶然发现一间土房，它是一二四师一个团战地急救裹伤所。仅有一个入口处。门户洞开，里面黑洞洞的，一排伤兵躺在墙边稻草地上，靠近门口一张桌子上摆着五、六个半壶水的水壶，一把土剪刀，几条绷带和一些小纱布。积满灰尘的椽子上挂着一大包棉花，这些就是这个急救裹伤所的医药物品。

我看着伤兵们的发愁面孔。他们用忧伤的目光盯着我。有一个喊喝水，护理兵倒了一碗水放在们的头边，并不扶他喝，我忍住心头的怒火，跪在他的床边帮他饮水。

伤兵们都默默的瞧着我，屋内五个护理兵年龄都在十七、八岁，我站起来看他们都低着头站在那里象受到了责备，怜悯之心抑制住了我的怒火。他们是部队里的穷孩子，在中国只有穷人关心自己。也许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是睁眼瞎子一字不识，读不起书，从舒适和悠闲创造出来的人类文化一切享受和他们绝缘。

土房外面行军的脚步声引起了我的注意力。一队穿灰军装背着背包和步枪的战士从门口走过。我走到外面望着他们停止前进解下背包，坐了下来，步枪放在两膝中间。有两个人离开队伍，隔了不久，抬回一大桶开水全体喝得足足的。

这是开赴战场的一个连。这里是他们休息的最后一站。今晚月亮高照，他们将战斗通宵。连长到我跟前敬了一个礼，和我谈了一阵话，然后问我：“你愿意跟我们连讲话吗？我们在这里休息半小时。”

因为我的余怒未消便婉言谢绝，此时此地讲话不大合适。但连长说我的讲话会对他们临阵受到鼓励，于是我同他走到队伍跟前。一声起立，战士们立正站好，连长喊“敬礼！”战士们举手敬礼。我特别礼貌地向战士们回了个礼。

对于奔赴沙场、几人能回的战士们可说什么好呢？我望着那些神态庄严、面有忧色的面孔，尽力回想起我们美国同胞和欧洲一般人的面孔，那些在业余活动时间里同情中国、想到中国人民的英、美国家人们的面孔。鼓起勇气，于是我对这个连的战士们开始讲话了。我说，有些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援助中国。一言既出，我犹豫了，因为我在中国前线那里没有看到过一盎司西药。而正相反，却只有美国的炸弹、汽车和辎重物

资。

“我们援助中国还很不够，不过，我们将尽力而为；看看能作些什么。”我结束我的讲话道：“我向你们提出我个人的保证，我要将我所见所闻告诉我们美国同胞和世界各国人民，我将尽力报道你们英勇抗战，奋斗到底争取自由打到最后胜利的精神和战绩。”

战士们敬礼，坐下。沉默了一阵，接着便叽叽喳喳议论开来。这时连长对全连说：“大家说什么，美国友人想知道。”

一个兵自告奋勇，挺身起立，双脚立正，腰杆笔直，象对长官报告似的说：“大家希望知道你们美国出售军火武器给鬼子杀中国人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伤害过你们美国人啊！”

这又提出了我们美国出卖中国的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妖魔鬼怪。战士们对鼓舞“士气”的精神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们就象脚底下踩的黄土一样讲究实际。我的答复同过去回答别人一样，向他们又讲了一套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卖国贼，他们没有人性，拼命谋取暴利。我又补充了一句，也有千千万万痛恨这种政策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和中国士兵们牢固团结在一起的。我机械地讲了一套东西。

战士们并不满意。原来提问的那个士兵又问道：“对那些有钱的卖国贼，我们的美国朋友们现在作了些什么？”

我把一些团体和个人以及所作的工作向战士们讲了一番，并提到罗斯福总统声明用医药物资援助中国，伦敦市长也作出同样的号召，至于响应者竟有几人，说出来是不妥当的。

一个士兵跳了起来高呼：“罗斯福万岁！伦敦市长万岁！”

全连人跟着他欢呼雀跃并喊起我提到的那些团体的名字，

连长豪迈地微笑着向我敬礼，接着命令全体敬礼，他们背起背包扛起枪，向山地进发。

四十七、有良心的将军

当我翻阅我的价廉粗糙的日记本子时，这一时期我遇见了两三个自以为是、与众不同的特别人物。头一个是张自忠将军，印象很奇特，他的良心驱使着他转战每个战场。第二个是比他年青一些的参谋长张开厦，他轮廓清晰，才华横溢，不存幻想，一双眼睛盯着未来。第三个是王瓚绪，他异想天开，是一个夜郎自大，喜欢吹牛，令人讨厌的家伙。提起他，使我想起了我们美国某些牛皮大王。

一月九日，我来到华中大洪山西北张桥集小镇张自忠将军的司令部里。他在冬季攻势中指挥国民党右路军，并指挥他自己的北方军队第三十三集团军，其中有抗战开始时在芦沟桥坚决抗日的冯治安英雄旅，这个旅的老兵仍然是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的核心力量。

我们一行绕屋进村时，我看见一个不带帽子身体结实、至少有六英尺高，穿普通士兵蓝色棉布军服的人，手里拿着一本包了封面的书，书页折了记号，好象他已阅读过。

张将军带我进了他的司令部，坐在桌子对面谈起他指挥的中部前线的战事。我们望着朝南开的大门外远处绵延起伏的高山，听见山那边传来不绝于耳的炮声和飞机声。我坐在那里的时候，心中想着一个军官象在为张将军辩护，反复向我提出保证这位张将军是一个爱国军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儒将。

正是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张将军曾一度被人们骂为汉奸，抗战前他在华北身踞高位，同日本人有所交往，并以代表团团员身份到过日本。

但是一个人能够对一个政府的政策负责吗？自“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六年中间，国民党中国对日本每个侵略行动都当作“地方事件”处理。步步屈服，不是妥协就是投降，在日本人的威逼下，河北全省几乎完全非军事化了。张将军同每个北方军人一样，包括他也是二十九路军一部分军人在内，都被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老顽固来对待，已经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事了。

二十九路军浴血奋战整整三个星期的同时，张将军献出北平城的报道受尽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实际上这段时间里的最后几天，他躺在使馆区的德国医院里。有一天，一辆外国汽车开出北平，前座坐着两个而不是一个中国司机，其中一个就是张自忠将军。在德国医院里假充将军的人掀起被子走出了医院。

等到日本人知道消息时，张将军已是五十九军的军长，并且在华北各地同他们作战。他指挥五十九军艰苦转战鲁北；一路激战，成为台儿庄大捷的主要因素之一。徐州失守后，他一军人奉命西撤，仍一路且战且走。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的冬季攻势中，蒋委员长任命他为华中前线右翼总司令。

张将军身经百战，在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但一度加在他身上的恶名使他仍然心有余悸。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有两个中国新闻记者同我在一起。他谈话时谨慎小心，一双眼睛望着两个记者疑虑重重，以致后来我对他的参谋长张开厦说：“我既不理解也不能相信这一类人。”张开厦说：“你错了。过去的事

仍然纠缠着他。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首挽歌，哀挽一个名将说：除非功名就，人生如尘土。……”

张自忠作人难，能有今天很不容易。在混乱和动荡中度过了四十六个年头，过去的影子至今仍然拉他的后腿。但我在他的司令部里却没有发现他过去的影子。到处堆放着军事政治书籍，他和青年军官特别是和他的参谋长在司令部里利用短暂休息时间讨论他的读书心得和体会，我到达以前他在前线视察防线工事两天两夜。人们说他为了得到良心上的安息，但求一死报国。

他有时性格开朗，显得活跃，但内心深处怀有恐惧。他只和我谈战事。他告诉我们，猛烈的大炮轰击来自南面二十英里以外的那座山头上的六门日本野炮。派出一个破坏敌人后方交通线的骑兵团已被敌人发现，但该团已返回原地复命完成了任务。张将军指出，敌人对那个团就耗费了几百发炮弹，仅杀伤了六十个人，看来敌人的射击术越来越不行了。

国民党军队要得到炮弹是有困难的，人和骡子是他们唯一的运输工具。三周伤亡统计，仅三十三集团军就死伤人数四千人。尽管如此，张将军仍然宣称他的部队士气很高。“他们以能参加冬季攻势为荣。希望粉碎武汉外围敌人的外线工事并夺回主要基地钟祥。”

但是整个冬季攻势是否会取得胜利，谁也说不上。敌人在据点防守了几个月，并筑起了坚强的工事。他们有空军的支援，并有汽车运送汉口的增援部队和给养物资，而且还能互相调整据点内的兵力。

我还了解到敌人军队里有东北伪军，人数占十分之一。敌

人在前线使用伪军总是有所畏惧，只要他们充当后卫。对此我甚感惊异，不加思索地问张将军“中国的傀儡汉奸这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的看法如何？”“无知”他答道。话刚出口，他的身子就发抖，神情发愣，两眼发直，紧紧地凝视着我。我尽力克制自己不叫出声来，表明我完全无他意，不是指他提问的。

华中前线，我所会晤的人中间，张开厦是最熟悉的。他是张自忠的参谋长，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内弟，到莫斯科学过军事科学。冬季攻势开始前一段时期，在三十三集团军训部整训部队。

张开厦的面孔瘦削而机敏，破旧的蓝棉军装穿在身上显得宽大。我有时在司令部里会到他，他有时来我的住处相见。一次近处有空袭，我们坐在树下谈话，我也只和他谈战事和前线的问题。

我们谈到日本官兵时，他说：切不要听信人们说的日本人老是照书本军事条规作战的一套说法了。他们在我国有了近三年的实践经验，并且学会了不少的东西。他们能够打正面、侧翼、或游击战。更糟糕的是，他们研究了我们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弱点，用来对付我们。

接着他指出大多数日本士兵具有文化，受过一些教育，并且他们的征兵制度要比国民党的抽壮丁优越，从而士兵的体质和文化程度要高。他承认，国民党拉壮丁，用绳子绑着行军。这样的士兵毫无政治训练。除了八路军新四军，所有国民党军队都有这个致命的弱点。然而他含蓄地说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

作人员不允许他们的战士和别的军队接触，这是很不好的事。我说，据我所知情况正好相反。他说也许两方面情况都存在，但无论如何，总之对国家都不利。他继续说道：“然而，抗战军兴以来，我们的国军在许多方面有所改进。这个那个军队再也不消除异己保存自己的势力了。我们必须把所有一切军事力量和政治上经济上持续不断的进步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同样在张自忠将军指挥之下的四川军队第二十四集团军王瓚绪的作风却完全是另一套。在王瓚绪的面前我感到他根本没有同舟共济的袍泽情谊，我对他难以增进友好起敬之心。

我同两名中国记者到王瓚绪将军设在村子的司令部里去听他摆龙门阵。他是一个瘦弱、其貌不扬的人，喜欢接受采访，特别是装模作样的照相。我们刚坐下来，他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向后一靠。声称要是他不因事在川逗留，前线局势则不致如此严重。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日本鬼子占领了的地方夺回来。他恭而敬之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新闻，就是蒋介石委员长已经答应只要他扫荡干净了外线的敌人就委任他当四川省主席！他也含蓄地声称他因此感恩戴德，非常尊敬蒋介石委员长云云。我倒以为这是他进退维谷、抽身逃躲难关的手法。这类角色在中国是臭而不可闻也的。

王将军谈军事问题是高明的，他最好的妙论莫过于他对汉奸傀儡的妙解：“他们所以那样多，完全是因为他们没有读过孔夫子的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是孔门学者。”

坐在我身边的记者作了一个鬼脸。他倒沉静，但我却单刀直入驳王将军的军人、汉奸、学者三位一体论。我提醒他说绝大多数汉奸头目是孔门学者。他带着一副怜悯的神色望着我提醒道：“正是因为那些汉奸经书不通，学问浅薄么！”张自忠将军过去读过经书，现在研究现代军事政治书籍；而他王瓚绪将军司令部里没有一本书甚至一本古书也没有，提醒他也白搭，我决定不谈了。

显然是为了夸耀他的理论高超，他的谈锋一转把他的军队刚刚抓到了六名鬼子俘虏的事告诉我们。对他可悲的是，我们见到了那儿的鬼子俘虏，并且知道抓俘虏的事和他王将军的军队风马牛不相及。那些个俘虏是“挺进”游击队抓到送来的。这个游击队在大洪山到汉口西北一带地区活动。扣字眼解释俘虏有什么意义，孔子经书查不到，因为挺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一支游击队伍。中国记者暗示我听他的发言，我便一本正经肃然起敬似地坐着听王将军吹牛皮。

访问后两个中国记者和我分手前，一个记者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四川牛皮大王。呸！”他啐了一口唾沫。

一天傍晚，我和我的秘书从张桥集赶集回来，出人意外见到了一个前线下来的连长和他的一连人。连长告诉我们，前晚，连队爬上山头袭击敌人阵地，听到上面什么地方有一个中国人喊话的声音：

“老乡！别再前进了，我们接到了使用毒气的命令呀！”

“汉奸！”连长大喊道。

“那是没路可走呀！”对方说。

连长翻下山头绕到山后想从后翼攻打敌人阵地，但发现全连已被一营东北伪军包围住。伪营长告知连长如果他们立即撤退可以连枪带走，他的兵士可以朝天放枪。连长还是高喊“你们是汉奸！”伪营长却回话道：“鬼子在东北征兵，我们家里也造有花名册，谁要临阵脱逃，谁要拒绝打仗，全家就会被杀。”

连长同伪营长争论开了，他说我们爱国军人的家都在沦陷区，哪还有家可归。你们回到自己队伍里来打鬼子吧。伪军士兵们一阵骚动，要不是官长在场他们会跑过来的，甚至伪营长也唉声叹气叫士兵让开道路放他们一连人快走时，一再叮咛“不要朝阵地前方走，那边有机枪网，机枪手是鬼子兵。”

回到我的住处，看到一个游击队队长和一个押送几个日俘的同志在等候我。两名来客向我汇报了汉口以北敌占区的情况。次日一大早，游击战士便取道大洪山敌人山上防线向东走了。游击队一面行军，一面打仗，成了家常便饭，总是距离敌人三、五里以外的地方宿营。

我请我的秘书送一短笺给张自忠将军，请他许可我到那边去。后来才知道我的短笺到达时，张将军正和一位重庆来的高级军官谈话。重庆军官说新四军的挺进游击队是非法的，无权在这个地区活动！

“非法的吗？”张将军问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们在我们的后方肃清了许多伪军，他们动员民众成立抗日救国联会，他们给我们抓来了日本俘虏，这些都是非法的吗？如果是，什么是合法的呢？”

于是，他拿起笔签署许可我去访问游击队的通行证。他一边写一边说：“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游击队队长是共产

党，游击队便是非法的，非法个屁！只要一个人打敌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我才不管！”

不是所有的人都同张自忠那样客观。他有一个副官，是一个基督教徒，当过北平卫理公会教堂副主祭。一听说我要到游击队那边去，就满怀见假惺惺地来劝我不要去了。他声泪俱下地宣称：“如果进入游击区就会被人杀死。”

“收起你为我出殡的眼泪吧！”我忍不住说了，有点厌烦。他歇斯底里大发作，居然大哭道：“游击队员都是共产党啦，何得了呀！”我回敬他道：“尽管他们都是卫理公会的主祭官，我也不在乎。”

第二天，我和游击队员一起走了。

两个多月以后，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再次见到了张自忠将军。我走过大洪山回来向他报告华中战局发展的危险局势。我告诉他那个大吹牛家王瓚绪将军告诉我，他已接到肃清我访问过的挺进游击队的军政部命令。

张将军谨慎地问我：“你有把握说的是真话？”

“清楚得很！他翻来复去对我这样说。当然啦，这样的内战亲者痛仇者快，只是对敌人有好处，我跟他争论了一番。”

张将军死一般地坐在那里，而我也在沉思。我已听得人家告诉我，他也接到把枪口转向游击队的命令，不过他找到了不执行命令的借口。只有王瓚绪部思想落后的川军才会同意执行这种自相残杀的政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将军。我已病了，他用军车把我送至长江边的宜昌外国医院里。后来，张将军的一个负伤的参谋长来看我并讲了下面的情节：

五月十五日，日寇春季反攻高潮中，张自忠将军又奉命指

挥中线军队作战，把枣阳守敌和其他一些城镇的敌人赶出去。他在汉水以西仅有个警卫团在身边，他能否与他的三十三集团军联络上很成问题，这时他和其他军队已经失去联系。在服从指挥中线作战的命令前，他给副总指挥冯治安将军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他发生任何不幸，即由冯指挥军队。

五月十八日，他和两团人在冯桥集附近被敌人六千步兵骑兵包围，他们打了八小时，伤亡殆尽，他的左臂受伤，参谋官们催他这时还来得及撤退，但他说他尚未为国家尽到天职，拒不撤走，就在争论时敌人逼近，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中了将军的胸膛，打伤了身边的一个副官。两个副官要背他出去，他断然拒绝，命令他们快走，嘴里不停地说着：“我已尽了我的天职了”。

几小时后，冯治安将军赶到，与这支日军激战并把他们全部歼灭。在死难者中间，他们找到了自己长官的遗体。日本电台广播欢呼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将运回山东老家安葬。说是“骑士传统”和“武士道精神”。

国民党把张将军的遗体与钟毅将军的遗体运至重庆在北碚举行国葬。日本人得悉国葬消息，派飞机轰炸，警报解除后葬礼继续举行。

我想，他的良心终于得到安息了吧！

四十八、兵 变

我离开张自忠将军的司令部几天以后，到达大洪山区王瓚绪将军的一个团的医院，这时我猛然想起那个好吹牛皮的川军将领，使我很不愉快。这个负责“医院的”院长使我拍案惊奇，

尽管我自己这方面的阅历太多早已见怪不怪了。他决不是什么外科医生，何以能捞到这个职位，使我百思难解。村子里驻防的团长，此人精明能干，看来象一个屠夫，也许他过去是杀猪的。

他寻找各种借口不让我看他的医院，但在我的坚决要求下他无法推脱时，才勉强地陪我走了一遭。我们走到一片茅屋的小村落，进入一个各有四间房的四合院子。我们一跨进院子就惊慌失措茫然四顾，脚底下似乎发出不断地呻吟呼叫声。我转身推开身边的一道门，呻吟声浪迎面扑来。

房间既长且暗，光线只能从门口和墙壁另一头一个小窗射进来。地上靠墙铺着一排草垫子，二、三十个伤兵象停尸房平板上躺着的尸体。草垫和土墙之间有一条通道，靠墙摆着四、五个尿尿溢出的大粪桶和马桶，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尿尿臭味。伤兵们有的三五个挤在一条军毯里，有的六七个围在一起设法取暖。他们都在呻吟叹息，痛苦呼唤。

一个病兵起身下地，摇摇晃晃地向尿桶走去。我上前抓住他那滚热发烫的手，扶他走到桶边。

我忘却了一切礼节，跨过通道和伤兵们谈起话来。然后又转到另一间类似的病房里，在那里我看到死人和活人并排躺着。我推开第二间病房的角门，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又小又暗的套间里，停了一阵，眼睛才能习惯黑房子的光线，慢慢地我才看出了地下躺着的人们的模糊轮廓。我翻转一个，身子僵硬，他已经死了。他的衣服和草垫上尽是屎便。什么地方伸出一只手用力拉我的裤脚！向下一看，发现一双发绿的眼睛在望着我，一个嘶哑的声音在说：“帮帮我！”

这是一间弃以待死的房间。我蹒跚而行，来到四合院子里，

然后又走进另一间还要长一些的病房，人们一直在那儿痛苦地挣扎呻吟呼唤。医生紧跟在我的身后一直唠叨，不满地说办公室的人都下班啦，没有药啦，没有援助啦，等等等等。这时，在最后一间病房里，一个兵从草垫子上站起来绝望地叫喊道：

“这不是一个医院，是一个等死的牢房。院长说我们应该作出牺牲，他可不作出牺牲呀！他侵吞我们的伙食费！他不护理我们，无人护理我们！”

这个所谓的“医生”走上前去打了那个兵一耳光。我吃惊地喊了一声，他转身断然命令我离开医院。我沉默无语，走了出来，一到外面，我就当面对他发誓说：“我一定要把此事告诉张自忠将军，告诉重庆每一个人，告诉全世界”。

我勃然大怒，去寻找团长，还没有等我开口说话，问题以可怕的收场得到了解决。挨过医生耳光的那个兵蹒跚地走到他连长的住处，向连长报告问题发生经过，连长对他大发雷霆一顿臭骂，并以开军事法庭威胁他，那兵士摇摇晃晃地走了，转身拿了一支步枪，许多兵士见他走近，都沉默无语，静静地注视着他。

那个兵士喊连长出来，连长走出来，他一枪击中连长的腹部，然后转身向医生的住处走，旁观的士兵们远远的跟着他，盯着那个兵士到了医生住的屋门口，喊一个护理员去找医生出来有客会，医生正和两个朋友共餐，闻报怒气冲冲地走出，兵士向他开了枪，走进室内，医生的两个朋友已跳窗而逃，兵士把枪放在餐桌上，随手把室内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做完这些，他摇晃着走出屋，穿过看他行事的士兵们人群中间，下了短街，沿着山路向山里走去。

一下子全村沸腾起来了，待到所有军官真正了解情况前，天黑下来了，兵变者已在山中。一个军官召集并训斥事变发生的当时在场目睹的士兵们。一个兵士说，他们谁也没有一支枪也没有盒子炮，而人家手里有一支好步枪。

除此而外，军官什么也了解不到。晚上，加了特别岗哨。有什么用处？团长和参谋官商议过后，召集全团士兵，集合讲话。他说持枪杀害官长的兵变犯有两条人命，抓到即正法。并说他亲自抓医院的改良措施，希望有话要讲的士兵们直接找他而不要枪杀官长。

后来青年兵士一小组人到团长那里报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们听说有些军队有士兵保健委员会，就不会有人埋怨伙食不好，指责医生侵吞伤兵经费了。大家说宁肯上战场杀鬼子死都不怕，并不想进医院，受死罪，不死不活。他们认为医生应该尽到医生看病的职责，护理员应该保持病房的干净，给草垫子上随时添上些新鲜干草。死者立即抬走，病者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在身边死去。寒冬腊月伤兵应该有被子盖，等等。

团长说官长们总是太忙，难以处理这类事务问题，今后要尽力作好。他很讲礼节，又很和气，士兵代表们并未乘机行事。最后他们敬礼，列队而出，我看出他们里面有一两个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

那天夜里的其余时间里，全村子都在议论着兵变的事，不时听到人们窃窃的私语和悄悄的笑声。次晨，我们听到警卫团部周围的卫兵说，士兵们在营房里谈论白天所发生的事情。有的说：“太坏了，太坏了”，但大家都拍手称快哈哈大笑说：“好得很！好得很！”

第九篇 再次和游击队 在一起 (1940)

四十九、再次和游击队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休息时写道：

我们继续前进。……。一条公路展现在眼前。我们在林中逗留时，战士们在公路上成扇形上下展开活动。接着我们冲过去，小跑一刻钟越过公路，钻到那边一个林子里。走着走着终于见到树下游击队岗哨的人影。我们到了大洪山东山岗第一个游击队村庄，我们这次旅途行军是胜利的进军，一阵阵抗战的歌声，一张张欢乐的笑脸，一双双动人的眼睛。……。黑夜来临，大庙里的烛影摇闪着，男女儿童和新四军挺进游击队的队部参谋人员在一起，坐无虚席。蜡烛光照亮了一张长桌上堆满的花生和小红冬萝卜。萝卜是这些人现在仅有的菜。漫长的夜，报告讲话夹杂着欢乐歌唱的笑声中，我听到有人说：“我们的部队得转

移，一搬到新地方那边就有更大更红的萝卜了。”

游击队队部一个参谋把三周前在麻家镇山谷一次战斗经历告诉我。许多人包括伤员在内遇难牺牲。游击队战报《七七报》编辑被俘遇害。编辑李章湘过去是上海农业研究会会员。现任编辑是谢文尧，武汉大学毕业生。参谋又补充道：

“说奇怪真奇怪，鬼子一次扫荡够瞧的了！扫荡开始前我病了两周，我跳起来连夜走了九十里路，从此我的病再也没犯过，把我的病也治好了。”

“那是肾上腺素治好了病，”我回答说：“我现在生病，只能起一点机关枪的作用。”

“你在这里会把病治好的！”他笑了。

好得很，我很快发现我又一次和一群把枪杆子和知识视为同等重要的人们在一起了。《七七报》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每个人都出了席。他们给了我一张、我所期望参加座谈讨论的议事日程讨论题目表，我的心情立即沉静下来。议题包括：一、欧洲大战现状；二、苏芬敌对现状；三、中美关系；四、中国目前军事形势；五、中国各党派关系；六、改进意见。

游击队妇女领袖之一的军事指挥员“陈大姐”^①也通知我，她们正召开敌后十一县区的妇女会议，希望我讲讲国际妇女运动和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成就。当然，还要求我“指导她们”！

从汉口北面广大游击地区开始送来一封封信件：催促我去访问野战兵团连队。并参加首次“民主选举基层干部”的群众教育工作。希望我以民主国家公民身份在群众大会上讲民主问题，并出席决选前的代表大会。两个区长也邀请我去他们的区

^① 陈大姐即陈少敏同志。——译注

里进行访问并向自卫队作报告。一个区长签名自称是“你的七十岁的老友商毅。”

紧接着，有名的地下民众抗日团体“十人团”的团长来信告诉我，敌后组织起来的民众已有十万人，不久将在汉口西北的洪湖地区开代表大会，希望我光临谈谈天下见闻。和信一起送来了他们的战利品：五听日本香烟，一面日本国旗，五个崭新漂亮的日本笔记本，一瓶日本墨水，一件日本妇女穿的丝织和服。

我总是行军，总是讲话，为时近三个月。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敌人追逐，我们总是晚间走路行军，白天休息睡觉，武装的村民警戒着周围三、五里内的路口。一个雨雪交加的黑夜，我绕过一个日本人占领的市镇，穿过日军巡逻的公路，取道前往一所有两百名伤兵的游击队医院。医院每星期转移一两次以免敌人发现。唯一的“医生”是一位李小姐，是华北美国浸礼会医院毕业的优秀护士。她训练了十二名男女护士，她们一起作大手术，进行彻底消毒，打扫环境卫生，严格按医事条例办事，她穿一身破旧了的士兵制服，骑马巡回各村，把很少一点医药物资藏在山洞里。我和她并辔同行，才相信世界上真有所谓奇迹一类事情。

我在游击队医院工作的时候，游击队队员们跟我讲了一个隋县爱尔兰天主教青年神甫的事，隋县是本区日寇防守最坚固的城市。这个青年爱尔兰神甫经常帮助游击队，保护中国老百姓，分发平价粮给城外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我很想会见他，一天晚上，我因支气管炎躺在一个帮助过游击队的老乡家里，我给神甫写了一个便函说如果他敢离开鬼子占领的县城就请他来我这里。一个老乡带走了便函。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天麻麻亮

时，神甫来了。他走了四十五里路，带来了药品，三罐澳洲黄油和一些糖作为礼物。而游击队员们在离我的住处八、九里外地方正同一队鬼子激战。

我起床，骑马和他去游击队医院伤员所在的村庄，我把所有的钱捐给医院，神甫也解囊相助，尽其所有把五十块钱给了医院。许多伤员至今缺乏被褥，神甫深受感动，马上动身回隋县去，隋县天主堂有一个小医院，他去想办法。

在隋县城门口鬼子守门卫兵照例命令他脱下帽子，恭恭敬敬低头弯腰站立半小时。然后，卫兵劈面打他一个耳光才准许他进城。青年神甫睡了几小时后把我的请求支援医药物资并请求医院的中医下乡相助的呼吁信送到城内基督教新教会医院。传教士只送给我一磅硼酸，给我个人一瓶药。一个中国医生拒绝下乡来，这个医生却在鬼子许可下，最近到天津把妻子接来了。

神甫转回了自己的医院。实际上把医院所有药品囊括一空。他把防破伤风一类药品放在可可罐头底部，上面用可可粉盖住，把外科医师用的纱布缠在身上衣服里面。一切准备就绪，他把药物包好分放在四个箩筐里。上面盛满白菜和萝卜，由两名医院工人担着在城门口一家铺子前等候，一俟鬼子换岗，城门口有四五分钟的无人站岗的间隔空隙，这时神甫赶急走出城门，手里拿着帽子，后面跟着挑夫。

在他送到贵重礼物之后，我们骑马到游击队司令部，留他在那里作客三天。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游击队到处散布谣言说重庆来了一名美国医生。

一天晚上，游击队挑选了五十名领导人进行保密宣誓，我们围着两张长桌坐在一起，桌上摆着大米饭，萝卜和花生。这

象是一次胜利的会餐。饱吃过后，讲话赞颂自由，然后我们唱起自己的歌曲来，神甫用一种奇异生硬的强音先唱了一支中国歌，接着又唱了一支“爱尔兰骑兵之歌”。朝鲜游击队员唱了一个尼姆·华莱士新近不朽的名作美丽的“阿丽芒之歌”。一个几年来同游击队在一起的越南游击队员引吭高歌越南革命的歌子，一个从爪哇、三个从新家坡、四个从马来亚来的中国孩子用马来亚语唱歌。然后，我们大家起立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三天之后，神甫偷偷地回他的教堂去。在城门口，他脱下帽子，毕恭毕敬地站在鬼子哨兵的面前，等候挨耳光进城。

五十、我的中国儿子

我第一次来到新四军的挺进游击支队时，一名“小鬼”被派来作我的勤务员，陪伴我的女通讯员也配备就绪。虽然这是游击队的惯例，我仍然面临着一个老问题：不仅让孩子们为我服务，还要让孩子们在战斗中经风雨见世面。

在全国各地和各个时期，儿童们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参加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内战开始时，新兴的红军在群众规模上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参加了红军的队伍，有时全家男女老少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同在新四军主力部队里一样，这些儿童担任早上打热水，给部队首长或政工负责人打扫房间及送信等一类轻微工作。每天他们有许多时间要读书写字或上课，他们从勤务员“毕业”当警卫员或战斗员，许多人后来成为战场上的指挥员。他们以

一股完全崭新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这是在战争中成长并确实扎根于革命觉悟之中的一股力量。

从多方面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然而我看不到孩子们有别的出路。因为部队生活对于儿童是太严峻的话，那比起在工厂或小作坊里的儿童命运来还要好一些。除去家庭富裕的儿童以外，在漫卷全国的各种急风暴雨的灾难中，中国的儿童总是首当其冲。

我屡次听到在中国的外国人说，游击队里的小鬼是军官蓄养的变童。这是病态心理的人的胡说八道。军队是一个大集体，过的是集体生活，纸包不住火什么事都掩盖不住。中国士兵聊天时无所不谈，战争使得他们习惯于讲真话，即使第一个兵向你撒谎，第二个兵会向你说实话。

派给我的小鬼是加入游击队的许多小鬼中最典型的一个。他的名字叫沈国华，虽然他说不清他是十岁或十一岁，而样子不过八、九岁。他具有中国儿童特有的聪明。他告诉我，是因为他过去经常挨饿吃不饱，而且当“小叫花子”时总是有病，所以他长得矮小。他解释说，很久以前，他“很小”的时候，土匪袭击了他在河南的贫苦的家，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的父亲，伤害了他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都当兵谋生活去了。大祸之后，他沦为乞丐，靠乞讨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

那时几岁他记不确切了，母亲叫他拿着饭碗站在富人的大门口。他战战兢兢地走到一座高大房屋的前面站了一整天。由于他不知道如何呜呜哀号、嚎啕大哭或在地上磕头作揖，求人打发，所以根本没有人理会他。只在天黑时大屋内走出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国华告诉那人说家中房子被烧了，

父亲被强盗打死，母亲受伤，自己当了叫花子，那人给他几个铜板打发他走了。

在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日子里，女通讯员和两个小勤务员整日留在我的房间里。因为我是支队少数供应一盆炭火的一个。象支队里其他的战士一样，两个孩子身上都长有虱子，一天我决定除虱。当他们在房角的一个小澡盆里洗澡时，我把火钳在炭火中烧得炽热在他们的湿军服里面衣缝处烫熨。国华洗完澡，天真无邪地走过来站在桌子边瞧着我，谈他参加游击队以前的经历。

“冬天老百姓身上都长虱子”，他说：“我当小叫花和给大地主干活时，满身都是虱子，总是头痛治不好，昨天就有一个战士死于这种虱子病，断气的时候他身上好多虱子爬进稻草里。”国华认为有病不求医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他当小乞丐的时候，就经常生病，哪里不舒服，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好了就行。有时候人家放狗咬他，一只狗咬过他的大腿，腿上还留有一条长长的伤疤印。

他补充说：“我怕狗，我怕狗咬住我的腿不放。”他的左颊有块伤疤，那是土匪放火，他家的屋子烧倒时留下的。

由于没有时间观念，国华不知他当乞丐多久。他曾见富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因为他们向他扔石子。他想读书，因为穷不可能。他在地上模写在碎纸上所看到的字，写简单的一二三。三以上的数目字就太难了。当他求人教他写自己的姓名时，他们嘲笑他反问他一个小乞丐想读书写字为什么。只是参加游击队以后才学会写他的名字。

他母亲找一个小地主作保，让他给一家大地主当放牛娃。

那是他六岁的时候。地主一年给他八十文工钱，供食宿，偶尔还给他一些地主儿子穿破了扔掉的衣裤。每年过年孩子得了工钱就给母亲八十文钱，她买布给他作棉鞋冬天穿。

我把国华军服上的虱子消灭完了。他穿上衣服，对我说：“你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我把他拉了过来，偎依膝前，给他梳头，帮他扣好鞋子上的钮扣，这样做使他有些发窘。因为以前没人这样待过他。他认为是他应该照料我，而不该我照顾他。

对国华来说，部队就是一切，就是他的救星。由于在部队里见识增广，他对部队表示无比的爱戴，但他解释说入伍时间到现在不过一年，还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习。孩子一张小脸，神情忧伤地望着我。听了他的讲话，女通讯员低声说道：“什么样的遭遇呀！”

国华说话时，屋外风声呼呼地响。他走到窗前从纸糊窗格的裂缝处内外窥望了一阵，然后要我们放心，说风暴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当风声那样的呼呼，雪花这样的飘飘时，暴风雪就快停了。这是他在地主家放牛扛活时多次观察风暴时学来的。

我们问他是如何参加游击队的。他说，有一次他被打发到京汉路边河南确山县去，路上遇到过兵。忽然在队伍里看见了他的哥哥，不过这是他的“坏哥哥”。他解释说他的“好哥哥”在芦沟桥事变的战场上阵亡了。他的“坏哥哥”和他讲了话，却不给他和母亲一文钱，反而说国华是一个大傻瓜，干一年只挣八十文还劝他找一个挣大钱的差事。

国华从士兵那里听说关于八路军的事。士兵们说八路军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好军队。军官不打骂士兵，人人学习读书写

字，还有俱乐部和歌咏队。国华问那些士兵他到哪里能找到这支“穷人的军队”，因为他自己是穷人，很想参加这样的队伍。人们取笑他，还说这支队伍远在天边。于是他去问警察。警察将他撵走说八路军是土匪乌合之众。

不久，偶尔一天他遇见一个身穿旧军服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兵，国华向他打听八路军的事。这位老兵王老汉也说国华年纪太小，参军不合适。但要找八路军从这里向北走几个月能找到，王老汉补充说他自己就是从离此不远的一支穷人的队伍那里来的，那就是挺进纵队。这老人对国华要去参加游击队的表白觉得好笑。“你知道吗？游击队的生活艰苦。缺衣少食，终日行军打仗，有时身无分文。”老汉说服他打消参军的念头不要去了。

那一天，老王走到哪里国华跟到哪里。这小家伙为自己申辩了一天。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多病，长的个儿小，但能挑重担走远路，而且也不想个人发财。等等等等。在这里，地主的雇工也殴打他，许多该他们做的活叫他做，等等等等。没有人叫他写字，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最后，天黑了，王老汉感到厌烦起来。于是答应国华随他去尝试尝试游击队的生活。国华跟他进到山里，从此以后他成了一名勤务员。

女通讯员经常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学习。每个孩子有一本支队编印的识字课本。开头的字是“人”，“人类”，接着是“工人”“农民”“士兵”。接下去是军队的名字，日军的番号等等，再下去是句子，页末是讨论题，有些题是：

“农民种粮，工人织布，为什么农民吃不上他种出的粮食？工人穿不上他织出的布？”“为什么穷富之间该有差别？”

“为什么今天穷人富人都必须抗日？”“什么阻止人类彼此信赖？”“为什么说鬼子军队是世界上最野蛮最无人性的军队？”等等。

我觉得，诸如此类问题是那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人们应该负责的。

“我长大了要当骑兵去打鬼子”，国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而我每次都想虱子和斑疹伤寒，不知他是否能长大成人带领穷人的队伍去打仗。

不久我有机会随一个步兵排到汉口西北的洪湖地区的野战兵团去，女通讯员决定和我同行。我俩都认为带小鬼去太危险，我一想到把他们留下，总忘不了经常威胁他们的虱子和常发的疟疾。我告知国华我要离开了，他很难过，强忍住哭泣。我无可奈何，只好向支队司令员写了个申请，许可我带孩子同行。国华拿着信一溜烟似地跑去了。事后我听司令员说他并未把我的信交出。相反，他连跑带跳进了司令员的房间。敬过礼就申述我要带他同走！司令员有点惊讶，但孩子坚持己见，说他常和军队一起，能挑重担，整夜行军。此外他恳求说我需要他，是因为他了解我的种种习惯和需求。

司令员答复他说既然我真正希望如此，国华当然可以和我同去。我惊讶不已，但想到军队办事该如何就会如何办的。

就是这样我带着国华进入洪湖沼泽地区。第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离公路五英里远的村子里停下来，计划在半夜里越过公路，一队没有武器的新兵集合在村子里和我们一起走，还有一些带着行李的旅客也等着我们同行，因为日寇利用这条公路增援大洪山线前线。他们在所有附近的大村庄都驻扎了警卫部

队。

天色漆黑时，我们整队前进。许多农民围着自己志愿报名参军的儿子话别送行。记得一个老妇，站在一个小土墩上，拭着眼泪，一个青年妇女怀抱婴儿，边哭边跑，朝队伍里一个男人喊道“快快回来！”我们走过村子一间屋子时听到一个妇女高声呼喊一个青年名字的声音。我们急速行进，但她赶上了我们，在队伍中间跑前跑后，打量每个人的面孔。我们知道她的儿子偷跑，参加了游击队，她正在找他。我们的队伍一声不响地走着。不久便把她甩在很远很远了，还能听见她喊儿子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几小时后我们绕过一个村庄的围墙想穿过公路那边去。公路在不远处。队伍一行突然停住了脚步。在我们前面百多码远的地方，有十几个背着步枪的鬼子兵站在房前正围着一堆篝火。我们又看到几个鬼子兵从屋里走出，拿着桌椅往火里扔。他们围在火旁洋洋得意地取暖。

我们退到村子里的墙后边。游击队员们集合商量，女通讯员和我也参加了会议。队员们打算要干掉那些鬼子！我俩不同意，提出我们的理由说，我们刚走过日本兵站一英里路远。他们会从后面攻打我们，而且我们并不清楚屋子里面有多少鬼子兵和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我们只有二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而机枪仅有二十四发子弹。

最后说服了他们走一点弯路绕道几百码外的地方插到公路上去。女通讯员和我骑马前进，接近公路时听见汽车开来了的声音。人们交头接耳，立即传下小分队的命令，指示所有的人员跑开，非战斗员找坡地隐蔽下来。我看见国华的小个子在

前面飞快过了公路。在黑暗和混乱中我的马冲到一座桥面已坏的桥头边，一伏一跃，踢腾不已。在团团转的人群中，我们走上了一条土路。马夫抓住马嚼子向稻田跑去。我前面有三个穿长袍的新战士以我生平罕见的速度箭一般地向前飞跑，马夫不住地低声喊道：“快加鞭！加鞭！鬼子来了！”

我们跃过河堤，越过黑暗的田野，子弹打后面呼啸掠空而过，手榴弹在后面的爆炸声，机关枪的哒哒声在响，我们听见敌人汽车的引擎咯的刹住声，一辆汽车咆哮着开走了的声音。

“站住！”我对人们喊道：“鬼子没有来！我们会失散的！”

“加鞭！快马加鞭！”马夫在背后气呼呼地喊。我感到自己真象个胆小鬼，丢下了我们的人，而在这群人当中我是唯一有一支小手枪的人。我跳下马鞍和惊恐的马夫争执起来。

“我们必须回去！快回去找自己的人！”我说。

他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声听起来象子弹的突突声。

“鬼子！鬼子！”他气呼呼地说。我抓住他的手，我们把马牵到过去一座坟墓的高岗后面，两个新兵早已无影无踪了。

战斗已经结束，一切象死一样的沉寂。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发出微光。马开始在脚边吃草，一个新兵悄悄地说：“你的马是白的。敌人瞧得见！马儿吃草，敌人听得见！”说完，他转身消失在黑暗里。

已经完全镇静下来的马夫。这时悄悄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等一等！”我回答他说，把他留在坟地，自己爬上山

岗，俯卧贴地，在黑暗中观察动静。一点动静也没有。远方是沿着公路的小山的轮廓，我竖起耳朵听，没有人来。于是走下山坡说：“我要给游击队发个暗号。”

“发不得！发不得！”马夫喊道：“鬼子会知道的！”

“我要发！”我不顾一切的说。又爬上山岗，躺下，举手轻轻地拍着。没有回答。我再试一次，掌声略高，听见后背有人悄悄反对，依然没有回答！我又拍一次，声音尖锐，一个谨慎的暗号从远方回答过来。我再一次试来，暗号也重复一次。我抓住马夫的手和马的缰绳拖着他们向暗号的方向走去。马夫不住地说：“只怕是敌人！”我们向前移动，小心地间断地发出暗号，听见回答声也越来越近。很快我们靠近了，于是我们停下走到马后。我掏出了手枪，拉开了保险机，等待着。

黑暗中有三条黑影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大声喝问“口令”，并用枪口对准我们。

“傻瓜蛋！”马夫一阵狂喜叫了一声，立即过去抱在一起。

三个游击队员把枪背在肩上，哈哈大笑，还使劲推了我一把。

“我们找到他们了！找到了！”他们高举双手喊着。我们一起穿过稻田。有一个人愉快地轻轻地吹着口哨，忽然停下来笑道：“哎哟！我的手榴弹炸中汽车时，鬼子都四下逃散了！逃散了！”他转身对另一个人说：“听着，记住，汽车开动时，手榴弹不要对准他扔。而要扔在他的前头。我没炸着一辆该死的汽车，原因就在这里！”

“他妈的！”还有人在骂道：“我们的机枪当然要参战，

以后不能旁观。自然，我们只有一挺机枪。”

一路上诅咒机枪，骂鬼子的娘，最后我们到达离公路三英里远的一个小镇。敌人在这里成立了伪乡政权，但没有驻军，而每个伪乡政府里都是我们的人。镇公所全体工作人员出来欢迎我们，镇长站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兴奋地谈着什么。

进村时看到国华丧魂落魄似地站在那里，我吃了一惊。他一见我就跑了过来，两只小手拉住我的胳膊，一声不响地盯着我的面孔。在我们接到散开的命令时，他和女通讯员以及青年诗人、我的助手罗凡跑在一起。当得知我已失踪时，他在黑暗中到处奔跑大声呼唤，担心我被鬼子抓走。女通讯员拉住他的手叫他平静下来，他说他非找不可，非把我找到不可。除我以外，别人不会回答他的喊话。别人劝告他，他是一个小孩子会失散的。他看着周围的小山和树林说：“我要把她找回来！她来到我们部队，首长要我侍候她，叫我好好照料她，这是我的任务。”

汉口西北和西部周围百多里地方，湖泊纵横交错，水面升起的浓雾笼罩着大地。黎明时刻，我们出发，雾里行军，经过大小村庄，老百姓都已走避。他们以为我们是穿着中国军服的鬼子兵。天光大亮，晓雾消散，我们来到一个大湖边的镇子上。只有三四个老汉老婆婆和几个儿童留下看门，镇上的人都划船逃到湖心去了。一个老太婆拿出一面大铜锣边敲边喊：“回来哟！回来！”象给湖上的人们发出信号。

人们回来了，欢天喜地围着我们，看到我时兴奋极了。他们大伙围住我，猜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英国人？一个妇女把惊恐的小孩拉到身边说：“她的一双眼睛象猫

儿眼睛一样！”

我的小子国华忍受不住这话，他站在人们的面前大声说：“她的眼睛决不象猫儿的眼睛！她是一个妇女，还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帮助我们的伤兵！在丁家冲她看到一个伤兵给他喂过饭，洗过澡，精心照顾，无微不至。”

人们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我的“儿子”国华还不住口。他拿起我的手来要大家看，“看看她包裹绷带的手！这就是她给伤兵洗澡时端起一锅开水烫伤的！她同我的生身父母一样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如果你们有人有病找她，她会帮你治好的！”

当我最后决定离开挺进游击队时，我决定收养国华作我的儿子，如果支队和他本人同意的话。其实，我思忖过，象这样的孩子多的是，决不止他一个。我听说华西有一个受过美国儿童教育训练的教授，他创办了一所重视科学的学校，儿童们自己管理，生活简朴，衣食费用少。一个外国人收养一个中国儿童，使他和自己的同胞隔绝，这种打算确成问题。但我想得更长远，准备将来能送国华到外国深造，钻研科学。可是我自己的生活行踪无常，飘泊不定，我敢承担这个设想吗？我要试试。

我到挺进游击队司令员李先念那里去，旁边有许多人，我和李谈到收养国华的事。李担任过红军的司令员，木工出身，他的生活艰苦，同人民共患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当他问我何以愿意收养国华时，我试图从科学根据说明理由，为这孩子辩护说这孩子具有科学头脑，他对虱子病对暴风雪的观察，学

习读书写字的快速方法，晚上他看星星能识别方向。等等等等。李先念说：“很好，如果您愿意而且孩子本人也同意的话，您可以收养这孩子。”

一个长得结实、顶门站着的小伙子提出国华所做的一切他都能够作到，而且有关虱子的事他敢肯定他知道的比国华知道的更多。具备这样条件的他我也愿意收养他吗？李笑了一下，补充道：“把他们这一批人全部收养下来，这个主意倒不坏呀！”说话有点离题，但大伙乐开了。

可是这对国华，确是一个严重问题，他向我打听关于华西学校的情况并说他害怕富人家的孩子，他还强调自己是部队上的人。我说他可以去试读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军队把所学的教给别人。我强调军队需要文化教员。他默然无言地思索，要求允许他和别的小勤务员讨论一下。次日他和另一个勤务员走了进来，向我说出他的决定。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方。”他说：“你可以在最后胜利以后收养我！”

我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不过在离洪湖地区以前，我安排我的“儿子”参加了挺进游击队的儿童剧团。剧团由一位青年女教师领导，半天读书，半天写字以及排练为士兵和农民演出的爱国戏剧，唱歌和集体舞蹈。

一叶扁舟载我走出沼泽地区。离开湖岸，我最后一次看到国华，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在湖边洗衣，他向我招呼和摆手，定定地站在那里守望着消失在霏霏烟雾中的扁舟。

五十一、挺进纵队和盐矿工人

武汉西北面的湖泊纵横交错，汉水每年泛滥。许多人一年中几个月在小船上捕鱼为业，过着湖上的生活。我们在这个沉闷的湖区既是搜索者又是被搜索者。我在那个湖波梦境般的世界里同挺进游击支队第四团的战士们一起过了几个星期的游击生活。游击队员们除了他们自己的活动外，还召集广大群众的地下组织“十人团”，勇猛机智的搜捕敌人。

第四大队是挺进游击支队的六个大队的一个。挺进游击支队是几千里外新四军的一个独立支队。它所以这样命名，也许是因为新四军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有合法地位，而它没有。第五战区有三四个游击支队有合法地位，但这个游击支队继续活动，因为国民党军队到这时还不敢冒消灭不了人而自己有被消灭的危险。我在张自忠将军的司令部里的闲谈中记下了这点，但是一进入这个红白争夺的地区，日寇的威胁有时不过是枝节问题，而阋墙之争的内部纠纷则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这个游击支队的每个队各有独特性质。四大队基本上由过去的苏维埃赤卫队农民和工人组成，整个地区是前红二方面军军长、现任八路军司令员贺龙将军的洪湖地区游击区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这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反抗国民党的群众组织尽管遭到镇压，但并没有被摧毁，共产党总是把洪湖地区看做是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同样视为它的禁脔。双方都知道对方采取的一切行动。

一九三八年日寇深入武汉，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的时候，

国民党顽固地拒绝动员民众，不许这个老苏区的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自卫、打游击保家卫国。共产党人力争有了人民的武装，日寇即不可能巩固武汉周围的防地，而国民党深知有了人民的武装对它的生存将成为心腹大患。攻击共产党人动员武装民众是“不老实”包藏祸心的。

国民党军队在武汉周围败退而走的途中，疲于奔命的伤病员一路丢弃武器枪支，过去为苏维埃而斗争的老乡们起来收缴枪支把它们埋在地下，土匪趁机抢劫、横行乡里、占山称王，同日寇一样的可怕。

国民党地方当局在日寇扫荡浪潮中纷纷散逃得无影无踪，共产党的组织者潜入这个地区半夜三更敲老百姓的门，家家的门他们一清二楚！为首的一个共产党组织领导者是一个瘦个子永不休息的人名叫陶铸。他蓬头乱发，一脸胡子，样子看起来不象一个中国人。他和一个姓蔡的青年人搞地下工作。这个青年是一个盐矿资本家的儿子，他家的盐矿在应城县附近。他出身于资本家。但在北平上过学，具有新思想。应城沦陷时县商会的大老板们组织维持会成立日伪政府。姓蔡的青年毁家纾难、号召他家盐矿工人和别家盐矿工人抗日救亡。几百盐工跟他上山打游击，最后他担任共产党领导的挺进赤卫游击队第五大队长。我不时看到他穿一身缴获到手的日本军服走来走去，同游击队员们同生活共命运战斗在一起。

挺进游击队五大队经常同四大队联合行动，对伪军和日军据点进行突袭。在这样的时候，我有了同盐矿工人谈话的机会。他们同世上的工人没有两样，记得一次我把手臂按在一个少年的肩头上，我以为他是一个“小鬼。”“小鬼”抬起头来

时我看到的可是一个满面皱纹忧愁面孔的成年人。他跟我讲了盐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应城周围的盐矿坑道很低很低，只有儿童能够进行坑道作业，孩子们劳动干活时也直不起腰杆。七岁八岁就到盐井挖盐一辈子。坑道炎热，吃住在井下，有时一住几个星期不见天日，天明天黑都不知道，老板给他们管饭吃，工资二十文钱一天。拼命干活，谁要睡觉，爬在坑道里的工头就用鞭子抽打。

盐矿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使得他们的身心发育很不健全。他们跟着蔡团长抗日，因为是盐矿老板给他们吃穿，挖盐是干活，抗日也是干活，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干活。武汉沦陷后开头几个月里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如果不发就拒绝作战。小蔡老板向他们解释他的全部财产都充作支持他们和其他游击队的军费了，提高工资是没有办法的。矿工们不懂什么毁家纾难、抗战救亡的道理，他们认为哪里能多挣钱就向哪里奔。头几个月，矿工游击队的思想一片混乱，情绪低落，失望悲观，不是去投日寇就是去当伪军，后来又跑回来同小蔡老板商谈条件。他们大多数留下来同游击队员们一起打游击。我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抗日的台柱，新的游击队需要骨干，游击队就派他们去加强组织。我到这个游击区不久亲眼见到挺进游击支队六大队的成立，六大队人员的出身与矿工出身的四大队一样古怪。抗战前应城县保安团有一千五百人，他们在武汉失守后对敌伪政府表示效忠，但从不甘心充当伪军。团长当过盐井的工头，向游击队报告日寇给他下的一切命令，他们走了一年半时间钢丝索似的迂回弯路，最后全副武装发生兵变起义过来编成六大队。

游击队员们一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欢迎新六大队成立，会上领导人都讲了话，我在会上对起义的战士们也讲了话，讲为什么外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反对日本侵略的道理。新任命的干部里面有几个特别机灵长得漂亮的面孔，我有一个印象：他们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挺进游击队的首长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们提出保证，他们直属支队指挥，但不要求非做共产党员不可，这一点我想未免过甚其词了。

就在这个六大队成立的大会上，一个农民信使给挺进游击队带来一封信，队长打开一看原来是日本军官劝支队兵变向日军投降的来信。大会上念了这封信。

“余为日本国上校，中日两国战争相见余甚致歉。余东亚人也，君等亦东亚人也，吾侪同种相亲，今何动武。吾大日本帝国方兴未艾正建设一个日本、满洲、中国携手并进之幸福世界……。

“君等开眼其看世界。俄法英美方有后顾之忧，岂能念及中国乎？尔等何为不明及此？试看中国军队之投诚皇军者安福尊荣，与皇军携手重建东亚……。

“尔部代表前来，余可在平林石等候，并不加害也……。”

下面有皇军上校大宁潘子的图章和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期。

游击队的指挥员们轻蔑地哈哈大笑起来，并且在会上宣布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自己选定的时间地点同日本上校的皇军在战场上相见。白天还是晚上，他当然无从知道。回来时到指定地点他们会带回武器弹药的。

大会后，我请两个身穿便衣的游击队员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汉口给我的朋友们和国际红十字会捎信，向他们汇报游击区急需医药物资并望中国医生护士能来工作。信使安全地把信送到了。两个外国朋友脚步沉重地走在汉口大街上，极力敦请国际红十字会答应我提出的要求。但没有结果。他们胆小如鼠，生怕日本人知道会受连累，一味拒绝，不给医药物品。我的朋友只好筹集了一笔钱买了一些奎宁、消毒剂和纱布。但是没有流行霍乱疫苗。

我的朋友们还给我个人送了一些礼物，里面有一箱如《时代》、《生活》等美国杂志，空隙地方塞满了美国纸匣火柴。中国的火柴的确可怜，把蓝头末端小白点的美国火柴送给游击队员用，他们惊奇不已，直喊哎哟哎哟好家伙。

我的朋友惟恐日本人抓住我的信使，特为对这些贵重的礼物进行保护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湖北省当阳县圣主日教会毕慈·罗丝小姐收^①。

我坐在乔湖的小船上读着来信不禁乐了起来，信封上的地址只有我明白幽默的寓意何在，信里面的谎言令人拍案叫绝。武汉的美国朋友们也多少学会了秘密通讯的策略，实属难得。这是我将近一年与世隔绝个人收到的第一封来信，在我的心头燃起了一星火花。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来者真不寻常，游击队许多小划子，船上架着机枪，一下子围拢上来靠在一起，争相传看《生活》杂志上的图片。

游击队员们要我解释广告图片是什么意思，我浏览了几页

^① 毕慈·罗丝是史沫特莱的化名。——译注

“圣诞橱窗”的广告，什么一件皮大衣贱价一千五百美金以上！汽车、房屋、项练、银器、睡衣等等，价格惊人，“迷魂香”一百美金一瓶。生活杂志里看来满是身穿浴衣的妇女照片，那些裸体香艳的女人照片使得游击队员们目瞪口呆，咋舌摇头，我不知如何向他们讲解是好。

我在武汉的朋友们尽力所及筹募了六百块钱，为洪湖地区几百万人民买了点医疗药品。而这个地区的人民深受疟疾、赤痢、伤寒等病魔的痛苦，而流行性霍乱每年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丧命。坐在小船上，湖宽天低看美国杂志，想中美之间的悬殊差别，真使我忍受不了。

仔细看杂志的内容想知道出版了什么新书，纽约市上演哪些戏剧影片，医药界有什么新药问世。然后带着欢乐的预感浏览《纽约人》杂志的“城市谈话”和“哼哼唱唱”栏，那些聪明机智趣味横生的编者按语，在我看来浅薄无聊乏味之至。也许是我的幽默感早已变了么？

五十二、卖国贼与爱国者

十人团的团员和游击队员有时从汉水敌人的船上搞到许多供应物品。游击队员们在汉水岸边架起机关枪，开枪命令敌船靠岸。如果敌人不听，敌船经常被打沉河底。

我有一回见到人们收了八船敌货。有几百斤红糖、五加仑桶装的美国家油、煤油，成箱成包地布匹以及许许多多文具纸张、笔记本、墨水、廉价水笔，还有几百套法兰绒衬衣、衬裤和许多面日本国旗。那些国旗在日本的市场上是难以推销的商

品。最好的可用作窗帘和台布，次些的成捆堆积无人问津。收到的敌货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成箱成箱的印有“钦赐”字样的金纸黄色味醇的日本高级香烟，显然是日本天皇赏给侵华部队的劳军品。同俄国香烟一样一头有过滤烟嘴。我们抽了好几星期。朋友见面打趣地说，天皇鬼子的赏赐，请抽皇军高级香烟！

每周都抓来一些汉奸。二月中旬，我同二十名伪军士兵谈话，他们是王博卿伪军在同游击队一次战斗中被俘的。抓来的伪军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是被迫加入伪军的。一个伪军说，日寇占据武汉后到黄北村一带骚扰，把村子烧光。他逃到外面听苦力们说要招工修铁路，于是他和五个朋友去招工站应募。走到汉水上游的雀儿山，人家说他们就是王博卿的兵了。政治是什么问题他们不懂，不过王司令跟他们作过一次报告，说他们的上峰汪精卫的确是蒋介石委员长派出去同日本议和的。汪精卫在南京的道理就是这个。他的司令部里有重庆中央派来的代表当顾问。等等等等，如此这般，究竟是真是假，他们说无法知道。

游击队员们对抓来的这类伪军从来不加惩办。相反，给他们一点训练，即要他们加入游击队。至于伪军头目多是读书人，则受到苛刻对待，有的甚至被处死。

我经常参加对汉奸侦察审讯的军事审讯。审判长年青，左颊有一道日本剑伤留下的长伤疤。抗战前他受过五年正规学校教育，但他的主要知识是在部队里学的，他在敌后作战，短时间里学到的东西够他平常几十年难以学到。他对普通法律知识一无所知，然而他对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会摇身一变

成为汉奸的政治骗子却爱憎分明，一清二楚。

有一天我看见法庭里带进了两个犯人。一个三十来岁的矮个子，面色精黄，垂头丧气，是个大烟鬼。他在初审时承认在日寇占领的冯水集镇开了一个鸦片烟馆。他的兄弟照看烟馆时，他就四乡走动为日本主子搜集有关游击队的军事情报。按个付酬，一个情报五块钱。因为他收入低，所以他百般狡辩说他是一个受压迫者，只是一个“小汉奸”而已。

另一个在押犯是一个敌伪县长。四十来岁的矮子，络腮山羊黑胡，形容猥琐，象是抗战军兴以来没有洗过澡似的邋邋。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说话一脸假笑，逢人作揖打躬，十足奴才相，这是他在冯水集讨好日本主子学的一套礼貌。他自称在他官运亨通以前是一个走江湖的草药郎中，是一个家徒四壁的受苦人，他夸夸其谈大讲特讲他万病一针圣手医生的高明本事，用春药、草药、虎骨、棺材钉、蛇皮能治百病。甚至眉飞色舞，恬不知耻，毛遂自荐他可以在游击队里当医生为战士群众服务。

游击队员们对于医药针灸一窍不通，但对汉奸卖国贼却恨之入骨。知道惩办他们的办法。他们告诉他要想活命就派人给妻子兄弟送一封信去把当汉奸头目以来胡作非为搞到的全部不义之财交出，可以重新考虑不枪毙他。他讨价还价愿交出赃款，开始说一千元最后加到一万块。他说他发家致富两手清白，并没有从“大日本皇军劳军妓院”那里拿到一文钱，即使放高利贷款或发“良民证”挣了点辛苦钱也问心无愧。高利生意是济人所急，良民证章是强迫要带的。游击队员说，赎命钱来了会并加考虑的。

不久他十分沮丧地作出决定同意派一个人到他家里去取全部赃款，我同法官辩论说，他可能是欺骗，游击队切莫上当。法官则认为事关他的生死，不见得敢耍花招。我盯着那个油腔滑调的家伙，提醒法官道：“枪毙他也许他老婆会欢天喜地。”法官微微一笑，直接了当地说：“我们也欢天喜地。”

最后传唤证人。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主要证人就是日本人称为“甘大土匪”、“十人团”的刚强团长，遐迩皆知的老甘同志。他手上缚着绷带。四个证人相貌平常，同普通老百姓一样，但我一眼看出这个老甘是一个很平常的人物，游击队尊称他为老甘，真名已经失传。他身穿老百姓便衣，走路步伐活象一个军人，瘦长脸，很机灵，举止沉着。他是一个爱国者，对敌人决不心慈手软。出身于中农家庭。念过几年小学，年青时同许多农民集体参加过哥老会汉刘班会，据说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结社团体红帮之一。这种团体逐渐退化为崇拜迷信，讲究仪式，同美国流行的秘密团体不一样，他们换贴拜把。烧香磕头结为骨肉兄弟。社团首领有夸张的名字。红二方面军军长贺龙统治这个洪湖地区时，他有“双龙头”的称号。

老甘同志在十年内战期间同其他汉刘班的弟兄均参加了共产党。红军转移后，他被捕坐牢判刑七年。监狱并没有摧毁他的身心意志、主义信仰。抗战爆发后政治犯得到释放。他出狱后在武汉飞机场当卫兵。日寇占领武汉后，他回到家乡在经常出没的汉水一带访贫问苦，动员组织他一班同志抵抗日寇。

日寇最初占领武汉周围广大地区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小汉奸跟着胡作非为令人侧目。然而，一旦有些敌伪头目不是神秘失踪，就是古怪横死，一把尖刀插在胸口上。其他汉奸

震动，有所收敛。“甘大土匪”的名字远近传播，活动在敌寇占领城镇内部的十人团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对敌人是一支威慑力量。

我看着老甘缚着绷带的手，就问他是怎么受伤的？他告诉我，几星期前他在汉水一带侦察活动，发现一艘敌人摩托艇停在湖边的树下。他匍匐潜行爬到艇上见到舱内一个日本军官和两个妇女。他扣动手枪扳机，但卡了壳，于是他跳进舱里扭住鬼子军官，互相厮打，翻身落水，俩人在泥里拳打脚踢，终于他把敌人打翻并骑在敌人身上用足踩，但手被敌人砍了一刀受了伤。然后他又跳上摩托艇，捆起两个妇女，在船上搜查一遍把人和物资交给游击队连队处理。几小时功夫干完这件事，又去执行其他的任务。现在我耳闻目睹亲眼见到这个老甘和其他三个证人出席游击队军事法庭作证。

“这个自称为王老百姓的人，”老甘开门见山的作证说：“是跟敌寇特务队有勾结的暗探。他经常走东乡到西乡，搜集游击队和十人团的各种他认为有用的情报。我们的人对他怀疑监视了很久。我跟他一起抽过烟谈过话，又尾随到他冯水集镇的家。他家的房子就在鬼子兵营附近，前面是中草药铺子，后面是鸦片烟馆子。我找了三个同志帮忙，大家身藏利器，因为我的手枪总是卡壳，我们认为……”。

“你的手枪总是卡壳，是怎么回事？”法官插话问。

“地上埋了一年啦。有时响有时不响。”老甘回答。审讯停了一会，法官把老甘的手枪仔细检查过后掏出自己的一把小巧的日本小手枪送给老甘作防身武器，表扬他的英雄事迹，并说那把手枪他会收拾好的。老甘赞赏那把日本手枪一阵，接

着又回到证言问题上：“言归正传，这三位同志那天晚上同我一起上这个老百姓的家里，我们佩戴‘良民证’徽章，我还持有从鬼子摩托艇上搞到的特务队公函，我找这个王老百姓说，我们掌握有充分证据他到村外同游击队接头出卖皇军情报给游击队。他矢口否认并称他可以请伪县长大人出面作证，他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不敢怀有贰心的。说得好听，空口无凭！我们把他带到庭上这个在押犯狗崽子的家里，这个瘟神说他可以保证王先生在特务队里很有名声，是响当当的亲日派。人证俱在，我们拔出刀子指着这两个东西说，谁敢声张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立地见阎王。于是我们押着他们出了冯水集把他们交给你们连队处理。完啦！”

法官问两个在押汉奸还有什么申辩没有？伪县长象日本人一样，深深有礼地向法官鞠躬，慢条斯理地申辩他出任伪县长是迫不得已，并非甘心情愿充当汉奸。老甘一针见血打断他的谎言：“什么迫不得已！死心踏地顽固到底！”

王老百姓又狡辩说他有一大家口人要养活才当了一名小汉奸。一个证人嗤之以鼻。法官掉头问我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罪犯提出。我问王某的烟土草药是哪弄来的？法官奇怪地说：“不消问当然是从鬼子那里弄来的！”接着他想了一下让那个汉奸回答。王某一再重叙法官的话，并又补充他的老调子：“谁使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该由日本鬼子负责！”

法官目不转睛久久地盯着他。然后对他宣判：“凡当敌特汉奸，买卖烟土春药者处以死刑。”汉奸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表白自己穷，且有一大家口人。老甘转身对着那个家伙，这时我以为他会用到手的日本小手枪打碎他的脑袋。然而他只哼了

一声说：“我们都是穷人，都有一大家口人，穷可要穷得有志气，我们穷人决不出卖灵魂，背叛祖国！”

过了几天我站在村外目睹两个被判处死刑的汉奸就地枪决。村里的老百姓不许看枪毙犯人。只有一小队游击队员集合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高呼：“枪毙一切汉奸！”

老甘同志又执行新的任务走了。他行前我诊断检查了他的手，日本军刀伤了他手神经脉管，残废了。

“还好是伤了左手！”老甘诙谐风趣地说道：“还有一只完好的右手，而且又得到了一支日本造新手枪。”

有人绝处逢生交了好运，他就是一个。

五十三、再见吧，游击队战士！

冬去春来，敌后的形势险恶象系在一根丝线上，寒光逼人的利剑悬在人们的头上。张自忠将军给我捎信说他即率所部三十三集团军转移汉水以西休整和补充，我可以到他那里去。国民党军队的冬季攻势越来越减弱如强弩之末，而日寇正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春季扫荡。在我们西面一带高山峻岭绵绵不断传来隆隆大炮声，在武汉四周进入山区的汽车公路上人马喧腾，尘土飞扬。载着军用物资和部队的鬼子车辆川流不息的出动，我们知道日寇的意图所在。中国的大地，江汉的高山和平原又一次会被志士们的鲜血所染红，我们有机会与日寇周旋捉迷藏，现在倚马可待，虽辛苦些但确难得。

敌后农村的乡区镇下级官员的初选已经过去，十人团的会员、乡村教师、铁匠、农民甚至一位妇女等军事干部当选负责，

代替了那些只作官不管百姓死活的老地头蛇。人们说上任的新官会烧三把火的。他们是“真正的人”，不抽烟，不赌博，不动摇，老老实实为老百姓办事。十人团冬季会议已经结束，会上决定动员群众人人投入迫在眉睫的反扫荡斗争。训练新战士，打击镇压敌特活动，坚持游击战争。

冬季训练结束后，人人向敌伪工作人员开火，一天我见到一个伪县长被押到游击队军事法庭上，审讯十分钟判以死刑，拉走十分钟内就枪毙了。砍头示众，使人恐怖，但对敌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随军活动的这支游击队支队在一星期内打过三次仗。晚上我们和衣睡觉，几乎一到半夜三更就有人敲门送信，我们慌忙火急打好背包卷，五分钟内就在湖上的小舟上了。我又请了一个信使到武汉捎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申请医药物品，明知一无所获，但我尽力而为。失望的情绪使我难以揣摩国际红十字会管事者们的意图。由于乍寒乍冷大伤我的体力，加上营养缺乏，全身出现浮肿，足趾发疼，牙齿动摇，视力减弱，有时出一身沙痒、斑疹，肠胃病使我痛苦不堪言状。病魔缠身使我在中国难以坚持战斗下去，至为遗憾。而全中国的老百姓正在英勇奋斗，不抗战到底，就亡国灭种，因此尽最大努力把个人情绪压在心底。

三月中旬，我在倾盆大雨中过湖访问年高德劭的老县长商毅，这是我在敌后随新四军战地采访活动的最后一次采访。这位老者成立一支非常坚强的地方武装，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与日寇奋战三年了，他的家在田二河镇，荒凉凄惨，日寇多次对这个镇子扫荡洗劫过，我在田二河镇找到了这位老者。

老县长和他的“县”政府人员过着戎马倥偬劳苦勤奋的生活。国民党政府的县政府的车轮还在转动，与他坚持守土抗战和誓死殉职报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给我看了一封日寇劝降书，这是日本军官丸山写给这个老县长的一封信，措辞巧妙的信，赞扬老者经世卓识，学贯古今，皇军佩服五体投地，有请大驾出山，即离田二河镇能“走马上任”屈长汉川县府，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东亚和平繁荣云云。老县长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回了一首旧诗，斥责日寇鄙视日寇算不了什么东西。他请我把他花了几小时写给蒋介石委员长的报告带到重庆投邮，因为我即将动身到华西去，希望在敌人春季扫荡攻势开始以前，走过大洪山。

这次西行，是我所有走过的路程中最艰苦的一次旅程。整整十天，我们走过了湖泊地区，我们走过了七上八下的山岭地带，我们走过洪湖的白天，我们走过了洪湖的晚上，有时躲过敌机的空袭，敌机临空就地躲藏，有时换坐过湖的小船。晚上我和乐方还有五个游击队战士，卷缩挤在小船里让舟子轻轻摇过静静的沉湖。

一个傍晚，我们接近一个湖港交错的北岸小沙洲边，等候天黑划过一英里外的市镇，穿过村子到山边去。上岸侦察的船工几小时后回来报告日寇刚刚开进市镇，北岸一带所有市镇均已落敌手，仅有一处可以通过，上大路前必须经过敌人两个哨所。

我们的游击队战士架起了机关枪，我们的船儿静静的偷偷的朝北岸那个敌人还没有到的市镇荡去。在黑暗中水手们拼命摇橹荡桨，我们注意汉奸的动静，望着市镇，这时我听到周围

有咳嗽声，说时迟那时快掉头看小洲升起一颗信号弹，房屋天空一下呈现在眼前。这是汉奸敌特向鬼子报警的信号。

我们的水手们弯腰使劲荡桨，其余的人屏住呼吸象大理石像定坐在舱内，毛发悚然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只有湖上遥远的地方传来邦！邦！邦！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不闻其他响动。船终于偷偷划到湖滨北岸的小弯里。大家急忙上岸站在几棵树下静候侦察员先行探路。他们回转报告了情况，随即一同沿着两边水稻田的田间小路向公路疾走。

我们横过了敌人巡逻的公路，在一个村子外的高墙下倚墙休息。周围烟雾迷漫，我抬头望着墙头，细声对乐方耳语道，我要是敌人就利用村子埋伏在墙头打伏击，乐方悄悄地说：“不要激动，不要惊慌！”

等不到反驳他的话，传来了一道尖声快走的命令！乐方同我拔腿就跑，我们手牵着手以防摔倒。拼命逃过公路的一个桥洞，继续没命飞奔，直到一个游击队员喊了一声“瞧鬼子在那里！”我们全体人员突然停止，呆如木鸡似地站立不动。

回顾公路下面刚才如箭离弦没命飞奔的地点，我们见到手电筒光在公路上闪动，接着又向桥洞探射。凭借于电灯亮光我们清楚地看到鬼子，刀光枪影的鬼子在行动。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鬼子所在的村子同我们倚墙休息的地方仅一墙之隔！也许，敌人没摸清我们的人数才不敢冒昧出击。

游击队员们转身回去准备打仗。我们知道鬼子会退守墙后以待各处的增援。经过一阵激烈辩论后我们继续赶路。

几天后，我们离开了挺进游击队支队队部，再次走过大洪山区。必须通过一个长长的狭谷，而这个地方不久前被国民党

军队游击司令曹学的队伍盘据。他们号称正规游击队，事实上全是改头换面的土匪。曹学与臭名远扬的兰衣社有联系，思想作风以法西斯霸王臭名远扬。他最近向老百姓大肆宣传军政部长何应钦给他的游击队和二十九集团军下的剿灭共军游击队的手令。中国的政治风云千变万化，明争暗斗了无止境，兄弟相煎，何日得了？

一当我们走进封锁严密的山谷时，使我感到如进鬼门关，阴森可怖。山坡上有人在向我们宣战，前面一道工事，成排的人头和枪口对准我们。有人问我们的姓名和任务。我取下军帽，露出金发碧眼向前看。对方叫我站住，一个土匪模样的军官过来拿了我的护照和军事通行证不见了。时间过了几小时，他来了，把我和乐方带进一个村子里见他们的头头。我和他争论通过山谷的过路权利，头头答应“可以过去，但是必须记住只准到曹学司令部去。”他话中带刺补充了一句。

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曹学的司令部就设在这个村子里。我在大洪山下对曹学作过访问，有一面之交，当时他的表情十分愉快，现在看来他思想上已经下定决心要挑起骨肉相残的内战了。他暴跳如雷地大声指责挺进游击支队鼓动敌后民主选举，组织群众成立十人团，这一切等等不分青红皂白破口大骂都是共产党的一套。我问他民主选举错了，错在哪里？他说民选才是民主选举，共产党搞的民选都是凭借暴力操纵民选。我说暴力操纵选民的事我没有见过。可是他顽固坚持己见，别人的话他根本听不下去。

他继续唠叨下去，我生怕那天晚上他会对我们下毒手，最后我跟他说，请他保护我们一行安全通过山谷，直率地说出他

的游击队官兵许多是绿林出身的土匪强盗。他出乎意外地接受我的指责，并且说他正在重新训练他的部下。同意派出一名向导为我们带路走过山谷他的地盘尽头处。他最后的话语是：“这是最后一次放行让路通过了！”

我们走过山谷时多次想到能否过谷还很不保险。黑夜漆黑不见五指，森林树木暗森森的使人胆战心惊。我们摔跌滚爬瞎摸乱走，有时同伴失散，相互击掌呼喊，狼狈不堪，时间没有尽头，山路没有止境。好不容易接近一个小村子边，这儿是曹学管辖区的边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躺在村边的空场地上休息。这时向导朝村子走去，砰砰砰敲打各家门户，大喊大叫官军游击队来人的姓名。好象村子已经死绝，不闻一点声音，不见一星亮光。

末了，我们的队长给向导几包香烟打发他回去。对他说明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穿过山区到华西去。我们静静地坐着，听向导走过羊肠小道的山路上碎石滚滚落下山坡的声响，很远很远直到听不见落石的声音为止。这时队长跳起身走到村子里一户人家的门口，轻轻地敲门喊道：“同志们，请开门，我们是过山的挺进游击队，我们需要一个向导。”

屋内现出一道微弱的亮光，不一会儿，风雨凋零的大门向后拉开，一个农妇手持一支蜡烛出现在门口，她身后藏着一个黄皮寡瘦的男子汉的脸。再一会儿，视线所及各家各户的门开了，男男女女，少年儿童蜂拥而出，问短问长。自由交谈没完没了。有的老乡背着稻草捆子到房子里为我们搭铺。有的老乡在灶底下用吹火筒吹火，淘米作饭，我们的游击队员们同老乡们拉拉扯扯，说说笑笑忙来忙去，亲如兄弟。

第十篇 重 庆 以 后

(1940—1941)

五十四、重 庆

日寇渡过汉水，进入鄂西平原，如秋风扫落叶击溃国民党军队的消息，接连传到宜昌。起初我们听到沙市失守，又听到并未沦陷的消息。国民党人靠空谈幻想过日子，要承认新的土地丢失是很不容易的。年年春天和秋天，日寇出动强大防守部队四处扫荡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从未越过汉水一步。我们认为宜昌西面的天险屏障，高山峭壁，可以抵挡日寇铁蹄的深入。但是，敌人的飞机为其部队和坦克先行开路，于是宜昌受到狂轰滥炸。

尽管国民党官方声明说日寇的攻势已被击退，但从宜昌向上开的每一条轮船、民船上都挤满了疏散的人和伤兵，条条山路上尽是成群结队逃难的老百姓。

我在宜昌快失守前坐江轮离开了宜昌。宜昌是六

月十一日失守的。路逢一个红十字会医生。他随机关带着医疗物资逃出了沙市，谈起华中前线一百五十个陆军医院的情况，仅有五个医院收留病人。“伤兵的情况怎么样？”他不回答我也了解。“全军作鸟兽散向四川败逃；王已经被上司枪毙。”我还记得牛皮大王王瓚绪矮子言天说地大吹特吹他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会把日本鬼子打回武汉去的话。五月里日寇扫荡开始，他又画蛇添足，自吹自擂地说他要到敌人的后方去消灭挺进游击支队。

从宜昌过三峡溯江而上，警报频传，空袭不断。冬去春来，江上的浓雾已经消失，江水滔滔，白云悠悠。山高路遥，日寇一年一度的闪电轰炸已经开始了。两岸的城镇乡村被炸成平地。我们乘的江轮上插着的英国国旗当然保护不了我们。甲板上挤满伤兵，每个人神经紧张，谈起国是慷慨激昂愤恨到了极点。

船快靠重庆码头时，我和一个中国官员同一个坚持己见为慕尼黑协定和张伯伦首相极力辩护的英国青年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个英国青年同所有远东的英国人一样无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的老头子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一声闷雷爆破的轰炸声使我们猛吃一惊，争论突然终止。这是人们在重庆悬崖峭壁上挖了许许多多的山洞，有的防空洞装备有通风设备和照明系统，能够收容几千人。空袭警报响了，山城死气沉沉！不见人影，只有巡逻兵。这里那里听到稀稀落落的枪声，巡哨见到给敌机打信号枪的汉奸砰砰开枪，就地处决。晚上敌机临空，我们总是听到巡逻兵见光就打的枪声，即使敌机去了，解除警报发出以前中国飞机仍在山城低空轰鸣扫射任何灯火的机关枪声仍时有所闻。江上浮尸日有所见，船工们用竹篙挑开

船首的尸体让它漂流顺江而下。

敌机每次空袭有三十到五十架轰炸机成三架组或四架组队形。我们有时站在南岸带着侥幸安全的幻想感注视着江北岸的轰炸。六月里我初到重庆时还见过国民党飞机起飞二十四架战斗机之多，迎战日本轰炸机，以后的日子里进行空战的飞机越来越少了。一次我见到一架孤单的战斗机尾随着沿江飞临的敌机群飞。这时我真想写一首一身是胆的小神鹰展翅扑击群母鸡的诗。

有时候烧夷弹落在扬子江心，升起白色浓雾遮住我们隔岸观看山城北岸的大火。只见到噼里啪啦腾空升起的烟雾火光声，空袭警报解除后，人们从防空洞里潮水般地涌出救火。满天通红的熊熊大火扑灭后，全城又听到捶打拉锯重建房屋店铺的忙乱声。

重庆的生活还是照常继续下去。中国工合举办了国内工业展览会，展出各地产品。我在北岸山城展览会俱乐部发表讲演，抽彩出售战利品，买医药品。英国大使夫人在一家戏院为蒋夫人的战时孤儿筹款义演白雪公主。外国人士举行警报宴会，南岸每个外国人的家里住满了遭受空袭房屋被炸因而无家可归的人。日本人对全体外国使节发出警告必须迁入南岸“中立区”，英国驻华大使置之不理。我们有些人下午有时上他家里吃茶点。在日寇闪电空袭狂轰滥炸的高潮中，老百姓欢庆端午佳节。大江小河里龙舟竞赛的健儿们锣鼓喧天，欢呼雷动。

日机在“中立区”投弹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来的，然而中立区里人们并不相信。在一次空袭中，我和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达维·巴瑞特上校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巴瑞特深知美国对日政策的

危险，他慢腾腾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的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们已经得到恶报了。”

“日本反帝同盟”于六月一个晚上演出了一幕话剧，我看了演出。他们是一些年青的日本俘虏兵，二十多人在日本革命作家鹿地旦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和日本战俘写作剧本，出版刊物，上演话剧。公演第二天，戏院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的警告，罪名是革命！因为话剧里面指出战争对日本穷人产生了影响，太革命化了。

自一九三八年我离开武汉现在到重庆。所谓“自由中国”也发生了巨变。国民党政府把华西转变成为抗日的强大基地的同时，许多举足轻重的团体应运而生，也使得不可胜数的反动势力得到发展。实验社以及各种团体的蓬勃滋长，各社团组织各界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争取社会进步和经济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使得政府官员、资本家和大地主吓得要死恨得要命。虽然在医务工作方面确是有过一些进展，如陆军医务管理局局长卢智德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全国卫生管理署署长金宝善博士建立了遍及“自由中国”的免费医疗临床讲授班训练网，打下了社会化的医疗基础。战时紧急医务学校校长林可胜博士，现在华东前线和西北前线设立了一所附属医校，重新培训了五千名医务官和护士。各医务学校培训出来的流动防疫小组在各战区为部队和老百姓注射疫苗，修浚水井，净化饮水供应等等。然而我一到重庆听到的首要新闻则是戴笠的权势通天，人们谈狗色变。据说他手下有十五万宪兵特务和十五万便衣打手。他给国民党打的许多报告里面有一个报告指责工合的领袖人物是“共产国际代理人”，把温和的自由主义民主人士连同真正的

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等量齐观想一网打尽。结果工合许多领袖人物不是被驱逐出境，便是被逮捕坐牢。

在一个小型宴会上我听到一个外国人士和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红十字会指导部秘书长潘琪给戴笠打的黑报告。

教育机关成为政治迫害的中心场所，仿照纳粹集中营形式成立了两个集中营，一个设在成都，较小；一个在西安。西北胡宗南的五十万军队继续包围八路军，专搞摩擦，消极抗战，爱德华·巴格尔率领的英国车队只准给国民党军队不许给八路军运送救济物品。驻防长江下游的五十军军长郭嵩岐将军拒绝服从同新四军的作战命令已被解职。前线各地围剿八路军新四军的零星事件不断发生，全国处于内战的边缘，大有山雨欲来一触即发之势。

时局紧张，整个重庆的气氛使我想起了日本侵华前的白色恐怖和政治迫害。作家、编辑、各公法团体进步人士纷纷逃往香港，或者准备跑解放区。我对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一次拜访时，使我看出形势极其严重。沈钧儒是一个年高德劭，性情温和，个儿矮小的老律师。他不在家。家里人告诉我沈老同生活周刊主编兼发行人邹韬奋刚刚出门向军政部长提抗议去了，因为才接到军政部长无端陷害老律师和邹主编阴谋制造重庆武装暴动的澜言！我很快了解到这是国民党政府内部亲日派蓄意挑起内战、制造重庆武装暴动、嫁祸于人解散同盟的阴谋，如果得逞，局势恶化，后果将不可收拾。

我又听到一些谣言，说基督将军冯玉祥和一批具有自由观点的国民党政府高级人士被称为“共产党外围保守阵线”分子。我还听到两个外籍妇女说戴笠系统的代表接近她们，要她们加

入特务组织探听外国记者的政治上的主张意见。一个同意了，一个拒绝了，拒绝当特务的被指为“同军人睡觉的”特务，她轻蔑地摆脱了特务的纠缠，因为她有治外法权的保护不受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的一套。

我又接二连三听到贵州省省会贵阳政治迫害的一些报告。那里的青年会和省市妇女团体被指控为共产党幕后操纵的组织。在青年会开会讨论什么是民主的一次集会上，有两个国民党党阀大摇大摆进入会场，并且命令人们立即回家，声称任何性质的集会没有取得省党部的许可，没有国民党党员列席一律不得召开。这两个国民党官员转身出席国民党召开的贵阳市妇女代表选举大会，给不识字的妇女代表每人发一块钱，选举他们指定的代表。这个事件传到重庆高级官员中间称之为政治诈骗案件云云。

只要日本人对国民党政府提出新的和平谈判条件，国民党内亲日投降派分子就大肆活动，掀起反共反抗战的政治反动的风浪。照例，德国人是提出和谈条件的通道，香港的亲日派和一小撮汪精卫的追随者，其中有一个重庆交通部的高级官员总是参与其事，兴风作浪，鼓吹向日寇妥协求和，认贼作父，借敌人的屠刀，消灭共产党。德国人心怀鬼胎，另有打算。德国驻华使馆特邀国民党某些官员看德国战争影片，我听到这些被人特请深以为荣的国民党政府的党国要人对压倒欧洲的战云机器，啧啧称道，佩服得五体投地。巴黎于六月陷落，赞扬纳粹的歌声响彻云霄。中国人记得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安南的腐败无能，残酷奴役剥夺越南人民的情况。国际红十字会一个中国官员告诉我，日本占领安南以前，法帝国主义在安南的殖民

主子们对中国医疗供应物资通过安南还勒索数字惊人的贿赂费用。

英国人在六月里关闭了滇缅公路，加上英美对日的缓靖政策，给中国人种种刺激。中国掀起了强大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对英国人的憎恶痛恨最为强烈，因此亲日派主张妥协求和、有了排外反西方的感情基础。虽然蒋介石的抗日立场还没有表现动摇，但亲日派主和投降分子的确在鼓簧弄舌、加油添醋制造投降舆论。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抗战三年多来，国民党军队被许多友邦人士看不起，说得一文不值。他们常说：中国不能打，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将军腐败不堪，士兵不是文盲苦力，就是黄口小儿；伤兵可恨无人过问。有些指责属实，有的指责不对。不管正确与否，几乎一切指责均由于对中国欠缺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步方艰，在沉重的负担下蹒跚迈步万众不齐心对外所致。

我们美国同胞自称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声称美国给中国提供了医药物品援助。每念及此，使我深有感触。其实，中国的医药物品和救护车辆，主要依靠海外华侨的捐助，我们美国同胞的援助，同海外华侨相比，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中国通过美国援华医物局获得美国唯一援助，局长是一个中国人。陆军医务总署一个华籍高级官员告诉我，美国最近给中国一百万元购买奎宁，可是美国实业界人士要求这笔买卖必须由他们经手。他们在爪哇采购奎宁运到美国重新包装再运到中国，一转手中国人仅收到价值三十万元的奎宁了！

我的态度和中国人的态度在许多地方有相同之处。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老百姓可怜，同印度的贱民一样，不齿

于人类进步社会的行列，被人鄙视，受尽侮辱。他们对人谦逊，备受欺凌。但中国实在为世界民主、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而战。据我所知，有许多外国朋友所见和我的这种看法略同，有的完全一致。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世界上所有彩色路线或种族偏见，对于中国人民不能熟视无睹，但中国现状如何？形势险恶，情况严重。美国公众似乎被荒唐错误、掩盖真相的报道所蒙蔽，无力应付国际和中国的当前险恶局势，外国通讯记者因此也不敢把事实真相向外国发表。“报道真相谈何容易！我并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一位外国记者说。我们只有凭籍思想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国内外形势，的确都感到很头痛。

美国炮艇“土土伊拉”号停泊在重庆南岸江边美国驻华大使馆前面。我们十多个人在日机空袭山城时集结在“土土伊拉”号的病室里对这类问题反复辩论，有时争的面红脖子粗。“自由中国”会讲和，“自由中国”不会讲和！美国应该参战！美国不应该参战！有一个法西斯分子比利时代办和一个因说过比利时国王是卖国贼的比利时人发生决斗。人们说我是理想家、幻想家什么什么家之类。日本轰炸机飞临上空，大家才闭口感到同舟共济大难当头的危险。

一天晚上我应“土土伊拉”号舰长巴尔特莱上校的邀请，到他舰上访问并进晚餐。访问中间空袭警报响了，水兵们各就各位迎接战斗。上校给我一顶钢盔和一件救生背心，让我留在甲板上面，而他自己却只有星空作伴，江风护身。敌机来了，我这时无法躲藏，只好硬逞英雄，站在那里。我问上校炸弹碎片在炮舰附近是否落过？他说落过，一块弹片打穿了炮舰一个

洞，一块弹片打中了一个水兵的钢盔。最关紧要的是，注意观察第一颗炸弹落在哪里，然后注意轰炸机飞出的方向。

“要是落到了我们的头上呢？”我问。“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炸弹落地了。”他答。这夜空袭日机向成都方向飞去，我从来还没有象这次跑警报、躲空袭提心吊胆如笼中老鼠惊恐怕得要命。

我想起了同杰克·贝尔登的一次谈话，我在新四军军部时，英国记者贝尔登也到新四军作过一次短暂采访，他问我害怕空袭不？我承认我怕得要死，他也坦白告诉我他怕得要命。这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害怕空袭之心不是减少而是与日俱增。我们二人都想，如果让我们参加几次战斗，也许会战胜这种恐惧心理。多少中国战士告诉我他们的切身经验：头次上沙场，他们怕得要死，炮弹一响，仗打下去，就毫不害怕了。贝尔登带了一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如果把书中人物地名更换成为中国的人物地名，使人很容易理解就是当前抗日战争的场面，谁能写出这样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文学巨著来？他问我。“只有自始至终亲身参加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才有可能写出。”我答。但我以为贝尔登有朝一日会写出一部非常动人的书来的。他访问过国民党许多部队，也访问过八路军、新四军，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避开官僚行政人员深入部队体验生活。比起我来他可客观冷静得多。他不抱成见，不代表谁，隔岸观火，走马观花，而我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在我看来，中国的强弱盛衰问题似是全世界的问题所在。

五十五、医疗队继续战斗

炎热的六月快完了，恼人的空袭还在继续。日寇想凭借空中优势用闪电战术把重庆化为灰尽，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妥协求和。林可胜博士因公来渝回桂林时带我到红十字会医疗队去。离开重庆道途阻塞，拥挤不堪的大小车辆和老少群众真成问题，一路上只听到空袭警报持续不断，我们坐的是红十字会的一辆汽车，因为这个，守卫在寂静荒凉村边的岗哨让我们通过赶路。只是见到敌机朝我们迎面飞来时，我们才伪装一个停车疏散。林博士老是说因为空袭停车，我们哪里也就去不了。这个小个儿医生在抗战前可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现在已经锤炼成为钢铁式的人物。如果恐惧折磨过他，做亡国奴和屈服的最大恐惧，使他恼怒难以忘怀，他经历了苦难社会挣扎求生的岁月，饱尝了人民祖国奋斗求存的艰辛。

林博士在他的小茅屋里让出一间房间给我住，并给我治病。我采纳了他的建议，离重庆时硬把胆囊作了切除。躺在病床上，我阅读一些他那满架满架小而精的藏书。他忙里偷闲来看我时，我把学习点滴心得向他请教。他除了看材料报告钻研医学著作外，少有时间看书学习。忙于行政事务之外，几年来专心致志于写作一套供战地军医参考的医疗手册。他办公室里的灯光经常很晚很晚才熄灭。医疗队在他的领导下成长壮大，情况喜人。但是心怀恶意嫉贤如仇的野心家们，对他这样一个没有党派偏见富有民主思想的人，极尽中伤之能事。政治阴谋干

扰他的日常工作，为了提防国民党格杀打扑分子的卑鄙暗害手段和对医疗队的破坏捣乱，他费了多少心血和消耗了多少宝贵的时间！

我对林博士的印象极其深刻，也深深佩服他的为人，品学兼优，献身医疗工作的精神和毅力。他是一个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下动脑筋想办法的人，对他的时代关系太复杂了。国民党所有伤兵的命运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他。唯有他的计划，重新培训全军医生的计划得到实现，伤病员的苦痛才可望减免。但是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能够彻底毁灭一个人和他的事业。他的未来将如何我并不关心，因为他个子高大、身体结实、意志坚强，决心奋斗抗战到底。

日本海军飞机每周从南面飞来轰炸贵阳，红十字救护车在敌机飞去前开出队部带回伤者回到山上。我们医疗队的座落所在，|中外周知，早已泄露给敌人了。现在本部附近与一所规模大的医校、医院和整形医疗中心相连。整形医疗中心的装备和财务是英国援助的，但整个医疗队的大半资金仍全靠海外华侨和捐献。

七月二十八日，敌人的海军飞机对红十字会本部和医疗中心进行了一次特别的迂回轰炸。空袭过后，医生们为伤兵动第二次手术，为恢复健康的士兵准备临时住处。林博士动手设计，分散隔离病房，医务工作更加困难。这天晚上，林博士拿了一块炸弹巨片进来，深有感触地瞧着弹片说：“我想了一下，把炸弹片制成特别奖章送给那些把战争物资卖给日本人的美国公司。”

我在治疗我的慢性病期间，动手写蒋夫人的新书《中国又

会复兴》，有关红十字会工作一章，并且开始给贵阳教育团体讲课。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林博士介绍我作为红十字会和贵阳地区陆军医务工作人员会议的主要讲话人。我汇报了战区的情况。大厅里面挤满身穿蓝色制服的战时男女工作人员。场面热烈，激动人心，给我以最大的荣幸。

医疗队现有十六名欧洲医生，均已工作九个月了。因为他们说西班牙语，又都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里服务过，虽然代表的国籍不同，但我们都称呼他们为“西班牙医疗队”。挪威红十字会把他们从法国集中营救出来，资助他们作为志愿军到中国服务工作。

这些西班牙医生和我在中国所见的一般外国人完全不同。政治上尽管各有己见，彼此分歧，但作为反法西斯分子，他们团结一致。同我所知的某些外国医生完全两样的是，他们穿的、吃的、生活同中国人一样。他们看出了中国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的落后，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肩负重任的相当可观大有作为的前景和良好条件。他们在贵阳集合重新整编，医疗队在中流从旧舟换乘新舟。他们将培训每个部队的医务工作人员，向部队讲卫生学和急救法，就地取材，成立防疫站，浚井及其他防疫工作，教育和再教育是他们一致的呼声。

安南的沦陷和滇缅路的封闭使得中国同外面世界隔绝。红十字会开始制造某些消毒剂，国家健康管理局建立了一些小工厂制造药品和器械，但是部队只有越来越依靠预防来对付伤病士兵。

到九月初，治疗情况越清楚了，如果留在中国我的慢性病

难以康复，因此林博士让我坐在一辆开往广西省的红十字会汽车里前往桂林。医疗队即开赴中越边境前线工作，那里正展开激战。我将飞越日本防线到香港去。

汽车沿着盘旋曲折、新修的西南公路驶去。万山丛中，峰峦起伏，陡崖峭壁，峡谷深渊，公路边上没有护墙。我们往往看到翻下山坡的汽车，同粉身碎骨滚到谷底汽车撞在一起。一路上空袭不断，敌机沿途下蛋。面黄肌瘦，困顿不堪的部队向后方开拔，他们大多数患夜盲症，打摆子病，增援部队源源向前方开动，一路走着看不见尽头。还有一队队被绳索捆绑有士兵在后押着的壮丁在公路两旁时走时歇。一路上还见到成百上千辆好车抛在路旁，得不到汽油，完整地摆在那里。所过城镇乡村均被炸毁。一个下午，我们在一个小镇子里停留协助救护治疗空袭过后炸伤的人们。第二天清早，我们又急忙坐车赶路。

我在桂林停留时同在贵阳小住一样，发表讲演，对外广播。广西省和其他省份大不相同，照旧准许言论出版集会自由，还是一个民主空气较为浓厚的省份，国内其他地方被迫害的作家、编辑、文化人，集合在这里坚持斗争。我个人希望到香港把病治好后再回到桂林，而后到中越边境的前线去。

一天晚上，我在桂林广播电台广播完毕后，发现一个在我前面广播讲话的日本人在等着我，想和我谈话，他背后无人看管，生活工作同中国人一样。我们在露天茶园里消磨了一个晚上，我发现他是一个不平常的人，名叫潮见正作，会说汉、英、法三国语言。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前，他任日本驻安南河内领事馆秘书，同时拿日本情报局津贴。在中越边界搞特务活

动中被广西部队抓获。一年来他拒绝认罪，抗拒改造。这时日本革命作家在国民党部队里致力于日本战俘的工作，和他谈话给他看书。最后他翻然悔悟，下定决心，献身投入反法西斯运动，他说：

“我一生的教育训练是作一个外交官。总是以生为日本人有福而自豪。我国政府侵略中国是顺应天理的。我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自以为我们日本人民是唯一未被白种人征服的有色人种，我国的军国主义分子，利用种族情绪鼓动我们相信，我们的战争是为了一切有色人种的解放而战。但是，经过读书学习和深思熟虑之后，我看清楚了我国的军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他们的意图旨在取白种帝国主义分子而代之。经过很长的时期才使我改变我一生的思想教育，采取了我国某些人攻击为叛徒日奸的一步。我认为。日本的统治者和其他各国奴役压迫人民的执政者一样，把普通老百姓在平时作为财富的资源，在战时作为侵略的炮灰玩弄而已。现在我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作日语广播。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为真正的和平和正义而工作战斗，我的心得到了安息。”

他说话很快，有点神经质，颇带感情，内心激动。他一再向我保证说他“幸福”，但我难以相信一个人能够彻底转变世界观和态度，把他生平所学的一套丢掉。我们分手前，他请我无论如何把他的事迹走到哪里逢人告诉。因为日本人否认他的广播讲话是他们的领事官员的声音。“请您把见到了我和我谈话的情况告诉世人。拜托拜托，终生感激。”这时，我情不自禁，感谢这个前日本领事馆外交官、现日本国战争俘虏广播员、和平战士对我的信任。易地相处，如果我身在类似他这样的境

遇下又将如何呢？怎么办才好呵！

就在这天晚上，几个官方朋友用汽车把我送到机场。我们站在漆黑的场地上，注视着东方山头上空一线耀眼的红光。这是一架从香港运银行钞票的特别飞机。我是飞出中国的唯一旅客。一部汽车载着压砂石卸入机舱，不久，我们即升入漆黑的太空，飞越日本防线向香港飞去。

五十六、香 港

清晨三点，我坐在飞机上俯视香港，黑暗沉睡的海洋闪动着柔和的亮光。景物这样可爱真是天下罕见。我知道在这样漆黑不见五指的夜晚，中国的船只静悄悄地偷过海峡驶到广东海岸的港湾深处，许多骨瘦如柴的苦力挑着船上走私的货物向遥远的内地快步飞跑。自一九三八年底广州沦陷以来，偷渡走私如是进行，香港落入日寇手里以后照旧如是。

我们在一片灯火下着陆。接待我的英国官员很有礼貌地拒绝检查我的手提小皮箱，并且代付车钱把我送到早已为我订好的一间富丽辉煌的旅社里。我战战兢兢，在四壁无尘宽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有安乐椅，闪闪发光的穿衣镜，雪白的床单和洁净的洗澡间使我自渐形秽，柔软的弹簧床使我后半夜久久难以入睡。

然而，香港政府医疗服务中心主任的夫人希弥达·司徒永觉一大早就来了。我到华丽堂皇的玛丽皇后医院就诊以前，她问我想要点或买点什么，我说我想吃点冰淇淋，于是我俩过海湾，清早八点半走进一家萧条的旅社休息室要一杯冰淇淋，服

务员吃了一惊。希弥达建议我买了两件睡衣，然后信步在一小药房前面停下来，里面贮存的医药物品比我在中国前线任何一个部队里所见不知多多少，这使我受不了，橱窗里面充满妇女用的漂亮日用品。我什么都不要，仅买了一把牙刷，一瓶牙膏和几块肥皂。

玛丽皇后医院院长打量着我，有条有理的把我安顿在面临苍海的一间华丽的病房里，接着他飞跑去找香港政府主要医事顾问，为我去请看病的主治医师保尔·B·魏京生。院长挥舞双臂，直忙招手呼喊：“一个脸色很难看，身穿伙夫头衣服的女人刚才突然来了。”魏京生医生一直宽他的心，一再告诉他，尽管病情着急，但她有一颗“惊心动魄、令人神往的胆囊。”

后来几个月，我同魏京生医生虽有时争论，但始终友好相处，他是一个这样的英国人：身在遥远的地方就非常爱自己的国家。他是一个隐姓埋名的遁世者，喜欢想他的过去，生活在古典文学和医学研究的世界中，随时摘引拉丁希腊文字，博得医学院学生的敬畏。他来香港不过几年，以前他驻扎在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只有黑人相处，仅同黑人打交道，他总说黑人非常自负、自尊、敏感。妇女到他那里求医看病时，来以前总要洗澡沐身，做新鲜的绿叶小围裙子穿上。

魏京生教授对富有的中国人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对穷苦的中国人则和蔼可亲、满怀敬意。香港警方对我打过招呼，在港就医逗留期间禁止我写文章、作演讲，参与公开的社会活动。然而，魏京生博士有一天在上课时，离开讲坛让我对香港大学的医疗系学生发表讲演，谈中国战场上伤兵的情况和需要。他从中插话劝毕业生参军，到祖国的军队去从事医疗工作。我的

讲演结束后，他用最温和的英国腔调念了一首莎士比亚的诗。他说我的“讲演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对学生们犹如耳边风，不会有什么影响。幸运的是有三个学生志愿投笔从戎，去内地参加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和伟大民族解放战争。

我的病经过医院治疗后，承蒙香港主教罗伦德·霍尔博士的款待，住在他乡间的家里。我同主教很快成了互相信任的朋友。他和我的朋友希弥达一样，致力于各种救济中国伤兵和老百姓的慈善工作。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一个种族矛盾阶级矛盾极端错综复杂的英国殖民地，这种生活谈何容易，肩负的使命并不轻松。从我的观点方法看来，是绝对办不到的事。他同希弥达以及希弥达的丈夫皮尔士·司徒永觉博士并肩战斗，和种族差异阶级差异作战，力求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一类社会改良方案毫无成效，工会本来可以大力支持他们种种改良的，英国统治当局很久以来却一直对工会采取高压手段。

霍尔主教跟我讲过一件小事：他获得日方许可去广州观光，下船时目睹他前面一个背上背着一个婴儿的中国贫苦妇女，带了一听喂孩子的高价奶粉。日本哨兵一见就从她手里夺过奶粉，用刺刀捅开、把奶粉撒在她脚边的泥地里，然后放行。

我很快成为一个从事中国救济工作的英国团体的一个成员。这个小团体的男女人数不多，但很积极热心。希弥达是这个团体的带头人，她是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的秘书，英国各种救济团体和美国援华医疗总署的医药物资均经过她的手里运往中国的经手人。她还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秘书。没有她的出力奔走，保卫中国同盟很难开展工作。作为

一个高级官员夫人，她还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产儿，并不鄙视劳动，亲自动手干打字、接电话等一类工作。在她的办公室里，我遇到各式各样的香港中国救济工作者，其中有一个美国红十字会代表，他领的薪金为数惊人，叫人恶心。大小官员说希弥达泼辣放肆，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有人说她随意玩弄总督乔福利·罗富国，一有机会达到目的，她是心狠如铁的。

香港虽说是以英国殖民地自居，战时保守中立，实际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战争租让的一块大陆领土。在香港生活旋涡里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种种畸形状态。拥有巨大财富的中外银行资本家麇集在这里，中国四百家百万富翁逃往香港避难。有的首途赴美。后来我听说这些人在上流社会中，以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人士出现。他们如果代表人民，他们如果代表中国，神州早已陆沉。几十万中国贫苦难民在香港这块殖民地寻求棲息安身之地。可怜流落他乡的姑娘，有的不到十四岁的小小年纪倚门卖笑，到茶楼酒馆戏院舞厅卖身谋生。警察和守门人从她们身上榨取小费。

每天下午，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云集在大旅馆的休息室阴暗角落里，举行鸡尾酒会，密谋策划，交谈生意经，消磨时光，等待有朝一日国民党军队为他们开路，以便回到他们失去的天堂，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汪精卫的代理人在他们中间公开露面，有的是金钱，拉拢收买，如蝇逐臭。香港有的是这类人物，例如，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回慌忙火急地离开茶桌走进我身后一道门消失了。原来是上海青帮头子，鸦片贩子臭名昭著的中国黑沙皇杜月笙其人到房里了；杜某人现任中国红十字会指导部副主席。他们几个帮手现在居然共赴国难抗起日

来，而其他的青帮喽啰则媚颜事敌，认贼作父。比起指导部里有两三个家伙阴谋赶走林可胜博士而以青帮某人代替的两三个委员来，杜月笙其人还不那么令人讨厌。这些人等热衷于争权夺利，对伤兵漠不关心。对这些人，我从来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对他们当面说出我的意见，因此不言而喻，我再返中国的机会是失之交臂，机会很难得了。

我的中外朋友有时被人们称为“政治文化人”。为了一个目标争取中国的自由解放而工作在一起，同中国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思想上的分歧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这批人里面有两个英国共产党员的事例可见一斑。一个青年人在欧洲大战开始时回到英国去参加皇家空军，可是一到英国才了解英国共产党对这次大战的态度，认为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于是他彷徨了，回到香港，救济团体支付了他的旅费。我个人看不出世界上任何英国人，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当纳粹侵略迫在眉睫威胁当头的时候，除了战斗，此外还能作什么。

在中国和香港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日本人会进攻香港，也知道日寇进攻香港只是更大战略的一个小插曲。日本人鼓吹渲染过这一套田中奏折里甚至提纲挈领谈过进攻的计划。他们通过中越边境向南集结部队，准备侵略泰国。几年来日寇在缅甸的活动非常活跃，两家缅甸全国性大报是亲日的。进入中国的滇缅路开放时，号召仰光工人总罢工抗议海运武器援华，可见日本影响之大。日本谍报人在阿富汗、印度、荷属东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国活动多年了。虽然印度国大党援华抗日，但是许多恐怖主义分子都同住在日本多年的印度人纳什·比哈里·薄士有勾结联系。

因此我们知道日本人进攻香港的时间快了。香港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言过其辞道破了真相：争夺香港之战没有必要，因为它“象一个烂熟了的果子”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另一个日本官员对美国总领事说，日军只要破坏供水系统就能占领香港。日本人可不是光说不练，他们开始占领靠近香港的广东沿海港口，强迫民工修筑飞机场，切断香港和內地的联系。

香港政府在香港防务上花出了几千万英镑，而且还在新区兴修过山的新公路。房屋住宅堵上了沙袋，通往九龙的公路都有特别岗哨检查。日本人可知道每一个炮位，每一处沟道里的军火库，每一道公路上的急转弯，以及英国人花大笔钱财在修盖新的地下掩护所等等。

香港的空军力量只有三架旧飞机，晚上以每小时一百英里在上空盘旋，以便探照灯部队演习。我们常坐在香港大学历史教授诺尔曼·法兰士家里的阳台上注视飞机防空演习，说“空军出动了，全部三架！”法兰士教授是香港志愿军炮兵队队员，是英国共产党反战的党员之一。但在香港保卫战中不幸牺牲，他在日本人进攻香港时英勇战斗过。

英国当局估计防卫部队的战斗力量能支持三个月，到时乐观估计英国海军从新加坡前来支援，或许到时候美国会参战，海军援军可以从太平洋门户守住亚洲，当然还有美国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美军基地。等等等等。

有些英国人争论说，香港无足轻重不值得英国海军或美国海军的援助。香港弹丸之地只是牵制和吸引日军转而更重要的目标，可以牺牲的前哨基地。为了大英帝国的声望而战，将有无

数的人战死沙场，我听到一个医生这样说。然而香港该怎么办？是放弃不顾无所作为？还是归还给它的合法的主人中国？难道中国守不住它吗？大多英国的男女绅士们，包括法兰士教授和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为之而战死的人们在内，对整个大英帝国并不那么关心，什么声威不值一谈。他们感兴趣的是，保卫英伦三岛。他们之所以留在香港是出于道义感。如果他们扬长而去就会被人看作临阵逃脱懦弱可耻。妇女儿童多数已撤退到澳大利亚，少数到菲律宾去了。留在香港的参加抗日的医务工作训练。里面有我的朋友希弥达。她和她的丈夫以及我的其他许多朋友后来都当了日本人的俘虏。

有些英国人惊醒到危险，但种族和阶级偏见是他们的致命伤。

许多英国官员一提到中国人就非常看不起地说，是“第三等强国”。一旦日本人同英国人打起来，“中国人就会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意思！”香港志愿军团里有好几百中国士兵，都是顶呱呱的健儿，可是英国士兵妄自尊大拒绝同他们在一个池子里洗澡。不但这样，而且英国人认为并不值得同中国政府谈判讨论香港的联防作战问题。我和一个英国官员在宴会桌上进行过一场辩论，他说中国人微不足道，要行的话早就守住广州或夺回广州了。我说英国人也微不足道，要行的话，到现在就不会出售铁屑给日本人。一个英国将军说罗伯特·寇雷吉爵士应该代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凯尔爵士驻在中国。寇雷吉爵士是臭名昭著的亲日派头目和绥靖主义分子，这个英国将军更进一步在排华亲日的立场上走得更远。

我在许多圈子里象鱼儿在浅水里游一样活动。香港警方仍

然禁止我发表讲演和写东西。我同他们争论的时候，他们就说香港是中立区和桥头堡，容许我讲话就是破坏中立。我在日本人看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日本黑名单上列的许多外国记者和广播员里面的一个。

香港政府的中国代表扬言要把我的问题向英国下院提出，只是在这以后对我的禁令才松弛下来。这以前，我已在“私人集会”里作过讲演。这些集会在香港大学学生中间、在救济团体、中英文化协会，有时在美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罗亚尔·黎翁纳德上尉的家里举行。

香港地方弹丸之地毕竟太小，容纳不了搞阴谋“犯罪活动”的君子。我在一次私人集会中间极力劝告中国大学生们天天参加军事训练。这时我发现负责香港民政事务的英国上校胖乎乎的面孔在盯着我，这位绅士先生的出场引起了一个满天飞的笑话，稍使我的心得到慰藉。这个英国上校以前想把香港殖民地所有反纳粹德国的难民驱逐出境或集中关押，开明的罗富国爵士总督要他说明理由为什么。

胖乎乎的上校说：“哟，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不喜欢他们的面孔！”

总督说：“哟，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也不喜欢你的面孔！”

尽管香港的局势混乱，问题成堆，矛盾重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它还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它是进入中国的门户。摩顶放踵熙熙攘攘的中国人众，加以外国新闻记者、作家、军事考察人员和过路游客的人群川流不息。许多外国人逗留香港的时间比他们在酒吧间、舒适的旅馆长廊里逍遥的时间更久，这是

一个讨厌的地方。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但套上过时的帝国主义机器枷锁的英国青年心灰意冷，百无聊赖，看香港始终一片黑暗。敌人即将进攻香港的危险使我们大家极度紧张，彼此见面总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明天说不定就完了！”

有些英国人特别是苏格兰人某些方面使我喜欢。苏格兰人虽然生硬乏味，但富有古怪的狂想气质。某些英国人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们不但能把我变成中国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还能把我变成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例如，有一个英国人对我说：“美国人出于忌妒不喜欢英国人”。“看在上帝的份上，忌妒什么？”我问。另一个英国人对我说“英国人正在为美国人而作战，美国人将为最后一个英国人而作战到底的。”

我反驳道：“难道英国人会为最后一个希腊人作战到底吗？”有些英国人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人如何沉默寡言，具有教养，而美国人如何粗鲁庸俗崇尚浮夸。可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地道英国血统出生的英国人，有的既不沉默也不庸俗，有的崇尚浮夸如星条旗国歌一样夸夸其谈，不着边际。我有一个苏格兰朋友，青年大卫·麦克唐纳，派到香港作一名小公务员。负责分发情报部新加坡出版的无聊小册子，麦克唐纳是香港情报组组长，自己出版的东西我见他没有看过一本。反而看一些“讨厌的”左翼文艺作品。他在保卫香港志愿军团里服役，后来在香港保卫战中负伤，之后他同一些中国人、英国公务人员逃到大陆，在游击队帮助下转赴内地。

另一个苏格兰朋友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柯林·麦克唐纳。他深受国民党中国没完没了拖延时间的影响，以致《泰晤士报》总是不断写信电催建议他有必要时常写点文章寄给报

馆。柯林说他认真考虑信电提出的建议，常年累月大伤脑筋地是他不写为妙。还有一个英国武官也深受国民党中国的影响。他说“十个中国人有九个骂我，只有一个中国正人君子说好，真该死！”

而路过香港的美国人士与众不同。有些人喜气洋洋，满怀自信，精力充沛，到中国访问两三个星期，回国后就能写出两大部头书。有些人严肃认真，在台上大吹大擂发出可怕的吵闹，使得全美国人享有不佳的令誉。沉默寡言、态度温和的伊文思·卡尔逊上次过港迎得人们的欢心，这回又为了工合运动去中国访问了。

美国陆海军情报人员成群结队出现在香港，但他们是前往埃及的过客，取道重庆，飞越滇缅路到仰光，然后经新加坡、印度、中东。还有路过此地前往苏联的作家伊尔斯金尼·卡德维尔和马加里特·波尔克一怀特。伊尔尼斯特·海明威忽然来港，大请其客，欢庆他最近文学上的胜利，为我们讲遥远的故事。他说在美国爱达荷州的酒巴间舞会上痛打亲戚内奸，一天晚上他和一个海军军官拿出大刀示威说杀人如砍瓜切菜毫不费力。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旧病复发来港看病。我在他的大姐夫孔祥熙博士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他，有几个外国友人曾经安排我和蒋夫人见一次面，但我为本身利益着想还是不大乐意去接受她的侍从卫队们的盯梢。我趁她的人马不在之机，和她相见，发现她很有学问，仪态优雅，妩媚动人。同富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善于打扮，她精于修饰，但我怀疑她是需要一笔钱财才能过日子的。由于岁月催人老，她的姐姐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比她老

而忧伤得多。而她的自信和权力则日益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住在香港的女作家艾米利·哈刚刚完成她的大作《宋氏三姊妹》。宋氏三姊妹值得出一本书。但是同某些外国人士想法相反的是，宋氏三姊妹并非中国唯一能干的女中人杰，我总是认为单单宣传她们三个是很不幸的事。我经常感到奇怪的是，如果宋氏一家人出生无名穷苦之家的中国战区、作牛作马的贫苦无名的家庭遭遇又将怎样？只有那些在军队里、在人民中间无视艰难险阻、勤奋工作、随着年华流逝而增长才干能力的医师、护士、政工干部、学校教师等等中国妇女，使我终生敬佩，特别是那些在斗争中献出青春壮烈牺牲默默无闻的中国妇女使我永世难忘。

有一些在激烈的战争熔炉里锻炼成长的新中国女性，许多方面赛过了美国女性。这样一个妇女和我在霍尔主教的家里同住了一个时期。她的名字叫肖红。她的命运是典型的。一九三一年日寇侵略东北，她逃离家乡，她不但逃脱了敌人的魔掌，而且逃离了富有的双亲为她选择的丈夫的婚事。她刚在九一八事变前到北平，以后流浪到上海、武汉、寄居重庆。她的处女作《生死场》正是鲁迅向中国大众推荐的一本由中国妇女作家写作的最有权威的小说。这以后肖红姑娘写了另外三本书，包括她和我同居香港时写的一部战时小说在内。她同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这些作家挣得的钱只够维持苦力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肖红也和许多同道一样，得了肺病。我让她进玛丽皇后医院治病，直到香港沦陷以前给她提供经济补助。日寇占领香港后几天她不幸去世，享年二十八岁。

日本人在香港大屠杀以前，把从中国学到的一套政治权术付诸实践。他们首先把自己装扮成把中国人从白种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救世主。当肖红的丈夫申请火化她的遗体把骨灰带到上海葬在她的“导师”鲁迅的墓旁时，日本人同意了他的请求。日本人的策略在某些方面如是巧妙，而对大英帝国在香港的政策又极力清洗其污浊、影响，致使一些中国人选择在香港当顺民，不愿回祖国去战斗。

我要是当了日本俘虏的话，丝毫不抱任何幻想。美国总领事把我的名字列入日寇进攻香港时用紧急飞机送往中国的名单里。我的慢性病还未痊愈。除了宣传活动在林可胜博士指导下为整形医院筹款以外，只能做一点点写作。如果我回到中国我将完全不能写作了。反动势力在中国正张牙舞爪，不但对左翼作家，甚至对如工合、红十字会医疗队等一类无党派团体组织施加压力，进行迫害。

因此我考虑回美国去。但我还在拖延时间，希望千变万化神秘莫测的情况能使我返回中国。有一天，一个美国飞行员使我高兴，他劝我不要回美国去：“哎哟，老大姐，你难道不晓得你回美国以后跟那些陌生人一起不会有什么幸福吗？”

他的话完全正确，然而我还是决定回去，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我已成为中国广大斗争的一部分，当我在香港遇见英国人和我们美国人时，开始认识到这个整体与部分，如血肉相连不可分离。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依然如故，还是一个美国人。说到底，我已经成了那些到处无家，寄身异国的可怜的人儿之一。

时间在夏天，香港沦陷前，我首途返美，由于日本人对停

泊日本港口的美国船只上“需要的”美国人进行盘查，所以我不敢取道日本。于是我决定和一家挪威轮船公司办交涉，他们的公司船有好几只被德国强盗击沉和俘虏的事，我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在严密的灯火管制下慢慢横渡过了太平洋。

船上有十二个旅客，有三个圣灵降临节教会的修女，一个和我同一房舱。她连希特勒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三位小姐来自美国南部。她们在老家都有黑奴女仆。她们在中国都有中国佣人婢女。她们讲述天堂是这样的地方：真正的虔诚教徒将永远永远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不大虔诚的将成为她们的仆人。因此她们一旦上天堂就有福了。

另一个旅客是一个加入中国籍的比利时神父。关于中国许多问题我们有共通的看法，因此我们在太平洋上四个星期中间消磨在有关宗教和社会的未来等问题的讨论上。船进圣比得罗港时，我们俩人倚靠栏杆，神情沮丧地注视水面上浮动的三辆日本坦克，正慢慢地朝远东开去。

我们盯着坦克身上涂着的日本太阳旗时，年青的比利时神父说道：这些东西始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悲惨的“九一八”。

自从我当年离开家乡，一眨眼二十二年过去。新一代已经出生，长大成人。流行一种对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使我完全陌生，商业万能主义似乎高过一切，它已深深渗入美国生活和文化的核心。我刚登岸，就来了一个洛杉矶女记者带我到广播电台，希望我对中国发表广播。年青的电台台长问我第一个问题是：

“您的无线电播音拍卖记录呢？”

他在问什么，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告诉我们美国人民一点真相，你首先必须推销他们的肥皂、癣药、便秘精。

尽管如此，我偶尔还是发表讲演。有一回我跟一群实业界人士讲我对销售战略物资给日本的想法，他们里面一个人说我“存心破坏一切”。我问一个青年实业家他看什么书，他回答的话语几乎和我听到一个中国官员说的话一个调子：“我自从离开大学后就不读书了。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吃饭，有时看电影消磨时间。”我把他跟我所见到过的中国战士们相比较，我真高兴，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最使我吃惊的是美国的妇女同胞。工人阶级妇女有她们的家和子女，此外是中上等阶级妇女的人海，中间很少有工作的。她们同所处社会主要活动很少联系，这方面甚至还不如中国妇女。洛杉矶市政大厅的男会员们告诉我，如果准许妇女入会，他们就要退休了。妇女“俱乐部”似乎是妇女们填补空虚生活尽力一走的地方，我在一个俱乐部里讲演时，只见我前面一间大房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白亚麻布衣衫，雅致的服装，珠宝首饰正如穿戴这些东西的家伙一样，毫无用处，装模作样。

我又在圣地亚哥遇到伊文思·卡尔逊，我们讨论了我们周围国家的前景预兆，到处都是浪费和大手大脚，加利福尼亚州人们没有汽车就不能生活。各种难以理解的迷信泛滥滋长，如一潭死水上面升起的泡沫上下翻腾。电台广播员也在广播站占星术，告诉人民根据星象栽种园庭安排生活。林德伯尔洛在好莱坞狂饮中吸引了两万五千观众，参议员韦勒在电台歇斯底里

广播说，到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党攻击罗斯福总统，说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政府当局是帝国主义分子，比较客观具有才智的人都不能否认，印度提供了血淋淋的证据。但是我们自己含糊不清的倾向却留下推测的余地。六月二十二日以后也罢，十二月七日以后也罢，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我离开中国的决定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很难满足。我自知犯过许多错误屈指难数，我尽力作了一点有益的事。至于未来，我照旧还有一件大事要做，这就是把中国的真相，中国人民如何英勇战斗仍在战斗不息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美国同胞。“告诉你们美国同胞，请告诉你们美国同胞”，钟毅的话我永远记得。我曾经发誓尽力而为的……。